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西方  
人文主义  
传统

〔英〕阿伦·布洛克 著 董乐山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B82-61

B982

[英] 阿伦·布洛克 著 董乐山 译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西方  
人文主义  
传统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036828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 Copyright 1985 Alan Bullock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英)布洛克著;董乐山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

ISBN 7-108-00976-5

I.西… II.①布… ②董… III.人道主义-思想史-西方国家 IV.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908 号

|      |  |
|------|--|
| 责任编辑 | 冯金红  |
| 封面设计 | 罗 洪  |
| 版式设计 | 彭丹莉  |
| 出版发行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br>(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
| 邮 编  | 100010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排 版  |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
|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
| 版 次  |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br>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
| 字 数  | 242 千字                                     |
| 印 数  | 00,001-10,100 册                            |
| 定 价  | 18.60 元                                    |



#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 译 序

董乐山

正如本书作者阿伦·布洛克所说,对于“人文主义”一词,没有人能够作出使别人也满意的定义。即使在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西方,这个名词也含义多变,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对它作出不同的理解。甚至在素有权威之称的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里,它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

至于在中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别和语言的隔阂,以及由此而致的翻译上的困难和局限,不仅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内涵没有一致的认识,而且在译名上也出现了混乱:有译为人文主义的,也有译为人本主义的;有译为人道主义的,也有译为人性主义的;更有主张仿唯物论、唯心论而译为唯人论的。其次是,如果上述各种译法,都是人文主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具体状况下的表现,那么出现不同的译法,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一词多义,一词多译本来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正如其他一些抽象名词一样,一旦译成了汉语以后,人们对它们

的理解往往绝对化了，或者根据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衍生了与原意有所出入甚至背离的含义。人道主义原来本是人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也就是为了强调人文主义这个新含义时所采用的译法，凡是了解人文主义的发展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人道主义一词一经在汉语中确立，它就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涵义。有人不仅把它同人文主义视为两种不同的概念，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人文主义不过是狭义的人道主义，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就是由于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没有一致的理解，说得不客气一些，甚至连概念也没有弄清楚，以致在有关的讨论中，匆忙披挂上阵，进行论战起来。结果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混战一场，不了了之，问题仍没有解决，倒把观战的读者弄得益发糊涂了。

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对西方文化思想缺乏比较深入和透彻了解之故。过去中国虽有两次西学东渐，但主要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两次都不深不透，近乎一知半解。最近这次虽然因为新思潮新学说纷呈，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但还未深透就戛然而止，以致烧成了不少夹生饭。不是有著名政治学家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吗？在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但发生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至于把民主理解为“当官要为民作主”而犹理直气壮，那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

由此可见，要避免发生概念上的混乱和由此而致的无谓争论，对人文主义一词的来源和它的涵义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当然主要是西方各国）的作用，作一番追本溯源的探索——也可以说是大学一年级课程的补习——是十分必要的。

要进行这样的补课，作为第一堂绪论，英国史学家、牛津大

学副校长兼圣凯塞琳学院院长阿伦·布洛克(年轻时曾以《希特勒:暴政研究》一书饮誉史学界)的这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可说是一个比较简明而又详尽的入门课本,因为本书原来就是布洛克应美国阿斯本学会之邀去纽约作的几次讲座的讲稿。它从文艺复兴(这就离不开希腊和罗马)开始,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广泛地论及了人文主义在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建筑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和贡献。实际上,这就是一本简明西方主流思想史。

由于人文主义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思想混乱,译者本来想以“西方主流思想史”作中译本书名。但是既然本书有追本溯源,弄清概念的作用,改换书名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译本仍用原来的书名。

不过,这并不妨碍译者在人文主义一词上从翻译的角度再来饶舌一番,也许这对弄清概念有所帮助。是否有当,就要请读者包涵了。

人文主义一词的英语原文 *humanism* 是从德语 *Humanismus* 译过来的,而德语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甚著名的教育家 1808 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 *humanus* 杜撰的。其实德语该词也不是这位老夫子所独创,早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先生叫 *umanista*, 把教法律的先生叫 *legista*, 他们所教的课程统称为 *studia humanitatis*, 英语译为 *the humanities*。而 *humanitatis* 又源出于 *humanitas*, 意指人性修养,把它译为人文科学不知是否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谓人文,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却是指礼教文化,在字面上

与 *humanitas* 甚为吻合,但从内涵来讲,就很难说了。而在现代汉语中,“人”与“文”合起来似乎不能构成一词,若不知其出处,难免不发生概念上的混乱。

如果人文主义可仿唯物论、唯心论、唯理论而译为“唯人论”,那么它也可以仿科学、哲学、化学、文学而译为“人学”。前几年不是有一些作家发过“文学即人学”的感叹吗?那么所谓人文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又何尝不然。或谓这易与人类学混淆,但人类学顾名思义是一个专门学科,只能包括在“人学”之内,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就像物理学是科学的一个专门学科,不能与科学相提并论一样。

但译者才疏学浅,不敢贸然从事,把习用已久的定译妄加改译,在本书书名和正文中仍旧从俗,一律译为“人文主义”。以上所云种种只是求教于识者而已。

1991年9月27日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 序 言

7

本书是作者于 1984 年 1 月至 2 月在阿斯本人文学会主持下假纽约的大学俱乐部学院堂讲学的讲稿。

作者以此来对阿斯本人文学会及其会长 J. E. 斯莱特表示感激之情，作者夫妇在与该学会交往中不仅感到十分愉快，而且得益匪浅。讲座以已故的杰西·K·埃麦特命名。我们有幸曾在阿斯本学会与她共事，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以勇敢的态度面临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些最优秀品质，我们感到敬爱和钦佩。

我希望在此对下列诸位表示感谢：爱娃·波帕尔——代表阿斯本学会组织此次讲座；茹尔斯·W·和埃莉斯·G·米德基金会——资助全部费用；拉菲尔·伯恩斯坦——大力协助将十六页彩色插图收入本书。我特别有幸承蒙我的出版商 W. W. 诺顿公司的托姆·华莱士建议把讲稿编印出版，还有斯坦莱·巴伦负责担任编辑工作并利用泰晤士和赫德逊资料馆找到插图。

在科林·威廉斯的主持下，阿斯本学会在科罗拉多州克萊斯东的巴卡·格兰德牧场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作者有幸能够从会上发表的意见和批评中获得教益，用于讲稿的修订。我还利用本



书出版的机会恢复了当初为了要在限定的一小时内讲完一次课而不得不略去的一些段落。第四次讲课时删节的材料恢复后，该次讲稿长得不成比例，在本书中我就把它分为四、五两章。尽管如此，本书仍保持了原来讲稿的形式，其内容与我在纽约讲学的内容大体相同。

在印制正文和插图的工作中，我得到了派米拉·托马斯太太和苏姗·波斯曼小姐的宝贵帮助。

我欠情最多的，像往常一样，总是我的妻子，她同我一起经历了我对人文主义看法的形成过程，并且一起灌注了热情。

——1984年9月1日于牛津大学圣凯塞琳学院

## 绪 论

我第一次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感到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初与阿斯本人文学会交往的时候。阿斯本学会像阿斯本音乐节一样,起源于1949年歌德诞辰两百年纪念会,那是芝加哥大学瓦尔特·配普克、罗伯特·赫钦斯和G. A. 波吉西在科罗拉多州的落矶山脉8,000英尺高处一个采银业败落后废弃的小镇举行的。在纪念会<sup>①</sup>上发言的有亚尔培·施维策尔\* 和西班牙哲学家兼社会批评家奥特加·Y·加塞特\*\*。后者曾在马德里创建人文学会并任会长。他向配普克建议在歌德诞辰纪念会后在阿斯本成立一个人文学会。虽然该学会后来的性质与奥特加当初建议的有相当的不同,但是它保留了他所提出的名称和他原来建议的一部分宗旨。

我一生在牛津大学度过。在牛津大学,人文学渊源流长,至

---

\* Albert Schweitzer(1875 - 1965), 法国神学家、音乐家。晚年放弃声誉卓著的学术和音乐生涯,去法属赤道非洲设立麻疯病医院,为当地居民免费治病。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 Jose Ortega Y Gasset(1883 - 1955), 西班牙哲学家。1935年起流亡国外,战后回国,著有《群众的反叛》(1932)、《协和与自由》(1946)和《人与危机》(1956)等。

少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谟\*、科莱特\*\*、莫尔,以及文艺复兴的“新学”。也许就是因为如此,人文学的含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深究。一直到我快六十岁时当了牛津大学副校长后,我才在落矶山脉上的阿斯本学会的图书馆里坐了下来,默默地问了一下自己,我所受的人文学教育与阿斯本学会组织的那种讨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所讨论的都是在社会公正、教育、通讯革命、环境、能源、军备控制等问题上,以及由于变革的影响而摆在美、日、英那样不同的社会面前的其他问题上,作出政策选择时要考虑的社会和道德的不同观点。

我在最后一讲中将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上来,但是在寻求答案时,我终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我提出的问题。我发现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名词,没有人能够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这些名词意义多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使得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伤透脑筋。

对于这个问题既然发生了兴趣,我在过去十年中就不断阅读凡是能够找到的可以适用人文主义这一名词的一切书籍,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史学家关于文艺复兴的辩论,到洛克、歌德、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威廉·詹姆斯、马克斯·韦伯、席格蒙德·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这些讲稿追溯了我所走过的道路,

---

\* Desiderius Erasmus(约 1466 - 1536),原名 Gerhard Gerhards,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曾任神职,首次印行希腊文《新约全书》,并编印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著有《愚人颂》(1509),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和教会对于人民的愚弄,抨击经院哲学和宗教偏见。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有影响,但本人并未参与改革运动,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主张理性、宽容和信念,提倡学习自然科学。

\*\* John Colet(约 1467 - 1519),英国神学家。1504 年任圣保罗教堂教长,创建圣保罗学校。曾编写拉丁语法,后以“伊顿语法”传世。

也是关于我的发现的一份进展报告。

作为暂行的假设,我姑且不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者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任何时候都会有非常不同的、有时是互相对立的观点出现,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问题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的。我能够找到的最贴切的名词是人文主义传统。

我的关于这一传统的说法能否成立,只有在我结束讲座时才能得到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从彼特拉克到歌德和马修·阿诺德\* 等对古代经典的重视及其受过古典教育的共同经验。但是我用这个名词的涵义不是指有意识地处理一种一成不变的信念或实践,而是认出——常常是在事后——某些思想和假设之间的血缘关系,比如在彼特拉克身上认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洛克身上认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在边沁和柯勒律治身上认出穆勒,在歌德身上认出托马斯·曼,在蒙田身上认出威廉·詹姆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人文学教育我这一代青年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当时是在引导我们接触这样一种传统。这个信念强烈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正如当初它也强烈地影响了许多从纳粹主义统治下逃出来的流亡学者和作家的生活一样,也像后来它决定我自己的生活方向一样。

这个传统里的主要人物所以入选,是他们自己的贡献所决定的。我在上面提到的早期的人物中,还可以加上的就只有亚

---

\* Mathew Arnold(1822 - 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提倡古典主义,作品有《文学评论集》(1865, 1888)和社会评论《文化和混乱》(1869)。

尔培蒂\*、伊拉斯谟、伏尔泰和狄德罗了。至于其他人物的入选或落选,特别是比较接近于我们自己时代的,则纯属个人的选择。任何人来开这张名单,我想也是这样。不过在纽约讲学,却由于对美国的思想史知之太少,无法对美国的贡献作出应有的估计,我特别感到遗憾。除了少数例外,我的材料都取之于欧洲来源。

讲完最后一点,我的绪论就告结束。我所使用的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这两个词适用于男人也同样适用于女人。但是我考察的传统是一个历史的传统,而到二十世纪为止,一般都把man(男人)一词也用作人类的含义。因此我在自己谈话的时候,视具体情况,分别使用男人、女人或者人类。但是当 the Fall of Man(人类的堕落)或 the Dignity of Man(人类的尊严)这类短语出现在历史的场合而我加以引用或转述时,我就照搬不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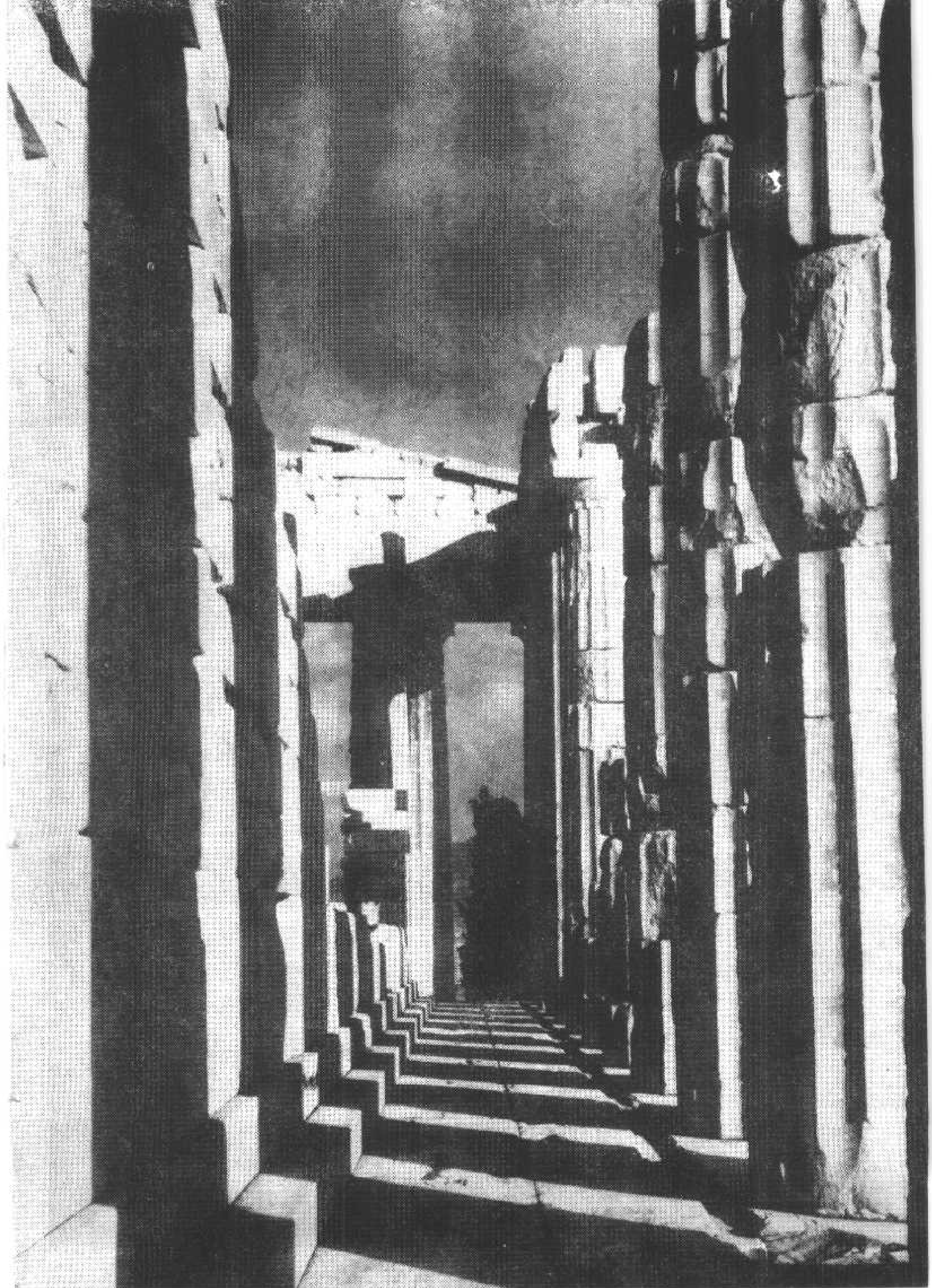
\* 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 - 1472), 意大利建筑师。多才多艺,既是诗人,又是艺术理论家,还精通数学,好阐扬道德哲学,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人”(即“全才”)。所创直接透视法为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所采用。曾设计教堂多所,著有《论绘画》(1435)。

\*\* 这在中文里似不成问题,因为一般都视具体所指把 man 译为“人”或“人类”的。

# 目 录

---

|           |                      |     |
|-----------|----------------------|-----|
| 译 序       | .....                | 1   |
| 序 言       | .....                | 1   |
| 绪 论       | .....                | 1   |
| 第一章       | 文艺复兴时期 .....         | 3   |
| 第二章       | 启蒙运动时期 .....         | 69  |
| 第三章       | 十九世纪: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 | 129 |
| 第四章       | 二十世纪:走向新的人文主义 .....  | 195 |
| 第五章       | 人文主义有前途吗? .....      | 254 |
| 注释和参考     | .....                | 299 |
| 英汉人名术语对照表 | .....                | 311 |







# 文艺复兴时期

## 一

我在进行我的探索时要遵循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不过的线索，就是要回顾一下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人文学这几个词的历史。这就把我们直接带进古人的世界。但是，我们这几个词的来源拉丁文 *humanitas* 一词本身又是一个更古老的希腊观念的罗马翻版。古代希腊人除了创造了哲学、史学、戏剧(对于这些，我们至今还用希腊文的词汇来称呼)以外，还创造了教育，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中的教育。以 *paideia*(此词来自希腊文的 *pais* , *paides*, 意即男孩或儿童，我们所用的 *pediatrics*[儿科]、*pedagogy*[教育学]都来自此词，甚至 *pederasty*[鸡奸]也是)这个

巴台农神庙

上(自左至右):彼得拉克、亚尔贝蒂、梅迪齐

中(自左至右):米开朗基罗、伊拉斯谟、马基雅维里

下(自左至右):托马斯·莫尔、蒙田、纳瓦尔的玛格丽特

名词出现的教育,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雅典逐渐系统化时,已是很古老的了。它有四个特点。

它在七门文科学科中对人类的知识作了统一的有系统的记述。这七门学科是语法、修辞、逻辑即论辩(又称三学科)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又称四学科)\*,它们在好几个世纪以后终于在中世纪为大学教育定下了最初的规模。

它提供了在一个没有书本的世界中进行教授和论辩的技巧,以语言的掌握、思想的精确、论辩的熟练为基础。

它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假设,即可以用教育来塑造人的个性的发展。

最后,人的优越性是它要发展的一个概念,它在其中还包括了能言善辩和领袖群伦这些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活跃的角色所必备的品质。希腊人认为这种角色是一个人之有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希腊及其诸多小城邦先后都被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征服和吞并,但是希腊的语言和希腊的教育却由此传播开来,从大西洋到遥远的中国边界都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希腊人的 paideia 为罗马人接了过去,由西塞罗\*\* 和昆的利安\*\*\* 在他们

---

\* 把算术、几何、天文也归为文科,今天看来似乎讲不通,但这里所称的文科是 liberal arts 的约定俗成的译法,该词原意为“自由人的学科”,系指对提高文化素养有价值的学科,与实际用途的学科相对而言,到了后来转意为与科学技术即我国俗称的理工科相对的文科。

\*\*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前 43),罗马政治家、学者、演说家。在罗马共和国内战期间维护共和原则,曾任罗马执政官,被政敌流放,由庞贝召回,后又反对凯撒独裁,维护法治和立宪。

\*\*\* Quintilian(约公元 35—96),罗马学者。生于西班牙,以《演讲术浅说》一书名传后世。全书共分 12 卷,内容涉及道德、文学和修辞教育。

的关于教育的论文中给予了标准的形式，他们的论文题目都是与演讲术有关。<sup>②</sup>

在罗马人的世界里，就像在希腊人的世界里一样，由于没有印刷的书籍，没有报纸或其他交流媒介，公共事务都是在议会和法院里面对面进行的，因此演讲术的精通掌握是获得权势的钥匙。但是这并不仅仅指把话说得动听的能力——罗马人认为人有别于动物就是由于说话的能力——而且还指能够抓住和提出论点或者批驳论点的思维能力，这就需要在文科学科中受到全面的教育。对这种全面教育，希腊文叫 *enkyklos paideia*（英文 *Encyclopaedia* [百科全书] 一词即源出于此），西塞罗在拉丁文中找到了一个对等的词 *humanitas*，他所根据的是希腊人的这个观点：这是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途径。

这一希腊和罗马传统一直到十九世纪末都对西方教育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它当然对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牛津大学最具威望的课程中受到的教育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牛津大学的这些课程叫“大课程”，又叫 *literae humaniores*，或人文学科，即以希腊和拉丁原文学习古代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思想。但是“人文主义”一词本身不论在古代世界或者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没有出现。它是迟至 1808 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 F. J. 尼特哈麦\* 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 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 *humanismus* 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 于 1859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

---

\* Niehammer 和 George Voigt 生卒年月和事迹均不详。

这比伯克哈特\* 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

如果说人文主义是后来才使用的一个词,那么在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一个词叫 *umanista*, 英文即 *humanist*, 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他们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的。就像称法律教师为 *legista* 一样。他们所教的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称是 *studia humanitatis*, 我们译为“the humanities”(人文学), 在十五世纪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学习这些科目需要阅读基督诞生前的古典时代传下来的拉丁文课文, 其中包括希腊原文的拉丁译文和希腊原文, 不过后者不是那么普遍。

这就是托马斯·莫尔和科莱特那样的英国人所称的“新学”, 即古代经典的复活或再生, 文艺复兴同它有着超过其他一切的关系, 并由此而得名。伏伊格特和伯克哈特这样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功劳, 就是把人文主义一词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 他们把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 二

这件事说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必须讲一讲, 因为它引向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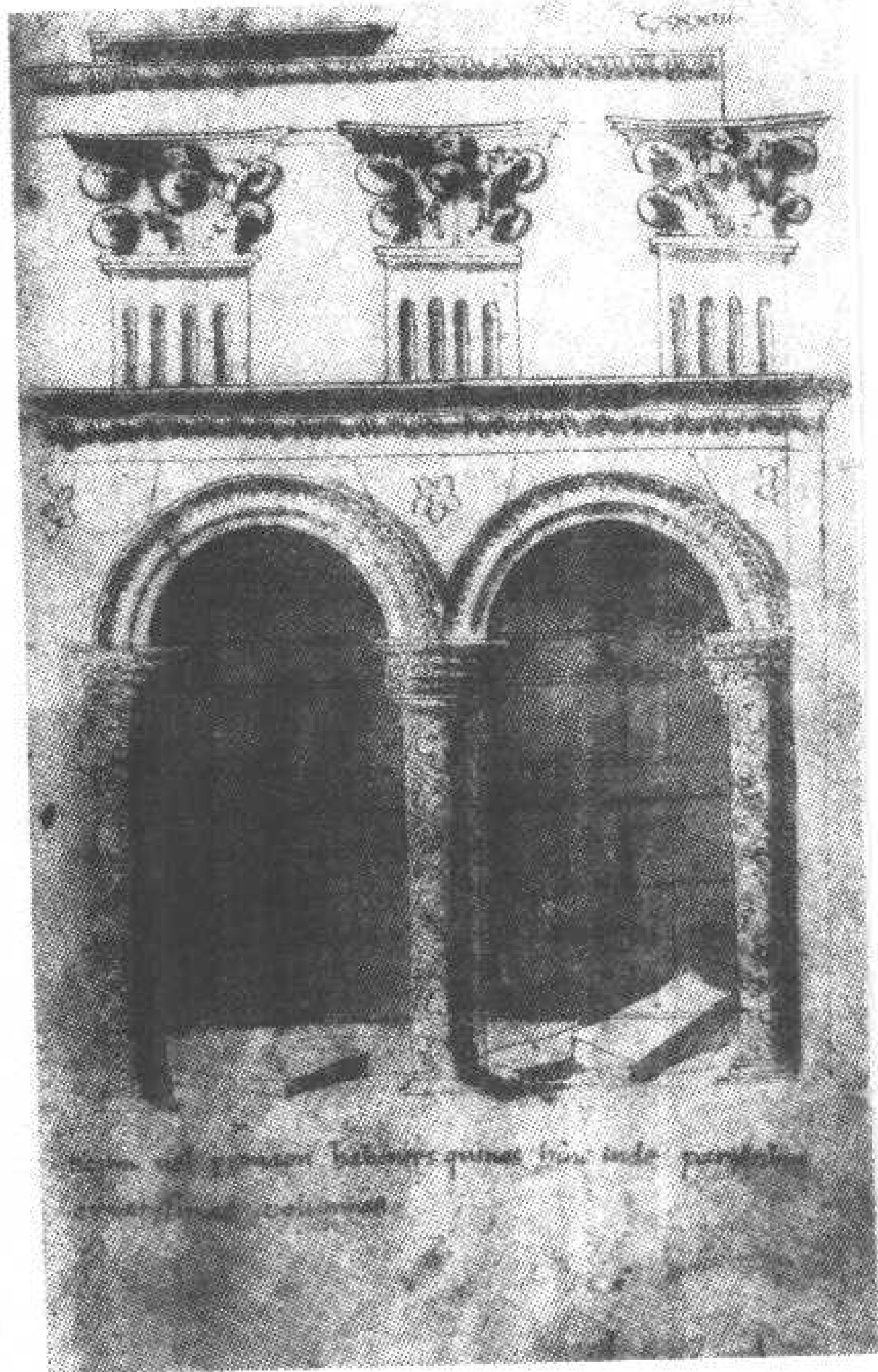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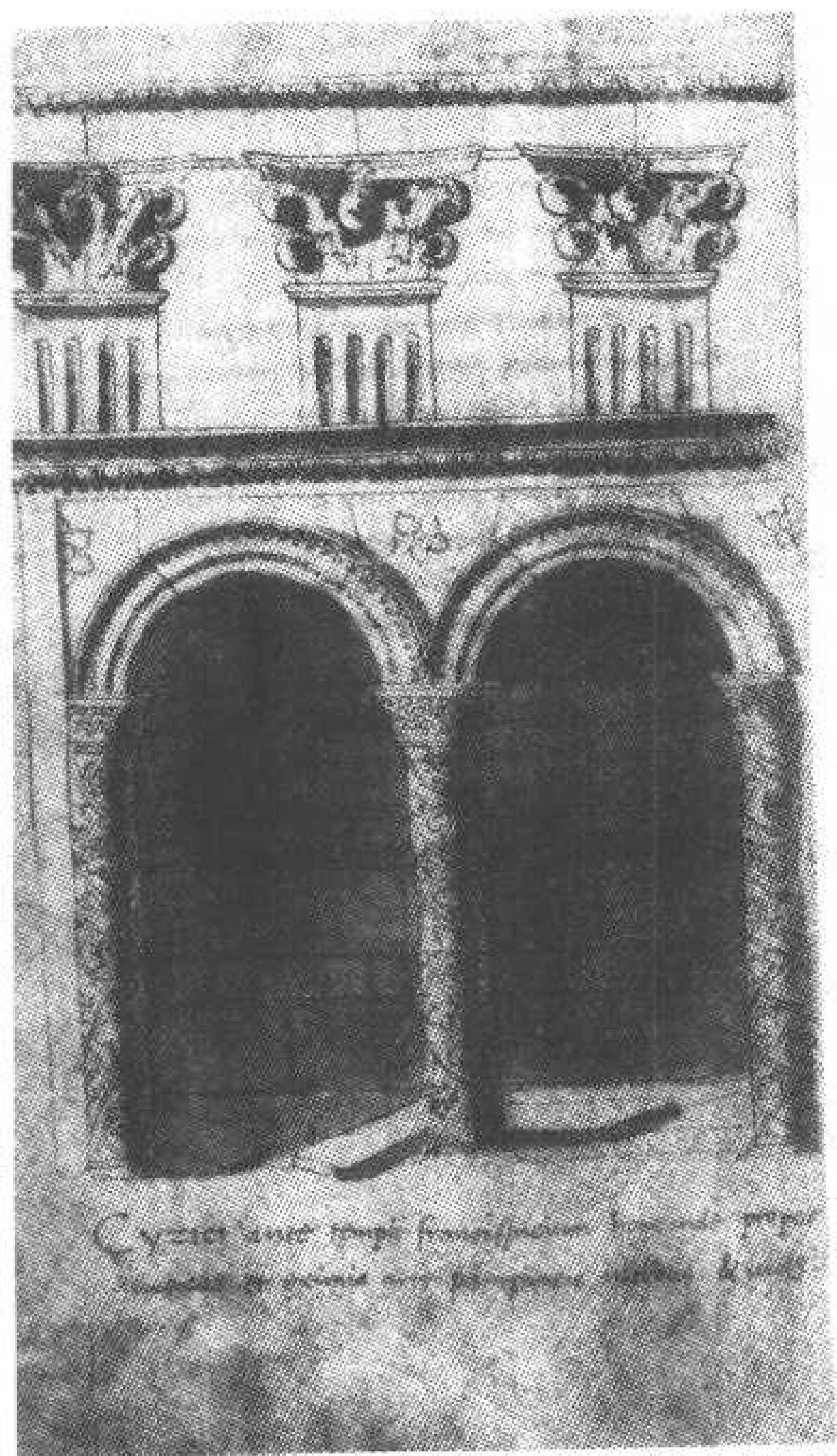
---

\*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 (1818-1897), 瑞士文化和美术史家。强调历史的文化价值, 而不是政治因素。主要著作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1860)。

围绕着人文主义一词最早的、也是持续最久的争论。历史学著作中很少有比伯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发生更大影响的。它确定了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同一性，这是每一本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以及导游书中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但是却被二十世纪一大部分专攻这一时期的史学家竭力否认。这是为什么？

凡是注意到这场争论的进展情况的人有时觉得，好像伯克哈特的批评者不在史学词汇中删去“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两词就决不甘心似的，他们认为把这两者联起来纯属神话创造，可以与独角兽和鹫头飞狮相比。不过近年来史学家们已不那么有兴趣来继续笼统地辩论文艺复兴问题，而比较有兴趣于重新检验已有的证据，并通过详细研究过去忽视的原文来扩充这些证据，因为这种研究常常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见解。在这场争论平息以后——哪怕只是由于精力耗尽才平息的——出现了一些暂行的结论，其中两个结论正好为我要进行的对人文主义传统的第一阶段的考察提供了最好途径。

第一个结论是，文艺复兴已被用来作为欧洲现代史初期阶段，也就是从1350年到1600年这么一个广阔而又多样化的历史时期的标签，因此无法赋予它一个单一的特征。以前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概括为人文主义，这已不再能为大家所接受。在这250年之间，欧洲发生了许多事情，不能把它们都称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类例子，我可以举出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另外一类例子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和对亚里斯多德的研究，不仅维持了下来，远远没有被人文主义的研究所取代，而且还在大学里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并对从哥白尼和伽利略开始的科学思想的革命性变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有人甚至认为



塞齐克斯神庙,选自安科纳的塞里亚克速写册,1475年左右  
 巴托洛米欧·方齐欧临摹

比人文主义的贡献还要大)。

这并不是说,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新学”和重新发现已经湮没的古人世界的尝试是不重要的。这次再生的名称“文艺复兴”,后被用来代表欧洲现代史的整个早期阶段,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反证。但是如果你要按文艺复兴的原来含义——对古代世界的兴趣的复活——来谈什么文艺复兴,就必须具体指明你所谈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举例来说,必须认识到这在意大利比欧洲其他地方早开始一个世纪;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意大利人文主义与北欧特有的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之间,以及在这两者与法国拉伯雷和蒙田的人文主义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二个结论是,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并没有遽然的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除了经院哲学以外,中世纪的其他思想习惯也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流传到了十六世纪,反过来,在中世纪也有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方式看待人类和人类世界的先例。<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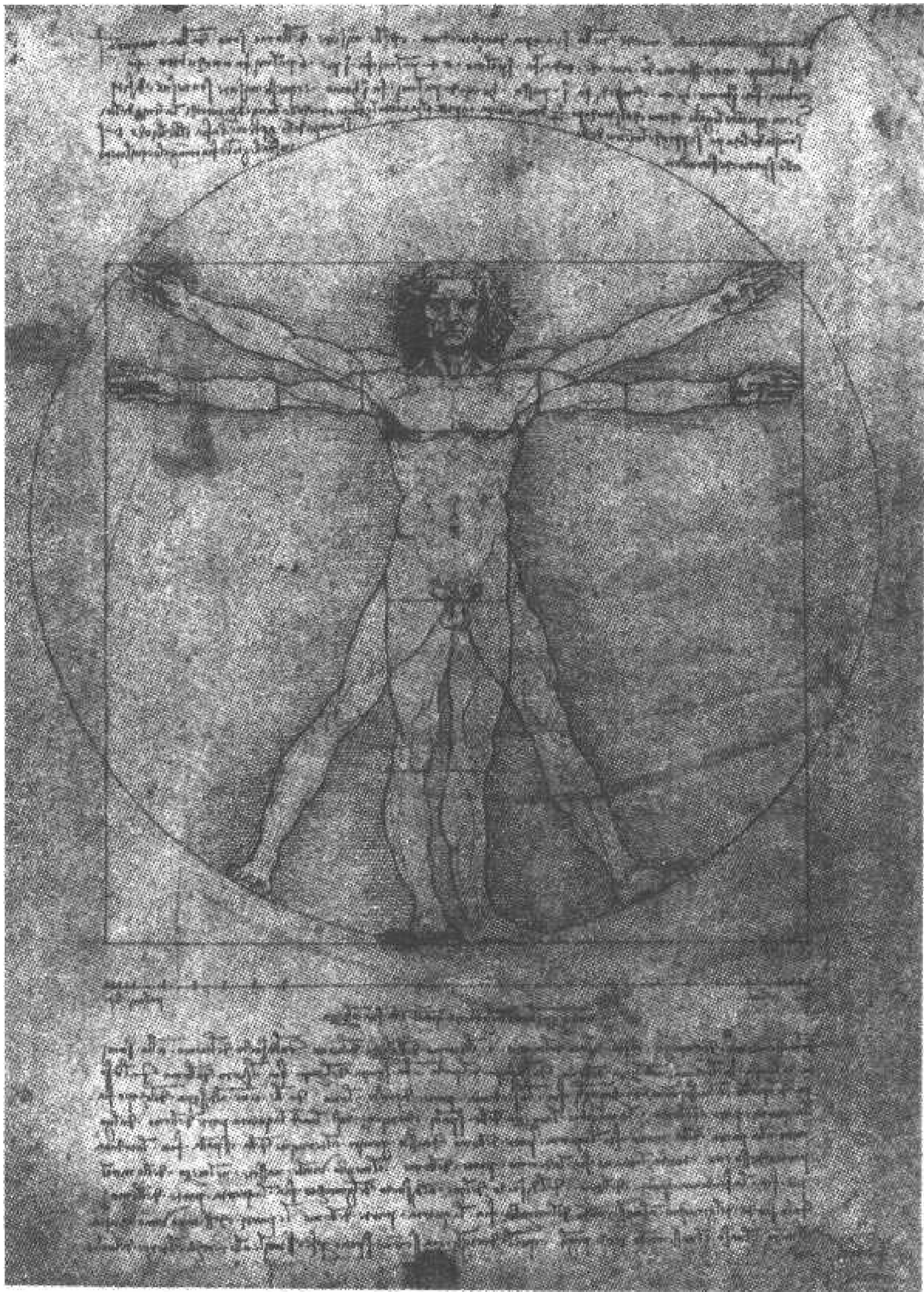
毕竟,拉丁文作为教会的语言和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已有千年历史,古人成就这么辉煌,中世纪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他们的许多知识,从罗马法到数学(欧几里德)和天文学(托勒密),都依赖古代世界。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别的诗人比奥维德和维吉尔那样拥有众多的读者;但丁就是选择后者作为《神曲》第一部的向导的,这部作品是中世纪人生观的最佳表述。中世纪的教会不得不与希腊哲学妥协,这么做的尝试不止一次,最著名的一次,不过绝不是最后一次,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是把基督教教义与亚里斯多德协调的一次尝试,为经院哲学提供了基础,经过了文艺复兴时期而仍旧

存在下来。甚至在阿奎那之前，就已查明有两次古典的复活，一次在九世纪的加洛林王朝，另一次是十二世纪的所谓原始文艺复兴。

但是承认艺术史学家埃尔温·潘诺夫斯基<sup>③</sup>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把连续性当作同一性。以我刚才讨论的问题为例，较早几个世纪看待古代世界的方式，与十四、十五世纪尤其在意大利看待古代世界的方式，有着关键性的不同。中世纪能够从古代经典中取其所需，正是因为他们与古代世界之间没有分隔感。但是不论他们从古人那里拿来了什么，不管是在艺术、神话、文学或者哲学方面，他们都把拿来的东西融化在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之中，改变了这些东西的原来涵义使之适应这一体系，而没有任何不合时代的感觉。只有到了彼特拉克和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古人的世界才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凭其自身价值而单独存在的文明，不再是一个任人劫掠的货栈。中世纪对古代世界的感觉是轻松随便的熟悉的感觉，而文艺复兴时期则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觉得它既遥远生疏，又令人着迷。他们所努力的不是吸收它的某一个特点，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极其不同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比他们自己的世界不知优越多少倍，因而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是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展了古代“复兴”的想法，创造了中世纪一词来称呼他们与那个他们自称要恢复的古代世界之间的鸿沟。彼特拉克 1337 年初访罗马时，被罗马的废墟遗址所征服，感动得“没有言词能够形容”。他改变了  
15 众所公认的历史概念，以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所代表的辉煌时代与基督教罗马的黑暗时代之间的对比，来代替异教徒时代的黑





达芬奇的绘画

暗与基督降生后所开始的基督教时代之间的传统对比。如今基督教罗马的黑暗即将被过去时代失传的艺术的复活所驱散。这个复活计划后来得到他的后人热情的继续。

毫无疑问,他们是相信这一点的。即使有所夸张(他们肯定是夸张了),他们的有了新起点的感觉仍是一个历史事实,尽管后来的研究恢复了中世纪的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而且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在下面谈到后来温克尔曼\*和歌德时代的古典复活时就会看到,古人世界的重新发现释放了新的能量,刺激了想像力,最后发现了新的真理,创造了新的形式,而不仅仅是恢复过去已被淹没或歪曲的许多价值。

### 三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这三种模式的第一种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当时的西方思想同神学有着一种特殊关系。人文主义的模式同文学和艺术、

---

\* Johann Joachim Winckle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在十八世纪促进古代艺术,特别对希腊艺术在欧洲的普及传播甚有贡献。



佛罗伦萨的米开洛佐设计的图书馆

史学和社会思想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从古代世界吸收哲学传统,但是它的现代形态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能形成。而科学的模式还要晚些,到了十七世纪才形成。这种概括过于简单化,但是很有用,不过要受两个限制。一是这种区分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组合的三种倾向之间的区分,不能作为严格的界线。二是这种区分不能作为孔德的三阶段规律的另一个翻版,即人文主义模式超越神学模式,反过来又被科学模式所超越。十七世纪以来,所有这三种模式都继续有代表,继续吸引<sup>17</sup>着信奉者,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竞相自称垄断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

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以来,人文主义的特点就是观点多

样,各不相同,这也是古代世界的特点。以权威自居的论断,不论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人类的经验都是不会予以支持的。如果说在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上,没有两个人文主义者会有一致的意见的话,那么,他们认为十分重要而必须讨论的题目范围的广泛,以及他们常常用对话进行的辩论方式,则是十分突出的。彼特拉克在十四世纪中叶就写道,“只有傻瓜才妄自尊大,不是抱着谦卑的信奉态度去接受,却要想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和更加  
18 难以了解得多的上帝的奥秘。他们根本接近不了这种奥秘,更不用说达到这种奥秘了。”<sup>④</sup>人所能做的,不如转而探索自己和人类的经验的财富。二百年后在文艺复兴末期,蒙田又重复了彼特拉克这一观点。

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人文主义者不断反复要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

这就说明了他们为什么那样尖锐地攻击经院哲学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攻击它的抽象思维推理脱离人的日常生活。彼特拉克指责经院哲学总是准备告诉我们那些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贡献的东西,即使它们是确实的”,而对“人的本性,我们生命的目的,以及我们走向哪里去”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不加理会。人们应该把他们的脑筋转到道德、心理和社会问题上去,而不要花在经院哲学的抽象问题上。前者一直是与哲学传统相对的修辞传统的核心。彼特拉克自己在他的《对策》中讨论了 250 种可能引起人们绝望或高兴的常见情况,对如何应付生活中的感情危机,提出了他的建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最不愿做的事,是用另外一种哲学思想体系

来代替经院哲学。他们的目标是,把经院哲学(不是古典哲学)所忽略了一个作用复活起来。

## 四

文艺复兴重新燃起了对古代世界的兴趣,它为什么在意大利开始了以后,要过了一个世纪才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不过有两个明显的因素很突出。一个因素是,古人历史有许多是在意大利这块土地上演出的:在罗马,那里的大广场、竞技场、公共浴室的废墟遗址至今仍是当时罗马显赫威势的无声证人;在南方,有像叙拉古那样的讲希腊话的城市;在中部和南部乡间,那里的农民在耕田时还不断地挖出古代的塑像、钱币和碑石。

另一个因素是,意大利城市由于商业扩张的结果而得到特别迅猛的发展。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成了欧洲的经济领袖,到1300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有23个城市的人口达两万八千人以上,它们大多数是被一个农民和君主政体的封建世界<sup>19</sup>所包围的城市共和国。住在城镇中的居民有相对高的比例,再加上他们享受到高度的自治,能相应地参与贸易、工业和政治的活动,即使这种参与有时表现在家族和派系的斗争上,但也起了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温床作用,并且产生了一个受过教育的非教士阶级,具有除了佛兰德斯以外欧洲其他地方从未见到过的自信,<sup>⑤</sup>佛兰德斯也存在着同样的条件。不错,在十三世纪后期和十四世纪初期,大多数城邦(虽然不包括佛罗伦萨和

威尼斯) 都开始处于某一个家族的统治下, 而且在十四世纪中叶, 像欧洲的其余部分一样, 它们的经济趋于衰落, 有黑死病之称的鼠疫夺去了它们三分之一的人口, 因此到了 1400 年意大利人口低于 1300 年很多。但是受过教育的非教士阶级的传统和城市生活的活力仍旧维持不衰, 这是人文主义得以传播的必要条件。彼得·伯克说得好: “没有城市, 就没有文艺复兴。”<sup>⑥</sup>

当然, 我们这里说的只是住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小镇中的数量有限的人。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在十五世纪时的人口不超过十万, 佛罗伦萨和波伦亚不超过五、六万。罗马人口约两万五千, 在 1400 年时不过是一个小地方集镇, 到十五世纪后半叶才由历任教皇把它变成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都。至于文艺复兴  
20 时期人文主义和艺术的其他中心——乌比诺、斐拉拉、曼图亚——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两、三万。不过话得说回来, 城市的大小并不是衡量它们成就的尺度, 另一个同时代例子低地国家, 或者五世纪的雅典, 都说明了这一点。彼得·伯克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1420 年到 1540 年之间意大利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物——人文主义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科学家——为数约为六百人。<sup>⑦</sup>如果把早一辈的人也算进去, 恐怕仍大大低于一千。如果再加上那些不甚著名的, 还有他们的作品和艺术的欣赏者——一些最最重要的赞助人和主顾, 如梅迪齐家族\*\*、斐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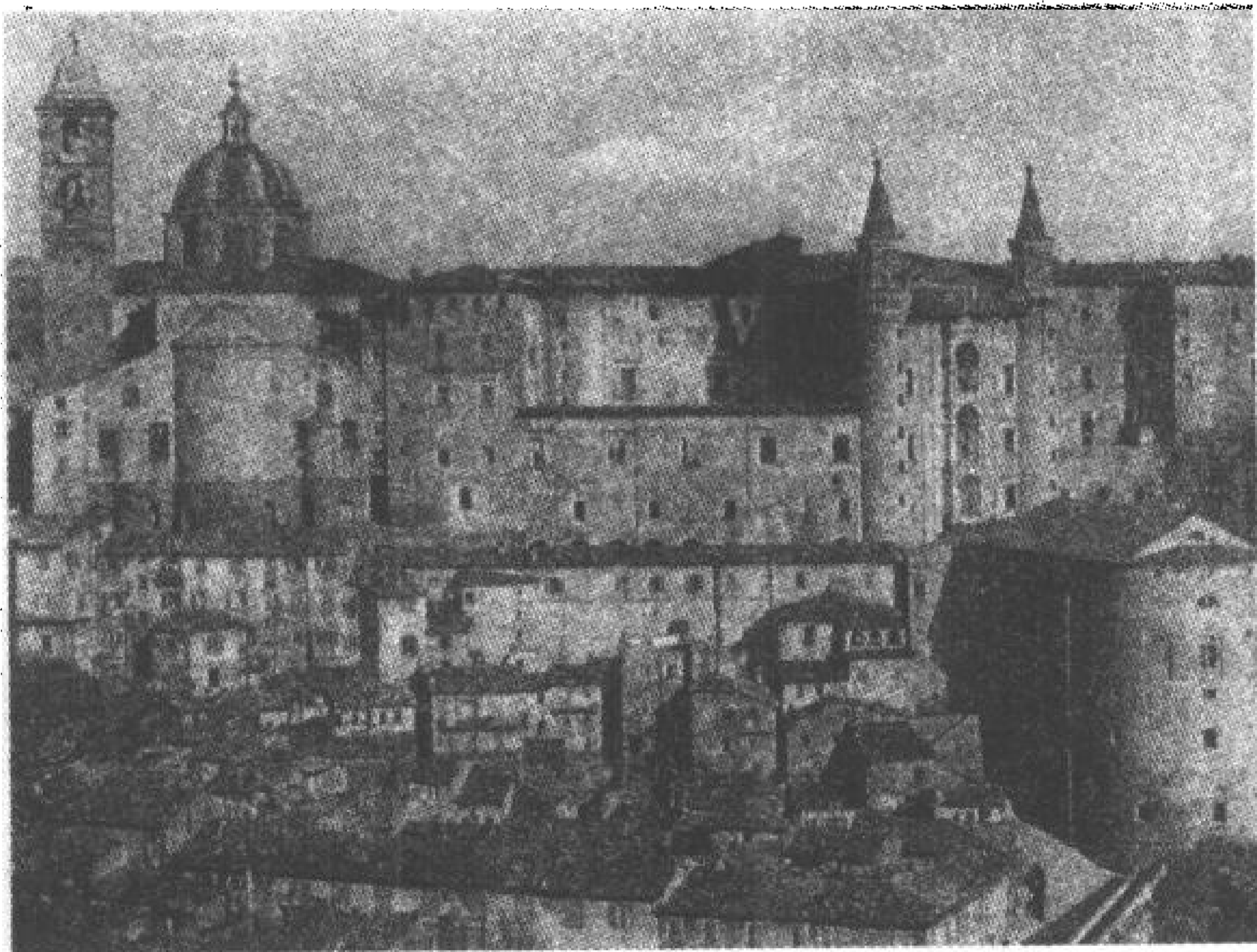
---

\* 这里指的其实是文科教师。

\*\* Medici, 意大利历史上的望族, 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统治佛罗伦萨以及后来的托斯坎尼。以经营毛织业起家, 后成为欧洲最大银行家之一。曾出三个教皇。其统治诡谲狡诈, 政变和反政变不断。代表人物有科西莫(1389 - 1464), 曾资助艺术和人文主义教育, 创建公共图书馆。在另一代表人物洛伦佐(1449 - 1492)统治下,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成绩辉煌。梅迪齐之名几乎已同时成为政治阴谋和赞助艺术的同义词。



佛罗伦萨远景



乌比诺的公爵府，由蒙特尔非尔特罗的菲德里戈二世(1422—1482)建成，他本人可谓集雇佣军首领、统治者、人文主义者于一身

拉的埃斯特家族\*、威尼斯的一些名门望族，尤其是历任教皇，还有业余爱好者、纨绔子弟、门人食客——人数仍不会超过一、二千，而且还前后分散在一、两个世纪里。然而，他们的成就和对后人的影响却很大，很少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就是文艺复

---

\* Este, 意大利一贵族家庭。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统治斐拉拉，到十八世纪统治扩大到莫德那和莱吉奥。其中埃科尔一世和其子伊波利托红衣主教(约 1471—1520)曾赞助诗人阿里奥斯托，阿尔方索二世(约 1559—1597)曾赞助诗人塔索。



兴神话的坚实基础,持怀疑态度的史学家曾经对它敲敲打打,却无法把它拆毁掉。

在伯克的六百人中,人文主义者的数目不超过一百,这符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对该词的现代用法,把它限于熟谙拉丁文(也包括熟谙希腊文,不过不如前者普遍)的人,他们以此一技之长作为谋生之道,在贵族或富家充当家庭教师,在教廷或其他宫廷官府充当负责公务信件来往或起草讲稿的秘书。通过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在意大利各城市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传播着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热情和爱好,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后代。由此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杂交文化,不是模仿,而是一种新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看法,后来显得颇有特色,到了十九世纪就有了人文主义的名称。

21

人文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用比较地道和比较优雅的拉丁文写作的的能力,以西塞罗那样的作家为模仿对象。结果他们留下了大量没有创见的、不忍卒读的得奖作文。不过打下人文主义治学方法的基础,却是他们的一个持久成就。人文主义者从十三世纪以业余者的身份开始,逐渐积累了大量知识,从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发掘出原来已散失的佚文,发展了文学鉴定的技术,来校勘有讹舛误差的版本,并以对罗马遗址的系统研究,创建了古典考古学。他们大大地改进了西方关于希腊语言的知识,并且通过对希腊原文的翻译,也改进了西方关于希腊思想和文学的知识,供那些只懂拉丁文的人学习,由此而产生了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全译本,甚至在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方面,产生了比中世纪所掌握的更加准确的译本。

只要想到文明有多大程度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判断文献纪录



约翰·阿吉罗保  
洛斯(1415 -  
1487), 拜占庭  
学者, 在佛罗伦  
萨大学教授希  
腊文和希腊哲学

22 及其真假,并能去伪存真,那么你就能够认识到那些首创这个传统和确立语言学治学标准的人的贡献有多大了。

但是, *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研究)就像它的一个组成成分、有着同样容易令人误解的名词修辞学一样,内容不仅仅是关于研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原作的语言和文字技巧,它也包括这些原作的题材——维吉尔的诗(后来是荷马的诗),李维和塔西陀的历史(后来是修昔底德的历史),西塞罗的禁欲主义和道德哲

学的讨论(后来是柏拉图的对话)。从这些人文学者的书信中,仍旧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探索一个新大陆时的兴奋心情。他们一块一块地拼凑与他们自己的文明极其不同的文明的形象,把这个文明看成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完全的循环,从默默无闻中崛起,经过帝国的创建——先是希腊,后是罗马——终于趋向衰落和崩溃。

随着古代世界逐渐从他们的研究中脱颖而出,具有了形态,它就开始被认为是另外一个仿效的模范,来代替原来的不仅是作为修辞和文学的模范,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的模范,也被作为最最重要的艺术,即生活艺术的模范,包括私人生活(善处逆境的艺术)和公共生活(治国的艺术)。

## 五

人文主义者中不乏趋炎附势之辈,以其才能巴结权势人物,当然也有书呆子。他们就像今天纽约、伦敦或巴黎的任何学术圈子或文学圈子一样,是一群争论不休、脾气暴躁、动辄生气、性好妒忌的人,总是不断地互相写信,指摘和挑剔对方。这里不妨介绍三、四个早一辈的杰出人物。

彼特拉克(1304—1374)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生于流放之中,但丁死时他才十七岁。如果说他够不上是第一个对人文文学表示出兴趣的人,那么他却以一个伟大创新者的所有天资使人文主义有了生命。他比中世纪的任何一个前人更熟谙拉丁文经典著作。他在维罗那发现了西塞罗佚失的书信,校勘了李

维的著作，写了一系列拉丁文原作，从而恢复了拉丁文作为活的语言的地位。这些作品中有模仿普鲁塔克的传记和书信集，为他这个有第一个知识分子之称的人提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复杂的自画像。他的其他著作都致力于调和人文学研究与基督教义，攻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经院哲学，痛骂批评他的人——这一切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并且用意大利文写诗，作品至今犹列意大利文学最优秀作品之林。

23 我的第二个人物是萨鲁塔蒂\*。他一点也没有彼特拉克那样的天才，他的拉丁文著作也写得很平庸。但是，彼特拉克尽管因享有声誉而能结交教皇和国君，却是一个漂泊不定的孤独者，身后没有留下一个学派。而生于1330年的萨鲁塔蒂却有其他才能。他把对经典的热情同斯多噶式的信念结合起来，认为这种热情应该表现在活跃的公共事务中。从1375年到他死去的1406年，他任佛罗伦萨总理。当时正是动乱的年代，先是发生了羊毛工人的造反，接着是同米兰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只有吉安加利佐·维斯康蒂\*\*1402年的死才挽救了共和国免于灾难。萨鲁塔蒂是佛罗伦萨抵抗运动的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以拉丁文专家的技能负责处理该城大局所系的外交书信，因而把总理职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权力中心。据说佛罗伦萨的最大敌人吉安加利佐曾经说过，萨鲁塔蒂的书信抵得上一千

---

\* Salutati (1330 - 1406)，意大利政治家。曾任佛罗伦萨总理，用拉丁文写作外文书信并提倡希腊文教育。

\*\* aleazzo Visconti (约1351 - 1402)，意大利世袭公爵。其家族从十三世纪到1447年统治米兰，并逐步兼并整个隆巴第和附近地区。在位时有计划东讨西伐，企图建立意大利王国。在准备进攻头号敌人佛罗伦萨时罹疫而死。在位时最大贡献是改革政府体制和提倡艺术与工业。

兵马。

同样重要的是，萨鲁塔蒂使佛罗伦萨成了十五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文主义中心。他罗致了一批年轻人，鼓励他们继续发展彼特拉克开始的传统。他于 1397 年任命拜占庭学者曼纽埃尔·克莱索拉勒\* 以公费教授希腊文，是希腊研究中的一个转折点。克莱索拉勒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师，他在三年之内不但为一代的学生打下了希腊文的基础，而且使他们培养了学习经典的终身热情。

受业于克莱索拉勒的弟子中有辽那多·布鲁尼\*\*。布鲁尼是个穷学生，他精通拉丁文，由此在教廷谋得秘书一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于 1415 年回到佛罗伦萨，后来至死没有离开，继萨鲁塔蒂之后成了该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人物，最后也继他为总理。他写过一部佛罗伦萨人的历史，从罗马时代写到当代，这部著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里程碑。而且尽管他政务繁忙，仍有时间把色诺芬、柏拉图、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出了一系列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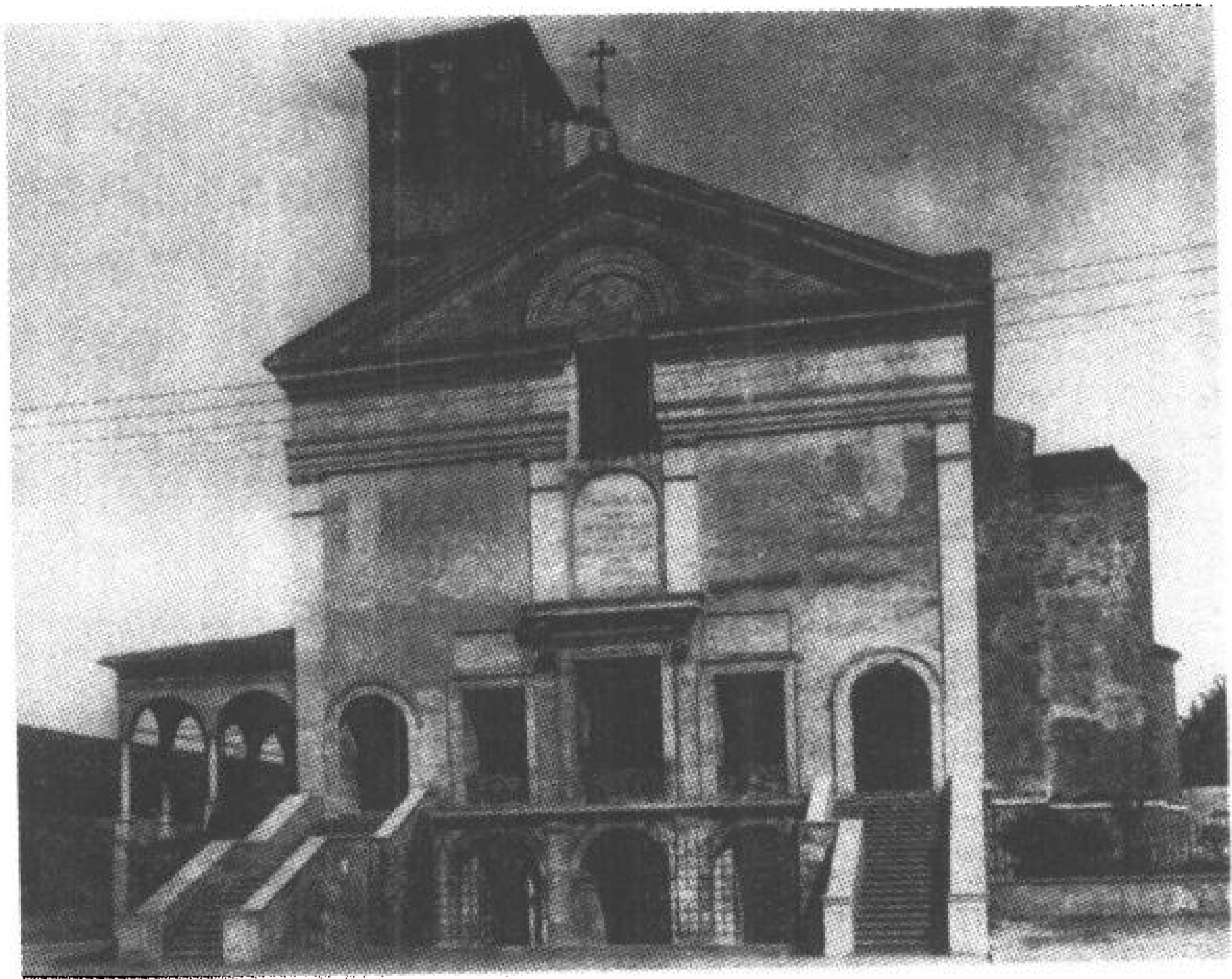
我的最后一个人物也许比十五世纪的任何其他人物都更加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 *l'uomo universale* (全才)。里昂·巴蒂斯塔·亚尔培蒂(1404 - 1472)，生于流放之中。他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庭之一的私生子，这一家族在该城长期不断的家族纷争中失了利。他既是运动员，又是人文主义学者、科学家、数学

---

\* Manuel Chrysolaras(约 1335 - 1415)，希腊学者。事迹见本书正文。

\*\* Leonardo Bruni (1369 - 1444)，意大利政治家。事迹见本书正文。

\*\*\* Demosthenes(约公元前 383 - 322)，希腊政治家。以擅长演说闻名。



曼都亚的圣塞巴斯蒂阿诺教堂,亚尔贝蒂设计

家、音乐家、建筑师、密码专家,还同时精通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他的关于绘画和建筑的著作改变了视觉艺术的实践,创立了美术理论。

萨鲁塔蒂和布鲁尼可以说是所谓公民人文主义的代表,而亚尔培蒂的生涯则生动地说明了人文主义与艺术的交融汇合。在绘画方面向比较现实的风格迈进一步的先驱者是乔托\*。但是他在1337年逝世时却没有留下后继者。要等到一个世纪以

---

\* Giotto di Bordonne(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建筑师。在人体绘画方面打破中世纪陈旧手法,着意表现人物的道德气质,而不是神赋光辉,面部表情生动逼真。这种写实主义倾向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绘画。

后，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当亚尔培蒂有许多时间留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才有马萨契奥\*、多那太罗\*\*、布鲁奈莱契\*\*\*继承乔托的衣钵，把他所开创的表现方法的革命继续推进。正是亚尔培蒂把布鲁奈莱契所发明的透视法理论加以系统化，出版了对艺术赞助人和画家都有很大影响的《论绘画》(1436)一书。他讨论道德问题的对话录《论家庭》和《论心境的平静》出版以后，就专心从事古代遗迹的考察和维特鲁维\*\*\*\*的研究，结果写出了他自己的建筑学论文《论建筑》(1452年完成，1485年出版)，一直到进入十八世纪很久，这部著作都是建筑师的必读书。书里有不少技术性的指导，着重强调建筑的社会功能(是城市规划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和从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大自然和谐规律中得出的比例理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可以付诸实践，他在里米尼、曼图亚和佛罗伦萨设计并建造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几个最令人瞩目的榜样。

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亚尔培蒂和布鲁尼为代表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到了十五世纪后半叶已大为改观，面目俱非。在梅迪齐家族的科西莫(1389-1464)和洛伦佐(1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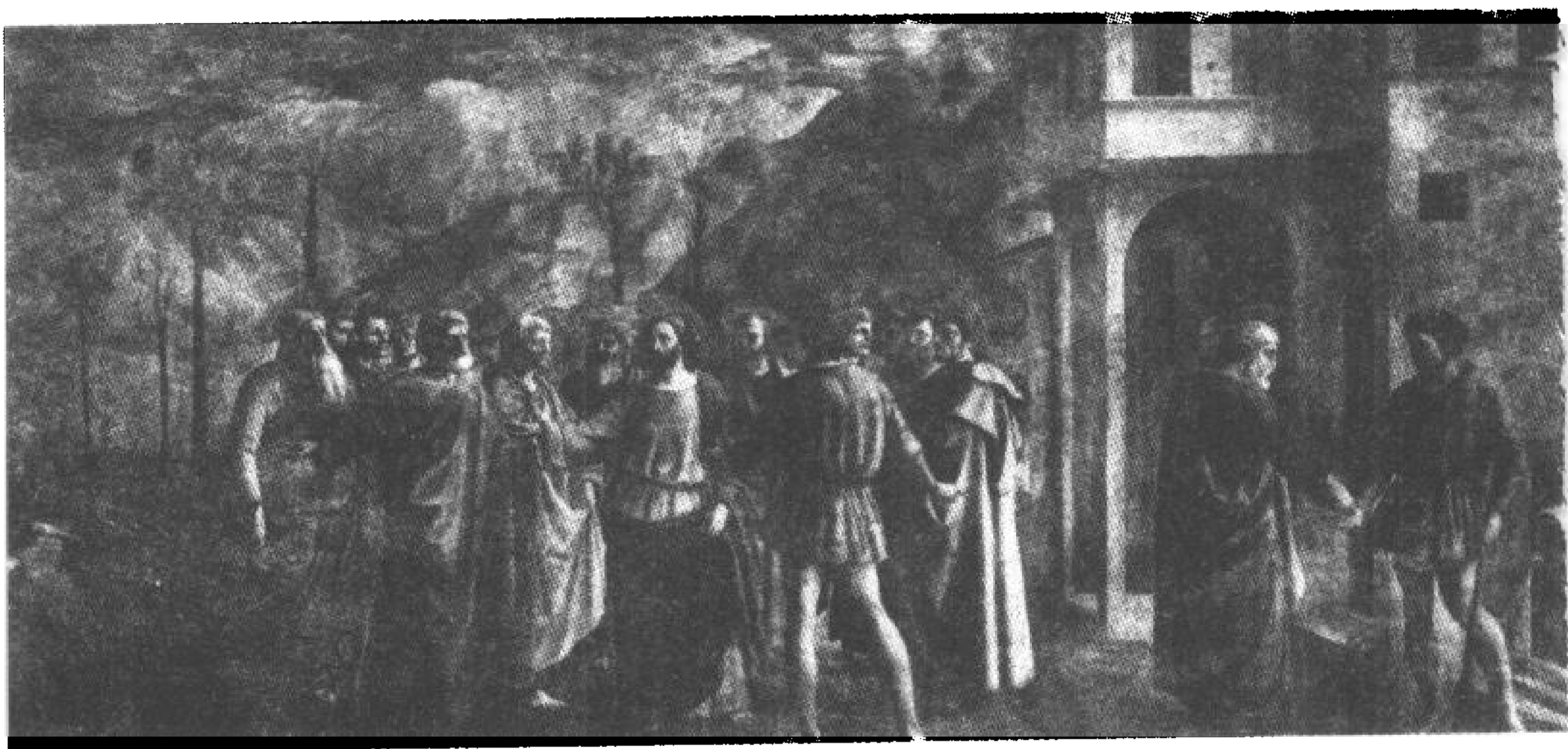
---

\* Masaccio(1401-1428),意大利画家。原名 Tommaso Giovanni di Mone,所作壁画《三位一体》有助于了解绘画中的空间和透视法,受布鲁奈莱契影响。

\*\* Donatello(约1386-1466),意大利雕塑家。在《圣乔治》中放弃早期哥特式风格,转向写实主义,最终在后期作品《大卫》和《施洗者圣约翰》中达到高峰。

\*\*\* 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伟大的建筑家。使用透视法的开创者,对后来建筑家影响极大,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

\*\*\*\* Vitruvius (约第一世纪早期),罗马建筑师。全名 Marcus Vitruvius Pollio,著有10卷本《论建筑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代建筑学的一切方面,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物和建筑材料种类,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建筑师在建筑学理论方面的主要参考书。



马萨契奥(贝伦森称他为“乔托再世”)作此壁画时年方24岁,  
画中耶稣命彼得向罗马税吏缴税

1492)的庇佑下,该城成了由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所支配的一个形式非常不同的哲学和艺术中心。它的中心人物是马尔西利奥·斐契诺\*,他是梅迪齐家族所创设的柏拉图学院的精神领袖,柏拉图对话录的拉丁文译者,颇有影响的《关于灵魂不灭的柏拉图式神学》(1469-1474)一书的作者。他把基督教<sup>25</sup>义同人文主义作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在艺术方面的两个例子是波的契里\*\*的《早春》和《维纳斯的诞生》。洛伦佐于1492

---

\* Marsilio Ficino(1433-1499),意大利哲学家。希腊古典学者,提倡柏拉图研究。虽是人文学者,却有神秘主义倾向。



年去世，接着发生了萨伏那罗拉事变<sup>\*\*\*</sup>，法国入侵意大利和1494年开始的历次意大利战争<sup>\*\*\*\*</sup>，佛罗伦萨从此进入了一个多难时期，虽然仍能贡献出一个马基雅维里、一个圭契阿第尼和一个伐萨里<sup>\*\*\*\*\*</sup>，但是它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的地位却被重建后的罗马和迁返后的教廷<sup>\*\*\*\*\*</sup>所代替。这其中相继有好几位人文主义的教皇，其中最著名的是庇护士二世（1458-1464）和朱利乌斯二世（1503-1513）。

与此同时，印刷术为人文主义者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前景。意大利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印刷书籍后迅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出版国，以威尼斯最为突出。威尼斯是意大利各共和国中最后一个保持独立的。它既有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巴图阿大学设在它的领域内，又有以印刷希腊文书籍著称的阿尔杜斯·马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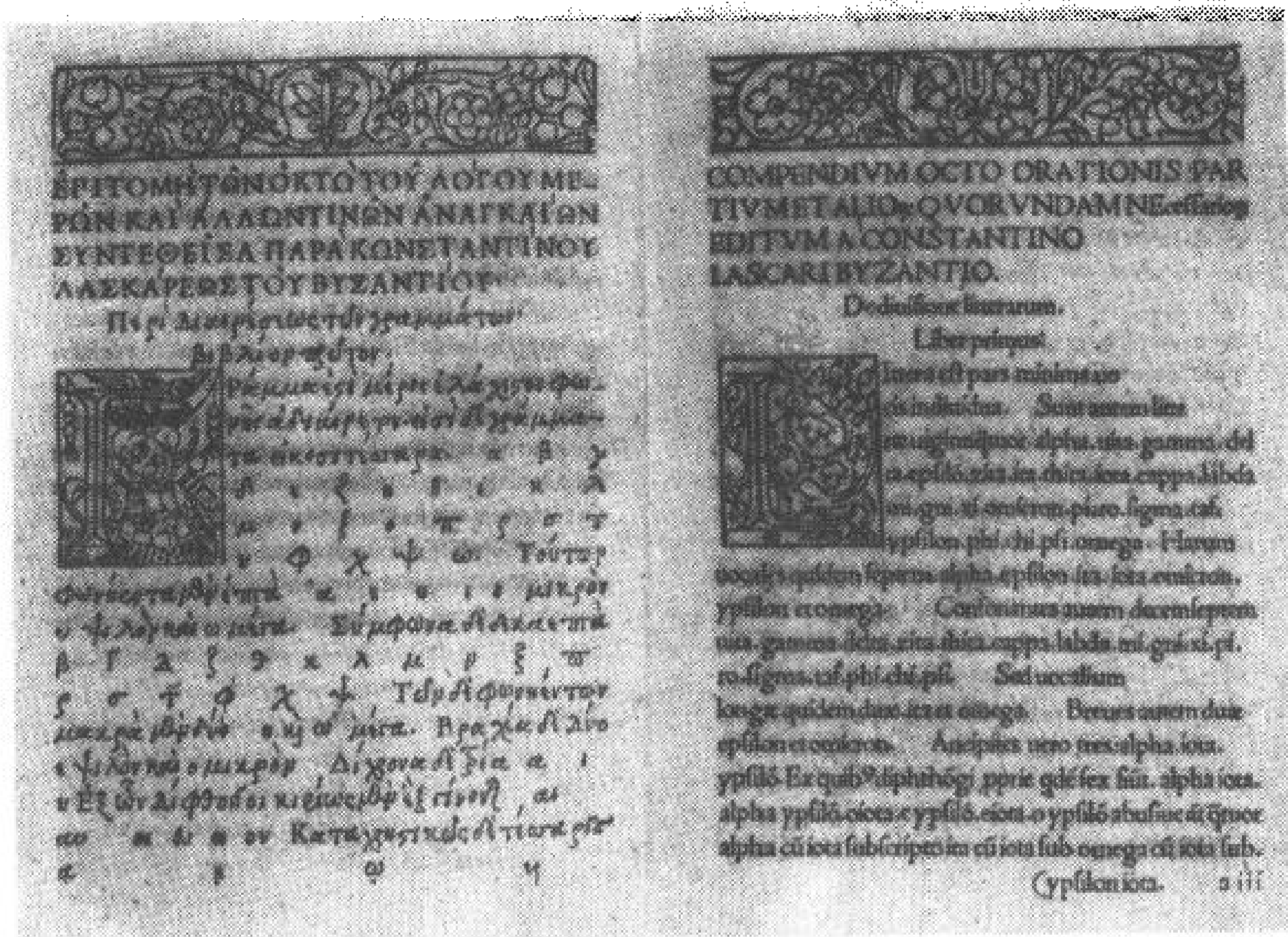
<sup>\*\*</sup> Sandro Botticelli(约1444-1510)，意大利画家。以善于运用色彩和线条优雅著称，在宗教题材转到非宗教题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sup>\*\*\*</sup>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原来学医，后因深信世人罪孽深重，入多明各教团为僧。1490年发起讨伐梅迪齐家族腐败统治，1494年成为佛罗伦萨实际独裁者，后被政敌推翻处死。

<sup>\*\*\*\*</sup> 1494-1529年期间，意大利各国纷争不已，招致法、西等国干涉，自1494-1495年法国征服那不勒斯起，历经多次混战，世称意大利战争。

<sup>\*\*\*\*\*</sup>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佛罗伦萨政治家。曾任该城市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外交官，梅迪齐家族复辟后丢官，余生从事著述。最著名作品《君王论》(1513)主张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可不择手段。他的名字已成为政治权术的同义词。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意大利史学家。曾为佛罗伦萨政府和教廷服务，所著意大利战争时期的历史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佳作。Giorgio Vasari (1511-1574)，意大利画家、建筑师、艺术史家。著有《最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列传》。

<sup>\*\*\*\*\*</sup> 1309年法国人出身的教皇克利门特五世在法国国王腓烈普四世的胁迫下把教廷从罗马梵蒂冈迁到法国的阿维农，至1378年始由格里戈里十一世迁返罗马。



希腊文法的一种拉丁文译本，康斯坦丁·拉斯卡里斯编，伊拉斯谟的朋友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1494年2月最后一天”在威尼斯印刷

蒂乌斯\* 这样的出版家和贝林尼父子、提香、乔吉奥尼、丁托莱托和维罗尼斯\*\* 这样的艺术家，因此它能够产生意大利人文主

\* Aldus Manutius(约 1450 - 1515)，意大利印刷家、出版家。以出版袖珍本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著称。

\*\* 贝林尼一家是威尼斯画派创建人。父亲 Jacopo Bellini(约 1400 - 1470)，留下速写两册。其子 Gentile(约 1429 - 1507)以绘制叙事题材著称；另一子 Giovanni(约 1430 - 1516)是威尼斯最伟大的圣母像画家，早期作品以精确的写实主义手法表现大自然，后来气势越来越雄伟，光线和色彩处理更有诗意。他培养学生多人，其中有 Titian(约 1487 - 1576)和 Giorgione(约 1475 - 1510)，两人后来均成大器，各有特色。Tintoretto(1518 - 1594)则是提香的学生，Veronese(约 1528 - 1588)兼作室内装饰，大幅节庆画面采用圣经和历史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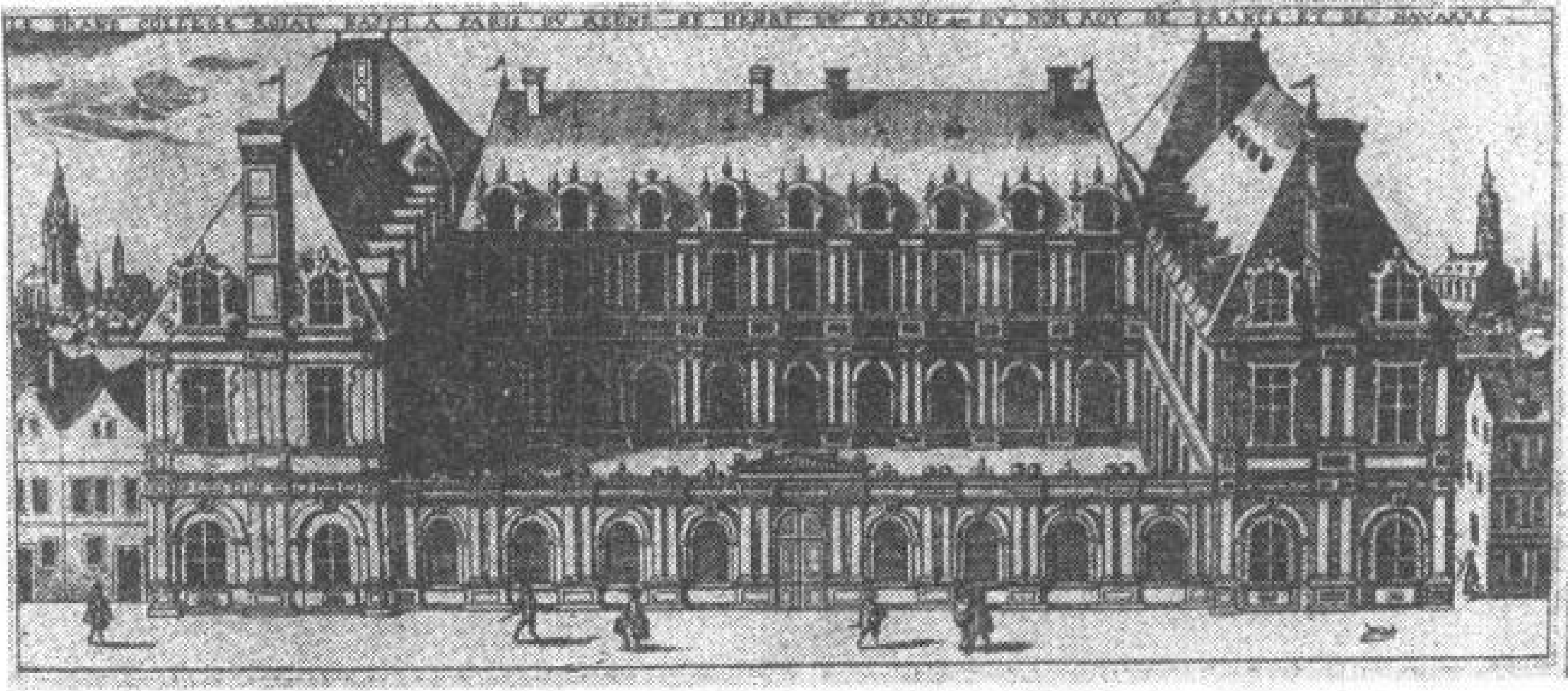
纪尧姆·布德，法国  
杰出的人文主义者

义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的形态。伊拉斯谟 1506 年就是到威尼斯来随马努蒂乌斯在阿尔丁出版社工作的，也是在威尼斯，为北方睁开眼睛看到意大利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所复活的古典世界的杜莱尔\*，在这里打开了自己的眼睛。

北方的人文主义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后期交叠。第一代北方人到意大利来学习的是在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sup>⑧</sup>，北方的人文主义到十六世纪初期开始结出果实来。1508 年是<sup>26</sup>巴黎大学首次正规教授希腊文的一年。1516 年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伊拉斯谟的希腊文《圣经新约》出版的一年。牛津大学的基督圣体节学院和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及圣约翰学院这

---

\* Albrecht Dürer(1471 - 1528), 德国画家、版画家。两次访意, 结合南北传统, 对欧洲艺术影响极大。著名作品是《启示录》木刻集。



法兰西学院，由布德劝说法兰西斯一世于 1530 年成立

三所人文主义学院于同年创办。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法国最伟大的希腊文学者布德\* 说服法兰西斯一世——辽那多·达芬奇就是在为这位人文主义君主服务时死于安布瓦兹的——于 1530 年创办法兰西学院后又创办王家图书馆，这两个机构四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在学术上的荣誉。

基督教人文主义不仅出现在低地国家和法国，而且也出现在德国，启发了马丁·路德的主要助手腓烈普·梅兰克东\*\*和希伯莱学先驱约翰·劳克林\*\*\*。在西班牙，阿尔卡拉的人文主义大学创办人希门尼斯枢机主教\*\*\*\* 拨供经费印行六卷本的

---

\* Guillaume Bude(1467 - 1540), 法国学者。法国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说服法兰西斯一世创办法兰西学院，在罗马法的研究中使用版本考据方法，提倡希腊研究。一般认为是法国文艺复兴的主要人物。

\*\* Philip Melancthon(1497 - 1560), 德国神学家。与马丁·路德同被视为新教创始人。著有《奥格斯堡的忏悔》(1530)，申述新教信念。

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圣经》，并附拉丁文译文。但是北方人文主义者并不限于具有十六世纪初叶特点的基督教性质。例如，三十年代出版的拉伯雷的《庞大固埃》和《卡冈都亚》，在人文主义的音域中添了一个全新的音符，而五十年后，蒙田在他的《随笔集》中为那个被宗教争论引起的暴力行为和不容异己的态度弄得元气大伤的运动，追加了一个同样有创见的附笔。

## 六

27

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的一个话题是积极活跃生活与沉思默想生活孰优孰劣的比较。即使答案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事实是很令人瞩目的，那就是可以对沉思默想生活的优越性公开提出质疑。布鲁尼曾对“忙碌工作的生活”和修道出家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作过对比。这种对比对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些活跃于贸易、金融、政治的城市贵族阶级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十五世纪初为了保卫佛罗伦萨抵御米兰统治者维斯康蒂家族的专制暴政的生死斗争，也加剧了这种对比。从这场斗争中产生出公民人文主义，把公民对城邦的服务视为最高美德，这是城

---

\*\*\* Johann Reuchlin(1455 - 1522), 德国律师。著有第一部由基督教徒写的希伯莱语法《希伯莱语法入门》(1506)。因反对毁掉所有希伯莱文古典书籍而招罗马教会不满。

\*\*\*\* Francisco Ximenes de Cisneros(1436 - 1517), 西班牙枢机主教、政治家。创办阿尔卡拉大学，晚年曾任短期摄政。

邦政治和古典历史的结合,使得布鲁尼把佛罗伦萨同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和庇里克尔斯时代\* 的雅典相比。亚尔培蒂写道,“我相信,人不是生来虚度慵懒岁月的,而是要活跃地从事丰功伟业。”

第二个话题是命运的无常(不再是从基督教天意的角度来看)和拒绝对之屈服的人的 Virtù\*\* (不再从基督教美德的角度来看)之间的冲突,这又是复活曾遭圣奥古斯丁谴责的一个古典概念。像亚尔培蒂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坚持认为,人只要有足够大的胆量是能够制服命运的。对于人的创造能力和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样强调,产生了对人的个性和提高自我意识的兴趣,伯克哈特认为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明显标志,反映在画像、自画像、传记和自传的数目越来越多上,这些都是第一次以写实的风格绘制或写作的,不再用象征的或比喻的风格。

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1860)一书中,把那个社会描绘成一个自信的、互相竞争的、一心要获得成就的、追求光荣和不朽的社会。这是人文主义者经常议论的又一<sup>28</sup>话题。为了回答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和教皇英诺森三世\*\*\* 对追求世俗名誉和光荣的贬责,亚尔培蒂(响应彼特拉克)写道,“只要不是完全懒惰成性和头脑迟钝的人,大自然都给他

---

\* Pericles(约公元前 490 - 429),雅典政治家。死前十余年每年当选政治高职,品格高尚,演讲有术,曾对巴台农神庙的建造和卫城的修复有功,史家称其当政时期为庇里克尔斯时代。

\*\* 意大利文,兼有“美德”和“力量”的含意。

\*\*\* Innocent III(1160 - 1216),罗马教皇。中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认为精神重于肉体,因此教会统治者教皇高于各国世俗统治者。为此,他积极参与政治,左右欧洲各国君主的立废。

注入了迫切想得到赞美和光荣的愿望。”

这种独立的世俗价值观的发展,起源于基督教前的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它表现在更加敏锐的历史感上,历史不再被认为是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的努力和失败的产物。最早作出尝试来表达这种看法的,是布鲁尼和波吉奥\*。他们两人十五世纪都在佛罗伦萨担任过总理。他们尝试着一改编年史家的插曲式写法,把一桩桩事件的发生当作一个连续过程来叙述。但是在迈出这非常重要的一步时,仍不免受到牵制,因为他们想使自己的叙述符合古典模式,保卫共和,反对君主政体。只有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后阶段,圭契阿第尼和马基雅维里才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历史和政治写作可以达到多么精彩的程度。他们两人仍是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共和派,忠于自由的最高价值,但是对他们所生活时代的性质不抱幻想。圭契阿第尼的《意大利史》被吉朋\*\* 视为可以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提并论。马基雅维里在他论李维的文集的序言中,自称他在开拓“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他在分析权力方面的大胆,从来还没有被人超出过。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既无法忽略又无法归类的一个人物。他在今天仍旧像当初他同时代的人感到的那样,既具有独创性,又令人不安。他是人文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却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中。像圭契阿第尼(1483-1540)一样,他不需要你说服他相信自由和自治的价值,他是压迫和腐败

---

\* 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任佛罗伦萨总理,著有《滑稽故事集》(1474)。

\*\* 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史学家。罗马之行诱发了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3,共6卷)的决心,此书堪称现代最伟大的史学巨著。

的敌人,热情地献身于他担任外交官和军人的佛罗伦萨。但是他对人的行为的观察和他的历史知识使他相信,如果一个王国或共和国要避免发生灾难,它的统治者在国家的安全和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的时候,必须准备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欺骗、作假和武力手段,用他的一句著名隐喻来说,要有“雄狮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

马基雅维里的独创性在于他毫不犹豫地坚持,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就可以,而且必须,准备使用最可谴责的手段来实现它。这一创见由于他文章的明白生动的风格而更加突出了。他运用悖论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而且从内心有一种冲动,要把他的观察和结论推到逻辑的结果,由此而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概括,往往建筑在很狭隘的证据基础上。但是他远远不是一个把邪恶当作他的货物来推销的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热情慷慨的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伯托·里多尔非所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不到美德获胜的希望而痛苦地感到绝望和他悲剧性的对邪恶的意识。”<sup>⑨</sup>

## 七

马基雅维里的文章所以有力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它集中焦点在所有政治行动的核心问题上:权力和良心之间,力量 and 美德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他拒绝接受常规的答复并坚持认为总能找到一个答案。他认为基督教教义提高了错误的价值观,因为它“把谦卑、克制和轻视世俗事物当作人类的最高品



德”，结果把世界双手拱让给“坏人当猎获物”。这是颇具他特性的观点。以前共和时代罗马的宗教颂扬公民美德，因此帮助维护了政治自由；而基督教却“颂扬谦卑和隐退的人”，结果促成了国家(社会)的腐败。<sup>⑩</sup>

撇开马基雅维里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政治背景不谈，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观点提出了基督教教义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出现的，和后来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的人文主义观点两者的可容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基督教教义与马基雅维里的极其个人化的(已遭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驳斥的)观点的可容性问题，因为上述人文主义观点的范围要比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广阔得多，多样得多。

答案似乎是，在十六世纪中期人文主义者从早先的充满信心转向幻灭之前，很少有人会走得像马基雅维里那么远，或考虑到有那样的需要。从一开始起，他们的思想就是朝着一种比较世俗化的人生观，集中焦点在“此世”，而不是中世纪想像中的那个“彼世”，这是一种历史的观点，不是玄学的观点。这又因为古人哲学思想的重新发现而加强了——比如斯多噶派的哲学思想或者对命运女神的崇拜。

早在1337年彼特拉克撰写他的论文《论名人》的初稿时，他就完全忽视了中世纪的圣徒和殉道者，而从古代异教英雄中找例子。一百年后，在1452年，吉安诺佐·马奈蒂\* 写出了另外一篇论文《论人的尊严和优越》，逐点批驳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著名论文《人的苦难》，马奈蒂在文中表示，他相信人的“不可估量的尊严和优越”及人的本性中“特殊的天赋和少有的有利

---

\* Giannozzo Manetti(1396 - 1459)，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生平事迹不详。

条件。”

我们是无法回避奥古斯丁笔下人的充满罪恶的存在状况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之间的冲突的。因为在奥古斯丁所绘的图像里，人是堕落的生物，没有上帝的协助无法有所作为；而  
30 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却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名声。但是对人文主义者自己来说，这种冲突却很少成为问题；他们大多数人继续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没有感到自己对古典的热情需要与它协调。

至于少数感到困惑的人，可以采取两条道路：新柏拉图主义和圣经人文主义。它们以不同方式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的宗教因素。

新柏拉图主义兴盛于十五世纪后叶梅迪齐家族上台毁掉了佛罗伦萨各项自由以后，这绝非偶然。该世纪上半叶公民人文主义者所大力鼓吹的积极活跃生活的理想，如今被斐契诺的——和得到梅迪齐家族赞助的柏拉图学院的——沉思和神秘理想所代替。科西莫·梅迪齐聘请斐契诺第一次把柏拉图的著作全文译成拉丁文（1484年完成），洛伦佐又鼓励他出版自己的著作《关于灵魂不灭的柏拉图式神学》。斐契诺强调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的亲密关系。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他援引普罗克路和普洛丁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和《炼金集成》，那是一个神秘和灵智体系，据说是（其实错了）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神（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著作，而他又是埃及神透特。斐契诺的目的是想实现所有这些宗教传统实质上的一致，把它们看作是通向真理的平行途径，它们的源头和古代世界连结在一起。与这种宗教一致性的信仰一起，还有另外一种信念（比如在极受敬重



洛伦佐·德·梅迪齐周围的佛罗伦萨柏拉图派著名成员：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斐契诺、波利齐亚诺(1486)

的古萨枢机主教尼古拉斯\* 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 那就是认为和谐和匀称是宇宙的根本原则, 人通过沉思默想这种最高的人类活动可同这两个原则求得一致。这种信念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 新柏拉图主义强调沉思默想生活, 而公民人文主义<sup>31</sup> 主义者则强调积极活跃生活, 这两者是无法调和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 两者都可以自称是人文主义者。斐契诺从古人那里汲取灵感不下于萨鲁塔蒂和布鲁尼, 虽然从希腊文明时代汲取

---

\* Cardinal Nicholas of Cusa(1401 - 1464), 德国教士。是个相信人文主义的神秘主义者, 企图改革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修道院而未果。



埃及智慧之神透特，希腊名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幅像成为锡耶那大教堂中殿过道上的一部分。这位贤人据信与摩西为同时代人，图像中把一本书交给一东方人说，“学习文化和法律吧，埃及人。”

的要多于从共和时代的罗马。在宇宙的等级层次中，他把人放在创造的中心，是同所有已被创造的东西联系的环节，属于物质的较低层次，但是仍能够再提高自己与上帝求得相通。就是这个与神求得相通的能力，斐契诺的学生，年轻的比可，也就是米兰多拉爵爷\* 在他著名的演说《论人的尊严》(1486)中曾大加赞扬。

---

\* Conte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 - 1494),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年纪虽轻而学识过人，后因所写九百篇论文中有一部分被视为异端而被捕。

这样五花八门的人文主义思想,从新柏拉图主义到神秘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对魔术、占星术及巫师(弗朗西斯·叶芝对此已有论述<sup>①</sup>)的着迷,再到毕达哥拉斯式数字象征主义、神话及寓言,都对欧洲的艺术和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进入十七世纪很久。

而圣经人文主义却对如何对待宗教真理提供了另外一种相当不同的方法,那就是有可能把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到《圣经》的本文和当初吸引北方人文主义学习意大利人的教会元老们的著作上。为伊拉斯谟开路的,就是意大利人洛伦佐·伐拉\*,他努力协调基督教研究和人文主义研究。伊拉斯谟本人是由共同生活兄弟会扶养大的,这是低地国家由虔诚的教外信徒组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他们把神学和神秘主义都加以摒弃,而毕生在世界各地作出遵循基督教导的榜样。托马斯·肯比斯\*\*在《基督的模仿》中提出了这个简单的、非教条的、伦理的观点,伊拉斯谟就是吸取了这个观点,而且一生坚持不渝。他并没有发现把这种宗教信念同精通古典文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结合在一起有什么困难。这种结合使他成了他的时代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的研究结果产生了希腊文的《新约》评注本和拉丁文新译本。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这两个版本在欧洲都得到广泛的传播,使原来拉丁文译本的权威性受到了怀疑,并为新教改革家提供了重要武器。伊拉斯谟相信,要掌握基督原教义真

---

\* Lorenzo Valla(1407-1457),意大利学者。版本校勘的先驱,曾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拉丁文。

\*\* Thomas à Kempis(约1379-1471),德国僧侣。一生在修道院中度过,除誊写手稿外,著有《基督的模仿》及其他多篇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论文和许多圣徒传记。

正的而不是以讹传讹的精神,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修订早期教会的文献和把《圣经》译成英、法、德文。

圣经人文主义吸引了法国、德国、英国和低地国家的一部分最优秀和最虔诚的思想家,由此鲜明地昭示了,像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感到非教条的、虔诚的基督教教义与人文主义对新学的  
32 热情之间存在着什么障碍。克里斯泰勒教授说得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虽然比中世纪更加以人为中心,更加世俗化,但它的宗教性不一定不如后者。<sup>⑫</sup>

不幸的是,这个运动被比较激进的改革家与教廷之间的争吵所超越和淹没了,这一争吵把分歧扩大到了人人都得非此即彼参加一个阵营的程度,中间立场是无法维持的。而关于信念的争论又与权力斗争、政治野心、社会紧张关系和民族感情的抬头等等无法解脱地纠缠在一起。

当时有人认为,而且至今一直有人认为,的确需要路德采取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震撼一下腐朽的教会,迫使改革有个结果,不仅由此产生了经过改革的单独新教教会,而且在教会内部产生了反改革运动自己实行的改革。这话也许说的不错,但是欧洲的历史是否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来代替?这个问题仿佛一个危险的沼泽,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贸然踩进去,因为那样做不仅不智,而且无必要。我在这次讲学中唯一要想明确的一点,是这场争吵对北欧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因为北欧人文主义传统是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泉源之一,许多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开首都是抱有改革教会的目的的。路德本人和后来成为他主要助手的梅兰克东都从来没有放弃过  
33 他们的看法,始终认为精通古典研究和把它用于《圣经》是恢复基督教导的本来面目的钥匙。伊拉斯谟正是这方面的开



克拉那赫所绘路德(1525)(左)和菲利普·梅兰克东的画像

创者。而且,路德反对牧师的中间角色以及他坚持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很可以被看作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发展,正如他坚持把《圣经》译成各国当地语言一样。

但是,尽管在德国路德对初生的民族感情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吸引力,在德国境外,要使大多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追随路德,却有两个致命的障碍,有时是这个障碍在起作用,有时是那个障碍在起作用,有时是两个障碍都在起作用。一个障碍是,路德在放弃教会传统习俗和信念方面越来越走极端,最后终于干脆与教会决裂。另一个障碍是,路德复活了——加尔文甚至比他更加强烈地复活了——对人的罪恶本性的毫不妥协的看法,

认为只有靠神意干预才能得到赎免。在伊拉斯谟看来,这个观点与基督教导的精神,就像与人文主义一样,是互不相容的。由此而产生的尖锐分歧,宣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最初希望的破灭,并且使伊拉斯谟丧失了他的影响,托马斯·莫尔丢了他的性命。

## 八

不论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都——包括伊拉斯谟,也包括路德和梅兰克东——同意教育的重要性。而熟识拉丁文和希腊文是进入古代世界的经验和思想殿堂的必要钥匙。

在意大利,原来市镇办的学校都恢复了。开明的君主还创办了新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孩子同主要宫廷人员和市民的孩子一起,在那里跟着人文主义的教师学习。优秀的教师到处吃香。其他国家相继仿效,设立这种学校。在意大利,这种学校有两所最有名,一所叫拉吉奥科萨学校,是维多里诺·达·费尔特莱为曼图亚贵族贡札加家族\*办的,他在那里从1423年教到1446年;另一所是圭里诺·达·维罗那在1429年为斐拉拉的君主尼可洛·埃斯特办的,维罗那曾在佛罗伦萨随克莱索拉勒学习希腊文,后来跟他去了拜占庭。

人生活在社会中,特别是像意大利城市的那种小而紧张的

---

\* Gonzaga, 1328 - 1707 统治曼图亚的家族。历代许多统治者都耗资赞助艺术,其中吉奥凡尼·弗朗西斯科是人文主义者达·费尔特莱的赞助人。



社会中,教育除了培养人的智力以外,也需要培养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暴力的时代,他得学会控制情绪;在权力统治残暴的时代,他得学会谦恭的艺术;在竞争的时代,他得宁取外行的手法而舍内行的手法;在崇尚出类拔萃和容不得平庸的时代,目的就 34 是办训练精英分子的一般教育,而不是生产专门人才,所谓精英分子即理想的 uomo universale(全才),一个辽那多·达芬奇,一个亚尔培蒂,一个米开朗琪罗。

这些学校的总数从人口比例来说,当然很少,但是人文主义者集中力量培养治国人材(不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国家),对于学生们后来治事处世态度的养成,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十五世纪,统治家族的年轻人光知崇拜骑士品质和熟娴战争艺术已经不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要求他们除了精通武艺以外,也要精通艺术(例如音乐)和文学。关于如何教育君主的教本出了很多,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认真,而且在一个君主可以左右其治下人民幸福的时代——包括改变他们的宗教,像亨利八世所作的那样<sup>③</sup>——这也有充分的理由。

英国最伟大的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教育的最典型范例。她的教师罗杰·阿斯坎\* 撰写了他那篇最著名的教育论文《学校教师》,在当时的英国,语法学校的设立确保了人文主义传统一直维系到二十世纪中期。在这些学校中,最有名的是莫尔和伊拉斯谟的朋友科莱特于1512年在伦敦设立的圣保罗学校,招收“各国各族学生,不论班上人数”

---

\* Roger Ascham(1515-1568),英国人文主义者。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伊丽莎白未登位前曾由他担任教师,他并担任过玛丽女王的拉丁文秘书。所著《学校教师》(1570)论述拉丁文的传授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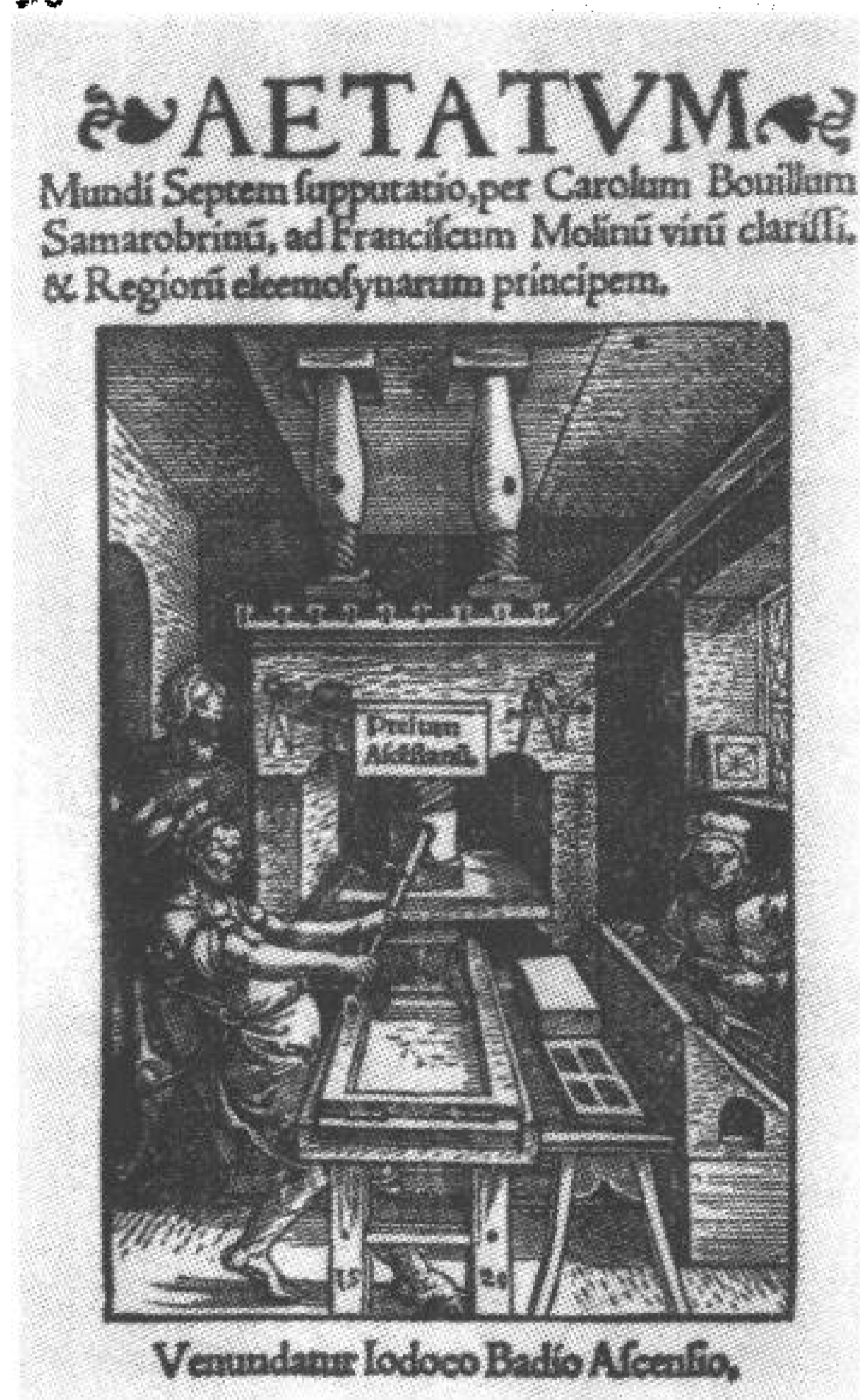
(153人)。二十五年后，约翰尼斯·斯托姆在斯特拉斯堡开办了拉丁文语法学校，并领导该校达四十余年之久，他给这所学校起了一个希腊文的名称，叫gymnasium\*。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路德和耶稣会创建人伊格纳修斯·罗耀拉\*\* 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相信上学受教育的重要性和坚持经典教育的价值。他们的这一信念均来自于人文主义并将之作为传统遗产传给他们各自的信奉者。

至于大学，情况就不同了。除了有新建学院的大学以外(见上文第五节末)，其他大学仍是经院神学和亚里斯多德主义，以及传统的法律和医学教学的堡垒，虽然常常受到新学的影响，但仍闭门不纳。人文主义基本上是个非宗教的运动，独立于教会和大学。它比较典型的表现，可以见诸于一些非正式团体，如英国环绕在托马斯·莫尔周围的团体，法国环绕在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1492-1549)周围的团体，而在意大利它常常采用学园的名称。其他还有伦敦的法律协会组织的团体，或者由一些著名的通讯网联在一起的团体，伊拉斯谟书信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应加上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伊拉斯谟是第一批利用印刷术的先驱者之一。大量的古典作家，有用拉丁文的也有用希腊文的，他们的原作如今  
35 第一次可以在欧洲获得，这为人文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无形学院的框架。

---

\* 后演变为预备学校。

\*\*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西班牙军人、教士。耶稣会创立人。一次作战负伤，休养期间大量阅读宗教著作，遂决定从事传教工作。与圣方济等立誓甘于贫困、独身和服从。1537年任神职，1540年去罗马获教皇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成为反宗教改革的一支力量。后来目标转移到海外。在西方，耶稣会教士常有阴谋家、伪善者含义。



丢勒木刻，为约赛·巴德(约多克斯·巴迪乌斯·阿森西安努斯)设计的印刷机械。巴德是第一个定居于巴黎的学者兼印刷家，他曾在意大利学习印刷术，还学习了希腊文，后在里昂教了十年希腊文。他的经典文本的印刷可与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的印刷媲美

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教育。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是把人从自然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发现他自己的 *humanitas*(人性)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 *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中，语法和修辞不仅引导学生熟悉古典研究并培养他们有效的说写能力，而且也引导他们熟悉文学、历史和道德哲



贺尔拜因的  
约翰·科莱特  
画像，科莱特  
是英国人文  
主义者和圣  
保罗学校创  
建人

学，不仅仅是熟悉他们所学习的经典作品的形式，也有这些作品的内容。他们是从荷马和修昔底德，从维吉尔和西塞罗那里学到 *humanitas* 的含义的。

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人文主义者对学习历史的重视。他们对语言的学习也予以同样的重视。例如洛伦佐·伐拉就在词汇的历史中看到了追溯一种制度和—一个概念——例如在法律方面——或者一种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发展的手段。语言使人有别于所有动物，它是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的手段，并培养人类共同生活的艺术。

早期人文主义者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恢复拉丁文古典用法的

纯洁性。但是最早怀抱这一愿望的彼特拉克最好的诗有几首却是他用托斯坎语写的,而拉丁文与本国语言的孰优孰劣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题目,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语在这个争论中得到纯化以后,终于脱颖而出。马基雅维里和他在十六世纪的同时代人都是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古典的复活却导致了当地语言的繁荣,接着而来的是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现了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弥尔顿、塞万提斯和卡蒙斯\*,它永远得到古典世界复活的滋润,却不再依赖拉丁文的输血。

## 九

大多数人都很容易把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视为同一回事,而不太容易把它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或文学视为同一回事。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里又需要弄清楚我们谈的是什麼,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的艺术(其中一部分品质极高)与人文主义传统很少关联,或者甚至没有关系。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勃艮第宫廷\*\* 统治下的尼德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画家之

---

\* Luis de vaz Camoens(或作 Camoes)(约 1524 - 1580),葡萄牙诗人。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写有十四行诗和抒情诗,最著名的是他仿维吉尔写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

\*\* Burgunay,在法国东部,以产酒闻名。在罗马的高卢时代就有日尔曼裔勃艮第人建立王国,后不断受到征服和分割,877年在大致今日的勃艮第省建勃艮第公国,十四、十五世纪为黄金时代,兼并了低地国家。

一的扬·凡·爱克\*，还有雨果·凡·德·戈斯\*\*、佛莱马尔的大师和罗吉·凡·德·维顿\*\*\* 在那里形成了一种以自然主义为特点的新风格，特别是在表现风景方面。这种新风格还有其他的创新，例如用油料作画。

不过，虽然尼德兰的画家，特别是凡·爱克，追溯他们自己的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式传统，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意大利人（例如布鲁奈莱契）那样更进一步，从罗马式又探索到原来的罗马源头。就是这种与古典复活的关系，才有理由使用“人文主义的”一词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富有创新性的艺术。在北方要等到一世纪以后的杜莱尔才复活了追求古典的比例和运动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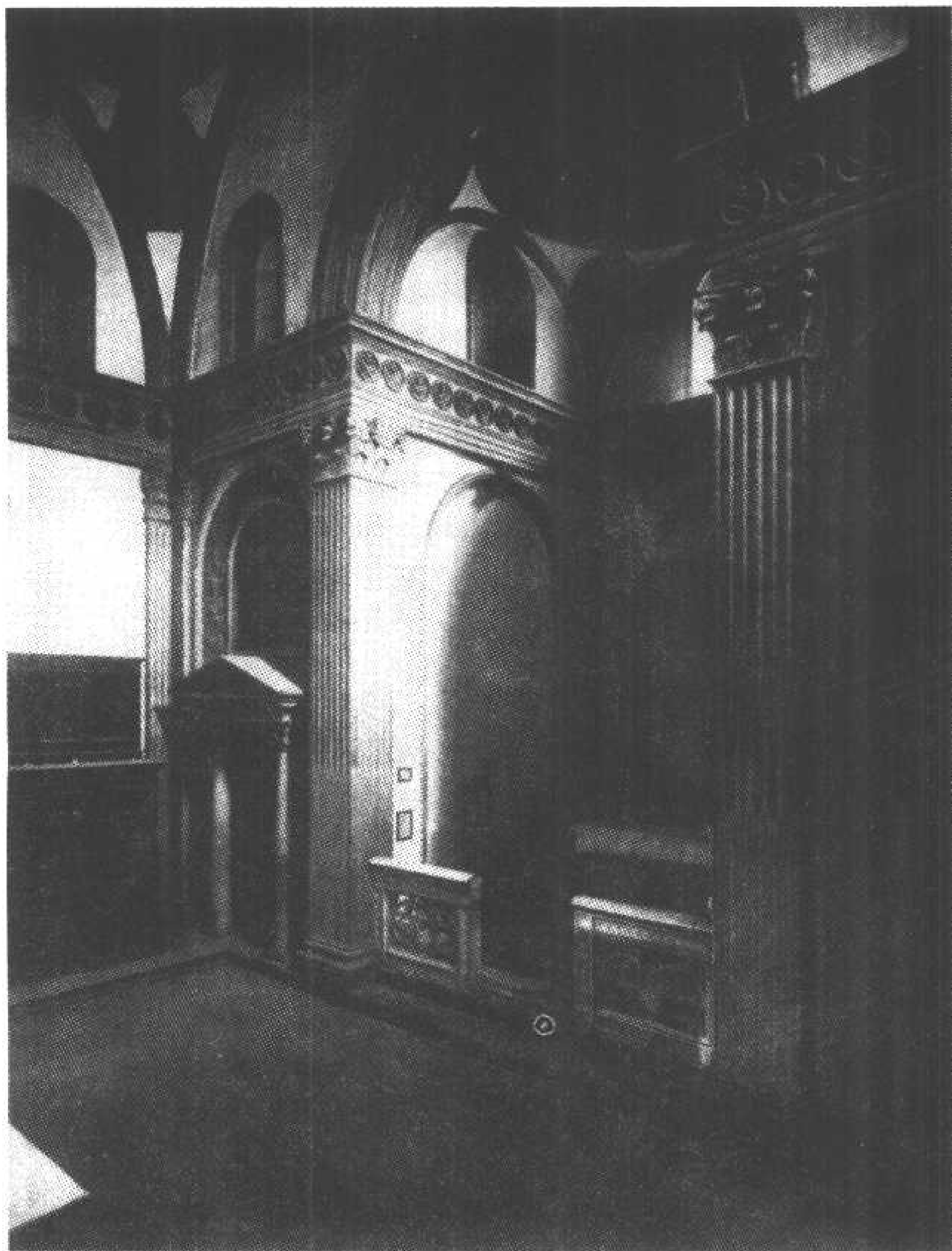
在意大利，创新者有一个建筑师布鲁奈莱契，一个画家马萨契奥，一个雕塑家多那太罗。意大利多的是古典建筑和雕塑的遗迹，甚至还有少量的残存壁画和镶嵌。就是通过这些遗留物，古典的形式和古典的特色融进了意大利的绘画。不过，艺术家追求古代艺术所谓“缺席的模特儿”的努力，从来没有落入仅仅限于模仿的窠臼，而许多人文主义的拉丁文写作却因为仅仅限于模仿而失去了生气。艺术家们的想像力不但没有因担心是不是地道而受到窒息，反而因受到刺激而得到了发挥。安德烈·夏斯特尔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同古代的关系时，

---

\* Jan Van Eyck(约 1395 - 1441), 佛兰德斯画家。他的写实主义油画，特别是肖像和宗教题材的，对后来北欧画家影响极大。

\*\* Hugo Van der Goes(约 1440 - 1480), 佛兰德斯画家。他在佛罗伦萨的画把写实风格同重大题材结合起来，对许多意大利画家有影响，发疯后的宗教题材画十分有感染力，震撼心弦。

\*\*\* Master of Flemalle, 相传即佛兰德斯画家 Robert Campin(1375 - 1444), 曾教 Rogier Van der Weyden(约 1400 - 1464)习画，后者继凡·爱克为佛兰德斯画派领袖。



布鲁奈莱契在佛罗伦萨所建圣洛伦佐教堂中的圣器室, 门上有多那太罗的双人浮雕

称它是“文化仿造的一件大事……为了要重新发现古代，它  
38 创造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一点在当时已经被认识到了，拉斐尔就曾写信给利奥十世教皇：“但愿宗座永远继续古物的仿造，追上它，超过它，像您在伟大建筑物方面所做的那样。”<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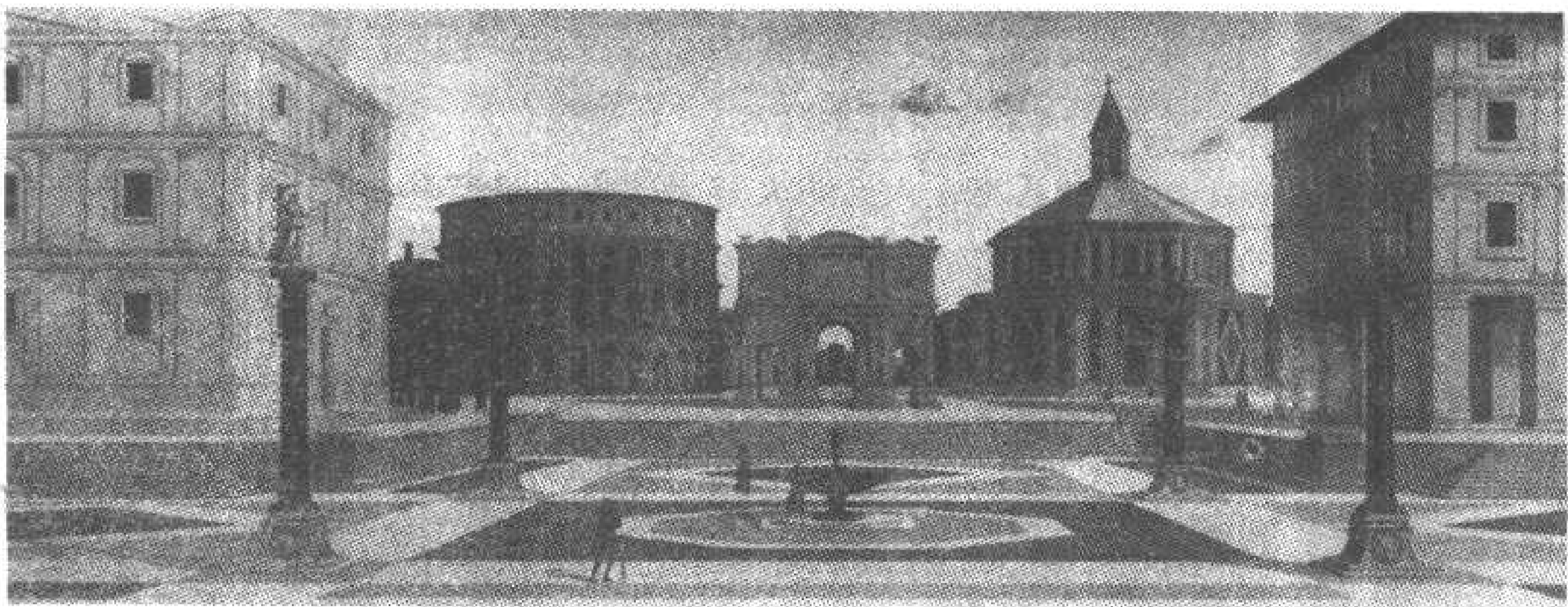
这种情况在十五世纪发轫于佛罗伦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佛罗伦萨人对他们的城市引以为豪，这是公民人文主义的一个必要成分，导致地方上共同努力美化他们的城市，布鲁奈莱契、多那太罗和马萨契奥都被聘请来参加了这项工作。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城市在佛罗伦萨有了看得见的形态，同时又有亚尔培蒂在那里，为后代把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的新手法在他的论文中加以系统化。这些新手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透视法，这不仅仅指它的实践（凡·爱克的作品中就有，不过只是试验性的，比如你从窗口望出去所见到的东西），也指可以用来概括它的数学理论。这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数字为基础的和諧比例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佛罗伦萨人，因为他们精于数字计算，对建筑设计的数字基础有着偏好。任何城市都没有像佛罗伦萨那样精通银行业务，所有受过教育的佛罗伦萨人都从小学过打算盘。不仅是中世纪，就是古代世界也都不知道的透视法，为自然主义式表现外部世界提供了精确的基础。这十分恰当地表明，重新发现古代同创新是互相可容的。

伯克哈特有一句名言，它概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发现世界和发现人”——前者探索外部世界，是客观的；后者探索人的个性，是主观的。“回归自然”是当时普遍使用的一句话，与“回归古人”相配。达芬奇称画家是“一切看得见的自然景物的模仿者”，并与一般见识一样，认为一幅画越接近“模仿





意大利的钱  
币兑换商和  
银行家



理想城市的建筑透视(15世纪意大利)

的东西”就越好。

透视这门“科学”与表现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对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联有其特有的更加广泛的兴趣,所谓科学是指在画家的观察中结合对数学的寻求。这方面最高峰的榜样是达芬奇。肯尼思·克拉克\*称他是“有史以来最爱追根究底的好奇的人。”他对自己看到的一切东西都要问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是这样”。这种热情充满了他著名的笔记簿。他坚持认为,为了追求自然主义,绘画必须受制于“数学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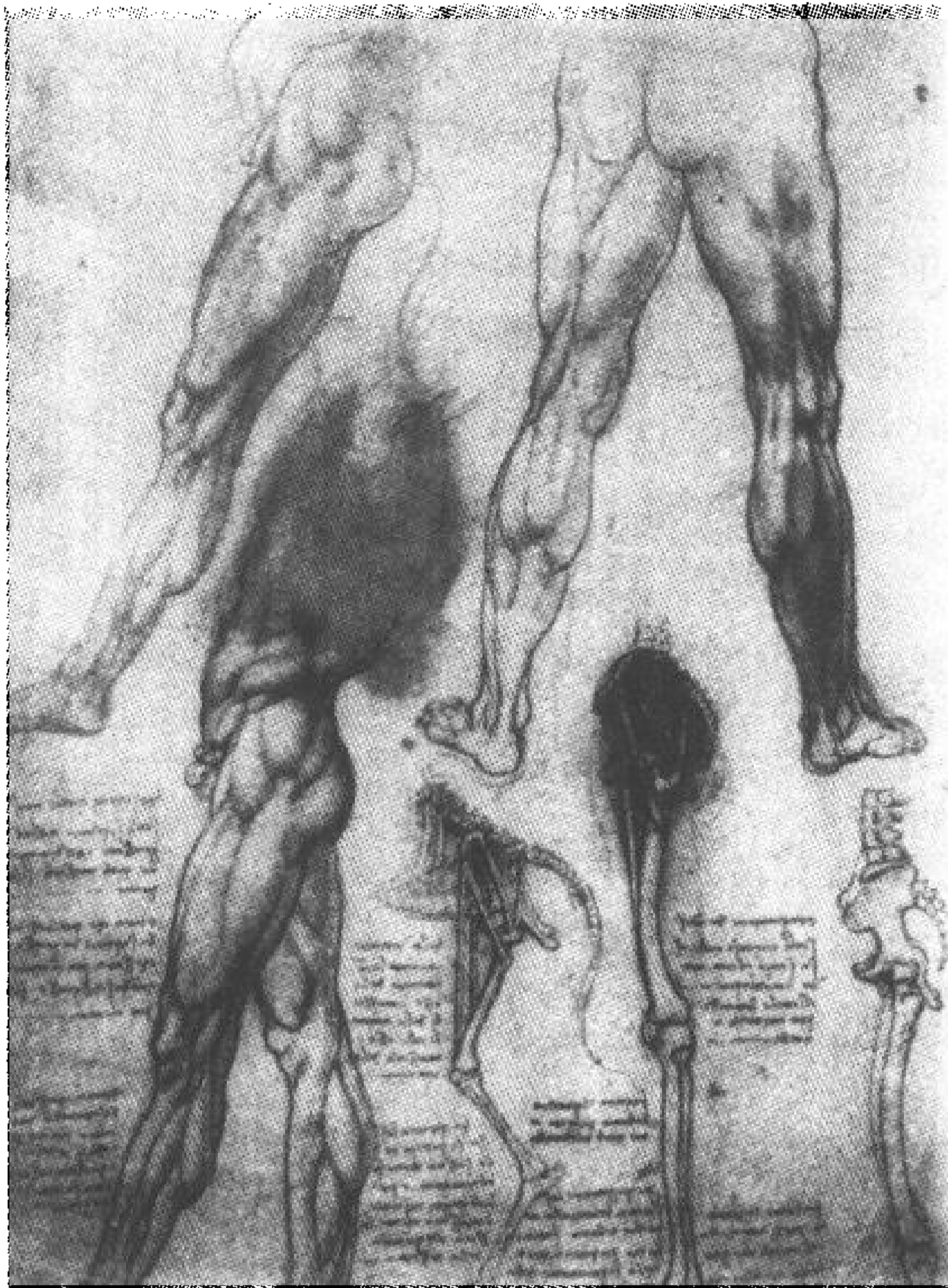
39 寻求一种关于人体比例的数学理论,既要满足新柏拉图主义对人与自然和谐连续性的信念,又要满足古典派对对称的信念,使得亚尔培蒂、达芬奇和杜莱尔都为之入迷。这最后一位在北方艺术家中总是最近乎意大利人的。他们三位都写过关于透视的文章,也写过关于人体比例的文章,亚尔培蒂并以此作为他的建筑比例的基础。

亚尔培蒂和达芬奇又不谋而合地都重视艺术家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意大利画家中兼做人体解剖营生的,可以开出一份很长的名单,除了达芬奇以外,也包括米开朗琪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这种把观察自然、描绘自然、表现自然三者的结合,一直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科学家伽利略所开始的科学创新大爆炸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在科学与艺术尚未分家的时代,这种发现世界的兴趣同伯

---

\* Kenneth Clark(1903 - ?),英国艺术史家。曾任伦敦国立画廊馆长(1934 - 1945)、牛津大学美术教授(1946 - 1950, 1961 - 1962),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主席(1953 - 1960)。著有艺术史和评论多种。



达芬奇所绘人体解剖比较图

克哈特的第二句话“发现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如果只有一个特点的话，那就是抓住男人和女人人性的心理力量，这是自从古典时代以来无与伦比的。从多那太罗到拉斐尔再到提香这么一长串伟大艺术家留下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如此生动的证据，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多费唇舌呢？他们所表现的就是一幅人的形象，虽然形态各异，但是

却用视觉形式传达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尊严的信念。我们还可以把杜莱尔和贺尔拜因\* 这两位艺术家包括在内,他们是  
40 最接近伊拉斯谟、莫尔和北方人文主义者的。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人文主义的艺术》一书中写道,“他们的题材是人,严肃而热情、全心全意和具有头脑的人。”而且像伟大的希腊艺术家一样,他们描绘了“具体的普遍性的”东西,把普遍真理同具体经验相结合,而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这种具体经验把诗意的和艺术性的表现方法置于哲学和历史之上。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本人很少是人文主义者,但是在意大利,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常常与人文主义者来往,有共同的兴趣(例如,他们都热衷于重新发现古代),受到后者思想的影响(例如新柏拉图主义对波的契里和米开朗琪罗的影响),并且企图通过自己的媒介来表达这种思想。亚尔培蒂是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中最接近艺术家的,他在《论绘画》中坚持说,绘画是一种高尚的活动,应该把它像诗歌和修辞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因此,艺术家必须得到诗人和修辞学家所受的教育并与他们交往,艺术不能交给没有文化修养的工匠。如果说在十五世纪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的话,那么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的名声就足以说明人文主义已把艺术家的地位改变到了什么程度,至少一些极其例外的少数艺术家,教皇们和君王们都把他们当作熟人看待,“神奇”已成为描写艺术天才的常见的词语。

---

\* Hans Holbein(1497 - 1543),德国艺术家。与伊拉斯谟结交,1526年去英国为莫尔绘肖像,也曾为路德的《圣经》绘插图,被认为是当时肖像画家中最写实的。

## 十

除了把古典的神话和象征融合到基督教传统中以外,还要把古典的模特儿(例如裸体)融合到基督教传统中,这个难题是后来才慢慢解决的。两种传统的融合最后在十六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鼎盛期出现的异乎寻常的“火与光的爆炸”(潘诺夫斯基语)中完成。当时独断专横的教皇朱利乌斯二世把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布拉曼特\*都带到罗马来工作,相距不过几十码:米开朗琪罗画西斯廷教堂拱顶,拉斐尔画教皇在梵蒂冈宅邸的壁画,布拉曼特建造圣彼得教堂,并把梵蒂冈和贝尔维德别墅相连,创造了文艺复兴时期花园的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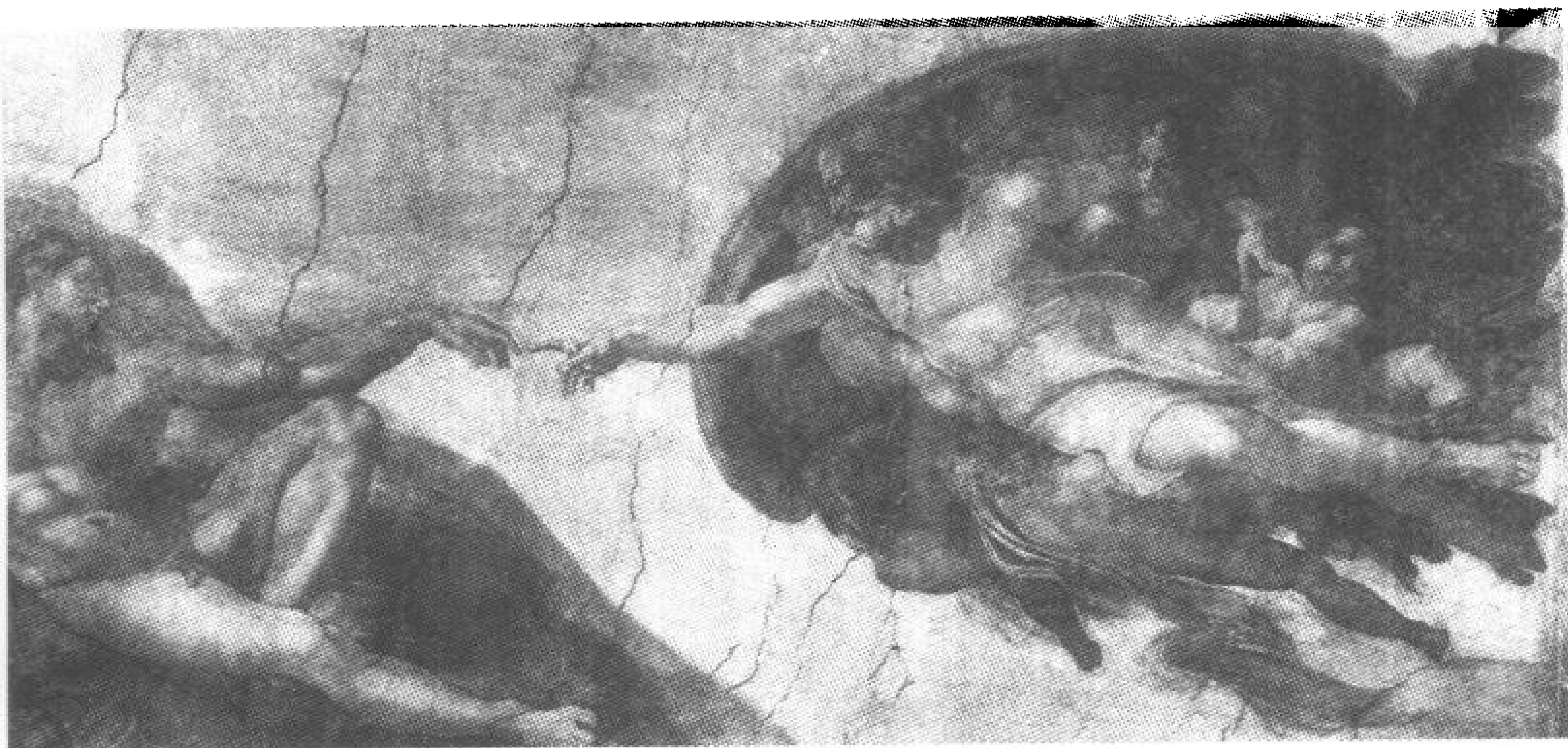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个黄金时期在1520年拉斐尔逝世后结束,前后不过二十多年。继文艺复兴鼎盛期的和谐与平衡——伍尔夫林给了“古典艺术”这一名称——之后是一个动乱和多难的时期,它在艺术上的反映是矫揉主义\*\*的过分夸张。

是否存在一种矫揉主义的风格,是艺术史家有不同看法的问题。但无疑在米开朗琪罗早期作品《悲悯》、《大卫》和《摩西》中所表现的和谐,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劳伦斯图书馆和梅迪奇陵墓所造成的强烈的令人不安的印象之间,已经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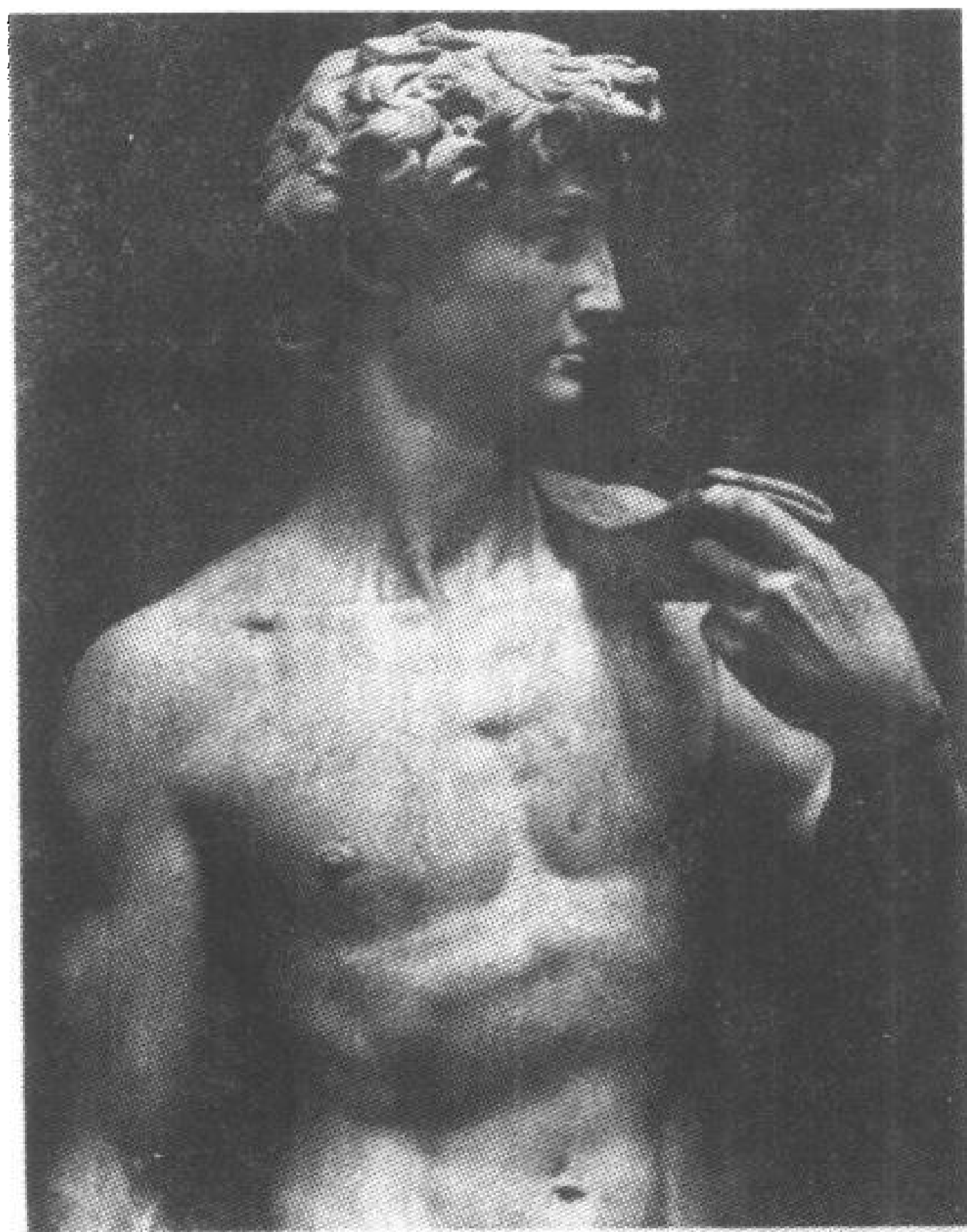
---

\* Donato d' Agnolo Bramante(约1444-1514),意大利建筑师。画家出身,但以建筑闻名,以罗马式气势和匀称比例著称,为文艺复兴鼎盛期风格典型代表。

\*\* mannerism, 亦译风格主义。



米开朗琪罗的  
“上帝造人”，摄  
自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的穹  
顶



米开朗琪罗的“大  
卫”，和“上帝造人”  
一起，是文艺复兴时  
期人文主义的最高  
表现



拉斐尔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画像，尤利乌斯二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赞助人(“波尔森那的弥撒”的细部)

或者甚至在米开朗琪罗 1511 年在西斯廷教堂拱顶上画的《亚当的创造》的崇高，与他 1536 年和 1541 年在同一教堂的尽头墙上画的《最后的审判》中发暗的令人痛苦的画面之间，对比就更加强烈。

圭契阿第尼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末写的《意大利史》中，把文<sup>42</sup>艺复兴鼎盛期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对比强烈的时期。分界线是 1494 年，在那一年法国入侵了意大利，十五世纪下半叶的和平和繁荣为各种各样的动乱和祸害所取代。1527 年罗马遭到洗城之劫后，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继之遭到围城之难，接着又是饥荒与鼠疫。马基雅维里死于 1527 年，圭契阿第尼比他长寿，活到 1540 年，他们在后期的著作中都开始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灾祸频仍

的时代,因此已经失去了亚尔培蒂和其他公民人文主义者的信心,即力量能够战胜命运,人的勇气加上理性能够战胜逆境。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一切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循环,政治家的手腕只能拖延而不能阻止腐朽和衰亡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甚至认为这对古代共和政体的罗马都是适用的,对于当代的佛罗伦萨也适用则是更加明显了。在那里,刚刚于1527年恢复的共和政体不出三年就垮了台,梅迪齐家族从此一劳永逸地重掌该城的统治。

意大利剩下最后的一个共和国是威尼斯,圭契阿第尼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它寄予了厚望,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至少人文主义的艺术在威尼斯仍旧获得成功。绘画方面有提香,建筑方面有建筑天才巴拉第奥\*。但是威尼斯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幸存,仅仅依靠它善于适应时势的变化,而那个变化的方向,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是与人文主义相敌对的。当宗教战争的暴力和不容异说的偏狭在欧洲肆虐的时候,勃鲁盖尔\*\*在画他那令人惊恐的《死神的胜利》(1561-1562)时,早期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信心肯定成了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讽刺,43 其辛辣程度不下于对我们自己这一世纪的实际情况的讽刺,因为十八十九世纪对进步的可能性所抱的信心如今已粉碎无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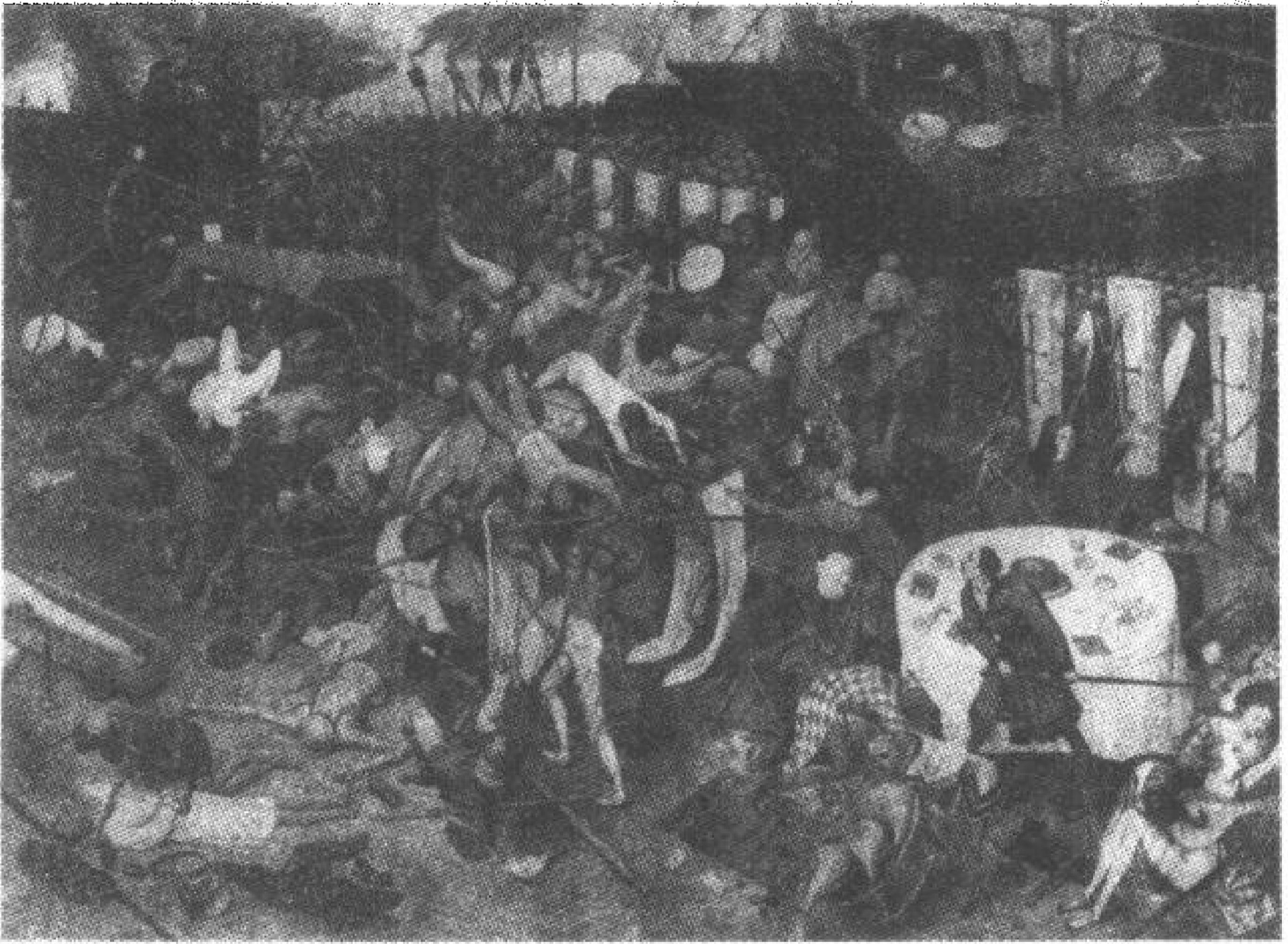
在十六世纪,如同在二十世纪一样,人文主义传统如果要经受过得起早期乐观情绪的幻灭,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拒绝对人类抱

---

\* Andrea Palladio(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以按罗马风格的宏伟堂皇风格设计著称,此风格十七世纪传入英国,为乔治王时期英国建筑师所仿效。著有《建筑学》四卷(1713年始出版)。

\*\* Pieter Bruegel(约1525-1569),佛兰德斯画家。善于画农民生活和圣经寓言,场面浩大,色彩刺激。所作《背十字架》和《屠杀无辜》表现了佛兰德斯一村庄中宗教迫害所造成的恐怖。





勃鲁盖尔的“死神的胜利”，绘于 1561 - 1562 年



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十四行诗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最宝贵的财富

全然悲观的态度,那么就必须安于马基雅维里早已感到惴惴不安的人生中的不安定和悲剧因素。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十六世纪头二十年文艺复兴鼎盛期出现的精彩而昙花一现的和谐,与莎士比亚在该世纪最后十年和十七世纪头十二年写的剧本中所表现的世界,就可以看出不同的程度了。我并不是说莎士比亚本人是个人文主义者。谁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位著作达百万言的作家,一般都认为是所有文学家中最伟大的,但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蒙着头罩的神秘人物,仿佛他没有写过只字片语一样。

但是他的剧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这位作家的情况,不论知与不知,有一点却是可以说的,即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了。因此,“莎士比亚”——不是那个人,而是他所写的剧本——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中,是有他的稳如泰山的中心地位的。正如马修·阿诺德所写的那样:

不朽的精神所必须承受的一切痛苦,  
一切伤人的弱点,一切压倒的悲伤,  
在那个胜利的额顶上,  
都找到了它们唯一的聲音。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有明有暗,有滑稽淫猥(福斯塔夫、波顿、托比爵士),也有田园诗和罗曼史(《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暴风雨》),但是最深沉的调子还是悲剧——李尔王、奥赛罗、安东尼、克丽奥派屈拉、布鲁图斯等。莎士比亚和马基雅维里一样,不相信 Virtù——勇气和雄心——能够掌握命运。人所能够做的,不过是以坚韧不拔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失败。正如埃德加在《李尔王》中所说的:“不管是生是死,人都必须承

受。成熟乃是一切。”

或者，像克丽奥派屈拉那样，以一个高贵庄严的姿态面对希望的破灭。

……可敬的先生，请鼓起勇气；  
我们会埋葬他；然后，只要是勇敢高尚的，  
我们就按罗马的崇高方式来做，  
让死神自豪地把我们带走……  
把王袍给我穿上，把王冠给我戴上，  
我心里有不朽的渴望……

莎士比亚也绘出了他自己的人文主义王子的肖像，这是比所有其他的肖像寿命都长的一幅肖像：

重臣的，军人的，学者的，眼神，辞令与武艺：  
这美好国土的希望与鲜花，  
式样的模范与举止的典型  
一切观摩者的对象……

44

但是如今哈姆莱特是“一个被毁掉了的高贵的心胸”，一个幻灭了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模仿亚尔培蒂和米兰多拉以前写的颂词，给他写了台词，表示了他的厌恶：

人是怎么一回事：理想多么崇高！能力多么无限！在形状同行动上多么敏捷而可羨！在举动上多么像天使！在体会上多么像个神！是世界上的奇迹！是万物的精英！但

61

是,对于我,这烂泥捏成的究竟是个什么?我看见人简直不能欢喜。\*

## 十一

对哈姆莱特的最好回答是最后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蒙田提出来的。他谴责宗教内战真是“一个训练背信弃义、惨无人道和盗匪行为的学校”,决心不给卷进去,便在1571年退出“宫廷和公家的奴役”(这是他刻在书房门口的话),后来献身于写作有二十年之久,为三卷使他成名的《随笔集》作补充,其间虽有间断。蒙田有一块刻着“我知道什么?”的闲章,他自己的回答是:“只有一件事有把握,那就是我自己。”在他所创造的文学形式随笔中,他对自己进行了详尽的检查,一系列的考验和测试,法文 *essais* 即为此意,他就以此命名他的文集。在这些考验中,他观察自己的行为,并把它记录下来,他的观察不仅不自欺欺人地想把自己说得比实际的他要好,而且也同样没有自暴自弃地歪曲自己本来面目的毛病。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件艺术品,伯克哈特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蒙田对此没有兴趣,却有志于认识自己,以此作为了解人类状态的唯一可靠钥匙。他写道,“每个人都带着成人状态的整形式”,在他所举起的镜子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易变和渺小。

蒙田所描绘的人的形象与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对自由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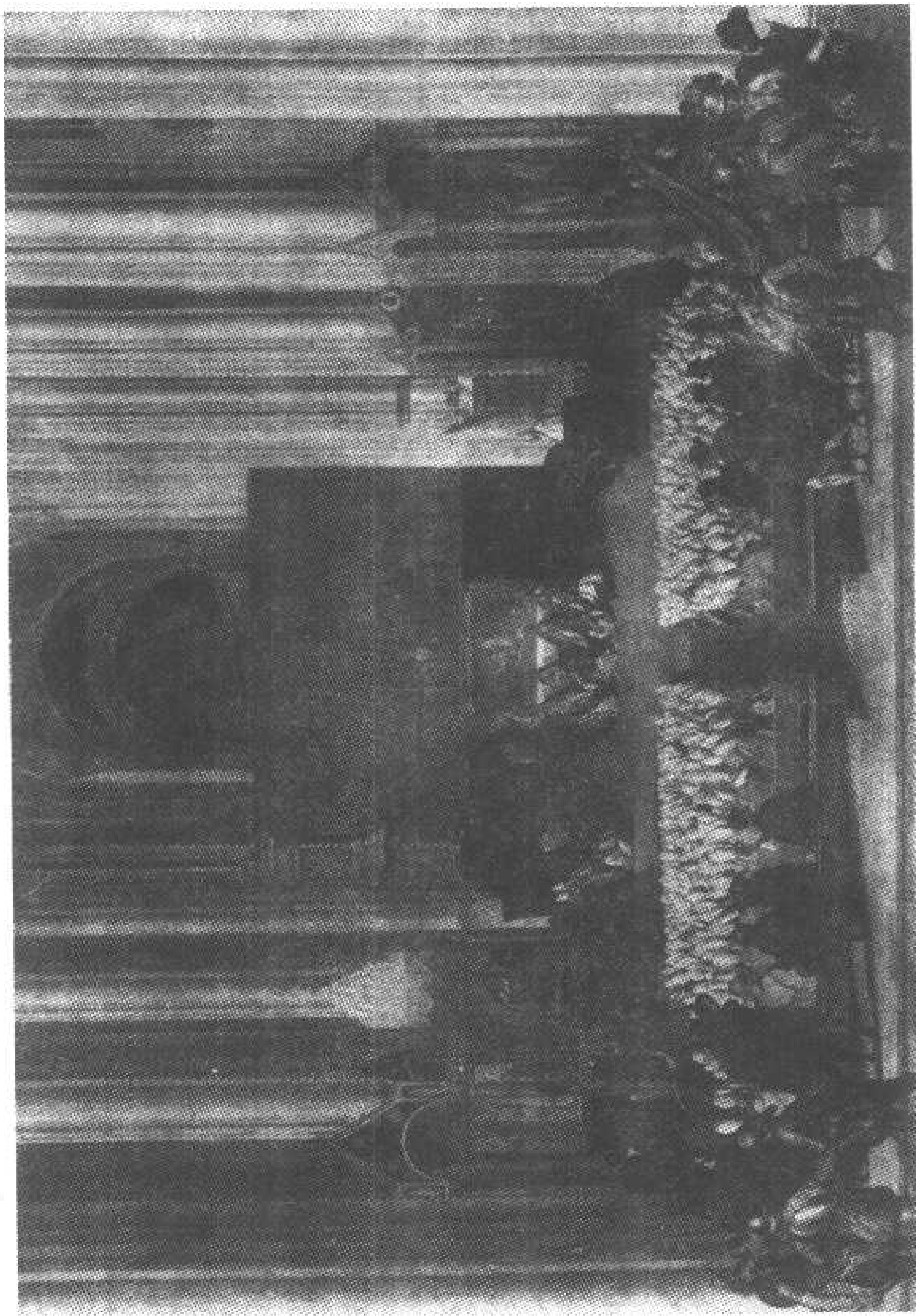
---

\* 以上《哈姆莱特》中所引译文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曹未风译本。



蒙田在他书房的顶梁上刻了希腊和拉丁作家以及《圣经》里的话。例如顶上第三梁上刻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一行希腊文：“谁知道生是不是就是死，死就是生？”

的希望和一个共和国的公民精神——或者他们的失败引起马基雅维里去寻求的救急办法，这三者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的形象既避免米兰多拉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过高颂扬——“在举动上多么像天使，在体会上多么像个神！”——也避免米开朗琪罗那样艺术家的英雄般的想像。但这仍是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sup>45</sup>形象，哪怕仅仅是因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自身的经验。关键所在是蒙田和歌德一样都视为臬圭的箴言——“克制”，这是他从希腊怀疑派那里拿来的一個词，他用希腊文刻在他的闲章的背面。要想超乎人的状态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人若能学会接受自己的实际面目，就会快活一些，好过一些。这种自我接受



1563年特伦托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标志着天主教人文主义的结束和反宗教改革的胜利（此画据  
说系提香所绘）

不一定是自我改善的障碍；相反，它是自我改善的条件。

蒙田以他私淑的老师苏格拉底为榜样，在他最后一篇随笔《论经验》中总结道：

对我来说，我爱生活，并且珍视上帝赐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寻求别的条件，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正确利用我们自己的条件，我们到自己的身外去，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内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用踩高跷，因为即使踩在高跷上，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在世界最高贵的宝座上，我们坐的仍是自己的屁股。最好的生活是普通的和符合人性的模范的生活……既没有惊人出奇的事，也没有过分的奢华。

这是对哈姆莱特嘲讽的答复，这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答复。它的从容安详并不是轻忽随便的乐观情绪的反映，而是出诸蒙田和他那一代人在命运无常上的辛酸经验，以及人在相互关系中会多么不讲人道的第一手知识。

蒙田的答复当然算得上是一个答复，但这是一个个人的答复。像除此以外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前的人文主义的态度早已过时，早已不吃香了。路德在1517年把他的论文钉在维腾堡的教堂门上，这一行动标志着在此以前几百年的那个异乎寻常的宽容时代的结束。伊拉斯谟这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今受到新旧两个教会的谴责。路德在1525年发表的<sup>46</sup>《意志的羁绊》中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宣称人类是“被束缚的、可怜的、被囚的、有病的和死亡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诸“可憎可厌的邪恶”本性。卡尔文甚至更进一步驳斥他本来持有的人文主义观点声称，除了上帝的选民，其余人类都注定要受到诅咒，永世不得超



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惨案，当时巴黎的全部胡格诺派，总共有二千人，被信奉天主教的母后凯撒琳·德·梅迪齐和吉斯公爵下令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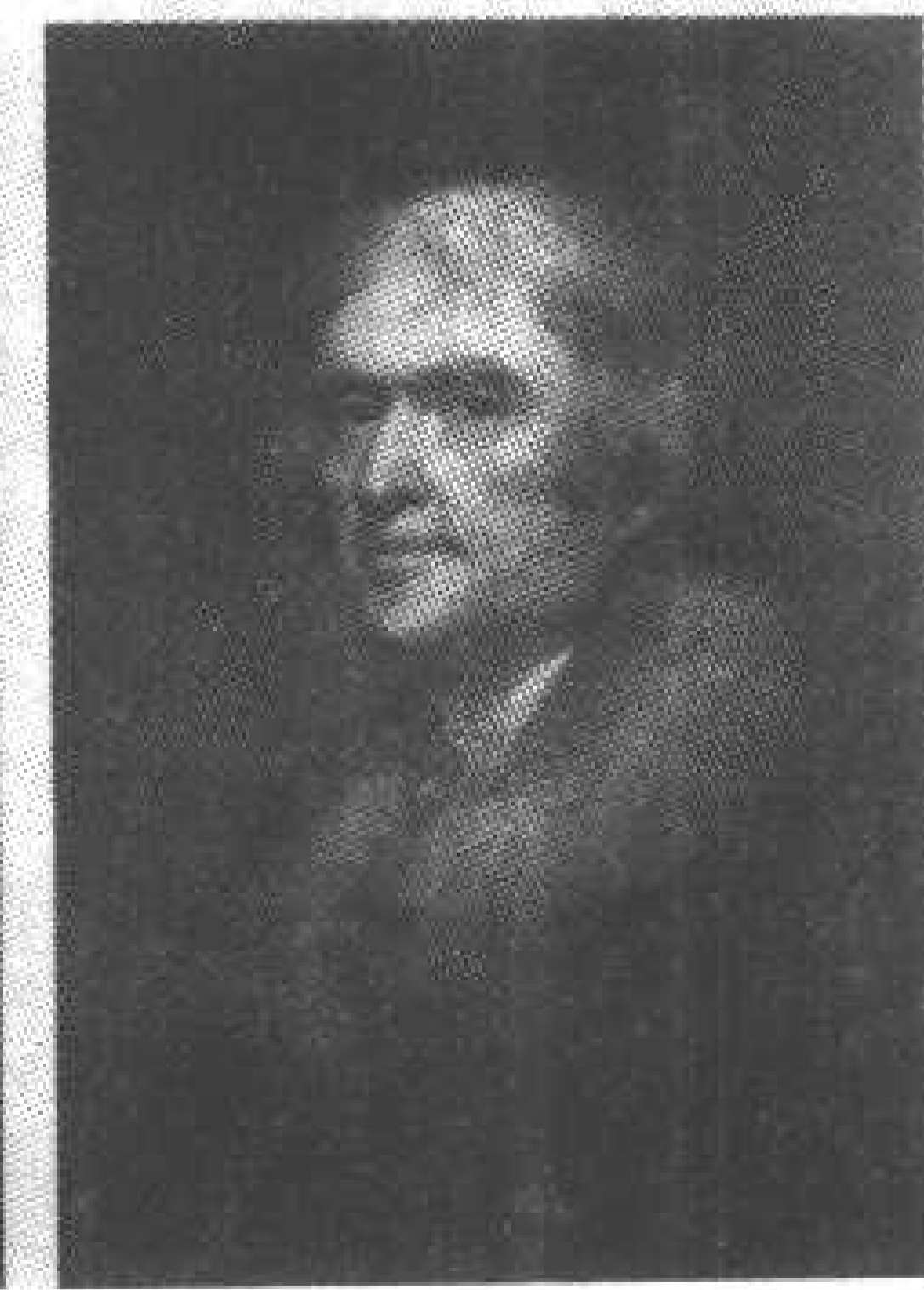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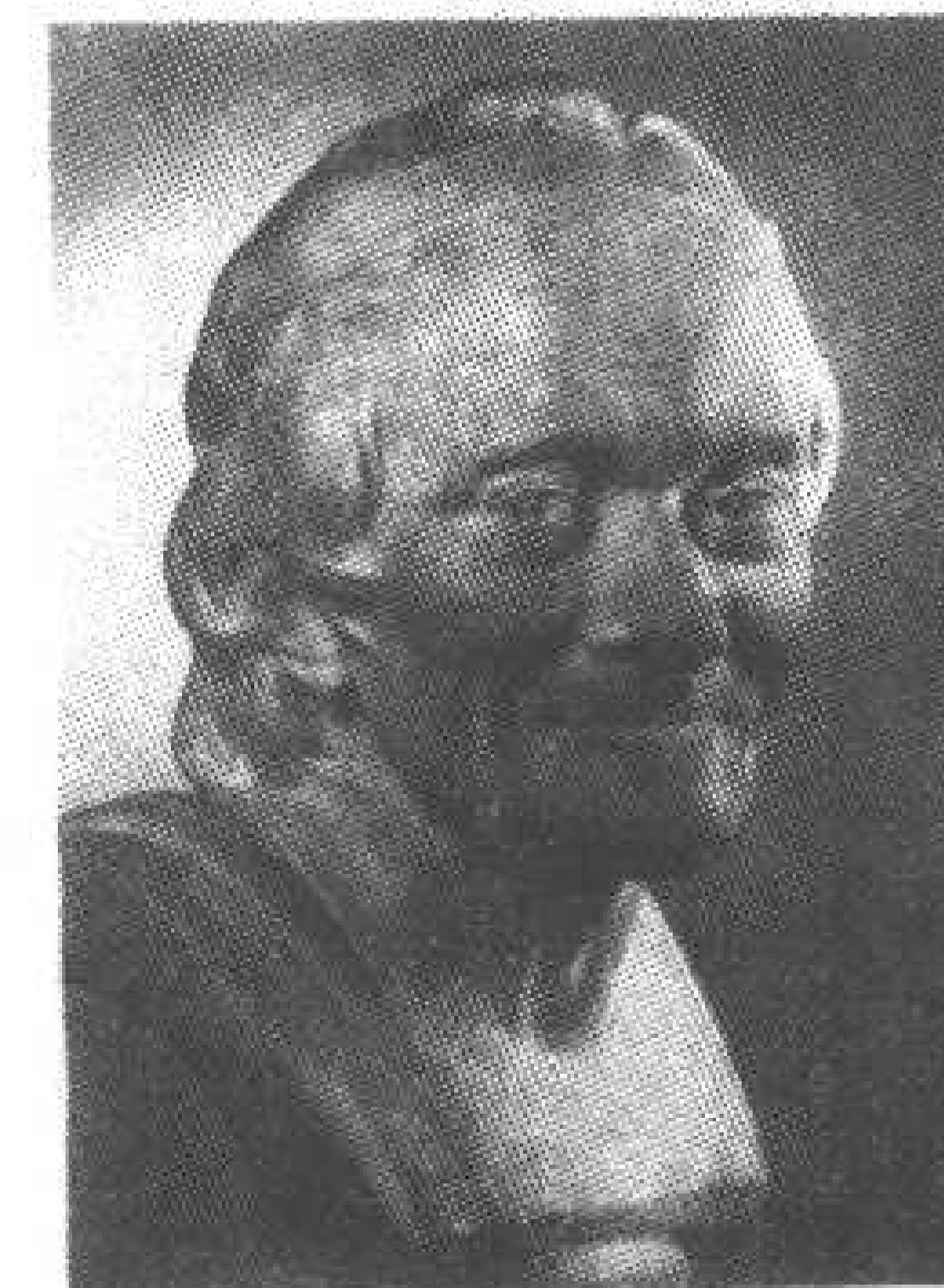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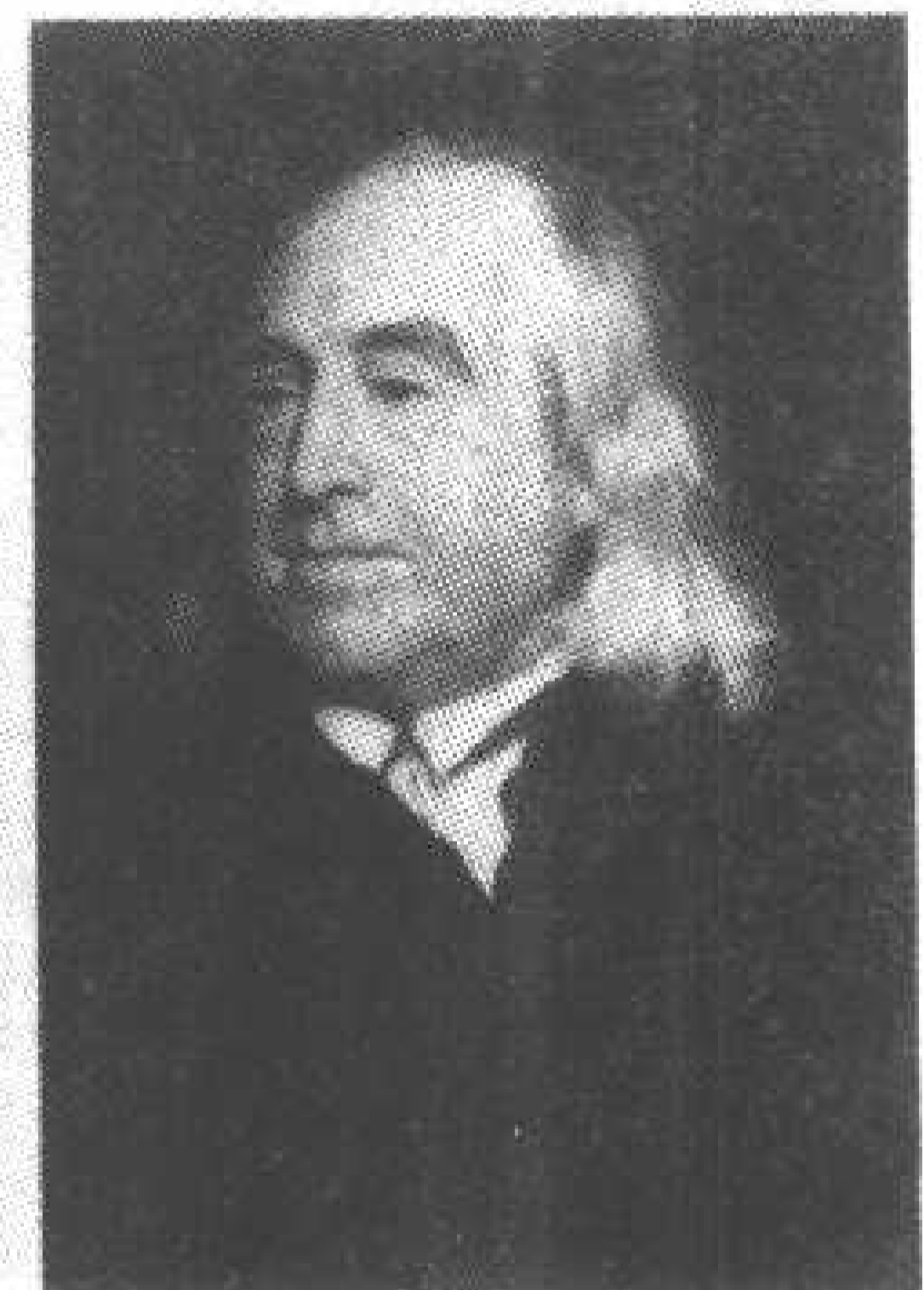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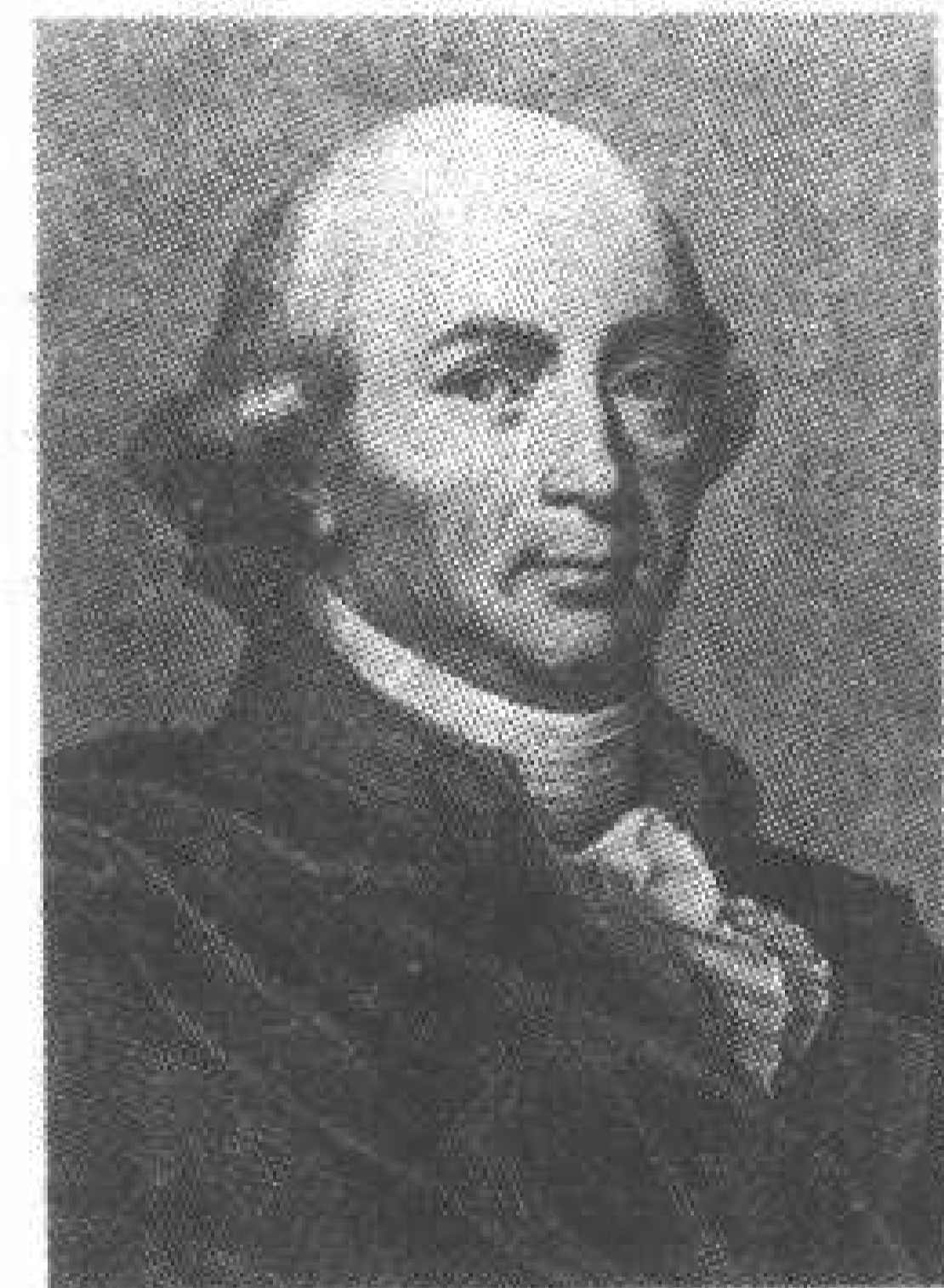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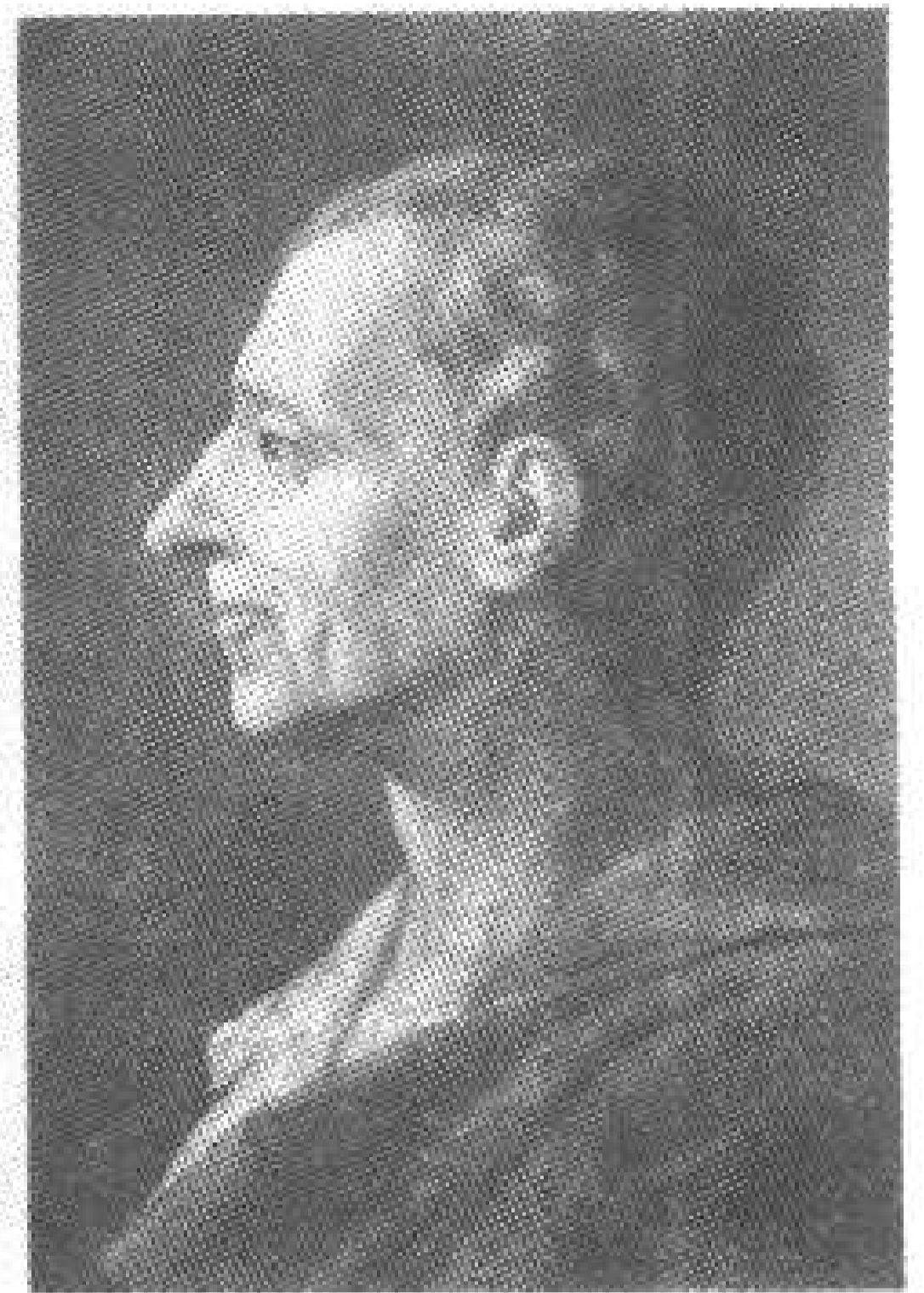
度。艺术成了清教徒敌视的特殊目标,反对崇拜圣像的破坏狂热席卷北欧。蒙田用在二十世纪可以引起共鸣的话写道,宗教改革的意识形态常常把“超天思想和入地行为”结合在一起。

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满足于恢复宗教法庭和设立像耶稣会那样的激烈的修会,而是像新教一样转而求助于国家的世俗权力来实施它对思想自由的禁令。人文主义既然不要权威,就转而寻求古典传统的支持,包括早期基督教教义。如今权威已经重新确立。不论是反宗教改革运动,还是新教改革派,都着手压制人的精神自由这个人文主义异端邪说,不让强调人和他在今世的活动,而就是这种强调使得古典的社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大大有别于中世纪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sup>47</sup>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体系;它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种运动。它只以受过教育的阶级为对象,这是人数有限的城市或贵族精英;不像路德或诺克斯\*那样,也不像后来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那样,以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为对象。因此,作为历史力量,它有明显的软弱性,而当某些人组织起来把它当作异端邪说或虚妄幻想加以压制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尽管在十六世纪末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未来站在它们一边。

---

\* John Knox(约 1505 - 1572), 苏格兰宗教改革家。创建苏格兰新教派的长老会。



## 第二章

# 启蒙运动时期

49

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发展中,我下一步要考察的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特别着重于 philosophes (哲学家)——不是职业的哲学家,而是研究他们历史的彼得·盖伊所说的,“一批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和政治改革家的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sup>①</sup>如同三个世纪以前佛罗伦萨是人文主义者的中心一样,巴黎是这联合的中心,法语是它的自然语言,正如拉丁文在十五世纪中一样。

上(自左至右):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孟德斯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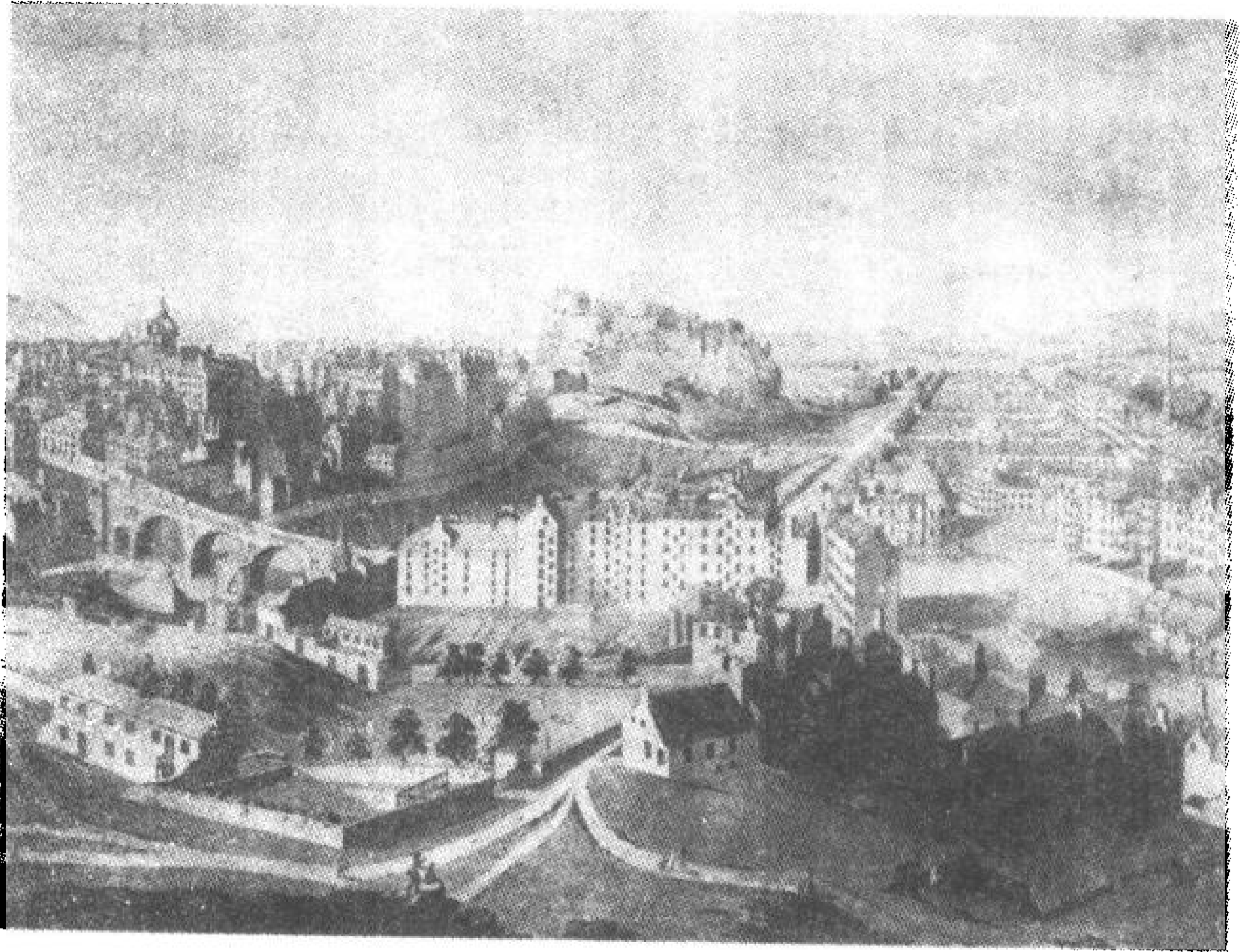
中(自左至右):赫尔德、康德、边沁

下(自左至右):伏尔泰、卢梭、杰斐逊



一批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聚在一起晚餐，其中有(1)伏尔泰、(2)孔多塞、(4)达朗贝尔、(6)狄德罗。让·胡伯的当代雕刻

这些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仅举最有名的为例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吉朋和边沁、休谟和亚当·斯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莱辛和康德。这些哲学家就像他们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那样，相互之间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脾气暴躁，争论不休，互相攻讦。但是，就像他们自己打比方的一样，他们是一家人，随时可以团结起来，支持他们共同赞成的事业：创建一个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威胁，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世界。



休谟和亚当·斯密时代的“北方雅典”爱丁堡

欧洲受过教育的阶级从来没有形成过比这更加世界主义化的社会，他们以法语为通用语言，经常出国游历——这是一个伟大的旅行时代——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战争不甚频仍期间。十七世纪末首次出现的报纸和刊物的出版补充了书籍的流通，凡是在巴黎、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东西，只要是有意义的，马上会译成欧洲的其他主要语言。这里举一个例子，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于1748年出版，到1751年光是法语就印刷了二十二版；同年匈牙利出了拉丁文版；到1773年已出了十种不同的英语译本；荷兰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版都在七十年代内出版，德语版在1789年，俄语版在1801年出版。伏尔泰的《天

真汉》仅在 1759 年就出了八版。销路当然不成问题——著名的《百科全书》有四千多订户。这些哲学家发表见解的对象，虽然在世界各国都有，但毕竟是极少数的，极为虚心的精英，包括不少贵族（且不提只说法语的腓特烈大王和俄国的凯塞琳女皇），也有数目多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教士。萨尔斯堡大主教的书房里  
50 有伏尔泰和卢梭的胸像，所有的沙龙里都有教士的踪影。教士和律师、医生、王室官员以及当地贵族和有钱商人，构成了波尔多和狄戎等地外省学术团体和文学会、读书会的成员。七十年代美因兹的读书会拥有三百名会员，订有四十七份报纸和四十一份法语和德语刊物。就是通过这些团体和联谊会、俱乐部、咖啡馆，新的思想传播到了外省各地。

至少在一个地方，思想传播的流向是倒过来的。那就是苏格兰，它本来是一个王国，如今已沦为英国北部一省，爱丁堡已不再是首都，但仍以北方的雅典之称而自豪。它有着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当时最有创见和最为敏锐的思想家；有着像弗朗西斯·赫契森、托马斯·里德、卡默斯勋爵、蒙波多勋爵、约翰·米拉、威廉·罗伯森、杜加尔德·斯蒂瓦特\* 那样的饱学之士；有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经过改革的大学吸引众多学生，其中有许多是美洲来的；还有像精选会这样的辩论俱乐

---

\* 这些苏格兰思想家除下列几人外余均事迹不详：

Francis Hutcheson(1694 - 1746), 苏格兰哲学家。所创道德标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后被边沁采用。著有《美与德思想起源探讨》。

Thomas Reid(1710 - 1796), 苏格兰哲学家。常识派哲学创建人，该派亦称苏格兰学派，理论名称为常识现实主义。著有《常识原则问题上人的思想探讨》(1764)。

Lord Monboddo(1714 - 1799), 苏格兰人类学家。原名 James Burnett。比达尔文更早提出进化论原则。主要著作《语言的起源和进展》(1773 - 1792)中指出人与猩猩的关系。

部，大家都有志于讨论道德、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完全有理由说，它提出来而被传播的思想不下于它接受到的。

## 二

在启蒙运动前的一个半世纪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这个紧紧封闭的世界慢慢开放了。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革命，经过伽利略的发展，使得地球和它上面的居民不再是宇宙的中心<sup>51</sup>，而仅仅是一颗围着某个恒星旋转的行星。宇宙开阔了，地球本身的已知界限也开阔了，许多人作了探险的航行，不仅发现了新世界的美洲印第安人，也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发现了其他非基督教的历史文明。

文艺复兴之后紧跟着而来的是教条化宗教的有力复活。新教方面和旧教方面都一样。十七世纪并不缺少伟大个人天才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塞万提斯、伦布朗、莫里哀，但是更重要的是，十七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伟大的宗教时期之一，就像法国史学家保尔·哈柴德\*所说的那样“完全、必要、深刻。”但是，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怀疑的潜流也增长了。宗教战争的结果是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不可和解，而且造成了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分家的趋向。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本人也

---

\* Paul Hazard(1878 - 1944), 法国学者, 比较文学权威。1939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许是虔诚的人,可是他们在追求真理时只依靠理性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令人不安的。托马斯·霍布斯\* 素有哲学界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的追求安全(他曾写道,“恐惧和我是天生的一对孪生子”)反映了英国内战所引起的焦虑。他否定宗教是人的价值观的来源,而把道德和社会都完全建筑在人的纯粹谋求自我保存的要求上。传统的信念,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俗世的,都受到了十七世纪经验的深深打搅。像霍布斯或者比埃·拜尔\*\* 的怀疑论着实教人们吃惊。拜尔是一个法国新教难民,他宣称理性不但摧毁了得到普遍接受的信念,并且使得怀疑本身的根据也可怀疑。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种不安的潮流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被一股新的乐观情绪所逆转和代替了。这种情绪的改变早在十七世纪一开始就已被弗朗西斯·培根预料到了。培根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摒弃传统,把一切都押在试验性科学上,认为这能把人从原罪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恢复他由于堕落而丧失的对自然的控制。他写道,“就像被一种妖术所迷住一样,由于对古人的尊敬,由于那些在哲学方面算得上是伟大的因之得到普遍公认的人的权威,人类在科学方面就被拉住了后腿而得不到进步。”②

培根认为,剩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既不是在权威,又不是在(笛卡尔式的药方)演绎推理的基础上,而是在观察和试验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整个了解工作”。③

---

\* Thomas Hobbes(1588 - 1679),英国哲学家。对人的本性抱悲观的看法,主张建立绝对专制的政府,反对教会凌驾国家之上。在哲学上应用力学和机械学原理。著有《利维坦》(1651)。

\*\* Pierre Bayle(1647 - 1706),法国哲学家。唯理论著作《历史和批判词典》(1697)对法国启蒙时期哲学家和英国自然论者都有影响。



培根是个在科学还没有取得成就之前就大力宣传它有取得成就的可能性的的人,他于 1626 年去世。但是这些成就不久就来到了。艾萨克·牛顿生于 1642 年,也就是培根死后十六年,死于 1727 年。他的天才所造成的影响离蒲柏\* 著名的墓志铭相差也不远了:

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躲在黑夜里,  
上帝说“让牛顿干去!”一切就大放光明。

当然并不是“一切”;但是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不仅奠定了古典物理学的基础,而且提出了在一定时候同样的方法也能揭示迄今尚不为人知的规律的可能性。看来,上帝不过是个数学家,他的计算是人的推理能力所能及的,大自然不再是人类连续不断地怀着恐惧心理生活于其中的神秘力量的随意汇集,而已被显示是一种可知力量的体系。

### 三

如果说,有什么人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中扮演了彼特拉克在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系中相似的角色,这个人就是

---

\* Alexander Pope(1688 - 1744),英国诗人。写有不少讽刺诗并翻译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



约翰·洛克像, 布朗诺厄于大约 1685 年所绘

牛顿的朋友, 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洛克。洛克的《再论公民政府》为 1688 年的英国革命作出理性辩解, 提出了一种契约式的见解, 认为政府是一种信托, 如果政府不能为它的人民提供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和自由的保障, 这种信托就可以撤回。洛克的其  
53 他著作是关于教育和人的无理性问题, 提出了容忍思想自由的经典论述。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像他在 1690 年出版的《人类理解力论》那样引起注意。洛克反对笛卡儿的人类思想是天生的说法, 认为它们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 不论是直接的, 还是大脑对这些印象所提供的证据的反射。洛克进一步阐释这样的观点: 道德价值观, 善与恶的意义, 均产生于人类经验中愉快和痛

苦的感觉。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看来,他似乎像牛顿发现了自然世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发现了人心的科学规律,从而打开了在比较理性因而也比较愉快的方针上改造人类社会的途径。伏尔泰认为,牛顿和洛克的思想是英国人所享受到的自由的结果,由于他的热心提倡,他们的思想在启蒙运动的第一阶段发挥了独特的影响。

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也崇拜经典的古代。他们不再感到重新发现一个失去的大陆的兴奋。他们都受过古典的教育,因此他们将它视为理所当然,不以为奇,但是他们认同于基督教前的共和时代的罗马。在他们看来,西塞罗,由于他的 *humanitas* 理想,是他们的英雄,正如当初是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人的英雄。又像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抽象哲学体系没有耐心,不仅攻击天主教经院哲学,而且也攻击笛卡儿的唯理论。他们在谈理性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和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是经验和常识的哲学家,不是十七世纪笛卡儿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论者。他们像文艺复兴早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一样,崇尚积极活跃的生活,不赞成沉思默想的生活,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关心此时此地的人生中的实际问题——道德的、<sup>54</sup> 心理的、社会的问题。最后,他们同人文主义者一样都抱有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信念,如今牛顿和洛克已为此提供了思想基础。德莱顿\* 在他的《圣西西利亚节之歌》(1687)中,用亚尔培蒂、古萨的尼古拉斯或者米兰多拉一眼就能认出的话表达了这

---

\* John Dryden (1613 - 1700), 英国诗人, 戏剧家。1668 - 1700 英国桂冠诗人。

个信念：

这个宇宙的框架从和谐开始，  
从无比的和谐开始：  
从和谐到和谐，  
通过它奏的音符的全部音域，  
和声在人类身上圆满结束。

这种相似之处足够确立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人文主义传统的连续性，而哲学家们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同之处，他们也很清楚：这是连续性，不是同一性。彼得·盖伊说得好：“文艺复兴时期的辩证法是启蒙运动时期辩证法的祖宗和先决条件；但是，尽管紧张情况相似，解决办法却不同。”

55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发现有可能用多种办法，把古典思想和哲学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任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或者至少互相容纳起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中间，完全世俗的、完全清醒的世界观，相对来说是很少见的……神圣的东西仍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的中心主题。”④

而启蒙运动时期的调子、氛围和假设却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些哲学家来说，光容纳是不够的。到了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十七世纪的宗教复兴已经失去了势头，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特别在天主教国家里，宗教复兴所建立的权力结构仍旧在那里：除了教会的财富，还有教会和政府的同一，检查制度，迫害异己分子（例如 1685 年把胡格诺派 \* 逐出法国），剥夺思想自由，垄断

办教育大权等等。在这些哲学家们看来,这是必须摧毁的敌人。伏尔泰写信的时候都以“消灭这些丑事”结尾,这是他从加图\*\*那里学来的,加图是共和时代罗马的英雄,在参议院中发言总以“迦太基必须毁灭”结尾。

他们认为进攻正统教会堡垒的时机已经成熟。对教会拥有巨额财富、腐化堕落和追名逐利的批评,如今可以得到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成功的科学方法,和由此而产生的持批判态度的、怀疑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习惯的支持。

把新的思想方法扩大到人类状况和人类社会的改造是一门人和社会的科学。如今的障碍是教会对人心加以控制和操纵的所谓天启宗教\*\*\*的神秘、魔法和悖论所产生的恐惧和禁忌。我们必须以消除神秘的计划来扫除这一切。实施这项计划,可以取得基督教以前古典世界的异教哲学家的帮助(例如卢克莱修\*\*\*\*),当然也可取得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调查的标准的帮助(吉朋以“我描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这句名言来总结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些哲学家们唯一的共同主题。伏尔泰对基督教的妄自尊大进行了五十年的挞伐,使用了他所掌

---

\* Huguenots, 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的名称,得名于德文 Eidgenossen(结盟者)。胡格诺派的发展曾引起法国长期内战,1598年南特法令宽容该派,内战始停,但后来路易十四又废除此法令,造成大批胡格诺派外逃英、荷、德、瑞、美。

\*\* 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 234 - 149), 罗马政治家, 历任执政官和监察官, 常在元老院鼓吹消灭迦太基。

\*\*\* Revealed Religion, 与自然宗教相对, 指信仰神的启示的宗教, 如犹太教和基督教。

\*\*\*\* 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 99 - 55), 罗马诗人、哲学家。以诗歌形式解释希腊伊壁鸠鲁的原子说。



伏尔泰《有 40 块金币的人》插图，其中教士对求助的人说：“孩子，我们自己求人捐助，我们不施舍捐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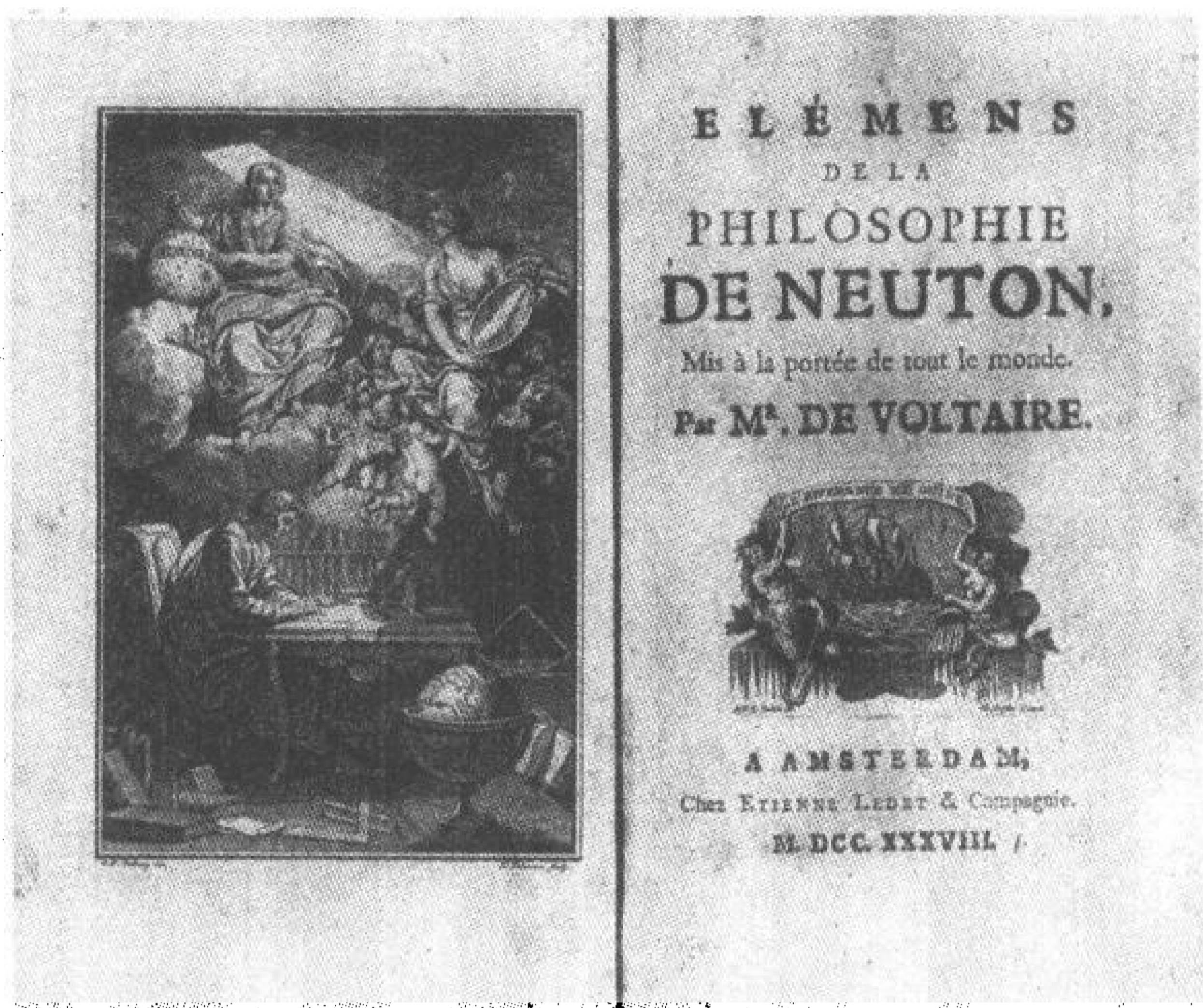
握的每一种辩论形式,从机智的妙语和讽刺到谴责,一直还没有人能胜过他。他写道,“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每一个高尚自重的人,都必须厌恶基督教派。”<sup>⑤</sup>狄德罗 1762 年在一封信中承认伏尔泰在反对谬误的斗争中的突出地位,亲热地称他为“卓越的、高尚的、亲爱的‘反基督’。”<sup>⑥</sup>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六年中,他的攻击比往年更加尖锐了。他在 1762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但愿这位在听我说话的伟大的上帝,这位肯定不是处女所生,也不是死在吊架上,或者被当作一片面包吃掉,或者启发了这些充满矛盾、疯狂和恐怖的书[指《圣经旧约》]的上帝——但愿这位上帝,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可怜可怜褻渎他的这一派别的基督教徒吧。”<sup>⑦</sup>

伏尔泰 1744 年出版他的有一半以上篇幅谈宗教问题的《哲学词汇》的时候,不仅是天主教的法国和教廷,甚至日内瓦和尼德兰的政府(都是新教的)也都把它焚烧掉了,而且,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恨不得把作者也一并烧掉才称心。

但是,伏尔泰及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并不是赞成迫害基督教徒,而是主张制止基督教徒迫害别人。伏尔泰生平之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他单枪匹马为争取给胡格诺派让·卡拉斯恢复名誉而作的斗争。卡拉斯 1762 年被诬告杀害他的要改宗天主教的儿子而被严刑拷打,车轮辗身,最后绞刑处死。伏尔泰最热情横溢的呼吁是要求宽容,要求基督教徒宽容别的宗教。在这些哲学家中,肯定有无神论者,例如霍尔巴赫男爵\*,者像大

---

\* Baron d'Holbach(1723 - 1789), 法国哲学家。本名 Paul Henri Dietrich。反对基督教,认为人性本善,堕落变坏皆因教育之故,并认为人类若能去除迷信便能达到普世幸福。所著《自然的体系》(1770)把一切都归结于物质的作用。



伏尔泰所作牛顿《自然哲学》导言的封二和扉页,1738年

卫·休谟那样的持怀疑态度的不可知论者，但是伏尔泰本人却一生保持了他对最高存在的信仰，也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创造主的信仰。他认为，这样一种信仰并没有因为牛顿的发现而声誉扫地，反而因此而有了必要。这种看法就是牛顿本人也会热烈赞同的，因为他追求宗教真理之心切甚至超过追求科学真理。

与天启宗教相对，自然论者代表大自然。它是一个没有奇迹、教士阶级、仪式、人的堕落、原罪、救世主、天意的历史或宗教迫害的宗教。这是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折衷。在英



国，十七世纪的狂热已把宗教热情的极端情绪燃烧光了，使得英格兰教会愿意与一种“合理的”神的学说妥协。自然论以容忍一切宗教为基础。伏尔泰笔下的札迪克（在同名的哲学故事中）说服了埃及人、印度教徒、儒教信徒、亚里斯多德派希腊人和祭司派凯尔特人，使他们相信，他们各自的教规都与一个共同的创造神有关系，以此结束他与他们的神学辩论。这是启蒙运动另一篇关于宗教的作品——莱辛的剧本《智者内森》的中心主题：既然自然宗教是普世性的，它就把整个人类都约束在对大家都是共同的道德法律中。上天被看作是人类共享的天赐仁慈的代理。人类不再被当作堕落的造物，在罪愆和负咎感的重压下被迫劳动，而被看作是天赋有仁慈的自然道德本能，而上天——看不见的手——则确保社会是由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一致性来维持的。这里再引述蒲柏的诗句，这一次引自他的《论人类》（1733 - 1734）：

这样上帝和大自然连结了总框架  
要求自我爱怜和社会保持一致。

## 四

自然神论从来没有成为流行的宗教。即使在英国它对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具有吸引力，但它无法满足宗教感情，这从约翰·卫斯理

和循道宗\* 有普遍的号召力可以看出。在新教的德国,虔信派\*\*也表示关心“一个心的宗教”。除了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那些少数城市以外,广大居民仍遵循传统的宗教教义和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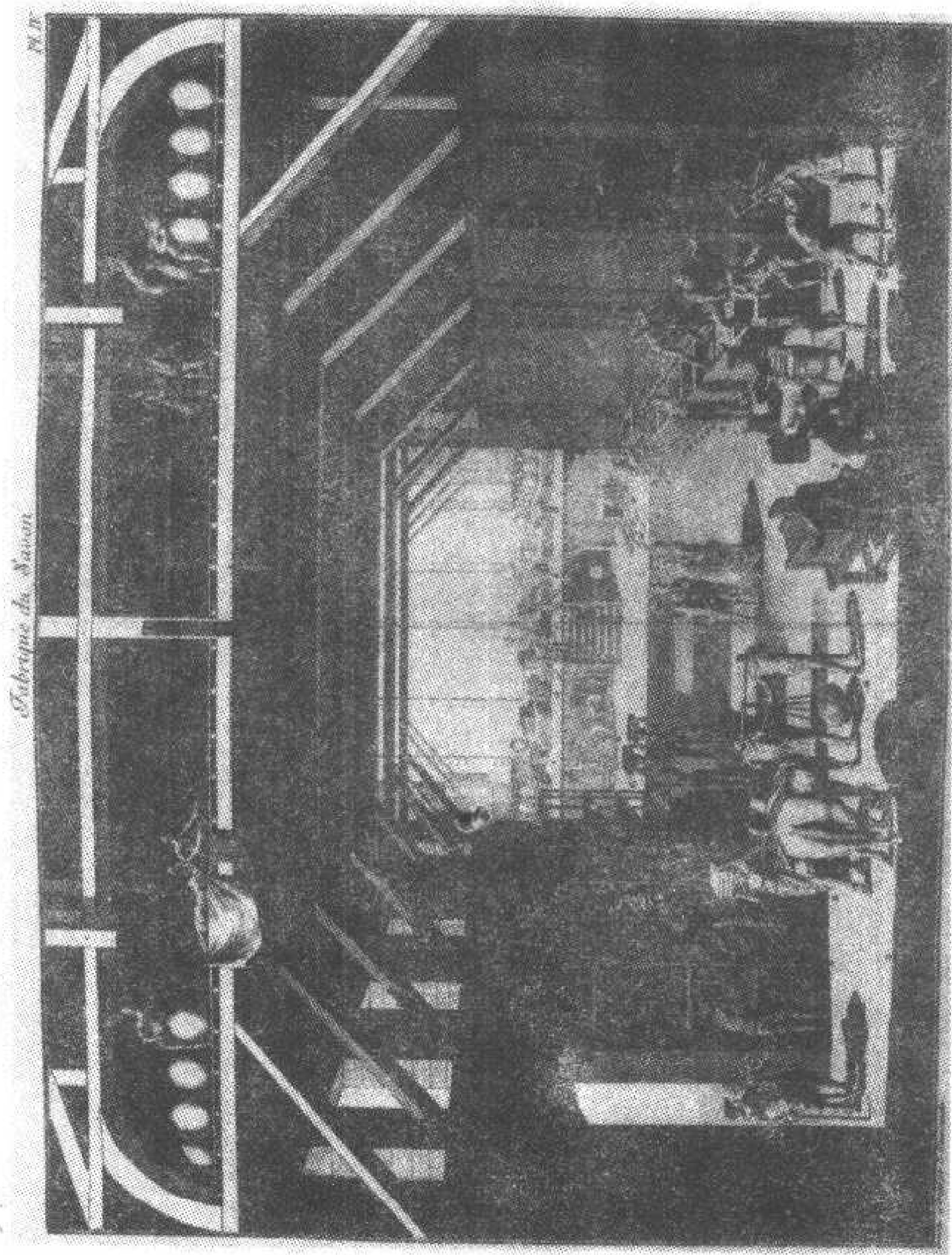
但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力量是那么深入,使得大多数基督教辩护士不得不采取守势,感觉受到这种思想的威胁;而态度放任自由的英国主教们和耶稣会教士则急于表示,在天启的真理和人类理性新信仰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耶稣会教士被驱逐出法国和西班牙,以及他们在1773年遭到教皇的镇压,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各国政府不喜欢教廷权威和教士参与政治。但是对国家采取世俗化的观点和政教分离是启蒙运动的很有力的主张,耶稣会教士成为这些哲学家们反教士运动的主要对象,很难说是偶然巧合。

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试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方法论——我们也十分清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将它推行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因此我们很难认识到在十八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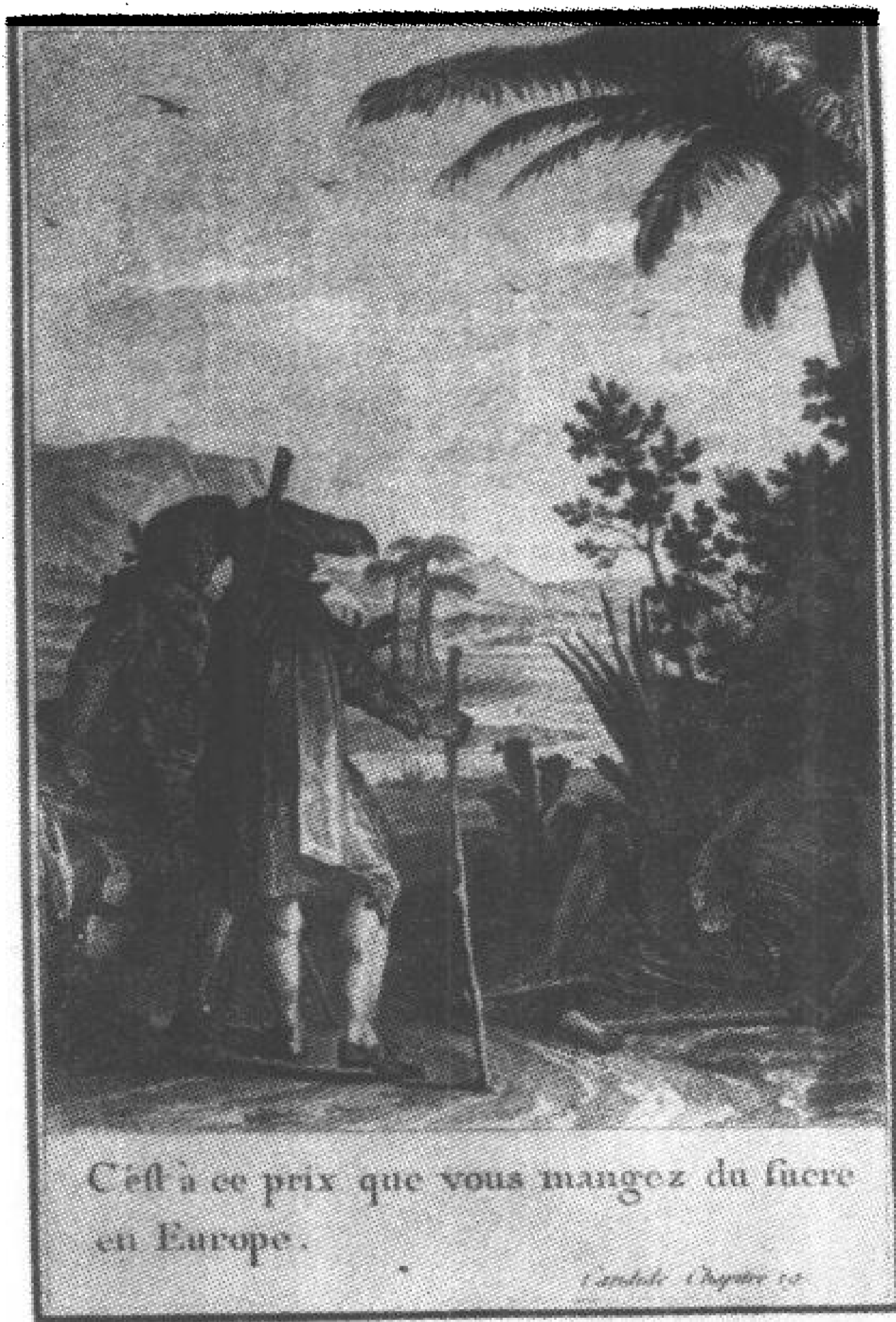
---

\* Methodists, 是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卫斯理(1703 - 1791)所创教派卫斯理宗的戏称,汉译循道宗,因卫斯理在牛津大学求学时自组宗教学习小组标榜遵循教规方法而得名。卫斯理后任圣公会牧师,曾去美传教,旋即回英,脱离圣公会,自立传教团体,在各大工业中心和矿区传教,以劳动人民为对象。循道宗在美发展成南北两个教会,皆名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南方教会在名前冠一 South。初无汉译名,后因在华设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取其缩写名,译为美以美会,南方教会则译为监理会,合并后称卫理公会。

\*\* 十七世纪后德国的一新教派别,强调信仰和得救的个人性质,影响遍及全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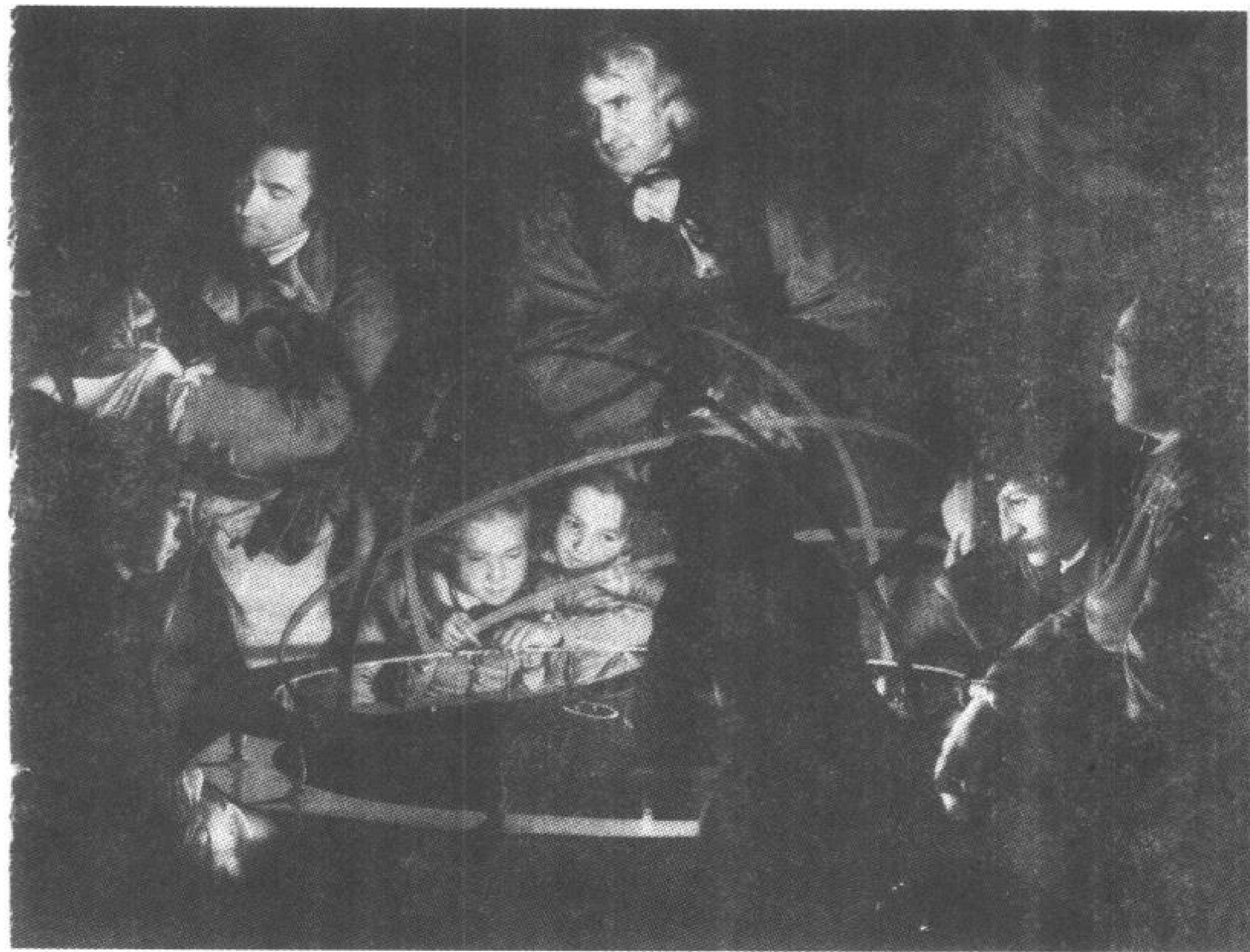
制造肥皂的情况，是这《百科全书》中许多技术创新的插图之一



伏尔泰《天真汉》  
(1787年版)的一  
幅插图：“这是你  
们在欧洲吃蔗糖  
的代价。”

时把这种批判方法初试于古旧的制度和态度时所造成的新奇感和震惊。

例如，在狄德罗看来，在任何问题上对已被接受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不过是打开人们的思想，接受新的可能性和令人鼓舞的猜测的第一步，而不是用新的观念来代替老的观念。这不仅适用于哲学学说和宗教教义，或者性道德方面的繁琐习俗，而且也适用于科学。他在《关于自然的解释的一些想法》(1753)中写



科学启示所引起的惊异：约瑟夫·赖特的绘画“太阳系仪”（1766），画中所示是一个太阳系的机械模型，由中间的光亮的太阳所照亮

道：“如果所有的存在都处于永远不断的变化状态，如果自然仍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的自然科学就会像通用的词语一样时过境迁。我们当作自然的历史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瞬间的非常不完全的历史。”<sup>⑧</sup>

狄德罗对于概念游戏和这种假设的推敲虽然很是着迷，但他对于事实的精确性也同样极为尊重。他在同一篇论文中写道，“事实，不论是哪一种，是哲学家真正的财富。”<sup>⑨</sup>他在著名的《百科全书》里证明他说的是实话。他一生之中有二十年最好年华用在《百科全书》的编辑上。如果说，《百科全书》最吸引注意的（因而也导致巴黎议会在1759年禁止它出版），是它的哲学和宗教条目的话，那么它最创新的特点是狄德罗留给科技的篇幅和他在细节精确性上所耗的心血，这可以从十七卷对开本正文所附的十二卷图版看出。

一个狄德罗或者一个伏尔泰的思想火花的迸发，不应该导致我们低估他们的努力在旧制度下的欧洲所带来的实际好处。扩大言论自由不过是其中之一。其它还可以加上：孟德斯鸠的开列被告的权利，莱辛的鼓吹宽容犹太人，贝卡里亚\* 和边沁的致力于将残酷的刑法改得人道些，卢梭的卫护儿童权利，伏尔泰的努力为错判受害人平反，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的谴责蓄奴，并由苏格兰经济学家穆勒和亚当·斯密证明奴隶劳动在经济上花费和浪费最大来予以支持。这些就是后来成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伟大成就的一系列理性和人道的改革的开始，尽管当时对结果如何抱有悲观的看法。

---

\* Cesare di Beccaria(1738 - 1794), 意大利哲学家、犯罪学家。著有《论罪与罚》(1764), 主张刑事改革, 制订开明的刑法。

这些哲学家们应用批判理性所以如此奏效，是因为他们同时有着一种同样是新发现的自信：如果人类能从恐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包括天启宗教的假偶像），他们就会在自己的身上找到改造人类生活条件的力量。培根说过，“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这是另一个文艺复兴主题的复活。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进步的条件，人的发明和智力是钥匙，科学经验则是最有力量的触媒剂。有人对这些希望是抱保留态度的，特别是在进步的代价上。但是他们相信，进步还是可能的，即使不是肯定的，而进步的可能性不在莫测高深的天意，也不在无法捉摸的命运，而在人自己的手中。古人教导听天由命，基督教则教导等待拯救，而这些哲学家却教导争取解放——人的道德自主，有勇气依靠自己，也就是康德建议作为启蒙运动座右铭的<sup>61</sup>贺拉斯的诗歌叠句：“敢于知道——开始罢！”

这些哲学家们对科学所抱的信心，由十八世纪每一个科学部门所取得的进步和一系列技术发明证实了。最后的顶峰是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成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基础。科学思想和试验，除了比较纯数学部分以外，当时还没有专门化到成为障碍，向普通受过教育的人关上大门。当时还是一个科学业余爱好者和收集者的时代。伏尔泰有他自己的实验室，发现氧气的约瑟夫·普里斯特莱\* 是个唯一神教派的牧师。当时除了雨后春笋般创刊的科学杂志以外，还有不少科学协会<sup>⑩</sup>可以让整个受过教育的——其实是受过人文学教育的——阶级跟上最新的科学发现。两种文化的分家还没有产生。启蒙运动的圣

---

\* Joseph Priestley (1733 - 1804), 英国牧师、化学家。从事气体研究，发现氮气，二氧化硫，氯化氢、氧气(1774)等多种气体。因同情法国革命被迫出亡美国。

经《百科全书》除了在各种思想上用了大量篇幅以外,也用了大量篇幅在科学和工业上,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个证明是布封\* 于 1749 年出版的《自然史》成了本世纪最畅销书之一。

## 五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很有雄心,要想为人类和社会研究做牛顿在十七世纪为自然研究做的事。这样一个设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他们最大胆、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已经成为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且从此以后一直在继续地启发、诱惑、甚至打击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启蒙运动自身的成败参半的纪录,对后来的发展是有预言性质的。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经济学的基础,那是杜尔戈\*\* 和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苏格兰的亚当·斯密的功劳。他们应用批判理性,破坏了传统重商主义的正统地位。这不仅导致当时的经济改革,把这些哲学家的自由信仰应用于贸易和企业,而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继续分析价值、资本和劳动,分析供求法则,这为十九世纪贸易和工业大发展提供了思想框架,为以后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经济学家提供了范本。

---

\* Comte George-Louis Buffon(1707 - 1788), 法国博物家。著有 36 卷《自然史》(1749 - 1788), 死后又出 8 卷。首先提出地质年代理论, 推定地球年龄早于《圣经》所说的六千年。

\*\*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 - 1781), 法国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 科学农耕, 税收改革。曾任财政总监(1774 - 1776), 因招多方不满而下台。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国富论》之前二十八年已经出版(1748),很有理由可以称是现代社会学的发轫,正如亚当·斯密的书是经济学的发轫一样。孟德斯鸠早在他论罗马人兴衰的论文(1734)中就说过:“主宰世界的不是命运,这已经在罗马人<sup>62</sup>的历史中得到了证明……而是有一般的原因,不论是道德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在起作用……总而言之,支配性的倾向夹带着所有具体偶发事件。”<sup>①</sup>在他的杰作《论法的精神》中,他着手搜集证据来证明他的信念的正确性,对“气候、宗教、法律、治理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那些合起来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方面,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孟德斯鸠这样做是寻找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非人格化力量,例如气候和地理的影响,企图以总规律和原因的形式来掌握它们。

这就会导致对社会采取一种决定论的观点,但是孟德斯鸠完全意识到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他不会对人类和社会的性质寻找一个简单的答案,或者把必要性的网抽得太紧,或者把某个特殊因素孤立起来(像后来马克思所做的那样),认为这就是支配整体的东西。此外,一涉及政治制度,他总把自由在道德上的必要性放在社会学决定论和历史相对论之上。孟德斯鸠反对专制统治,不论它怎么适应某一个民族的实际环境和历史传统,认为根据道德理由是不可接受的,即使这样使他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接着就是他对英国宪法的著名分析,他认为它是以分权为基础的,这一分析日后对美国宪法产生了重大后果,二百三十多年以后仍旧有实际意义。

在人性的心理和道德分析方面,这些哲学家们没有取得像在社会分析方面那样多的成功。没有别的问题,比他们在这方面写得更多,并认为更加重要。大卫·休谟写道,“人的科学是其

他科学的唯一基础。”<sup>⑩</sup>康迪耶克\* 写道：“我们绝不能忽略的第一个目标是研究人的心，不是为了发现它的本性，而是了解它的运作。”<sup>⑪</sup>休谟对此表示同意，否认有任何意图要解释“人性的原来品质。”要做的工作是经验性质的，以观察为基础，避免作形而上学的推测，抑制“要追究原因的强烈愿望。”<sup>⑫</sup>目的是够清楚的，结果却不是那样清楚，既没有产生一致意见，也没有产生信念。令人感兴趣的是各家学说纷呈——狄德罗的唯物论、霍尔巴赫的决定论、亚当·斯密的先天道德意识说、休谟的怀疑论、康多塞\*\* 对进步的信心、赫尔维修\*\*\* 的功利原则——以及对此种种学说提出的反对意见，而且常常是同一作者提出进行探讨的。

但是这些哲学家们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天启宗教所提供的权威乃是一种幻觉。一旦在这幻觉被丢弃后，善与恶之间，公正与不公之间的区别，他们所十分重视的道德、社会、  
63 审美价值和判断，还有什么基础呢？难道结论就必须是，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做的不论什么事情都是“自然的”，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主观的判断，这种判断在人与人之间也常常是不一致的，没有客观的标准可言？狄德罗写道，他

---

\* 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 - 1780), 法国哲学家。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来自感觉，一般思想是经验通过语言为媒介而产生的。所著《论感觉》(1754)中阐释的这一感觉论对后来心理学家有很大影响。

\*\* 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 - 1794),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原名 Antoine Nicolas。对或然率数学理论有贡献。积极支持法国革命，后因反对迫害吉伦特党人被迫潜逃，从事著作，后被敌人发觉，神秘死去。

\*\*\* Claude Adrien Helvetius (1715 - 1771), 法国哲学家。属百科全书派，哲学观点见所著《论思想》(1758)，认为人生来具有同等能力，由于教育而造成不同；一切心智活动导源于感觉，自我利益是行为的唯一动机。

渴望能够相信，“自然的意志是善比恶好，普遍的善比个人的善好。”但是他在别处又说：“自然不会做错事。一切形态，美或丑，都有其原因。所有的生物没有一个不是它应该是的那个样子。”<sup>⑥</sup>

有人准备完全接受这个观点：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和写《人即机器》(1748)的医生拉米特里\*。其他的人则像狄德罗一样，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解决这一难题。最后还是大卫·休谟声称他已找到了一个答案。

休谟是哲学史上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受到他朋友的敬爱和尊重。他把仁人之心同本世纪最敏锐和最赋怀疑气质的头脑结合起来，而丝毫没有存在主义者和其他现代哲学家与怀疑联系在一起的 Angst(焦虑)。使得休谟同时代的人吃惊的是，他否定基督教信仰，他在他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似乎已把这种反对扩大到自然神论和天意论。而吸引二十世纪逻辑实证派和经验论者的是，他反对形而上学，他把除了纯逻辑和数学的形式真理外的知识限于可以用观察和实验确立的事实上。A·J·艾耶在结束他关于休谟的论文时，赞许地引用了休谟本人在结束他于 1749 年出版的《关于人类理解力的探讨》时所写的著名的一段话：

当我们在这些原则的诱说下在图书馆浏览的时候，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如果我们随便拿起一本书，比如，不论是关于神的还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教科书，我们不妨问

---

\* 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 - 1751), 法国医生、哲学家。著有《人即机器》(1748)一书，以机械原理解释人的心智和一切行为。

一下：它里面有没有关于数或量的任何抽象推理？答案是，没有。它里面有没有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任何实验性推理？答案又是，没有。那么就把它付诸一炬罢，因为它里面只有诡辩和幻觉，没有别的。<sup>⑩</sup>

休谟本人似乎最重视他写的关于道德的著作。他很强调“道德的规则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不过这表明他分派给理性以有限的角色，而不是对道德的漠视。一般都把十八世纪看成是理性的时代，这是令人误解的。在目前这个具体的情况下，与其把理性的时代归于十八世纪，不如归于十七世纪。当初是笛卡儿早于休谟一个世纪写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一个灵魂会软弱到即使在很好的指导下也不能获得绝对力量来控制自己的感情。”<sup>⑪</sup>不像笛卡儿，休谟使用理性一词只限于得出推论<sup>64</sup>（“思想的关联”）和辨别真假（“事实问题”）；它同道德判断所关心的行动、价值、动机和感情都没有关系。<sup>⑫</sup>因此，就有与笛卡儿相反的名言：“理性不但是而且应该只是感情的奴隶，除了为感情服务和服从感情以外，绝不能自称有任何其他职能。”<sup>⑬</sup>狄德罗和其他哲学家们肯定是会同意的，尽管他们不会像年轻的休谟那样锋芒毕露地提出来。狄德罗宣称，“人们认为，如果他们为理性的对手说了一句好话，就是损害了理性。但是只有感情，而且是炽烈的感情，才能够使人做出伟大的事情来。”<sup>⑭</sup>

但是，道德的制约和是否认可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因为休谟肯定不是说男人和女人可以听任感情的支配。他对之抱怀疑态度的，不是道德和正义，而是关于道德和正义的糊涂理论。

他不是知识中，而是在感情中，找到了他所寻找的基础。

他承认人的本能目标是增进快乐和幸福,避免痛苦和不幸,他认为这不仅限于自己。对别人的同情和对别人幸福的尊重,在人类身上,如同爱自己一样,是自然的本能。这就是作为一切社会生活和个人幸福的基础的人性特点。他写道,虽然“很少看到一个人爱别人胜过爱自己,”同样也“很少看到一个人身上所有爱的感情加起来不超过一切自私的感情。”<sup>①</sup>

我们认可或者谴责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的动机和行为,我们权衡这些动机和行为究竟是愉快还是痛苦的产物,这一切均来自于我们的自然感情,而不是理性,或者天启。

这是否能满足哲学标准,并不使休谟操心,正如他对于我们所说的因果必然联系的著名解释是否满足哲学标准的要求,并不操心一样。他写道,“出于习惯,在某一件事情出现时,我们总是期待着通常伴随它的东西跟着出现”,就是在“我们心里感到的这种关联方面,这种从一件事情到它通常的伴随物的习惯性想像的过度中”,他发现了“我们形成力量观念或者必然联系的感情或印象。”<sup>②</sup>我们所能根据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关于自然规律性的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了。“我们所有关于事实问题的推理都来自习惯,而不是别的。而这个信念,比较确当地来说,是我们本性之中感官部分的行为,不是思考部分的行为。”<sup>③</sup>由此可见,休谟著名的怀疑态度不但是针对宗教的,而且也同样是针对抽象推理哲学体系的自以为是和限制束缚的。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传统。

休谟说的就是,归根结底,任何信念或价值观,不论是哲学<sup>65</sup>的、宗教的、道德的、科学的或者审美的,除了人类经验以外,没有别的来源;不论你怎样玩弄词句都不能给这些信念或价值观以独立于人类经验的权威性。当然,能够给这信念或价值观支

持的是,如果它是为很大数目的人所共同持有的。

为一种价值观系统提供基础,还有第二种办法:那就是把这些价值观放在功利原则的基础上。另一位苏格兰哲学家弗朗西斯·赫契森称这功利原则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这为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哲学家们所普遍接受。休谟本人虽然并没有把“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认可的基本特点,但是他认为功利的论点对政府、法律、政治来说,比起社会契约这个虚构性东西,是个更好的基础。下一代的边沁在他的《道德原则与立法工作入门》(于法国革命爆发的那一年 1789 年出版)中提出,考验一切立法和制度的试金石应该是,它们是否最大限度地增进了最大多数的幸福,后来这就成了他和哲学界激进分子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鼓吹的立法、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力。

要指出边沁对人的心理的观点有什么粗糙的地方,是很容易的,更不用说他的“幸福的运算”了,后者自称为赫契森的“道德算术”提供了一个可以定量的版本。没有人比穆勒在 1861 年出版的《功利主义》中所作的经典性论述更有效力了。但事实是,功利主义论点已成为提出制度和政策改革主张的自然形式,我们因之很容易忽视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特别是边沁第一次提出这些论点时所作的贡献是何等新颖和重要。

## 六

在卢梭身上则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他在今天仍像他生前一样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给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思想史



当代所绘的  
伏尔泰与卢  
梭的争论

带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转折,这对我们探讨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有意义,因为,正如彼得·盖伊所说,“除了偶然有所旁鹜以外”——他刚才还在强调卢梭的多才多艺<sup>④</sup>——“卢梭的工作可以归在公民教育即 *paideia* 名下。”

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把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的令人误解的名称“理性时代”视为等同,乃是错误的。卢梭声称,可以从感<sup>66</sup>情,感觉和心灵学到经验的教训,学到理性靠心智活动所永远不

能确立的真理,也是唯一能够为人类提供正确行动指导的真理。他的这种说法丝毫不会使休谟或者狄德罗感到意外或震惊。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启蒙运动第二阶段,卢梭的著作激励了一种感情的复活和对感性的崇拜,它与批判理性这一信念的关系,是复杂和混乱的,但它却充实而不是否定了启蒙运动的另一条信念——对自由的信念。

卢梭是这一崇拜的使徒,是因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咒骂这一社会的受到冷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是醉心于友谊而又留不住朋友的难弄的人。由于他有表现自己和解释自己的冲动,他以下面这句典型的话来开始他的《忏悔录》:“我感觉到自己的心,我了解人。我同我所见到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敢说,我同存在于世的任何人都不一样。”<sup>67</sup>他后来一生与他的哲学家同行们长期疏远。他与狄德罗、伏尔泰、休谟的关系,与所有他曾交过朋友的人的关系,都是以互相仇视和公开咒骂告终。然而,正如彼得·盖伊所说,卢梭始终是那个他不想要而别人又不想要他的家庭的成员。

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作风,虽然才气横溢,但是极为暧昧不清。休谟指出,他的著作“尽是虚夸浮华之词”,考虑不周的话和没有想透彻的创见,会令人作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他的著作在其发展之中仍有它们内在的连贯性和条理性,这说明了为什么他能继续发挥着持久的影响。

卢梭早在1749年,当他偶然看到第戎学术院提出的有奖征文题目:“科学和艺术的复兴会纯洁抑或腐化社会道德?”时就豁然开朗了,后来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用他典型的夸张口气说:“我一读到这句话,就看到了一个新的宇宙,我成了一个新人。”<sup>68</sup>他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灵魂已经堕落到程度与我们



的艺术和科学趋于完美成正比。”<sup>⑦</sup>正是文明本身带来了腐化和道德败坏：埃及、希腊、罗马、拜占庭都逃不了这同一命运。

这个论点的第二阶段是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出的，卢梭在这本于 1755 年出版的书中宣称，不平等乃是人类受到社会腐蚀的标志。

第一个圈了一块地后想到说“这是我的”，并发现别人头脑简单得竟然相信他的人，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建人。要是有人拔掉桩子，或者填平沟壑，而且向他的同胞大喊：“听这个骗子的话可得小心；要是你们忘了大地上的果实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人，那你就给毁了，”那么人类可以免去多少罪行、战争、谋杀、不幸和恐怖啊！<sup>⑧</sup>

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所描绘的原始的人既不好，也不坏，而是迟钝，只有一个方面优于动物，那就是他有改善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他无法利用的；他可能很快活，单纯无知，但是他无法实现他的潜力，除非他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卢梭很强调“人的本性是不会倒转的”，人不会“把世界投入它原来的野蛮状态……他总是坚持现存的制度，认为破坏它们只会留下弊端且无补救办法，以掠夺来代替腐败。”<sup>⑨</sup>需要做的事，不是放弃文明，回复自然，而是打开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人为的、腐败的社会（这是指卢梭于 1756 年逃离的十八世纪巴黎）的真正性质，并且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对它进行根本的改造。

那么，为此可以做些什么呢？卢梭在 1761 和 1762 年出版<sup>68</sup>的三本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答案。第一本《新爱洛绮丝》是一部



纪念卢梭作为儿童教育改革者的塑像

情感小说，出版后正合当时的流行情绪，单在法国从 1761 年到 1790 年之间就印行了七十版；第二本《爱弥尔》可以说是一切现代教育理论的鼻祖；第三本是《社会契约论》。

人必须按照自然的规律生活，这是很久以来斯多噶派的教导；卢梭的独创性不只是在重复这一教导，而是把它与通过教育来培养人这一思想联系起来。卢梭自己承认受益于洛克，他认为，一个儿童不是一个不完全的成人，而是一个完全的人，有他

或她自己的能力和限制。刺激儿童学习成长的钥匙不是死背硬记,鸚鵡学舌一样地重复他们所不了解的知识,而是刺激他们的好奇心、想像力和发挥他们人体的官能。他宣称,“人的所有官能之中,理性是最后发展的一个。”像教育一贯所做的那样,如以理性开始,无异是“从终点开始”。<sup>③</sup>童年是“理性的睡眠时期”,在那个时期里,感官很敏锐,儿童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不是言语,更多的言语,再更多的言语,而是事物,事物。”<sup>④</sup>如果这个儿童是得到自然的推动来学习的,那么到了他该学会读和写的时候,就会积极学习,没有什么困难。对于渐进教育的有些愚蠢做法,我们自己曾经感到失望,但是这不应该蒙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卢梭解放儿童教育法的革命性的和有益的效果。

对于道德的根源是什么这个问题,卢梭答道:不是理性,不是自<sup>69</sup>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或者功利原则,而是“内心的呼声”,每一个人内心里天生有的正义和道德感,这对农民和对知识分子至少是一样清楚明白的。这一内心的呼声,良心的呼声,在道德上是独立的,它不依赖天启宗教、教育或者任何外部权威——这种观点仍旧表明卢梭是与启蒙运动相一致的。他关心的不是情感(也就是感官)作为目的本身的解放,要是这样就不免是自我放纵了。而且卢梭不论有什么个人缺点(对此他足够坦率的),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关心道德行为的道德家,他认为只有情感为道德行为提供唯一可靠的指导。他写道,他的所有著作都是阐释“他的伟大原则的形成,那原则就是大自然使人得到快乐和幸福,但是社会腐蚀他,使他痛苦可怜。”<sup>⑤</sup>没有东西比人性本善是大自然的意志这一异端邪说更彻底地使他与那些相信原罪的人分道扬镳了。

卢梭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更进一步,要想寻找一个办法来取代腐蚀人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人能够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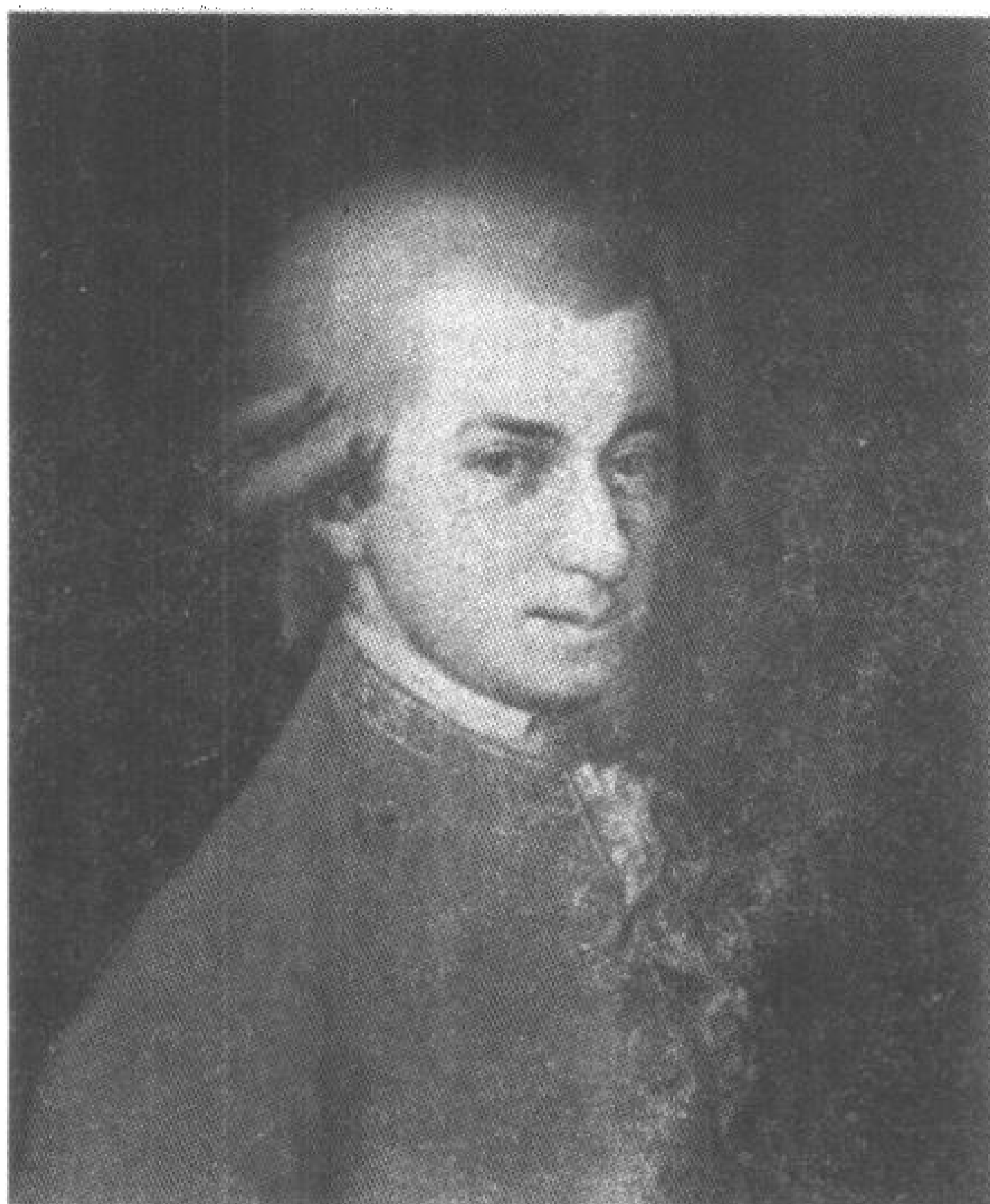
面继续享受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他就会丧失人性,同时又遵守法律,因为没有法律社会就无法运作。

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卢梭定下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主权必须来自人民,全体人民,而且主权必须是不能从他们身上剥夺的。他们不能放弃主权,而要继续亲自运用主权。第二个是,他们在充当立法议员时必须尽力表达普遍意愿,当人们抱着道德责任感行事和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私人利益时,这种普遍意愿就会出现。

至于怎样发现和认出普遍意愿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还有,普遍意愿一旦赋以法律形式,人人都必须服从它,没有持异议的余地,对于拒绝服从的人可以“强迫使之自由”云云,对这种主张也有很多疑问。卢梭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了这种主张后来在法国革命中为之打开大门的那种专制暴政?他的社会契约是以一个像法国一样大的国家为对象的,还是仅仅以小如他的故乡日内瓦、斯巴达、或早期共和的罗马那样的国家为对象?不过,不论存在着什么混乱和矛盾,事实仍旧是,卢梭是第一个阐释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的人。其他哲学家瞩目于开明的君主政体,不信任民主政体。卢梭则认为这不是未来的前途,而且这也与卢梭的人性观相一致。他的人性观认为道德行为的根源不是受过教育的人的智力,而是农民和工匠像达官要人一样都具有的没有受过教化的良心。

## 七

在艺术方面,启蒙运动正好与巴洛克时代的最后阶段发生



莫扎特(1756 - 1791)。莫扎特和古典时期(1770 - 1830)的其他大师如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在 20 世纪已被许多人认为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

在同一时期。这个气势一度宏伟的风格到了十八世纪上半叶已沦为洛可可式的纤细华丽,不过音乐除外。但是瓦多和弗拉戈纳\* 的世界,对哲学家们没有魅力;他们瞧不起洛可可风格,认

---

\* Antoine Watteau(1684 - 1721)和 Jean - Honoré Fragonard(1732 - 1806)两人都是法国洛可可派画家。

为这不过是一种弄臣的艺术,矫揉造作、不负责任、不讲道德。

很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通过批判地讨论艺术的不同特点和传统的欣赏标准,表达了对艺术的兴趣。“美学”一词最初是亚力山大·戈特利勃·鲍姆加登用作他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而十八世纪的辩论成了现代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史的开场白。在这场辩论中,像狄德罗、伏尔泰、莱辛、孟德斯鸠、休谟这样熟悉和崇拜古典作品的人第一次对从古典传统承袭下来的假定和假设提出质疑。

艺术必须服务于教育目的而进行道德训诲吗?还是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在适宜于绘画的对象方面是否有一种高下的等级,把历史的或神话的题材放在肖像之上,把代表性人物放在个性化的人物之上?在吸引霍加斯\* 和夏尔丹\*\* 之前曾经吸引过荷兰画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不是要被排斥在外,因为它们称不上是艺术?除了模仿自然,“从生活中汲取”以外,在艺术里是不是没有别的真实基础呢?还是成功的艺术家,不论是像拉斐尔那样的画家,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家,或者加里克\*\*\* 那样的演员,根据经验创造出“更加真实的”、更加自然的东西来,因为他们更加集中注意于自然本身?

绘画和诗歌是不是姊妹艺术(这陈词滥调是贺拉斯的,“*ut pictura poesis*”),还是像莱辛在他的论文《拉奥孔》(1766)和狄德

---

\* William Hogarth(1697 - 1764),英国画家、雕刻家。以绘有道德训诲的作品著称,目的为促进社会改革。作风特点是细节详尽,人物性格突出。

\*\* Jean Baptiste Simeon Chardin(1699 - 1779),法国画家。擅绘静物和室内景物,善用色彩。

\*\*\* David Garrick(1717 - 1779),英国演员。以吐词平易、作风自然取胜,一扫当时舞台上盛行的大声吼叫式的舞台腔,令人面目一新。所演角色有莎翁名剧中的理查三世、哈姆莱特等多种。



夏尔丹(1699-1779)作“女仆”

罗在他的《沙龙》(1767)中所说的,它们两者有根本的不同,看不到这一点会对这两者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美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品质,不仅像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派所相信的那样,而且像亚尔培蒂、达芬奇、杜莱尔都相信的那样,建筑在音乐和数学的比  
72 例理论上,认为美是艺术家们所发现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创造的东西?还是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认为的那样,美是只存在于观赏者心中和眼中的东西,即使(如休谟所补充的)在实践中,欣赏的历史形成了——根据经验,不是先验的——这样一种一致的看法:“二千年以前在雅典和罗马受人欢迎的荷马今天在巴黎和伦敦仍受人钦佩。所有气候、政府、宗教和语言的变化都不能遮掩他的光辉。”<sup>③</sup>

除了启蒙运动所开创的批判性评论以外,它的精神还表现在一个同时代的风格中。如果说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开初几年里的新古典主义无法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的艺术成就相媲美的话,它还是忠实地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也就是寻求一个由理性和公平来统治的更好的世界和卢梭所表示的回到更加简朴和纯真去的愿望。欧洲再一次向古代世界寻找模范和灵感,这一次对希腊原型和它们的罗马继承者有了好得多的了解和知识。

没有人比温克尔曼更加有效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个可怜不幸的家伙,最后竟因一个他所收养的年轻人贪图几块金币而被杀害了。他为古代希腊人的热烈感情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他有天赋把这感情变成一部杰作,那就是1764年出版的《古代  
73 艺术史》。温克尔曼的影响持久的成就是:他开创了艺术史这门学科,因为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追溯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并且把它们与社会和文化联系起来——它们原来就是





温克尔曼著《古代艺术史》(1764)扉页

其中的有机部分。这种考虑艺术和历史的方式，是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遗产的另一个方面。它是未来的预示，以致歌德称温克尔曼是个新哥伦布。但是使得他的同时代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声称希腊人已使美永恒不朽，他们留下的遗产，后代只有模仿的份。

温克尔曼的书的出版时机再也合适不过了。它正好符合，

并且加强了当时已经开始的对古代世界的兴趣的复活。这一兴趣的复活对十八世纪的欣赏口味和艺术有着不平常的影响,它受到重大考古发现的刺激,其中有庞贝、赫克拉纽姆、派伊斯图姆的发掘\* 和罗马的泰图斯澡堂与蒂沃里的哈德里安别墅的发掘\*\*;它所受到的刺激还有“雅典人”斯图尔特\*\*\* 著、配有莱维特豪华插图的《雅典古迹》的出版和皮拉纳齐\*\*\*\* 的罗马遗址的雕刻。它反映在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威阿特\*\*\*\*\* 的室内装饰上和弗莱克斯曼为伊特鲁里亚工场生产的威治伍德\*\*\*\*\* 陶器的设计上。它还扩大到对荷马的文学崇拜以及像埃斯库罗斯(作品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才第一次译出)、品达和虚构的奥西安\*\*\*\*\* 这样的古诗人的文学崇拜;还扩大到对共和时代

---

\* Pompeii, Herculaneum 和 Paestum 都是意大利南部古城,公元 79 年毁于维苏威火山的喷发。

\*\* 泰图斯澡堂为罗马皇帝 Titus(约公元 40 - 81)任内所建,同时建成的有罗马竞技场。哈德里安别墅为罗马另一皇帝 Hadrian(公元 76 - 138)所建,同时建成的有万神殿和在英国的哈德里安城墙等。两人在国外却都大力镇压犹太人起义,毁耶路撒冷城和神庙。

\*\*\* James Stuart(1713 - 1788),英国建筑师。醉心雅典建筑古迹,故有“雅典人”的外号。1751 年与 Nicholas Revett 同访雅典,著有《雅典古迹》(1762 年出第 1 卷),对古典复活影响至巨。

\*\*\*\* Giambattista Piranesi(1720 - 1778),意大利雕刻家。为罗马许多建筑物刻有铜牌。

\*\*\*\*\* Robert Adam(1728 - 1792)和 James Wyatt(1746 - 1813),英国建筑师。受古典建筑影响,风格优雅,亦适用于室内装饰和家俱。

\*\*\*\*\* John Flaxman(1755 - 1826),英国雕塑家。以纪念性雕塑著称,作品有纳尔逊像等,并为荷马、但丁作品作插图。

Josiah Wedgwood(1730 - 1795),英国陶艺师。在伊特鲁里亚设有工场,首先大批量烧制陶器,所制绿陶反映了当时对古典复活的兴趣。

\*\*\*\*\* Ossian, 传说中公元三世纪凯尔特战士和诗人,作品在十八世纪欧洲重新引起兴趣,后来考证为苏格兰诗人 Jame Macpherson(1736 - 1796)所伪造。



《派伊斯图姆的废墟》(1759)中所刊的意大利南部派伊斯图姆希腊神庙之一的雕版插图,这些神庙于18世纪被发现

罗马的政治崇拜,这通过大卫\*的艺术为法国革命提供了古典<sup>74</sup>的背景。

---

\* d'Angers David(1788-1856),法国雕塑家。其代表作品是巴黎万神殿山墙上的一组塑像。



首批新古典派建筑之一巴黎圣热纳维埃芙教堂,1759年由苏弗洛开始修建,法国革命时期改为先贤祠,以供奉法国历代伟人

建筑是受到古典复活的影响最持久的艺术形式。劳吉埃\*方丈 1753 年在他颇有影响的论文《论建筑》中总结了对洛可可风格的答复:那就是简单和自然。以苏弗洛\*\*在巴黎的先贤祠

---

\* Abbé Laugier, 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

\*\* Jacques - Germain Soufflot(1713 - 1780), 法国建筑师。1757 年开始建圣热纳维埃芙教堂, 法国革命后改称先贤祠, 建筑雄伟, 有罗马圣彼得教堂特点。

(建于 1755 至 1792 年)开始,新古典主义在公共建筑物方面产生了一种国际风格,远远不仅是模仿而已,而且从巴黎和伦敦传播到了东达圣彼得堡西至华盛顿和弗吉尼亚这么远的地方。彼夫斯纳\* 称它是从形式上表现了“十九世纪初期受过教育的阶级的自由人文主义,即歌德精神,这个精神创造了我们的第一批博物馆和画廊,我们的第一批国家剧院,并且促进了教育的改革和扩大。”<sup>④</sup>

## 八

但是,不能把新古典主义看成是巴罗克或者甚至洛可可风格的继承者。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从早期文艺复兴到晚期巴罗克的各种风格的交替继承已告一结束。这种交替继承在时间上有许多重叠,在地理上也有许多变化,这原来就是欧洲艺术的中心传统。没有任何继承者可以与它的普遍性和权威性相匹敌。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在他对皇家学会的讲座中最后一次加以赞扬,<sup>⑤</sup>不过,他不安地意识到,他是在为一个像宗教或哲学一样不再为人们不加思索地接受的传统进行辩护。

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一场新的反叛已在聚集力量,特别是在德国。它的目标针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狂飚运动的年

---

\* Sir Nikolaus Pevsner(1902 - ?),英国建筑史学家。曾对英国建筑进行过大量调查,颇有权威性。

\*\* Sir Joshua Reynolds(1723 - 1792),英国画家。皇家艺术学会创建人和第一任会长。



富色利的绘画：  
《为古迹残片所  
感动的艺术家》  
(1778—1779)

轻人谴责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他们把这看成是法国的文化霸权，这就在这些浪漫主义先驱者的怒火上增添了不满，他们本来就不愿让自己的国家被迫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这种新情绪不仅限于德国，年轻的歌德集中表现了这一情绪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以维特自杀作为结尾，风靡了整个欧洲受过教育的阶级。

不过，浪漫主义虽然和以前艺术和文学方面所表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它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风格。相反，它的多

样化正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和作家最最珍视的品质,认为这是他们的各别性的表现,是无法一言以蔽之的。波特莱尔在把它与以前的各种风格作比较时写道:“浪漫主义所处的地位恰恰正是<sup>75</sup>既不在于题材的选择,也不在于确切的真理,而是一种感觉的方式。”这话可谓是说到家了。

不论分类贴标签的探索方法是多么不可缺少,但是在像十八世纪后期那样的时期里,它可能比在一般的情况下更加起陷阱的作用,因为在那时,传统的区别模糊了。思想和艺术一样都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状态。正是狄德罗对这种状态的敏感,他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一贯性而接受新的而且往往是矛盾的思路的能力,成了他最伟大的天禀。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我的意思。第一个是新古典主义。乍看之下,没有别的东西可能比它更加尖锐地与浪漫主义对立了。但是古典复活中有一些最具特点的成份正好很容易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那就是质朴单纯的吸引力,在绘画中诉诸感情的反应,温克尔曼写希腊时的狂喜的语言,皮拉纳齐对罗马遗址的夸张以及对崇高事物的钦佩等。诗人们继承了对希腊的崇拜,他们把它看作是同济慈、雪莱和荷尔德林一样无可否认地是浪漫主义的。十九世纪希腊的复活(甚至在建筑方面),也像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复活和热衷于中世纪一样,是浪漫主义的一部分。两者可以容纳在一个词的含义里,这个词代表作家或艺术家可以用来表达他个人“感觉方式”的多种甚至是混合的风格。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卢梭。因为,还有什么比他所推崇的“心<sup>76</sup>的语言”,单纯自发胜于复杂做作,爱自然和信任自然,对城市生活的反感等,更有浪漫主义“感觉的方式”的特点呢?正是由于卢梭对这一切的推崇,使他成了浪漫主义早期历史的中心人物,

就像他曾是启蒙运动早期历史的中心人物一样。

现在比以前更有必要在探索人文主义传统时要绕到标签背后去认清各个思想家和艺术家,有时,比如在卢梭这个例子上,要把作家思想中对这传统有贡献的成分同那些看来在这传统中没有地位的成分区别开来。

浪漫主义中有一些成分,如感觉的夸张,情绪的泛滥,理性的排斥等,在我看来似乎与人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也有新的见解扩大了人文主义的意义。我在这里的例子是新教牧师和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他生于东普鲁士,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狂飚运动的最重要人物。

像卢梭一样,赫尔德不仅思想独创而且也多产广博,对后来的欧洲思潮有同样的影响;他也同样难以相处,脾气怪戾,性格多疑,心怀不满,一般的情况下总是使人难以忍受。但是又像卢梭一样,他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都有亲密关系。他彻头彻尾地反对启蒙运动一些最具有特点的信念,但是又接受别的一些信念,而且即使在他与启蒙运动分道扬镳的地方,他也要人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像卢梭一样,他的思想启发了前浪漫派和浪漫派,但是也受到了误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歪曲。像在卢梭身上一样,很难把“人文主义者”一词用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他的思想中至少有两个思想对人文主义传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思想在赫尔德给自己的论文加上一个讽刺性的标题《又一个历史哲学》(1774)时就已经露头了。因为它另有来源,

---

\* John Gottfried Herder(1744 - 1803), 德国哲学家、诗人、批评家。德国狂飚运动领袖,浪漫主义先驱,反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冷冰冰的理性主义。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著有《人的哲学史》(1784 - 1791)等。



那就是吉奥凡尼·巴蒂斯塔·维柯\* 的《新科学》(1725)。维柯于1668年生于那不勒斯,在赫尔德生的那一年1744年死在那里。但是,维柯像克尔凯郭尔\*\* 一样,要等到二十世纪才被人认识到是天才,而根据以赛亚·柏林\*\*\* 的说法,似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赫尔德在自己的历史理论形成之后二十年内读过维柯的书。<sup>⑥</sup>

启蒙运动的一个普遍看法认为,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能够发现普遍的、不朽的规律,而现实就是这种规律所建立的。赫尔德反对这一普遍的看法,他认为,恰巧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如果用笼统的话来描述或分析它们,就会模糊研究的对象所以具有自己特殊个性的那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赫尔德并不反对自然科学;像歌德一样,自然科学的成果<sup>77</sup>使他着迷,并且使他受到很大影响。但是他相信,有人从这些成果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特别是,有些方法用于物体性质的研究是合适的,但不能用于人类生活和意识这种非常不同的现象。

像维柯一样,赫尔德认为,研究人类现象的正确途径是通过历史科学,包括对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的研究以及对制度的研究,历史科学的正确对象是群体和它们的文

---

\* 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 - 1744),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创人类文明循环理论,把社会分为三个时期:神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每一时期都包含自身消亡的种子。

\*\* Soren Kierkegaard(1813 - 1855),丹麦哲学家。牧师出身,认为人应该在自己身上寻找真理。其思想对后来存在主义很有影响,著有《非此即彼》(1843)、《人生道路上的阶段》(1845)等。

\*\*\* Sir Isaiah Berlin(1909 - ?),英国哲学家、思想史家。维护哲学自由主义,曾任牛津大学教授,后任英国学术院主席。著有《自由四论》(1969)、《维柯和赫尔德》(1976)、《反潮流:思想史文集》(1979)等。

化(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每一个民族、时期、文化、社会按其特点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普遍理想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正如没有普遍的不变的人性一样。有的只是一种多元性,每个人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表现人类精神,这种方式相互之间的比较价值是无法断定的。如用分析、归类、概括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就会被科学方法的成功所蒙蔽,而看不到人类活动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活动,是第二个知识领域。这种知识不像自然现象,男男女女都可以从自己内部来掌握,因为他们参与和创造了这种知识。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想像性的同情,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要“解释”的或更好“了解”(德文是 *verstehen*) 其活动的人类群体或社会之中。赫尔德本人已经表现出在极其不平常的程度上拥有这一才能。

这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由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卡西尔\*、克罗齐和科林伍德\*\* 进一步发展,它使历史(按维柯和赫尔德的广义理解)成为人文的研究,而科学成为自然的研究。

赫尔德把这种按各民族情况来看人类的看法不仅应用到过去,而且也应用于现在。按照这个看法,各个民族并不天生就优于或劣于其他民族,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特性。赫尔德像维柯一样,认为每一民族的民族特性的主要载体是语言。

---

\* Willielm Dilthey(1833 - 1911), 德国哲学家。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了严格的划分,认为知识受时间和背景的限制。其历史相对主义影响后来的科林伍德和奥特加·加塞特。著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哲学和人的分析》(1921)等。

Ernst Cassirer(1874 - 1945), 德国哲学家。希特勒上台后流亡至美。发展了康德思想,把静态理性批判扩大为动态理性批判,包括人类一切创造性活动,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到民俗、星相术。著有《人论》(1944)和《国家的神话》(1946)。

\*\* George Collingwood(1889 - 1943), 英国哲学家。认为哲学与历史互相依存。著有《历史的思想》(1946)。

“一个民族难道还有比自己祖先的语言更宝贵的东西吗？它的整个传统、历史、宗教、生存原则，它的整个心和灵魂全都装在它的语言里。”<sup>⑦</sup>后来虽然有一种心胸偏狭的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玷污了这种民族思想，但在赫尔德原初的看法中是没有它的痕迹的。他认为，自然创造了民族，不是国家，正如以赛亚·柏林爵士所说：“没有别的东西比帝国主义遭到赫尔德的更加有力的声讨了——帝国主义就是由一个人类群体摧毁另一个群体，本地的文化在某个征服者的皮靴的践踏下被消灭。”<sup>⑧</sup>民族主义以马志尼\* 的宽厚形态进入了人文主义传统。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党”是要与所有民族的“青年”和谐地同情地相处的。到了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则表现为自由党对民族原则的热情支持而进入了人文主义传统。“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正常斗争”（格拉斯东\*\* 语）的事业当初只是希腊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的事业，后来还要扩及到印度人和其他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各国人民。

## 九

启蒙运动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像赫尔德一样，也来自信奉新教的北部，同一个波罗的海畔的东普鲁士省，

---

\* Giuseppe Mazzini(1805 - 1872), 意大利爱国志士、革命家。毕生从事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斗争，流亡期间组织青年意大利党，参加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继续斗争。

\*\* William E. Gladstone(1809 - 1898), 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四度任英国首相，力主爱尔兰自治，反对帝国主义政策。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哥尼斯堡。康德在气质上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不同于卢梭,可是他却认为,不是洛克或休谟,而是卢梭才值得称为道德世界的牛顿那样的哲学家。在他书房中挂的唯一绘画是卢梭的肖像。就是在这书房里,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康德完成了他的三大批判——纯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它们处理的依次为形而上学、伦理和美学问题。启蒙运动思想至此趋于完善和有序,同时实现了康德自称在思想界开创的哥白尼革命,沟通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好几世纪来互相敌对的欧洲主要哲学传统。

我不想沉溺在康德哲学的具体讨论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在他所有的三大批判中,康德的焦点,像卢梭一样,集中于人,不是超验的或自然的世界,而是人的经验,人的思考和人的想像的创造性力量。唯理论者依靠逻辑来理解原因和结果这种词的含义,休谟和经验论者则坚持,在经验里你所看到的根本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一件事情接着另一件事情,康德在这两种看法之间提出了第三种看法。他认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本身可能是什么,我们是永远无法知道的。康德事实上是接着蒙田要想答复“我知道什么”这一问题,而且像蒙田一样答复,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人的经验中接触到的东西,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超过这以外可能存在的任何现实。但是康德进一步认为,人的思考能力怎样对待经验不是随便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和范畴——原因和结果,时间和空间——这构成了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康德说,“通过感官,我们接触到了客体,而且唯有感官提供了我们知觉;通过了解,我们思考了客体,由此而产生了概念。”<sup>⑨</sup>这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桥梁。

同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人是一个道德上自

治的存在,他的义务是他自己承担的。这些义务来自他或她对<sup>79</sup>自己处于义务之下的直觉意识,来自一种责任感,而不是来自一个宗教信条的外部权威,或者一种物质或社会环境的外部压力。虽然康德并没有卢梭的人性本善的信念,但这是卢梭对道德来源所采取的同人文主义的观点。康德也同样明白地认为,一个科学家,例如一个生理学家,很自然地把人看成是像其他现象一样的一个现象,要受制于动物或无生物所受制的同样法则和规律,但是这个态度在伦理上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在考虑人的道德行为时,我们遇到的是人的直觉信念,人认为他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他是自由的。

在另外一句名言中,康德表示只有在“我也能够把我的准则[即我的行为准则或规律]变成普遍适用的法律[即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情况下,行为才是道德的。<sup>⑩</sup>他用这个标准作为改述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的基础,从而找出一个办法来克服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康德在他三大批判的最后一个批判《判断力批判》(1790)中,完成了他在二十年以前开始的除了分析形而上学和伦理的原则以外也分析审美趣味原则的工作。尽管——也许应该说,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自己艺术趣味的范围是狭隘的,他把秩序带进了一场混乱的辩论中。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他对艺术性质的掌握——艺术是游戏,“一种无目的的的目的性”,通过匠人手艺所表达的独创性,理性指导下的激情——甚至更大程度上靠他坚持艺术和审美判断的自主性,坚信艺术独立于道德、心理学、政治或者宗教。

甚至连休谟都不敢痛快地接受他自己的怀疑论所带来的后果的地方,康德都毫不犹豫地写道:“欣赏趣味的判断不能不是

主观的。”<sup>⑩</sup>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或者导向无政府状态。因为当人们说某件东西是美丽的，他们的意思与他们说“某件东西给他们带来愉快”是不同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客观性，而在于超乎个人兴趣或爱好的普遍性。说“这是美丽的”并不是说存在着普遍的一致；但是它暗示了这种意思，它声称，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只要让理性的人充分了解，他们全都会同意的。康德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调和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个是经验证明，关于艺术的见解分歧是普遍的，艺术家和风格的流行时尚是在变化的；另一个同样肯定的事实是，人们在谈论美的时候，他们的意思不仅是“这使我很愉快，但很可能是你所讨厌的”，而且还有更多的意思。

## 十

康德在写他的三大批判的时候，美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法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哲学家们在应用批判理性和提倡自由时，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怀着要产生实际结果的目的的。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引起了他们殷切的期望。甚至在独立战争得到胜利之前，杜尔戈就写道，美国人民是“人类的希望；他们很可能成为人类的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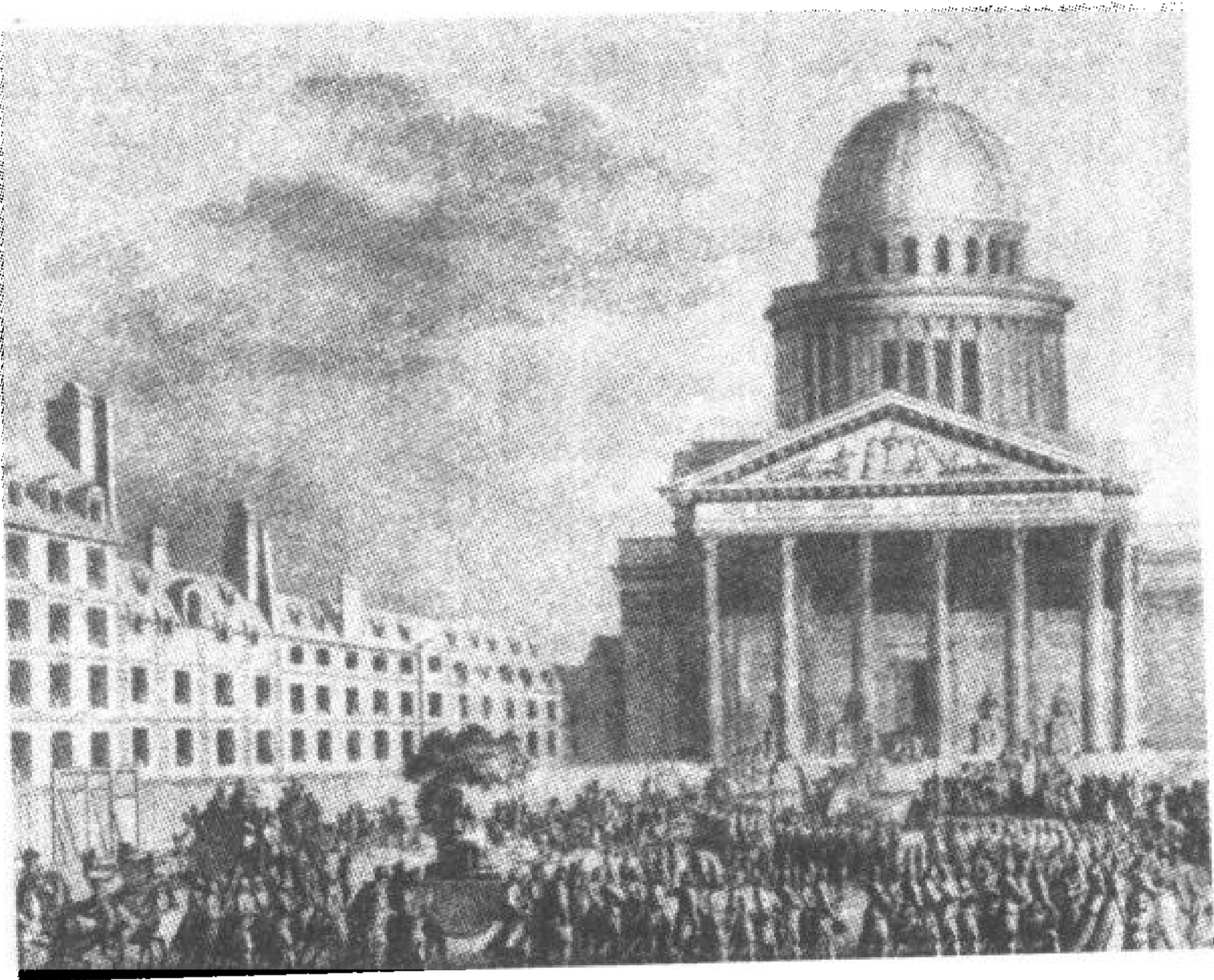
他们的热情是有充分根据的。

首先，创建合众国的那一代美国人——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登\*——都是启蒙运动的后继人。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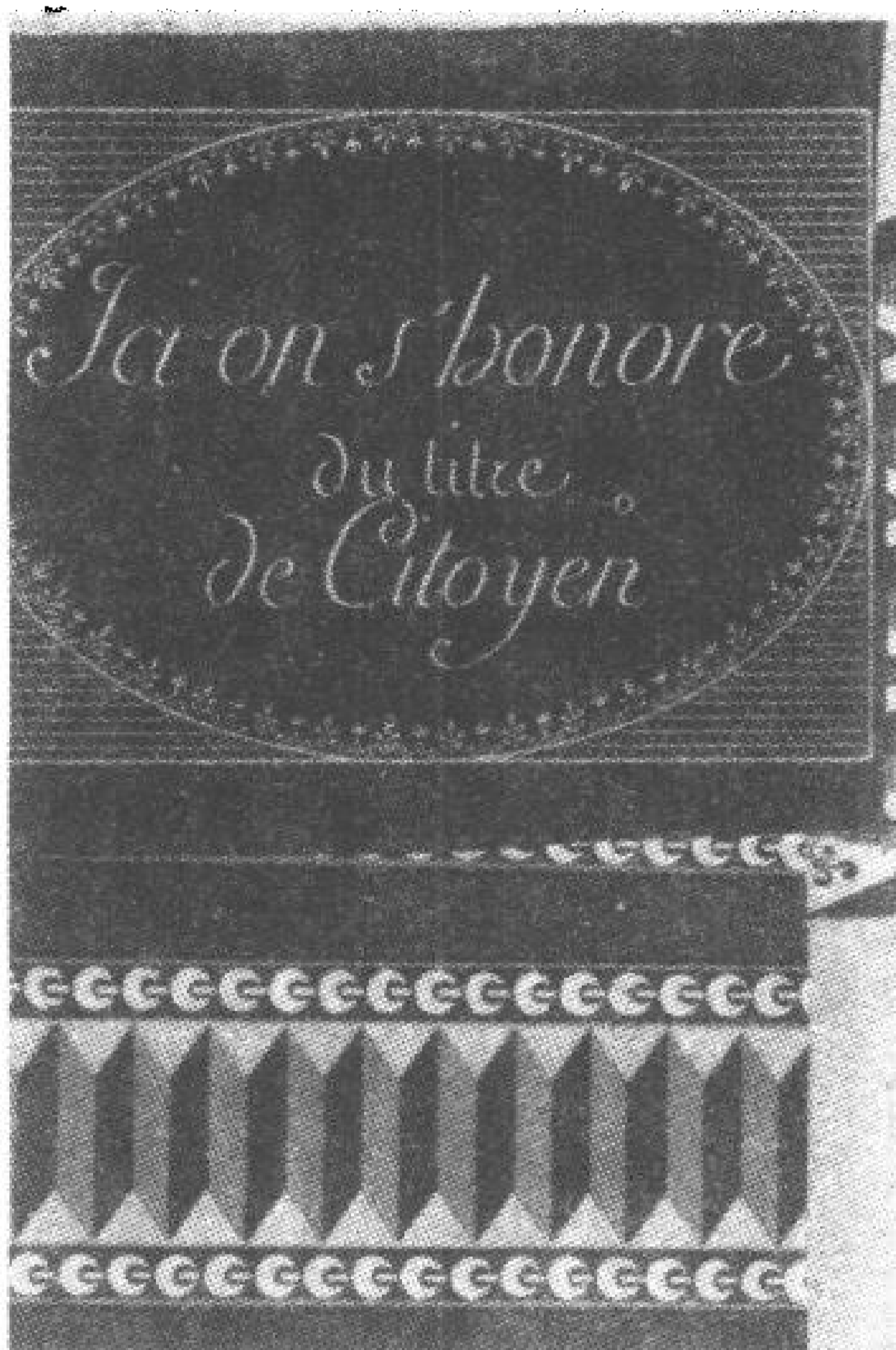
第二,他们矢志从事的那个自由和自治的“伟大试验”是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这个国家没有世袭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没有封建的过去,没有势力根深蒂固的国教,没有严格不变的等级制度,因此它一旦独立,在改革或进步方面就不受任何障碍的牵制,而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这种从历史继承下来的障碍。<sup>81</sup>当美国人在起草他们要用来进行自治的宪法时,他们一身空前的轻松,既没有历史的负担,也不受地理的限制,因为他们有一块大陆可以供他们进行扩张。

第三,他们闯进这些没有测绘过的水域时所具有的信心,是



法国革命时期卢梭的神化:1794年10月11日其遗骸由一模拟人像捧托迁葬于先贤祠





革命时期的巴黎，一幅 1790 年的招贴：“此处尊重公民称呼”

他们启蒙运动传统的一部分，并得到了他们成功的证实。康涅狄格一家杂志在 1786 年写道，“这个国家被保留下来作为改善人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场地，”也就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的计划可以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加接近于在实践中实现的新世界。许多美国人相信，这确是天意，否则他们的成功就不会是可能的。不少欧洲人也这么相信。<sup>⑫</sup>

法国革命的情况则与美国革命完全不同。它不是在一个新国家中作出新的开端，而是在一个立国最久的民族国家里力量对比的转移，这个国家有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仍旧有

左右欧洲大局的能力,正如后来历次拿破仑战争所证明的那样。

这些哲学家们和他们的思想在促成法国革命上起的作用,两百年来一直是大家辩论的题目。不过,到了现在,这场辩论的结果已经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了。启蒙运动主要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是一个思想运动。它寻求的是改革,不是革命,它的对象是受过教育的阶级,不是群众。除了卢梭以外,它对群众是表现出一种既蔑视又不信任的态度的。

正如启蒙运动主要不是政治性质的一样,法国革命也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是许多因素结合的结果,有经济上的、财政上的、政治上的因素;还有国家破产、贵族造反、农民不满及对土地的要求等。

但是,这些哲学家们所宣传的批判思想,即使不是革命的成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这种批判思想破坏了意识形态上的防御和旧制度的信心。对所有的权威,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抱怀疑的态度,已成为一时风尚,甚至在教士中间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贵族和中产阶级了。第二个原因是,当危机发展到以贵族与教会为一方和第三等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对峙时,后者的领袖——革命已把政权移交到他们手里——正是那些受启蒙运动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温和的保王派领袖莫尼埃时隔很久以后写道:“不是这些原则的影响造成了革命,相反,是革命造成了这些原则的影响。”随着对峙的加剧,激进派领袖利用了启蒙运动的词句和思想,把它们变成了口号:“公民”、“社会契约”、“普遍意愿”、“人权”,和最有力的,“自由、平等、博爱”。

战争的爆发和奥普军队 1792 年在英国支持下的侵入法国,引起了第二场流血更多的革命。国王被推翻后,接着是煽动群

众的支持和阶级仇恨,接着又是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造成了革命法庭判罪和处决了大约两万名男女,在狱中杀死的又有两万人。

在 1793 - 1794 年的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战争和阶级战争成为双方的意识形态战,公共安全委员会主要委员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 以卢梭主义原则的名义宣布法国的道德复兴和对一个最高存在的礼拜,以代替基督教。那些不接受新秩序的人,或者甚至被怀疑对此缺乏热情的人,很容易被任意投入监狱和处死,这个惩罚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建议的,也是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为此而送命的。

## 十一

革命的反对者急于扑灭他们心目中的对法国社会秩序的威胁,在意识形态上也采取了同样极端的态度。有一个名叫马莱·杜·潘的法国难民,虽然家产已荡然无存,但是他仍旧拒绝让自<sup>83</sup>己的判断力被恐惧的传染所左右。他在 1796 年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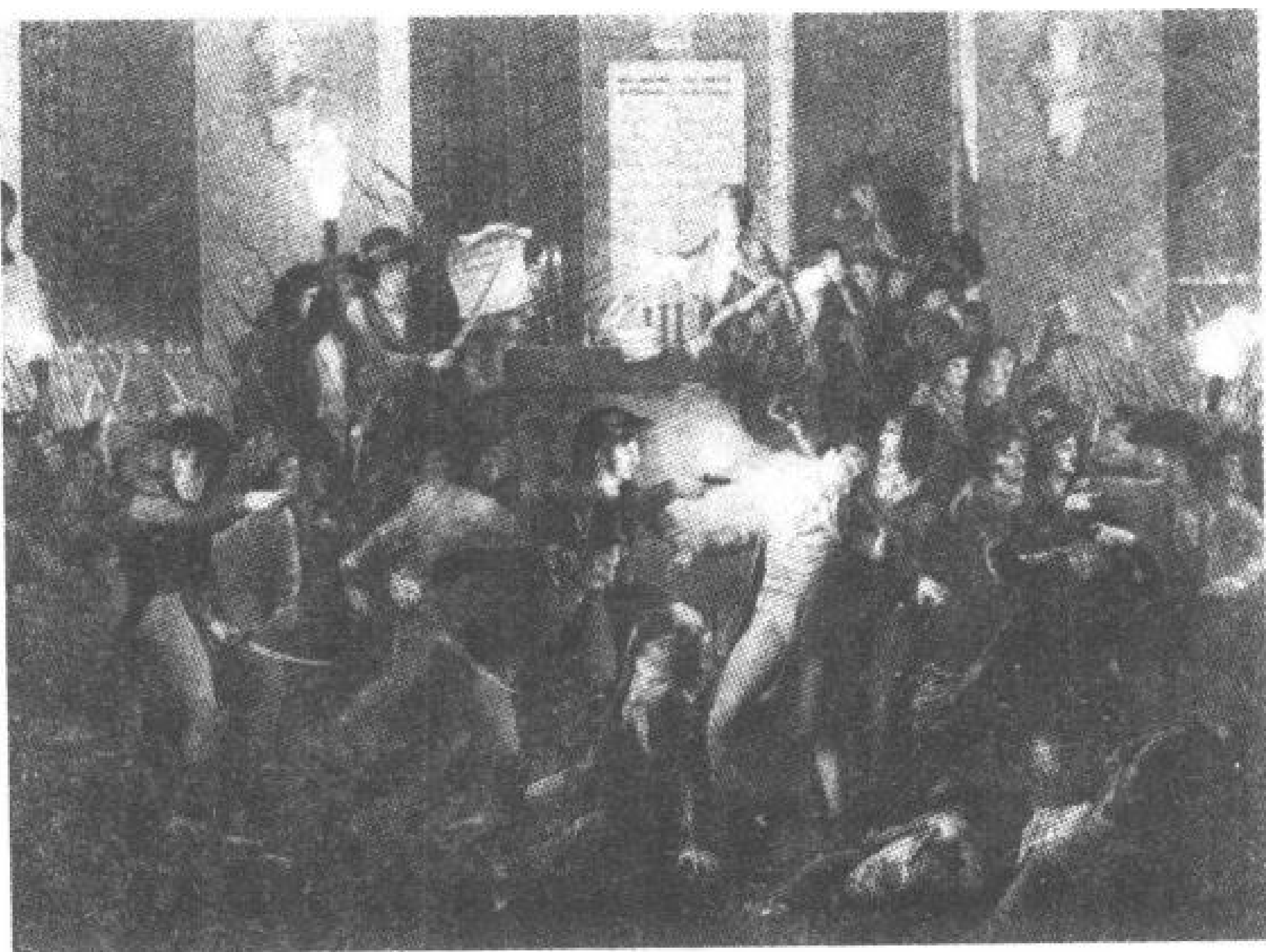
在欧洲形成了一个蠢货和狂热分子的联盟,他们只要可能,就禁止别人有思想和观察的官能。他们看到一本书就毛骨悚然,因为启蒙运动遭到了滥用,他们就要消灭一切

---

\* Louis de Saint - Just(1767 - 1794), 法国革命家。有“革命的大天使”之称,为罗伯斯庇尔在公共安全委员会中的左右手,热月政变中被捕,次日处死。

他们认为是受到启蒙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有头脑的人,就不会有革命,因此他们就想用低能和愚钝来扭转革命。

因此,启蒙运动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以一场似乎要把它所信奉的一切都一扫而光的反动而告终,不过这一次是一场反革命,而上次则是一场反宗教改革。即使我们接受哲学家们对启蒙运动所持的赞许观点,把它看成是一部伟大戏剧的一部分,文艺复兴只是其中的第一幕,这部戏剧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束缚它们的恐惧、迷信和虚假信仰中解放出来,那就很清



“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1794年7月27-28日热月政变,雅各宾党的对手推翻了雅各宾党领袖,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后者于28日被送上断头台



“理性酣睡产生妖魔”(约 1798 年):戈雅关于法国革命后对启蒙运动产生的反动的评语

楚,他们以为自己的一幕就是最后一幕的想法是完全错了。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

另一方面,在反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以后,这场战斗又重新开始时,情况就很清楚,启蒙运动已永远地改变了辩论的条件,伏尔泰、亚当·斯密和休谟、卢梭、康德和赫尔德所生活的世界已一去不复回来,他们的思想已把这个世界改造得面目不可辨认了。



## 十九世纪：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 一

在花了几十年功夫击败了第一次法国革命之后，欧洲所有大国在 1815 年以后的最高目标是防止第二场革命。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 1815 年与 1848 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早在 1848 年，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就告诉法国代表院（众议院）说：“我们是睡在一个火山口上……你们没有看到地球又在震颤了吗？革命的风吹了起来，风暴已出现在天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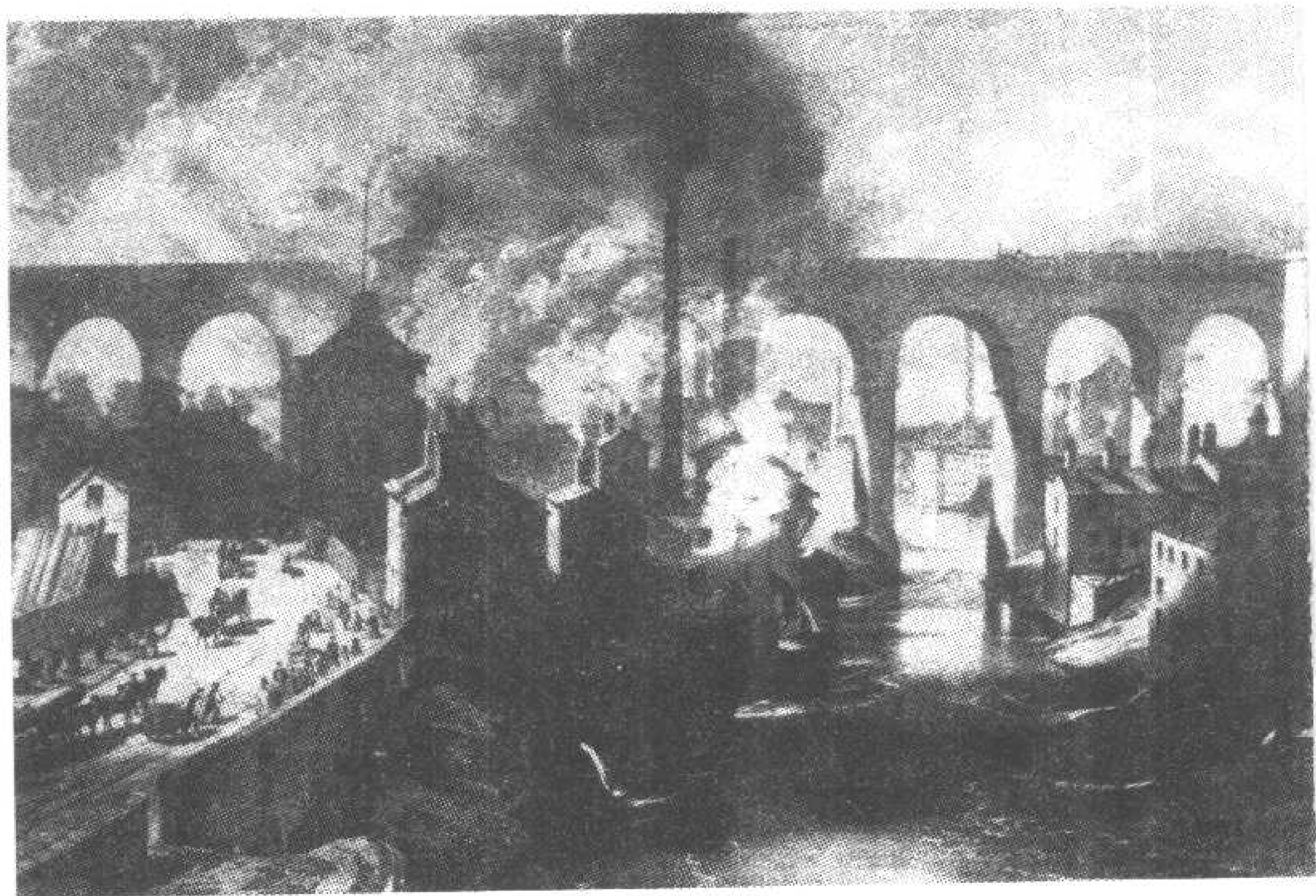
上（自左至右）：席勒、贝多芬、托克维尔

中（自左至右）：华兹华斯、孔德、乔治·爱略特

下（自左至右）：马修·阿诺德、穆勒、威廉·莫利斯

---

\*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 - 1859), 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官出身，曾去美国考察监狱制度，回国后出版《论美国的民主》(1835 - 1840)，立即受到好评，声誉雀起，后成为论美国民主制度的经典著作。另著有《旧制度与革命》(1856)。



英格兰北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塔特于 1848 年绘的斯托克波特铁路高架桥



几个星期以后,1848年2月,革命在巴黎爆发,同时席卷了欧洲。只有英国和俄国没有波及。甚至在起义遭到了镇压以后,在1849年,很少有观察家会预言,1848年的革命会是欧洲的最后一场大革命,至少一直到目前为止。

如果他们把注意力从巴黎和维也纳的街垒转到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这样的工厂城市,或者转到它们在大陆的姊妹工厂城市列日和利尔的后街,他们就会发现另外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在1848年政治革命失败后的二十五年内永远地改变了西欧的经济和社会,而且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也改变了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包括美国的和日本的。

我在这里只需提一下工业革命以后,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规模和范围的社会改造的主要特点就够了:人口的增长、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旧世界人口移往新世界、城市的增长、工业和商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先是在西欧后来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全世界其他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先是由贸易后来由通讯手段造成的地球的统一和缩小。

不论在以前或者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里,都没有发生过经济增长会像1848年到1873年之间的二十五年内那样对当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这样深的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第二是,即使用后来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率也是十分可观的:例如,世界贸易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从总的来说,增长是没有间断的,这就造成了人们普遍相信它会继续下去并且打开无限<sup>86</sup>的日趋完善的前景的信心,即使对那些在前一回合失利的人来说,也抱这样的信心。

工业化的经验对人文主义传统有深刻的影响,它第一次让



精英分子所设计的蓝图面对一个群众化社会的前景,不论是出于吸引还是反感,都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在这里,托克维尔又一次不曾放过这一过程的双重意义。他早在1835年写到曼彻斯特时就只用了一两句话说明了这双重意义:

从这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暴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sup>①</sup>

造成英国产生第一个工业社会的那些变化,人们往往将与一定的思想联系起来。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它们都是来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前所没有的只是这些思想在实践中和与之结合时所产生的力量。这些思想的核心是对自由的信念,还有对人类精力从迷信的桎梏、传统的重压以及政府干预所加的限制下解放出来后会产生的好处,所抱的信念。 88

法国国民议会追随美国人的榜样,于1789年宣布了“人和公民的天然的和不可让与的权利”。他们宣布,“人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和权利平等的”,他们把这些权利明确为公民自由、私有财产、个人的不可侵犯和对压迫的抵抗。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立法;未有法院拘票不得逮捕任何人;宗教和言论自由必须确保。这些革命性的提法不仅被宣布是法国人的天生权利而且也是所有人的天生权利;它们由革命的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全境普遍加以实行。经过二十年的战争,旧制度打败了这些军队;但是它却不能把这些革命原则的影响扫除干净。凡是必要的地方,可以另外用“功

利”原则来推翻不能回答下面这些咄咄逼人的问题的传统制度：这是合乎理性的吗？这是有用的吗？这是有助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吗？

## 二

在到 1914 年为止的一百年过程中，代议制政治制度和公民权利——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妇女还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已在整个西方世界确立。至于选举权，虽然对民主的危险以及民主对财产可能形成的威胁疑虑重重，但还是比较勉强地给了，至少给了所有的成年人。这些政治和立法改革只是在经过了许许多多次斗争后才实现的，其中包括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为了实现杰克逊式的民主\* 而进行的斗争和英国 1832 年的改革法到世界大战前夕争取妇女权的运动。在工商界也得对地产利益进行同样的斗争，确立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原则。英国人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起运用这些原则的日趋成功，比任何其他努力更加有助于证明理性加上自由的总哲学的正确，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的政治经济学为这种哲学提供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榜样。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把一切都押在这样的一个信念上：如果

---

\* 杰克逊式的民主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所倡导的维护普通人，特别是向西扩张的拓荒农民利益的民主原则。

\*\* 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影响很大。



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 1851 年大展览会

每个个人的能量得到解放,它们的成就是无可限量的。1848 到 1873 年这四分之一世纪在经济上异乎寻常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他们是对的,一方面显示,个人自我利益的追求,由于提高了——不论是多么不平等——所有人的生活水准而促进了共同的  
89 利益,另一方面为已被称为十九世纪真正宗教的进步信念,提供了一个不仅用逻辑,而且由经验所加强了牢固基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方面似乎都有迹象表明,在理性计算照耀下的世界里,个人才能的无限制发挥能够在知识和技巧方面,在财富、福利和文明方面,产生空前的增长,而在一定时间以后,这种增长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能把人类提高到以前未达到过的高水平。进步被认为自然的事,而且过去的障碍一旦消除,还是不可避免的事。

十九世纪中叶的乐观情绪所引起的希望,在我们自己时代的破灭,很容易使我们低估了其在创造财富方面与发展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成就的规模,我们西方文明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仍旧依赖这种制度,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技术革新、发达国家的革命和不发达国家的造反等等所造成的破坏。这种希  
90 望的破灭也很容易使我们低估了这种思想在共产党世界和不发达世界中对解放人的能量所仍旧具有的革命性影响。

觉得自己是在重新铸造世界的十九世纪企业家们,还从科学的进步中增强了自己的信心,这种科学进步提供了榜样,供经济学的铁的规律效法。科学已经代替了哲学和受到挑战的宗教,不仅提供精神上的保障,而且也提供了对大自然的掌握,而这正是技术进步的关键。自然和宇宙继续被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如今,用机械学的话来说,已从牛顿仍在寻找的“原动力”这一神学依据下解放出来,而用热力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来解释了。

自然科学方法的优越性,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出示范的,它把人类知识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所有的现象都被看作是超自然存在的行为的结果;在第二个形而上学阶段,超自然存在为抽象力量所取代;到了第三阶段即科学阶段,宗教和哲学成了多余,实证的科学产生了统一的普遍规律,任何偏离都是不可能的。孔德是人道教这一实证主义派别的创始人,以人类的物质造福者代替圣徒。但是他的最大雄心是要把在自然科学上如此奏效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道德现象的研究上去,这也是穆勒的抱负。而与此相对的则是赫伯特·斯宾塞\* 和卡尔·马克思,他们都自称做到的正是这一点,即得出了可以与牛顿的运动定律相比的一套决定论定律,不容有偶然性、神的干预或个人选择的余地。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 1859 年的出版,似乎无可挽回地废除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的分界线。没有疑问——而且如果有疑问的话,也被他的《人类由来》在 1871 年的出版打消了——达尔文的关于进化和进化所依据的自然选择过程的观点,结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带到了与动物和其他有机生命相同的生物学范畴。在达尔文的支持者的手中,原来作为假设的想法,如今成了教条。这是为了大众对象而把复杂问题加以简单化的一个后果。达尔文的学说被通俗化为“适者生存”,又被庸俗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T. H. 赫胥黎等人都引用达尔文的权威来支持一种侵略性的世俗意识形态,为一种竞争性的人类历史观来辩护,即成者成,败者败(道德

---

\*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把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应用到哲学上,认为进化论中的统一性知识原则可以用于一切现象。著有《第一原理》(1862)、《生物学原理》(1864-1867)、《心理学原理》(1855)、《社会学原理》(1878-1896)及《伦理学原理》(1891)等。

上的失败),白人的种族优越性等等。

我花时间谈十九世纪思想的实证论,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人文主义传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今天所谓世俗的或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版本的起源。但是,甚至在那时候,实证主义和世俗主义自称代表人文主义的说法,也受到了其他竞争派别的挑战,后者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十九世纪和工业社会的扩展。

现在让我先来谈谈那些接受同一的理性和自由的革命原则,但却要把这些原则推进一步,达到他们眼中的逻辑结果,从而完成1789年未遂革命的人。这引起了主张普选权的民主激进派与害怕暴民统治和要把选举权限于有产阶级的自由立宪派之间的争吵。这场斗争最后是激进派赢了。

第一个预见到平等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并且继续提出民主将会有何后果的问题的人,是年轻的诺曼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他出发到美国去,要想在那第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寻求答案。他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他的结论,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托克维尔在美国人生活中看到的生气勃勃和独立精神,给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也指明了他认为威胁到任何民主社会的危险,那就是,为了保证平等,人们会要求增强国家的中央集权,从而即使出于无心,也会造成新的形式的暴政。“他们为了要平等而谋求自由;但是平等越是藉



自由之助而确立,自由本身就越难获得,这适成反比。”②

托克维尔又写道,“这件事本身是新的,我既然不能给它一个名字,我就需要设法说明它。”危险是,人们会习惯于越来越指望国家

为他们提供安全,预见到他们的需要而供应他们必需品,便利他们的娱乐,指导他们的工业,规定他们财产的继承和遗产的分配——就只差没有为他们代劳省得他们思想和生活了。③

德·托克维尔并没有谴责民主本身。相反,正如他在写给他的朋友友琴·斯托费尔斯的信中所说的,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力图表明

如果说民主政体不像另外一种政体那样偏爱人性的某些较好方面的话[他是在说美国没有贵族政体],它也有伟大和高贵的成分;也许,归根结蒂,这是上帝的意志,宁可让全体人类得到程度稍差的幸福,而不让少数人达到十全十美的边缘。④

对另一个朋友,把他的书译成英文的亨利·里夫斯,他写道:

我只有一个意见,一种热情,那就是拥护自由,拥护人类的尊严。我认为所有的政府形式都是……为满足这一神圣和正当的愿望的手段。……我是在一场长期的革命[指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结束时来到这世上的,这场革命

破坏了旧制度,却没有建立能够持久的制度。我开始人生时,贵族政体已经死亡,民主政体还没有诞生。因此,我的兴趣不可能盲目地引导我到这个或那个政体。……我处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对两者都没有自然的本能的倾向性,我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够安静地考虑一下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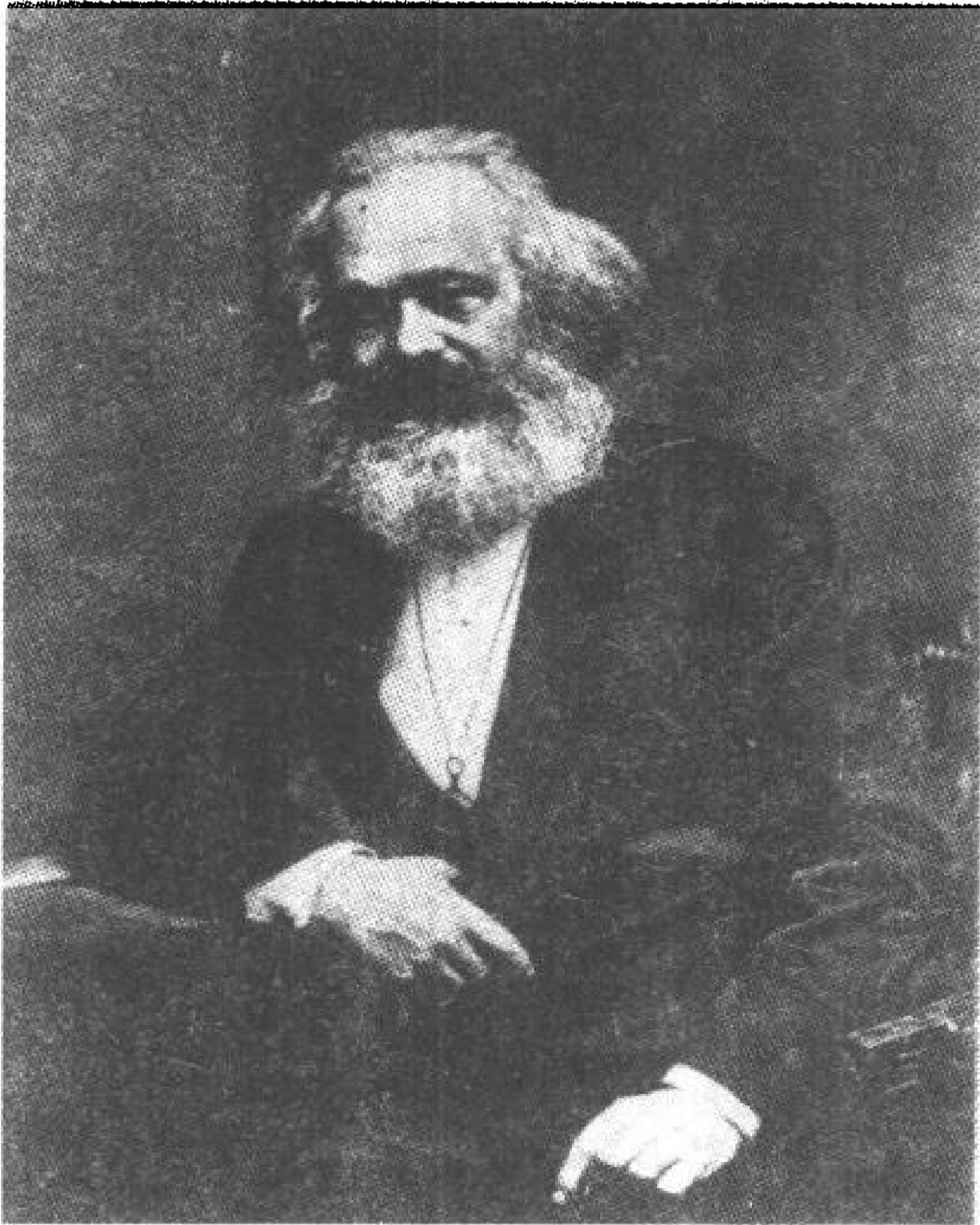
德·托克维尔的结论是,重要的是,民主的社会是否会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创造对付暴政威胁的抗衡力量,这步骤就是分散集中的权力,建立民选官员组成的有力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建立独立的法院,议会的不可侵犯性,尤其是自由的新闻事业,这是“自由的最最主要的民主工具”。

德·托克维尔自己的政治经验证实了他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他忠于自己的信念,在议会里担任反对党的议员,并且担任芒什省议会议员。当他曾经预言会发生的1848年法国革命推翻了七月君主政体时,他接受了短命的第二共和国(1848-52)的外交部长职务,结果是看着政府被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所推翻,后者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建立了第一个“全民表决的独裁<sup>93</sup>政体。”第二共和国把法国选民从二十万扩大到九百万,但是新选民心甘情愿地把权力交给那个对人人都许诺一切的人,而他唯一的本钱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名字。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1852-1870)就这样代表条件平等和暴政权力的结合,德·托克维尔对这暴政权力极不信任,他拒绝了为这政府服务的一切邀请,转而致力于写作另外一部政治分析的经典著作,证明法国的中央集权化政府机构不是革命所创造的,而是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建立的,法国革命不但没有推翻它,反而继续了它,认可了它。政权可能变易,但中央集权化的权力结构依然故我。<sup>⑥</sup>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呼吁法国人民(见此选举招贴画)在全民投票中支持他。有七百四十万人投票支持他,反对者仅64万。此次全民投票是创立第一个“公民投票通过的独裁政权”的决定性步骤,至路易·拿破仑于1852年登位称帝——拿破仑三世皇帝,这一独裁政权遂告完成

像穆勒一样,德·托克维尔代表的是十九世纪版本的公民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认为,为了民主本身的利益,相信自由价值的人必须积极投身于争取足够的保障来支持民主,来制约平等的大众社会中将会出现的权力的过分集中。他写道,“分权,



卡尔·马克思

像自由一样，是领袖向人民许了愿但从不给他们的东西。要得到它，保有它，人民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他们不想这么做，那么后患是无法补救的。”<sup>⑦</sup>

激进派致力于扩大选举权，而社会主义者则还要进一步，他们声称政治改革只触及贫穷和剥削这两个社会弊端的表面。只要仍旧存在财产和机会的不平等，1789年开始的革命就不能算是已经完成，而在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得到直接正视之前，上述这两个不平等是永远不能消除或减轻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以人道的名义，指出工业化在人类不幸方面所

付出的惨重代价。但是他们的论点在这样一个信念面前不起什么作用,这个信念就是,存在着经济学的“铁的规律”,不可能把工资提高到超过维持生活的水平,因为任何增长都会因为它带来的人口增长而抵销掉——这就是一般认为马尔萨斯\* 在他的《论人口原则》(1798)中所阐明的。

到了卡尔·马克思才把社会主义的论据放在一个相当不同而又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他不求助于那些以他所不屑一顾的人道、公正或道德为基础的论点,而以历史为根据。他认为历史的途径是由它自己的“铁的规律”所决定的,人能够了解这一规律,而且能够与它合作(这就是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但是它的运作,却不是人能够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人的思想或者信念,而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94

在这句话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那一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宣称,社会的经济结构是

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⑧

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优点是可以让他一方面表明,在社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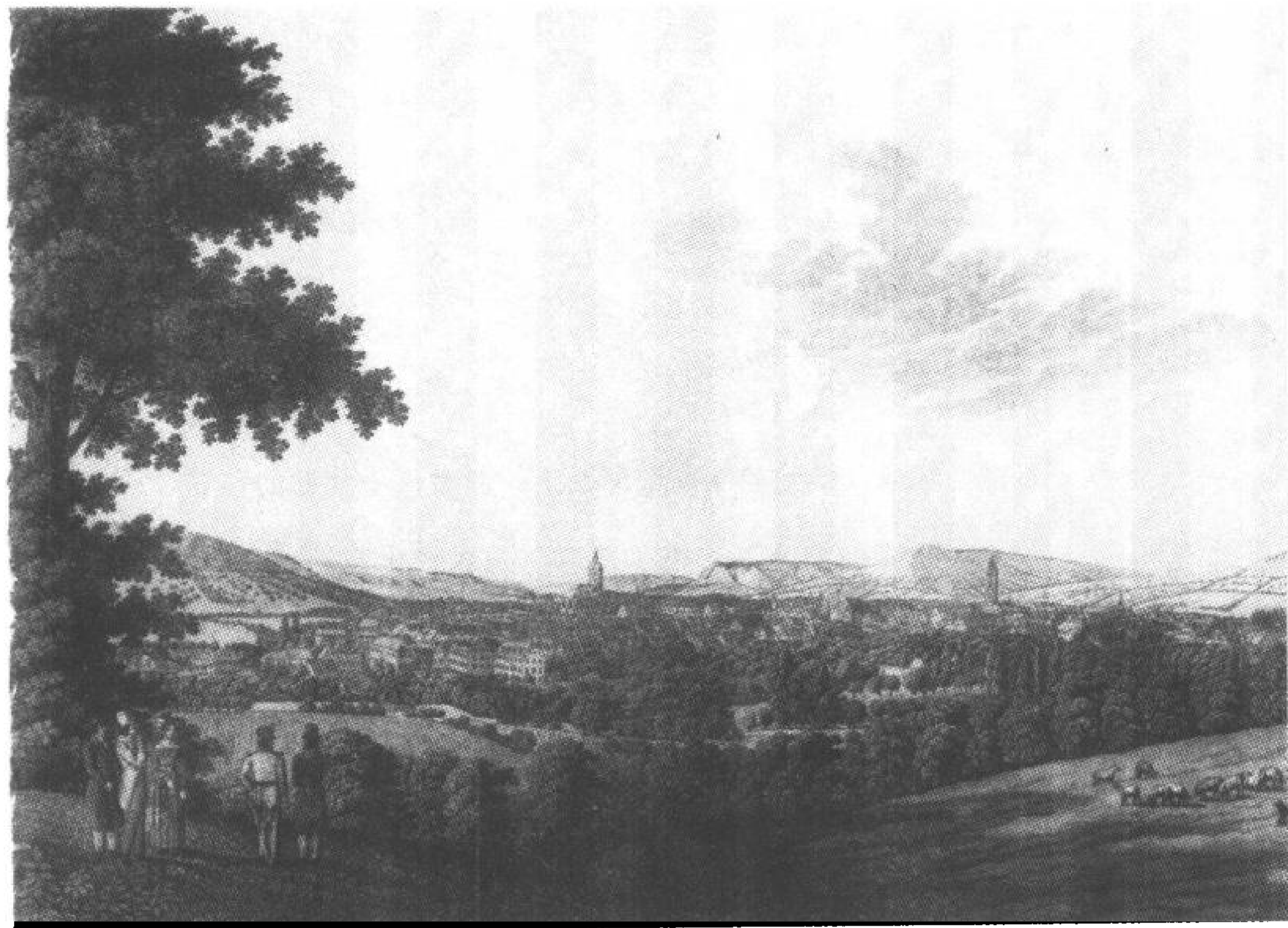
---

\* Thomas Malthus(1766-1834),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现代人口理论的先驱,认为人口是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手段只数学级数增长,因此穷困不可避免。

展的一定阶段,工业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角色要扮演,那就是作为一种生产形式,有力量打破传统经济的狭隘限制,把社会提高到以前所不敢梦想的生产力水平,同时又表明,由于内在矛盾日益增长的结果,反过来,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阶级冲突、革命、推翻现存社会秩序和诞生新的秩序,在这新秩序中,人们不再会由于不平等和阶级压迫所造成的挫折失望而异化,而是有充分发展人性的自由。

我本人看不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有什么位置,而且马克思本人会愤怒<sup>95</sup>地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他把人文主义看成是人们用来掩饰他们阶级利益的幻想和欺骗的又一例子。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封闭的教条的体系,它像卡尔文主义一样敌视和不合人文主义传统。

但是马克思不是这样可以轻易打发掉的,原因有二。第一,正如以赛亚·柏林爵士提醒我们的,即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否定,但马克思“在创造一个对待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全新态度,从而打开了人类知识的新途径方面的重要性却是丝毫不会受损的。”<sup>⑨</sup>这场思想革命一定会对关于人与社会的讨论产生永久的影响,进行这种讨论的人,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少于马克思主义者。不错,充分的影响只有在马克思于1883年死后才感觉到,他的同时代人如果看到这样一句话一定会感到奇怪。但是——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如果当初有人告诉他们,在马克思死后一百年,马克思主义会成为人文主义传统和其他每一个传统的最最强大有力的对手,就像当初新教主义在十六世纪宗教冲突中分裂基督教世界一样,先分裂欧洲后又分裂世界,他们就会感到更加奇怪和不相信了。



1800年魏玛附近大学镇耶拿远景。席勒于1788年担任耶拿历史教授，该镇以席勒与歌德的友谊驰名，亦在德国哲学和批评史上创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当时除了席勒以外，在该大学执教的还有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黑格尔等人

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我们在下文中讨论人文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遭遇时要回答的问题之一。但是在这以前，需要看一看十九世纪另外一个重要的欧洲思潮，它可以自称代表人文主义价值观，不过并不是像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那样，以扩大十八世纪理性—实证主义遗产来做到这一点，而是以反对它来做到这一点。

## 四

我在谈到十八世纪后期在德国发生的前浪漫主义插曲和赫尔德时已经提到了这个思潮，当然，“德国”是个令人误解的称呼。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德国存在；说德语的人民分居在数目多得令人眼花的王国、大公国、公国、选帝侯国和自由市中，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有接近于共同民族感情的东西，在今天仍像当时一样，是个激烈争辩的事情。没有争辩的是，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和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贝多芬死于1827年，歌德死于1832年）是一个思想和文学创作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相当于以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而在当初，德国人只受到后者的边缘影响。

1815年时，大多数德国人仍生活在前工业时代，五人之中有四人住在农村。最大的城市维也纳的人口不到二十五万；柏林在1815年的人口不到二十万，有十万人口的唯一其他城市是汉堡。许多最著名的城市如魏玛、耶拿、哈尔、戈丁顿等并不比意大利的帕都亚、曼图阿、斐拉拉、乌比诺大，但是这些意大利城



市虽然只有不到一万或两万人口，却在文艺复兴时期起了显著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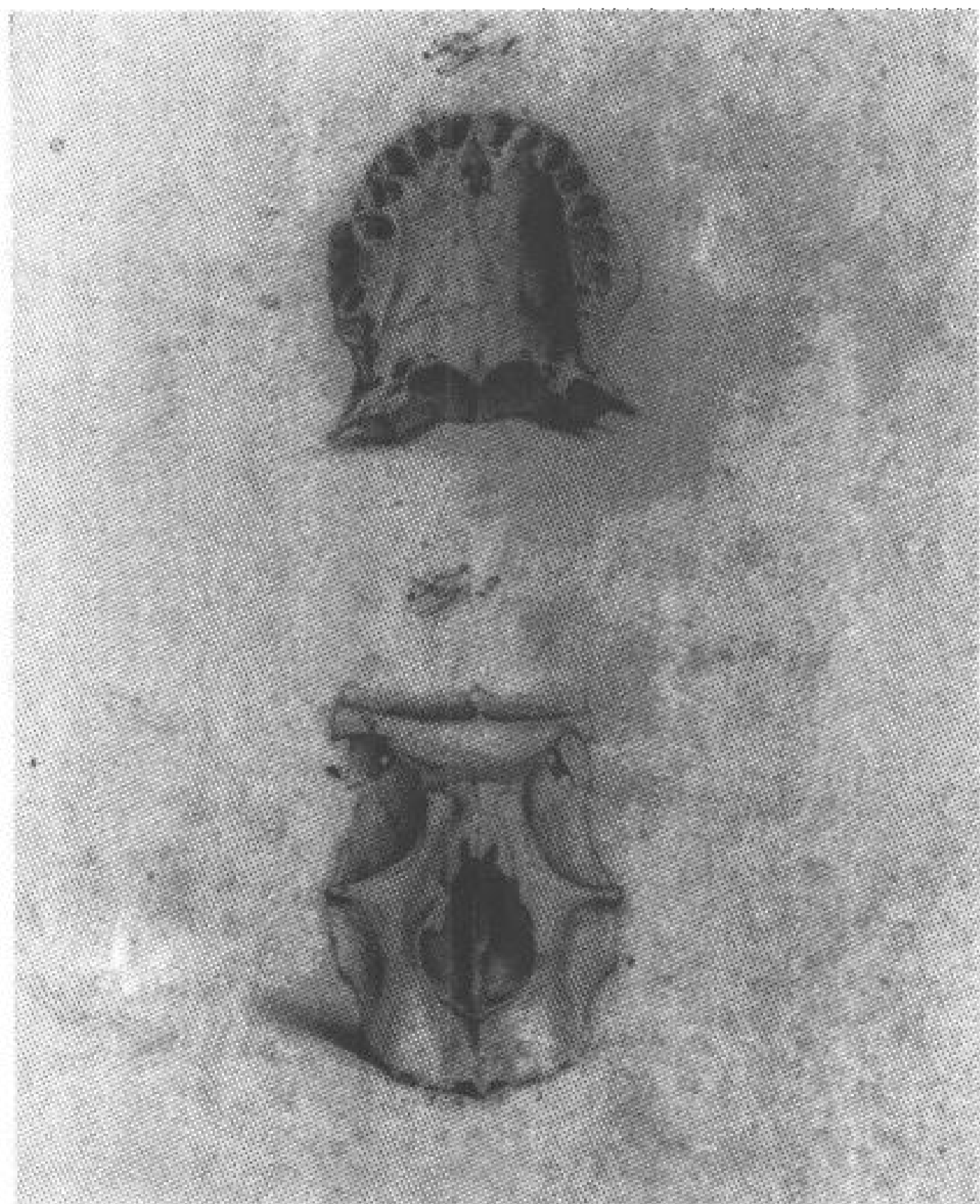
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德语国家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在某一种艺术中找到了表现途径，那就是音乐艺术，它在 1770 年到 1830 年之间达到了视觉艺术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达到的同样古典的完美形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对我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这四位作曲家的音乐代表了任何其他经验所不能代表的人文主义的精髓，把人类的深刻感情和新形式发展中的无与伦比的创新力量作了完美的结合。

除了歌德以外，没有别的人物更能代表这个时期的特点了。他把一个作家和诗人（他的诗句一再被人谱成歌曲）的杰出才能与使他在世世代代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心中成为古典人文主义化身的一种生活态度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在他身上的，而是要经过斗争才具有，这种有意地培养内心平衡与和谐，使他对德国教育传统中的自我修养有了一种塑造性<sup>97</sup>影响。

歌德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那种过度的、连续的狂热，也就是他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完美地表现过的。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这种强烈的愿望，这种强烈的厌恶，这种狂怒，这种狂喜”，而这种狂热也毁掉过他的一些最有才华的同时代人。他从这种激动的思想状态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到了老年时趋于心平如镜的境地。他对自己这几个阶段的记述，使得他的许多文章和谈话有了一种自传性的吸引力，而这正是我们在莎士比亚身上找不到的。

但是，在我要把人文主义传统的特点作出概括的尝试中，使我感到兴趣的不仅仅是歌德的文学成就，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这

文学上的成就竟是同别的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别的经验有像自然科学的发现一样在歌德内心的自我改造中起了这么大的作用。歌德花了很多时间，不论是在野外或者在实验室里，对地质学、解剖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前后达五十年之久(从 1779 年开始)。他对科学的独创贡献不大，但是科学对歌德自身发展的贡献却很大，尤其是作为一个诗人。探讨客观世界是他用来制约过度主观的手段，他越来越把过度主观看作是时代的通病。他从生物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自然观，即变形，原来是植物的变形，后来是可以看到所有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从对方互相生长出来的过程。就是这种要了解局



歌德绘的上颌  
间骨

部与整体关系的热情,使他不相信机械原理可以应用到任何活<sup>98</sup>的东西,不相信用分析的方法可以把有机生命本体所系的整个存在分解开来。——“自然受到拷问时是沉默的。”

对歌德来说,就像对达芬奇一样,科学的冲动,要了解自然的热情,同艺术性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制约自然中的形式的规律同制约一首诗,一支曲子或者一件艺术品的形式的规律是一样的。他于1805年他的那篇关于温克尔曼的论文中说,“人如果运用他的个别才能得当,能够取得很大成就,如果他把这些才能结合起来,就能够干出不同寻常的事情来,但是只有把他所有的才能都联合起来时,才能够取得最高成就。”<sup>⑩</sup>1824年他又写道:“人必须把他的所有能力——他的感官,他的理性,他的想像力,他的理解力——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统一体。”<sup>⑪</sup>他对其中任何一种能力本身都不信任,不论是想像的,还是抽象的,或者是意志的。古代希腊人对歌德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相信他们避免了不自然的二元论,这是像天罚的祸害一样降在现代世界身上的人类能力的分家。就是这种“愈合的统一”,使他有了一个诗人这样的直接的发言能力和他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人所达到的平静心境。

## 五

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和作家绝不是都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尽管如此,除了极其个人主义的和有才能的作家之间的天性不同以外——还有谁比歌德与席勒更加不同呢?而他



威廉·冯·洪堡,外交家、学者、人文主义者,创立了普鲁士教育制度,从1809-1810年实行到1933年

们两人从1794年起到席勒逝世为止的友谊却是德国人文主义的核心——在歌德、席勒、洪堡\*、施莱马赫\*\* 甚至赫尔德之间的共同之处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相互之间或者启蒙运动

---

\* Freiherr von Humboldt(1767 - 1835), 德国教育家。曾任普鲁士教育大臣,改革学校制度,创办柏林大学。

\*\*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 - 1834), 德国哲学家。著有《基督教信仰》(1821)等,致力于协调现代社会理论和福音派宗教信仰。

时期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多。他们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Bildung)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人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这就是 Humanität 一词所表示的理想,他们认为古代希腊人是最接近于实现这个理想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获得自由,克服逆境,甚至在失败的时候。席勒特别相信,艺术形式——在他身上自然是诗歌和戏剧——的经验比别的东西更能用来唤醒人们,使其意识到他们的道德本性是他们人性的突出特点——“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

99 德国人把人文主义与 Bildung (自我修养) 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缺点是,个人可能只顾自己而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德·托克维尔和穆勒继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 humanitas 观点,认为这种关心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必要表现。这就是当时对歌德提出的批评,因为他拒绝站在德国抵抗拿破仑军队的起义和解放战争一边,这也是我们到了二十世纪要回过来再谈一谈的批评。

不过这个批评是不能加在洪堡的头上的,虽然他比任何别的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来把 Bildung 概念加以制度化。他生于一个容克地主的家庭,兄弟两人,他居长。弟弟亚力山大(1769 - 1859)同样满怀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理想,成了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探险家,研究地球科学、气候学和生态学的先驱。兄长威廉年轻时曾在耶拿三年,成了席勒和歌德的密友,后来在拿破仑战争中和战后的维也纳和会上作为普鲁士的主要外交官干出了一番辉煌的事业。他忠于人文主义传统,把它当作指导他生活的原则,并没有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和对欧洲政治的掌握而影响他对学术的广泛兴趣,从古典研究直至他成为比较语言学的创

建者之一。但是后人至今仍纪念他的,却是他在 1809-10 年担任普鲁士政府教育部门首脑时的十五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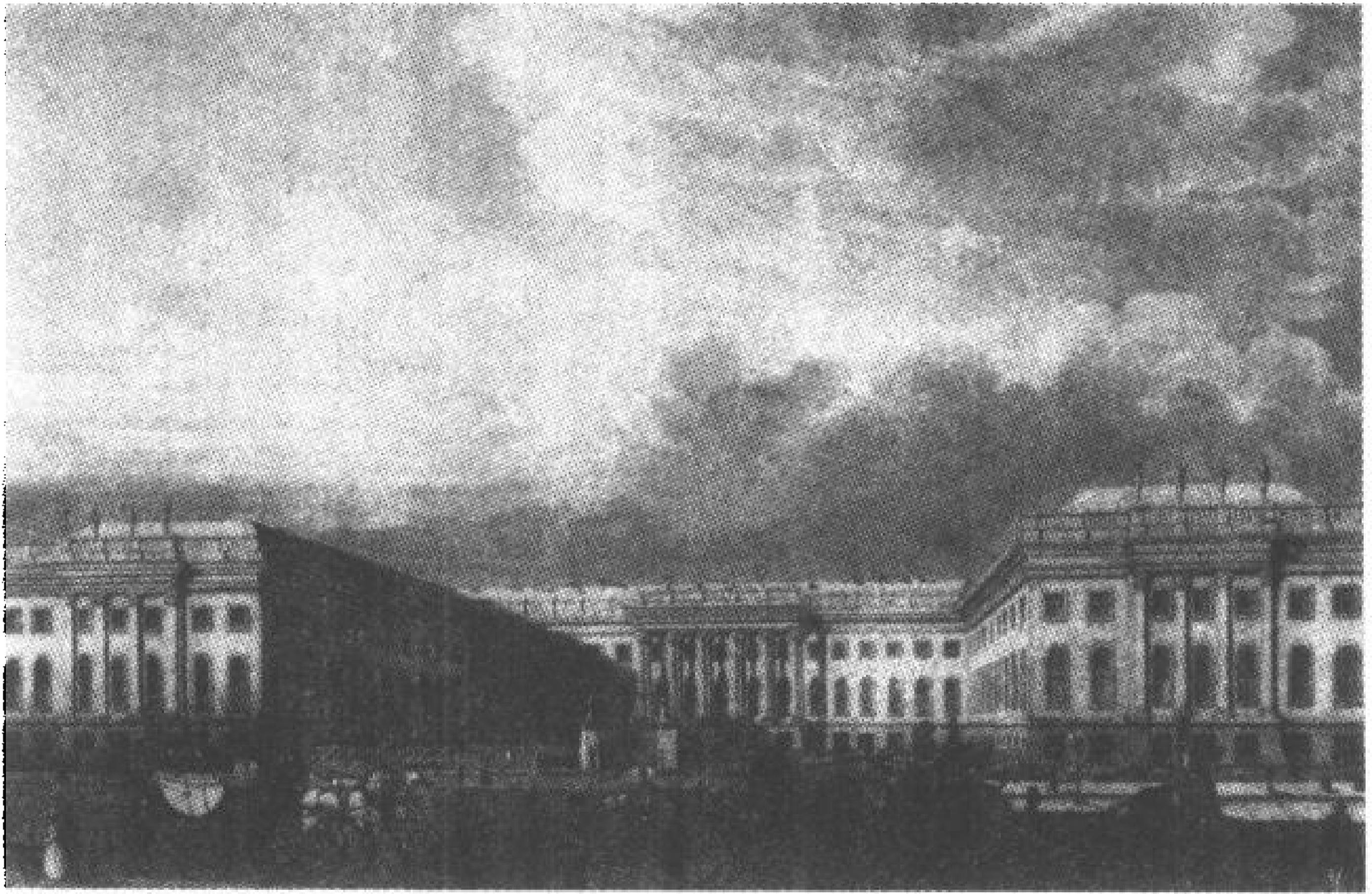
100 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在拿破仑战争的中途,当普鲁士的前途岌岌可危的时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奠定了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教育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 1933 年。他按皮斯特洛兹\* 的方针,改革了基础教育,然后又创建了人文主义的 Gymnasium(预科中学),重点放在通过以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和德语的学习为基础的一般教育来培养个性上。洪堡的教育计划的最高成就是他创办了柏林大学,明确的目标是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结果使该大学成了世界上最有威望的高等教育模范,一直到纳粹分子把它毁掉为止。

像所有的机构一样,预科中学没有充分实现洪堡当初的构想,而且乖离了他的构想。尽管如此,德国的教育制度,包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领导全世界的德国科学研究,比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享有更大的威望,而且有明显的优越性,像马修·阿诺德这样的教育改革家就这样认为。

洪堡和歌德都认为自己不过在名义上是个基督教徒而已,而席勒则公开宣称自己是不信教的。不过施莱马赫却对德国新教主义有着仅次于路德的影响。他几乎与洪堡生卒同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古典学者,精通希伯来文如同精通希腊文或拉丁文一样。他先以 1799 年出版的《对诬蔑宗教者中受过教育的人谈宗教》引起了注意,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的 Monologen 即独白。在这些谈话中,他提出了一种人文主义观点的宗教,它的对

---

\* Johann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改革家。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死背硬记教学方法,主张教育应以具体经验为基础。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初等教育方法。



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在纳粹上台之前一直是德国科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中心

上帝的信仰不是来自神学论据或基督教教条——人类通过基督的受难而获赎罪——而来自个人的人性意识，来自施莱马赫所说的“个人内心中神的最高指示，邀请到时间领域之外去过不朽<sup>101</sup>的生活，不受时间的严格规律的约束。”<sup>⑫</sup>

与这一在人的内心中发生作用的神的发现——也称为人类的人性的发现——同时来的是这样的认识：要扩大这一发现的途径是通过有意识培养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并在他对待别人的行为上表现出来。

表现你的个性，用你的精神来标志你周围的一切；努力

从事神圣的人道任务,把具有友好精神的人吸引到你身边,但同时总是时刻审视内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知道自己活跃的内心用什么方式在表露自己。<sup>⑬</sup>

这是参加教会的基础:“有头脑的人的永恒友谊,他们的相互影响,他们的相互塑造,自由的崇高和谐。”<sup>⑭</sup>

施莱马赫被任命为柏林的牧师,同时被任命为那所新创办大学(1810)的神学教授,他在那里把他的宗教观点的人文主义发展为感觉的神学。他被公认为现代新教神学的创始人,但在二十世纪遭到卡尔·巴尔特\* 和“上帝的话”派神学的攻击,因为他用以人的文化为基础的宗教来代替福音。但是他在我们当今时代又引起了兴趣,甚至巴尔特写到他时也说,在任何一部关于现代神学的历史书中,最先要考虑的名字不论过去和将来都是施莱马赫。<sup>⑮</sup>

## 六

如果我们转到英国同一代的浪漫作家身上,我们就会发现在德国发现的同一特点。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都同歌德和席勒一样崇拜希腊人。雪莱宣称,“我们都是希腊人”,

---

\* Karl Barth(1886 - 1968),瑞士神学家。企图把神学恢复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则,强调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即所谓“上帝的话神学”,因此他的神学被称为福音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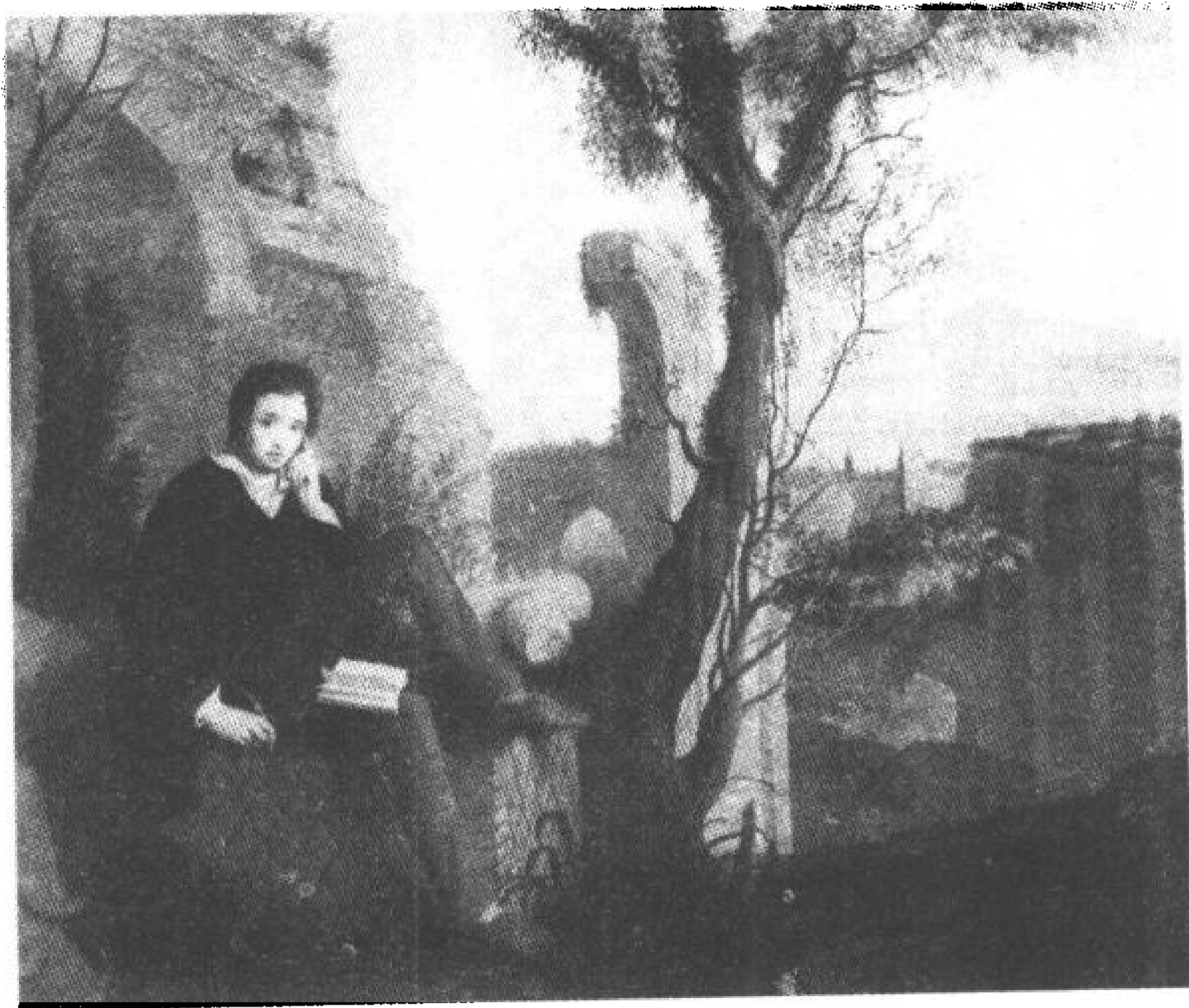
没有比济慈在他的《初读却普曼翻译的荷马》十四行诗和《希腊古瓮颂》中更恰当地表达希腊人在他心目中造成的印象了。他们同样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意识,认为这是人的关于真理和道德知识的来源。没有别的诗人曾经像华兹华斯在《序曲》中那样对此作过更有洞察力的探索。但是,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以比他们对自我探索,对自我修养,或者说对唯心主义的哲学更专心致志了。而当柯勒律治第一次要想把康德和谢林\* 的思想介绍给英国读者时,这些思想曾被取笑为空话连篇的胡说八道——德国的形而上学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这种习见的对比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

对于赫尔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极其不同的十九世纪德<sup>102</sup>国思想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具有同样历史维度的重要意义。因为这在英国又是没有比拟的。在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维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英国诗歌的伟大主题之一,例如华兹华斯在《亭腾寺畔所作诗》(1798)中曾加以展开:

因为,我已经学会观察自然,  
再不似少年时不假思索,常从  
无声处听见悲怆的人性乐曲,  
……………我能感觉到  
有什么常以崇高思想的喜悦  
使我心动,一种庄严的意识——  
意识到融合无间的某种事物

---

\* Friedrich Von Schelling(1775 - 1854), 德国哲学家。他的自然哲学把自然与精神联系起来作为现实整体的现实和理想两极。著有《超验唯心主义体系》(1800)。



约瑟夫·塞纹绘：在卡拉卡拉的巴斯写《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雪莱

存在于落日的余晖、丰盈的  
海洋，清新的空气，蔚蓝色的  
天空和人类心灵：一种动力，  
一种精神，在推动着那一切  
有思想的事物和思想的对象，  
通过万物，运行不息。所以，  
我依旧热爱那草地，那森林，  
热爱山峦，和从这绿色的大地

看到的一切；热爱我的耳与目  
所感受到的心或是经过他们  
再创造的宏伟世界；十分喜爱  
从大自然，从感觉的语言里  
辨认出我最纯净思想的支柱，  
心灵的保姆、向导、守护者，  
我的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

对自然的这种欣赏，由于担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了威胁而更加深了。工业化的经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才在德国被清楚地认识到。但是在歌德生前（他死于1832年），他在英国的同时代人已经要面对工业化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了，这一工业化从此普及到了全世界。结果浪漫派诗人被说服了，他们认识到了他们不能高高地置身事外，只顾自我修养，他们作为作家和诗人有责任表现商业化的工业社会有可能要摧毁的人的价值。

人世俗务过分繁重；起早摸黑  
挣钱花钱，我们荒废了天赋；  
我们在大自然很少看到自己的东西；  
我们丢弃了自己的心灵，可怜的恩赐。

对于自然界的一切，华兹华斯宣称：

---

\* 本诗译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4册，原译者江枫应本书译者之请重新修饰一遍，特此志谢。下引诗同。

……我们都格格不入，  
无动于衷——哦上帝，我宁愿  
是那陈腐信条哺育的异教徒；  
我就可以伫立在这怡神的草地，  
领略可以缓解我的孤寂的美景；  
看普罗丢斯从海水里腾空升起，  
听老特里顿\* 吹奏弯曲的号角长鸣。<sup>⑯</sup>

在1770年到1830年这段重要的年份里，最有独创性头脑的英国人是柯勒律治，他生于1772年，卒于1834年。这位杂乱无章的天才的兴趣之广可以与赫尔德媲美，他又把这一点同一个伟大的失意诗人的敏感结合在一起。在柯勒律治和边沁死后不久的1838年，穆勒写文章称他们是“他们的时代中英国两个伟大的思想泉源”。在边沁身上，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精神继续存在。而柯勒律治，穆勒则说，“表现了人的思维能力对十八世纪哲学的反叛”，唤醒了十九世纪，使它看到了在十八世纪哲学中所没有梦想到的一切东西。穆勒写道，“像边沁的哲学那样的一种哲学……能够把组织和调节仅仅是商业部分的社会安排的意义教给你。……它对社会的精神利益不会做什么贡献；它本身甚至也不能满足物质利益。”<sup>⑰</sup>

因此穆勒说，柯勒律治及其把他们的思想介绍到英国来的德国人的巨大功劳是，他们是首先越过这个局限性而产生“一种用当时唯一可能具有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哲学，即历史哲学……一个任何阶级的哲学家对人类文化的哲学所能作出的最大贡

---

\* 典出希腊神话，普罗丢斯是变幻无常的海神，特里顿是半人半鱼的海神。

献。”<sup>⑧</sup>

穆勒认为这种对他所说的“问题的问题……内在人的文化”的强调，是纠正平衡关系，扩大功利主义理性传统的办法。柯勒律治是会同意他的。虽然他自己的名字被视为“想像”的同义，他并不相信，这种修养本身足以产生真正有教育的头脑；“想像”必须与“方法”结合，所谓方法，他指的是根据经验进行安排和概括的能力。

像歌德一样，柯勒律治相信，对头脑，对知识，对社会要采取一种有机整体的观点，而不是机械的观点。1829年，年轻的卡莱尔\* 曾经写道：

要是我们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的话，我们就会首先叫它是机器的时代……同样的习惯不仅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人不仅在手上而且也在头脑里和心里机器化了。<sup>⑨</sup>

要克服这种把男女老幼看成是工业体系的部件——只是由于他们的机器功能才有价值——把他们看作是东西，是“手”，而不是人的倾向，穆勒和柯勒律治一样，都认为有必要注意人作为人的价值。柯勒律治在攻击剥削童工时，谴责了那种认为贫穷和社会弊端不过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器的排气管和安全阀所放出的许多多余的蒸气”<sup>⑩</sup>而已的放任不管态度。怎样来改变这一观点呢？柯勒律治对答案是没有怀疑的：一种新的社会需

---

\* Thomas Carlyle(1795 - 1881), 苏格兰历史学家。著有《回忆录》(1881)和《法国革命》(1837)。其历史观点强调英雄的作用。

要在一个更加普及得多的基础上改造教育思想。

## 七

用引述穆勒欣赏柯勒律治的话来介绍穆勒并不多见。从穆勒的童年时代起,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 就要他立志做边沁的传人,实施边沁和詹姆斯自己为之贡献了一生的激进理性功利主义的改革计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读了边沁的三卷《论立法》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05 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功利的原则……使我的事物概念有了一致性。我现在有了见解;一个信条,一个学说,一个哲学……它的教导和传播可以使之成为一种生活的主要外在目标。在我的面前展现了通过那个学说对人类状况进行改变的宏大设想。<sup>①</sup>

穆勒没有辜负他父亲对他的期望。他的《逻辑》(1843)、《政治经济学》(1848)、《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3)的出版,以及他维护孔德和实证主义学说的立场,确立了他作为哲学上激进主义化身的地位。像他所钦佩的德·托克维尔一样,穆勒认为他有责任参加议会。当选以后,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 James Mill(1773 - 183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John Stuart Mill 之父,与边沁一起,同为功利主义学说的领袖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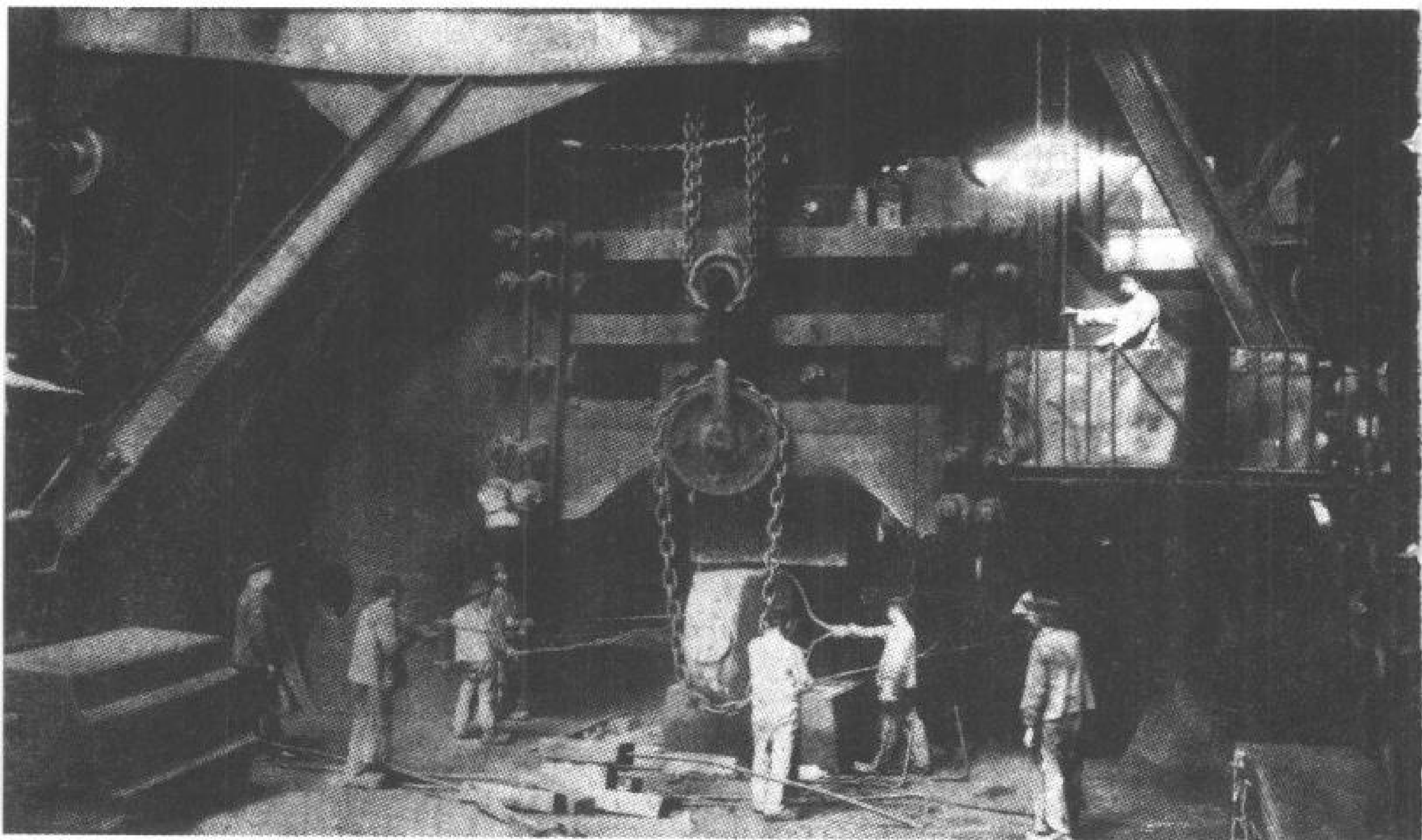
投身于一系列的激进的事业——议会改革(包括比例代表制的妇女选举权,后一事业使他极为不得人心);爱尔兰政府机构的大改革;全国教育法和在大学里取消宗教考试等等——其中有不少项目后来在格拉斯东\* 的第一任内阁执政期间(1868 - 1874)付诸了实施。他的不妥协的正直性格不仅赢得了下议院的尊敬,并且也博得了工人阶级领袖的尊敬。在1866年改革法案引起骚乱时,曾有人担心伦敦会爆发严重事件,军队暂停一切休假,全国仅有三人被赋予劝阻群众不要走极端的权限,他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敢于行使这权限的人。

但是穆勒也有另外一面,这曾使他在二十岁刚出头的几年里意气极端消沉,只能在华兹华斯的诗中寻求安慰,几次宣称他精神上的家乡是在古代希腊(为了写一篇书评评论格罗特关于柏拉图的一本书,他重读了柏拉图的全部原作),并且这么说边沁派理性主义的主要反对者:“很少有人比柯勒律治对我的思想和性格有更大的影响。”<sup>②</sup>穆勒在自己关于边沁和柯勒律治的论文中所看到和表示的,是把他们各人所代表的真理放到同一焦距之下以证明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必要性。要从一个单一的观点掌握任何情况或问题的全部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反对孔德是那么尖锐。他在他所爱的女人哈丽特·泰勒的提示下发现,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体系中,“孔德毕生致力于构想人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出过的最完整的精神和世俗暴政体系,除非是伊格纳修斯·罗耀拉\*\* 的头脑中才可能想出来过。”<sup>③</sup>

---

\* William Gladstone(1809 - 189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四次组阁,他的自由主义政策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政治颇有影响。

\*\* Ignatius Loyola(1491 - 1556),西班牙教士。耶稣会创建人,反宗教改革势力代表人物。见前有关耶稣会的脚注。



19 世纪的技术：克虏伯 1861 年在埃森装置的庞大气锤

他于 1859 年发表的论文《论自由》，据他自己说，除了自己的思想启发以外，也是在哈丽特·泰勒的思想启发下写的。他在那篇论文中把他不同的思想头绪理成了“他的坚定不移的人际沟通的理想”（他的传记作家语），那就是“一个受苏格拉底式精神所陶冶的雅典式社会。”<sup>②</sup>这句话有不少人文主义传统在里面。

106 在人的个性和社会本能这两者的各自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问题上，西方政治理论长期有不同的看法。在这场辩论中，穆勒认为，对社会健康而言，如同对个人一样，自由都是必要的。



“人类的前途取决于创新思想的力量，取决于个人重新发现旧有的真理，取决于创造新的真理。”<sup>⑥</sup>危险在于偏狭不容和多数强求一致的倾向，在于为求一致而使用国家的权力。

在他的论文《论自由》的伟大的结束语中，穆勒说明了他认为任何社会都不能随便忘记的根本真理：

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可以更加顺利地工作而加以扼杀的。<sup>⑦</sup>

像德·托克维尔一样，穆勒并不乐观地认为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会有人听他的话，但是他相信，有朝一日，当他所看到的开始汹涌而来的集体主义潮流，使得人们尝够了滋味并对此感到幻灭时，他在论文中要想说明的真理会具有它们的真正价值。“而且，”他在他的《自传》中补充说，“怕的是，这种价值会保持很长的一个时期。”<sup>⑧</sup>

## 八

107

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现代欧洲绘画的大陈列室

里漫步时,又一次为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画家马奈、德加、莫奈、雷诺阿\* 等所创造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世界栩栩如生的形象所折服。这个形象可以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所创造的他们时代的佛罗伦萨或威尼斯社会的形象媲美。这同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被狄更斯、夏绿蒂·勃朗特、萨克雷、巴尔扎克、福楼拜、提奥多·方坦纳\*\*、左拉、亨利·詹姆斯\*\*\* 和马赛尔·普鲁斯特等一连串目光尖锐的作家加以更加深刻和细微的观察。小说是十九世纪的独特创造,正如电影是二十世纪的独特创造一样,它用同样的方式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由于它对人类状况(巴尔扎克称为“人间喜剧”)所提供的丰富证据,就像莎士比亚的剧本在十六世纪末一样,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大部分时间里,小说中所呈现的,是一幅丑恶的和令人气馁的景象:男男女女为幻想所蒙蔽;被情欲所支配,所毁灭;互相憎恨,甚至憎恨自己;心胸狭隘;甚至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愚蠢之极,或者耽溺在奇怪的空想之中。但是,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

---

\* Edouard Manet(1832 - 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先驱。

Edgar Degas(1834 - 1917),法国画家。与莫奈、雷诺阿一起组织第一次印象派画展,但反对这一标签。晚年视力减退,放弃油画,改画粉笔画。

Claude Monet(1840 - 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运动主要领袖。

Pierre - Auguste Renoir(1840 - 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运动领袖。

\*\* Theodore Fontana(1819 - 1898),德国作家。著有歌谣多首和小说《考验与磨难》(1888)等。

\*\*\* Henry James(1843 - 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美国人》(1877)、《女士画像》(1881)、《华盛顿广场》(1881)、《大使们》(1903)等。作品主题多为单纯天真的美国人与老于世故的欧洲人的对比。

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本来能够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通的。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最早满怀热情地谈到人的尊严和创造能力，他们像任何人一样都知道，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可以找到邪恶、苦难、精神的贫乏。但是他们相信，人是能够摆脱他们的环境，克服他们的命运的；认识到这一点是这么做的第一步。正是这种可能性里孕育着人类生活中不断反复出现的戏剧和兴趣。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生动地提醒我们要看到这个对比和这个可能性。

如果我选择乔治·爱略特\*（玛丽·安·伊凡斯的笔名）作为这个角色的代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做有机会可以包括一位妇女在内，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作为小说家的才华是同她对她生活的时代的思想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敏锐兴趣结合在一起的，108她曾就这些问题为《威斯特敏斯特评论》写稿。

她从小受到福音派基督教徒的教育，长大后看到自己对《圣经》的独家真理的信仰竟被德国历史批评攻击得站不住脚，震惊之余，经历了一场十九世纪典型的丧失信仰的打击。没有人比她更加了解法国和德国思想界的最新发展。她是第一个翻译施

---

\* 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小说家。原名 Mary Ann Evans,著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米德尔马区》(1871-72),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关心道德培养。

特劳斯\* 的《耶稣传》和费尔巴哈\*\* 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前者总结了把早期基督教作神话和象征的解释而不作字面的解释的主张,后者则宣传另外一种版本的人道的宗教。“上帝,”费尔巴哈写道,“是我的第一考虑;理性是我的第二考虑;人是我第三也是最后的考虑。”<sup>⑧</sup>

费尔巴哈接受上帝的传统属性——爱,智慧、公正——并且认为,现实是,人有实现这些属性的潜力,但是人却把它们投射到一个神话的上帝身上,而没有认识到,他们归于上帝的智慧也是他们能够在相互的关系中实现的。这一直是乔治·爱略特所抱的观点,至死不改。她在1874年的一封信中写到:

一个结论,没有它,我就不可能要想写什么东西来表现人生——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已成为社会和道德发展的原则,它不取决于与人无关的概念;也就是上帝的概念……是一种完全属于人的善的理想(即人性的升华)。<sup>⑨</sup>

但是,乔治·爱略特不仅仅是一个热情的、进步的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她也具有一个能写出《米德尔马区》的伟大小说家的富有想像力的同情心。这使她能够用一种不同方式去做穆勒要做的事,那就是把英国十九世纪两大思潮结合起来:一个是边沁派理性功利主义思潮,站在外面考验一切接受到的意见,一个是富有想像力的柯勒律治派思潮,企图从内部来发现这些意见中

---

\* David Strauss(1808-1874),德国神学家。所著《耶稣传》(1835-36)把福音故事当作历史处理。

\*\* 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哲学家。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的内心向外的延伸,著有《基督教的本质》(1841)。

间有些什么道理。

就是这第二种思潮,她把它变成了她小说艺术的秘诀。有了它,她就能够深入了解别人生活中宗教信仰的力量和他们的宗教经验,比如在《亚当·比德》中那个循道宗传教士达娜·萧尔这个角色的身上,即使她自己并没有这种信仰和经验。

在1859年,即穆勒的《论自由》和她自己的《亚当·比德》出版的那一年,她写信给她的一个朋友说:

如果艺术不分析人的同情心,它在道德上就是无所作为的……意见是人的灵魂之间劣等的水泥:我想用我的写作来产生的唯一作用是,读了我的作品的人更加能够设身处地 109 地来感受,除了同样是不断挣扎和犯错误的人以外,在一切方面都与他们不同的人的痛苦和欢乐。<sup>③</sup>

## 九

轮到马修·阿诺德,我就到了我要谈的最后一批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了。阿诺德在本世纪中期被里昂纳尔·特里林\*称为“我们的时代中人文主义传统在英国和美国的伟大继续者和传播者。”

---

\* Lionel Trilling(1905 - 1975), 美国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结合社会、心理、政治分析,在当代美国文学界甚有影响。著有《自由的想像力》(1950)、《反对自己》(1955)、《逃亡者的集合》(1956)等文集。

由于里昂纳尔·特里林本人也属于这个传统,因此值得引述一下他接着提出的人文主义的定义:

让我们把它当作下述这种人的态度,他们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特别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是有好处的,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实现了他的本性,达到了他应有的高度。人文主义所珍视的个人美德是智慧、随和和宽容;它所要求我们的勇气就是在支持这些美德时所体会的勇气。它珍贵的主要智慧品质是温和与灵活——它要思想成为,用阿诺德所欣赏的蒙田的话来说, *ondoyant et divers* (波状的和多样的)。<sup>①</sup>

凡是读过阿诺德著作的人,无不注意到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孤独和怀恋的悲哀与他在论文中所表现的机智和愿意参与他的时代中最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论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例如,他把卡莱尔称为“道德上的亡命之徒”,他把英国社会分为野蛮人(贵族)、市侩(中产阶级)和老百姓。他说起自己是

在两个世界之间彷徨,一个已死了,  
另一个没有力量诞生出来。<sup>②</sup>

但是他对过去的同情从来没有削弱他对协助新世界诞生的义务。他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充当对生活的批评,在人们身上培养追求完美的热望,并认为“采取行动、帮助他人和乐善好施的冲动,消除人的错误、清理人为混乱和减轻人为不幸的愿望,要把世界改造得比我们降世时更好更快活的崇高抱负”,是文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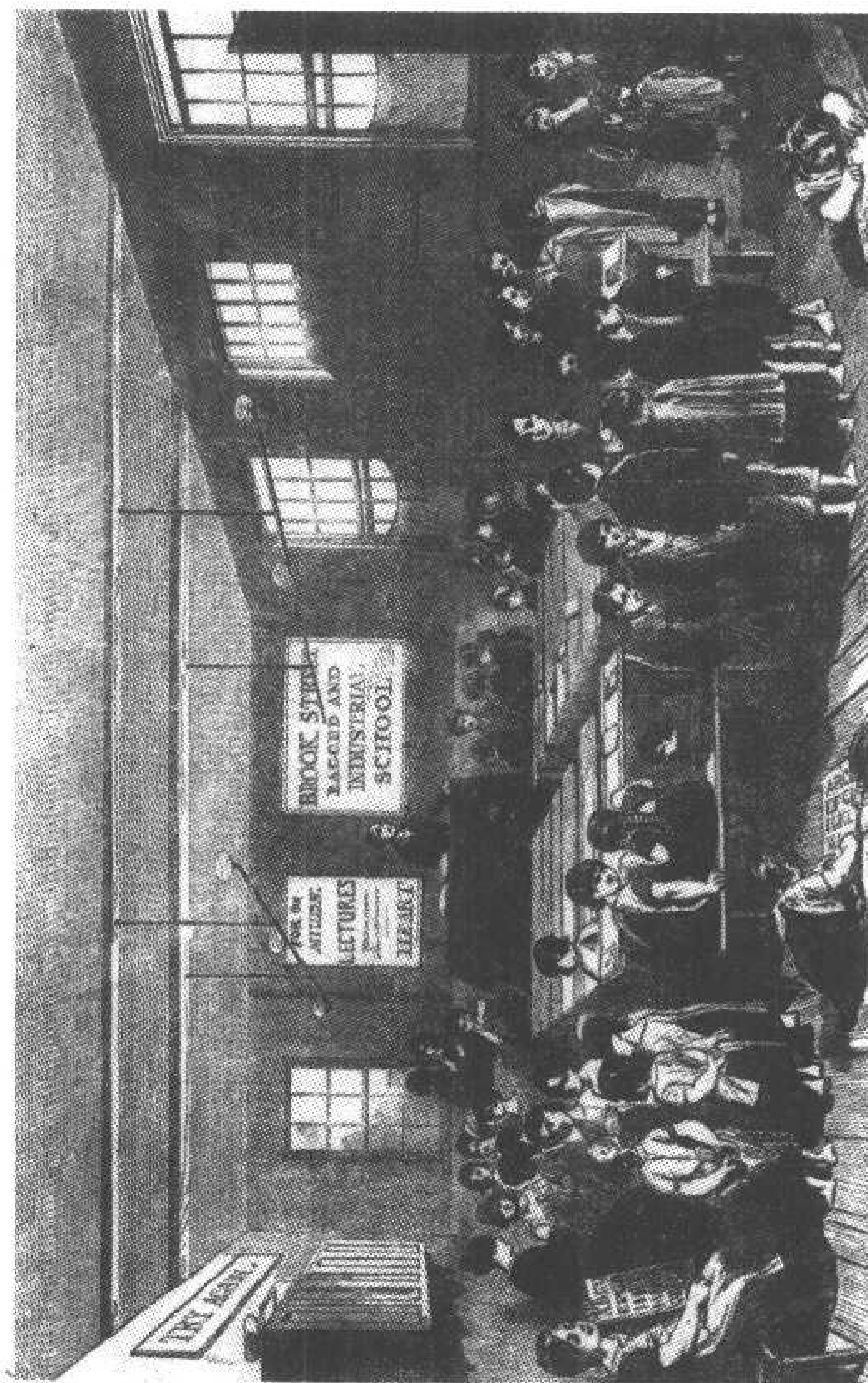
“主要的和显著的部分”。<sup>③</sup>

这些话出现在他的一篇最有名的论文《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中,那是在1869年英国群众性骚动(即题目中的“无政府状态”)结束时发表的,穆勒出力平息了这一场骚动,结果产生了1867年的改革法,扩大了选举权。阿诺德继而在“我们所尊重的机械和物质文明”与文化之间作一番对比,他认为“对机器的信仰已经到了与它要服务的目的荒谬地不相称的地步……好像机器本身或其作为目的就有一种价值”,而文化

却把人对完美的追求放在把自己变成什么上,而不是拥有 110  
什么上,放在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状况上,而不是外在的环境上……放在有别于自己兽性的我们人性本身的发展和优势上……放在扩大那些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 and 感情才能上。

像歌德一样,阿诺德把这个理想等同于希腊人和来自希腊而已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得到了发挥的 *humanitas* 概念。这个理想对现代世界的文明特别重要,因为现代世界文明“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比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更是机器的和外在的文明,而且有不断地趋于更加如此的倾向。”<sup>④</sup>

阿诺德认为,如果这个传统要继续的话,就必须改造如今已是英国社会中最有影响的中产阶级,使之回到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他曾任非国教派的学校的督察,从他任职三十年的经验中,他是很熟悉这些异议派教徒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观点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无异是流行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宗教版。阿诺德并不想否定清教徒传统的力量,这力量在于对希伯来词义的掌



给普通大众受的教育：1853年伦敦布鲁克街穷人上的工业学校



握、行为道德原则、不信奉国教的良心。格拉斯东和自由党其他领袖都是把这当作英国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来求援的。异议派所缺乏的,而且需要它来平衡的,是对文化的同等程度的重视,也就是对完美的追求,他把它视为就是希腊文化。

阿诺德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教育大权从教会手中夺取过来,建立国家中等教育体系,来教化市侩,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他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了解,英国在教育条件方面落后于大陆有多远。他在他的《大陆的学校和大学》(1868)中钦佩地谈到洪堡在普鲁士实行的改革,拿破仑留给法国的全国预科中学系统,这是建立在法国革命的基础上的,此外还有像高等师范学校、综合技术学校以及其他大学那样有力的高等教育机构。英国过了一百年工夫才仿效这个榜样。由于非国教派、天主教、国教圣公会特殊利益的争吵,一直到1902年才通过莫兰特法<sup>⑤</sup>,建立了全国性的中等教育体系,但直到今天,这一体系仍旧不能把独立的有名望的学校并到里面来,英国为了这一社会分裂付出了惨重代价。

阿诺德认为,“国家的兴衰是受道德原因支配的”,而且,正如他向一名美国的听众所说的,“在一个像这个社会一样的民主社会里,由于它的新,它的幅员,它的力量,它的商业生活,它的纯粹自由和平等”,其危险就在于缺乏纪律,就在于感情冷漠和物质至上,尤其是“大众的当权,而又没有恰当的理想来提高或指导大众。”<sup>⑥</sup> 111

约翰·拉斯金\* 在谴责十九世纪文明的丑恶及其忽视美的

---

\* 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批评家。著有艺术评论集《现代画家》5卷(1843-1860),后来兴趣转向社会评论。

方面,和阿诺德一样情绪激烈。他甚至准备比阿诺德走得更远,认为这不是教育有缺陷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据以组织的原则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注意财富的生产,而不注意人的生产。他宣称,所谓分工这个名词用词不当,“说分工,这么说是不严格的,分的是人:人分成了碎块,分成了生活的小碎片和小碎屑。”<sup>②7</sup>价值、财富和劳动应该从供求规律的统辖下解放出来,与完全不同的、有机的社会原则发生关系,他在《一直到最后》(1862)中毫不犹疑地把这社会视为就是社会主义。

威廉·莫里斯\* 把拉斯金的论点更推进了一步:

112

除了希望制造美的东西以外,我一生中的主要激情是对现代文明的憎恨……关于它对机械力量的掌握和浪费,它对人生苦难的惊人组织……我怎么说呢?这一切最终都要到灰烬堆上的会计室中……世界不再能悦目,荷马的地位要被赫胥黎取代?<sup>②8</sup>

莫里斯同意拉斯金的看法,不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艺术是无法复兴的。但是他没有信心,不相信这可以靠向一个没有能力完成自己复兴的庞大中产阶级进行说教来做到。这需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而这只有靠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使他们明白,他们“面对着一个错误的社会,而他们自己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社会的材料”。<sup>②9</sup>

到了1900年,乔治·爱略特和马修·阿诺德的维多利亚时代

---

\* William Morris(1834 - 1896),英国艺术家、作家。曾学绘画,后从事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最后20年致力于社会主义。著有《乌有乡的消息》(1891)和《社会主义的成长和结果》(1893)等。

中期的一本正经的世界,已面目俱非,无法辨认。虽然拉斯金和莫里斯后来在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注意,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国,他们的声音是荒野中的呼声,无人置理。在1914年的战争开始前的四十年中,西方文明从来没有显得这样自信过。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征服了世界以后,在政治上又把它划分为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白人优越性的叫嚣十分刺耳。统计数字证实了政论家的论断。但是在1870年到1900年之间,除了量的飞跃以外,也有质的飞跃,这使得1900年开始的头十年的世界,也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毕加索和列宁已在准备未来前途的世界,接近二十世纪中期的程度超过接近十九世纪中期。

1914年前的一代人得面对人生经验中某种新的东西,这不是人口增长所创造的大众社会的前景,而是这种大众社会的现实。这个社会还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的塑造,以及为了控制它和管理它而必须有的大规模组织的塑造,不论这种大规模组织是国家的、政党的、还是企业的。到了1900年开始的头十年中,选举权和基本教育的扩大,使得马修·阿诺德的“大众当权”的前景有了实际内容。很显然,这种“大众当权”很容易受到政客的控制和第一批出现的大众媒介的控制,这种大众化报纸就是为了利用大众的口味和偏见创办的。在这种偏见中,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有越来越醉心于暴力的倾向,这正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和诸如尼采、巴雷斯\*、索莱尔\*\*和其

---

\* 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小说家。早年提倡自我主义,后转向激烈民族主义,著有《无根者》(1897)。

\*\* 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认为民主是庸人的胜利,主张精英政治,某些观点对法西斯主义有影响。著有《关于暴力的思索》(1908)。

他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这种种倾向在普遍支持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和海军扩张、殖民战争方面有许多表现的机会，而这种大众文化就是年轻的自学成才的阿道夫·希特勒 1914 年以前在维也纳和慕尼黑所吸收的东西。

129 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哪里去找人文主义传统呢？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自由主义在创造这个新世界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例如，我上面提到的统计数字表明工业、贸易和财富都有很大的增长，其规模之大和时间之久都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尽管有上下的浮动，但 1870 年到 1900 年之间的世界工业生产量增加近四倍；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三十年中，世界贸易量增加到三倍；在 1898 年到 1913 年间贸易价值就翻了一番。自由贸易不再通行无阻了；它引起了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先是由亚当·斯密提出、后来由穆勒重申、又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在 1890 年给予最后形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在释放人的能量方面所起的作用。迄今为止的成就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sup>④</sup>

物质的进步也伴随有政治的进步。到十九世纪末，立宪政府和议会制度已在整个西方世界确立，同时，更加民主的选举权也得到继续扩大。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巴尔干半岛在土耳其帝国崩溃后许多新国家的创立、奥匈帝国被迫向附属各民族作出的让步，这一切都是民族独立原则的许多胜利。各国自由主义政党在谋求国家世俗化和教育世俗化的努力中

---

\* Alfred Marshall(1842 - 1924), 英国经济学家。创边际功利学说。著有《经济学原理》(1890)。

取得了类似的成就，最后在法国出现了激进派在德莱费斯案件\* 上的胜利、驱逐耶稣会和其他教士团出教育领域以及1905年通过政教分离法律。

总括起来，这些成就足以证明，一般称呼1870-1914年这个时期是自由主义的顶峰时期是完全有理由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此作了不少贡献。但是“顶峰”一词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达到了顶峰以后就丧失了它的继续成长的力量和势头。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各国自由党在面临像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新问题时的分裂和犹豫。自由主义思想也是这样。这种思想极其散漫，持有这种思想的人都习以为常，不加深究，因此它们已失去了独创性，僵化为正统思想，不再对新的一代有什么吸引力了。

理性功利实证主义传统，通过边沁、哲学上的激进派和孔德，自称继承了启蒙运动，实际上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它在公众的心目中仍受到敬重，一方面有自然科学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有政治经济学的驳不倒的“规律”的支持。赫伯特·斯宾塞\*\* 从达尔文那里获得了灵感，毕生从事解释为什么要对理性进步抱有信心，和支持理性进步的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有效性，他在1896年完成了十卷本的《综合哲学》。现代统计学创建人之一卡尔·皮尔逊\*\*\* 宣称：“全部现象，不仅是生物学上的，而且是精<sup>130</sup>

---

\* 1894年法国破获德国武官间谍案，法庭仅因笔迹相似判犹太血统法国军官德莱费斯叛国罪，押送魔鬼岛服刑。1896年发现真正间谍，经过十年激烈争论，德莱费斯始获平反。其间名作家左拉曾发表著名的《我控诉》一文为其申冤，竟被判罪。

\*\*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创始人，“适者生存”思想推广者，将功利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

\*\*\* Karl Pearson(1857-1936)，英国科学家。将统计方法应用于生物学。

神上的,整个宇宙,都是它的领域。科学方法是通向全部知识领域的唯一大门。”<sup>④</sup>希波莱特·泰纳\* 致力于证明它怎么可以应用于文化领域,研究文学、艺术和哲学。他声称,这些都是社会产物,与个人才能或意志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由于非个人的决定性因素的综合结果,这样一些因素是“种族”,即一个作家的体质和心理遗传;“环境”,即他的地理、社会和政治环境;及“时代”,即他所所处的历史条件。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恩斯特·哈克尔\*\* 出版了《宇宙之谜》,这是科学普及读物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西方世界行销几十万册。它在哈克尔所称的“一个全面的哲学体系中”总结了实证主义的观点,为自从希腊人以来一直使人类迷惑不解的谜团提供一个解答。他在1906年把他的“一元论哲学”归结为这样的信念,它是

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不间断的、永恒的发展过程从整个自然中得出的;所有自然现象毫无例外地,从天体的运动和滚石的落下到植物的生长和人的意识,都遵守同一个伟大的因果规律;一切最终可以归于原子的力学作用。<sup>⑤</sup>

这种对科学的实证主义信仰,以及这信仰所支持的对进步的信念,如果与狄德罗或休谟对理性的批判性的无限利用相比,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理性主义打破了宗教和教会对人思想的

---

\* Hippolyte Taine(1828 - 1893),法国批评家、历史学家。认为人是环境和遗传的产物。著有《英国文学史》(1864)和《当代法国起源》6卷(1876 - 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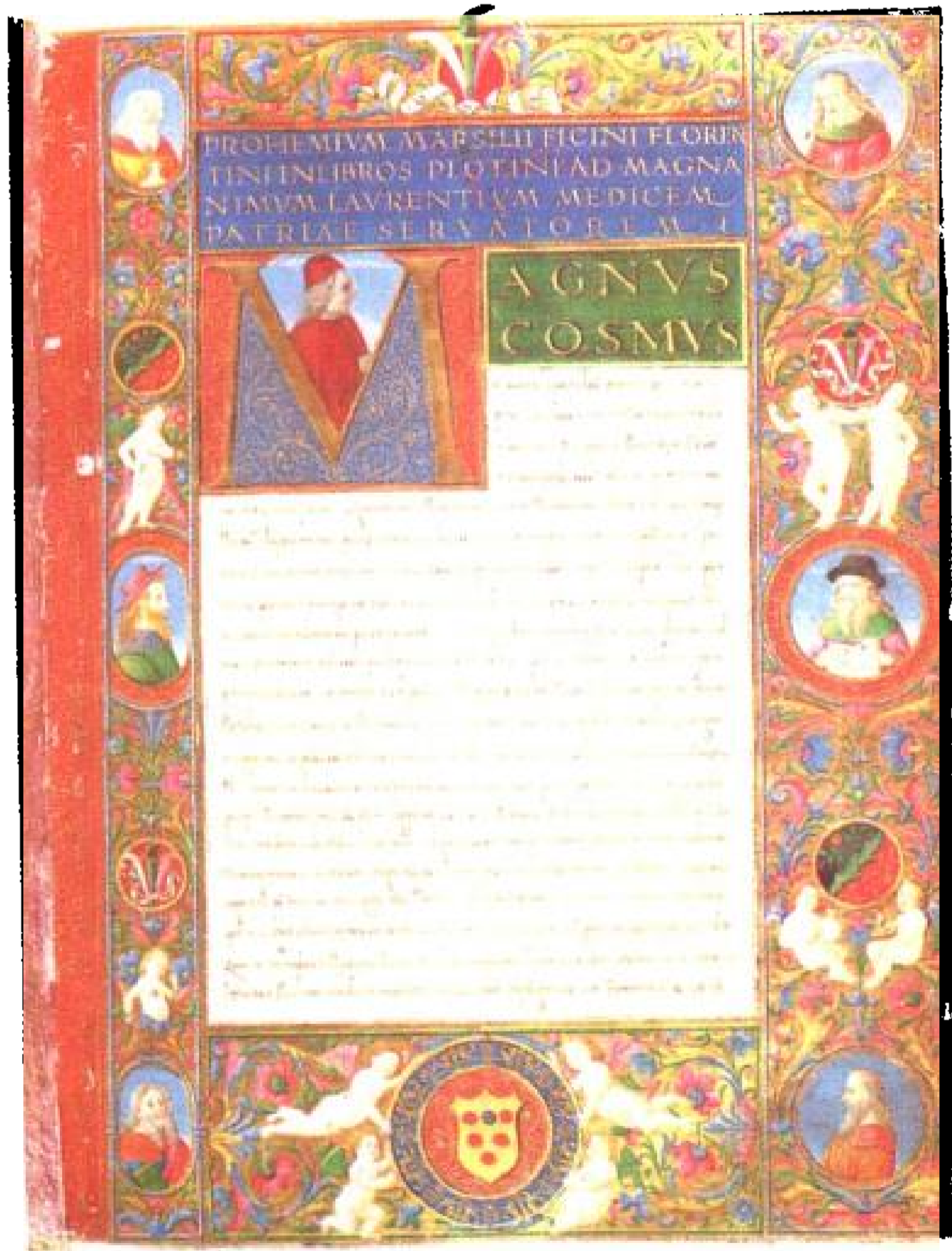
\*\* Ernst Haeckel(1834 - 1919),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在德国最早介绍达尔文主义。

I 幽默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以各种形式在各个时代中出现,从公元前5世纪的阿里斯多芬到现代的卓别林。这里是一只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花瓶,上绘一名舞女和两名丑角在酒神狄俄尼索斯面前表演一出滑稽戏



II 菲德里戈·达·蒙特菲尔特罗和他的幼子吉多巴尔多在乌尔比诺的菲德里戈宫殿中听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大概是米德尔堡的保尔)讲课。菲德里戈曾在维多里诺·达·菲尔特的曼都安学校受教育,奠定了日后做雇佣军首领的生涯的基础,但是他也致力并擅长于学术和艺术,他的多山而贫穷的公国的宫廷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杰出中心





III 15 世纪画在佛罗伦萨一只嫁妆柜上的彩绘。像波提切利、保罗·乌切洛、多那太罗等这样著名的佛罗伦萨画家都曾受聘画这种画，所选主题常常是古典的——在这幅画中，画的是公元 70 年韦斯巴西安皇帝和他的儿子提图斯胜利凯旋进罗马的情景

IV 埃及新柏拉图派哲学家柏罗丁（公元 204—270）的九人集的译本第 1 页，这是菲切诺译出献给洛伦佐·德·梅迪齐的。柏罗丁的希腊文本于 15 世纪被发现，菲切诺先前已为科西莫·德·梅迪齐把柏拉图的对话译成拉丁文，遂受科西莫之孙洛伦佐之聘，将柏拉图最重要的阐释者的著作译成拉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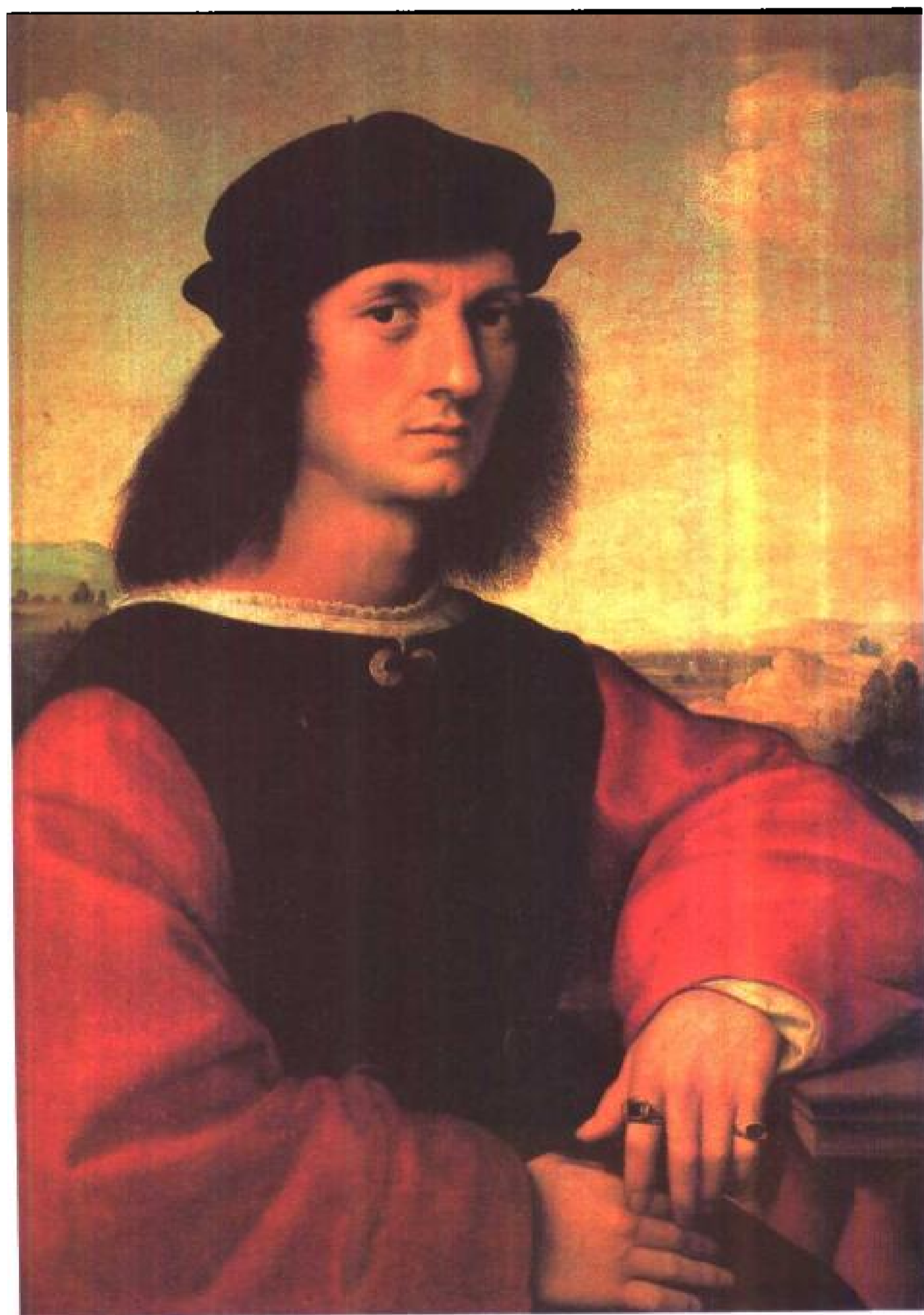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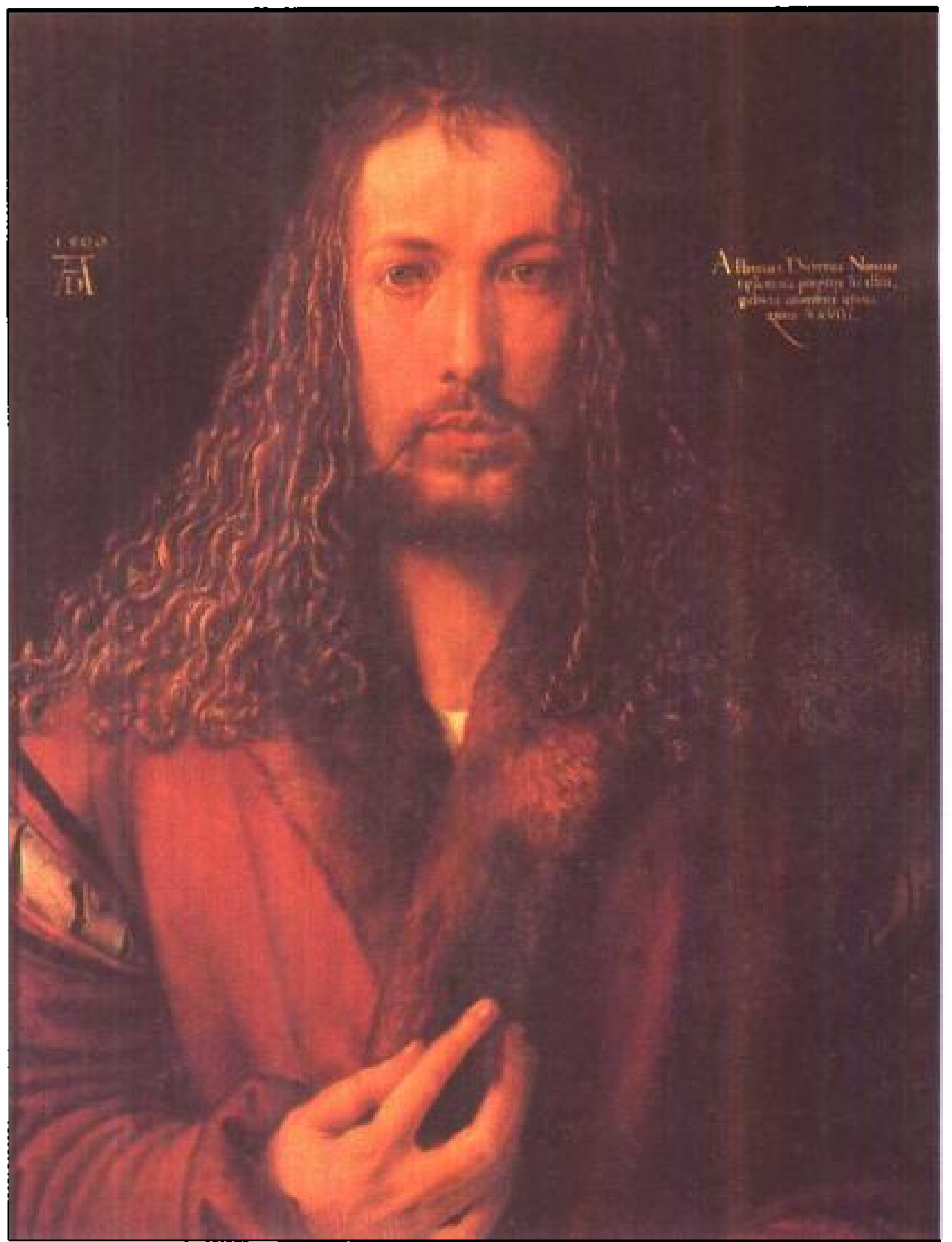
V 贺尔拜因的“法国大使”，画的是让·德·丹特维尔和乔治·德·塞尔维，1533年画于伦敦。架上的物件很典型地代表了对地理学、数学、气象学和音乐的人文主义兴趣。脚下是一只扭曲的死人头，据说它是用来提醒人生必死和一语双关喻指贺尔拜因自己的姓氏的，贺尔拜因意即“骷髅”



VI—VII 个人肖像——包括画家的自画像——是文艺复兴对人文主义传统的突出贡献之一。VI：丢勒和贺尔拜因都画过伊拉斯莫；国王学院教堂中的圣路加画像一直被认为是伊拉斯莫斯在剑桥的几年(1511—1514年)里出现的样子。VII：拉斐尔的一位佛罗伦萨艺术赞助人安吉洛·多尼的画像



VIII 丢勒 1500 年打扮成基督的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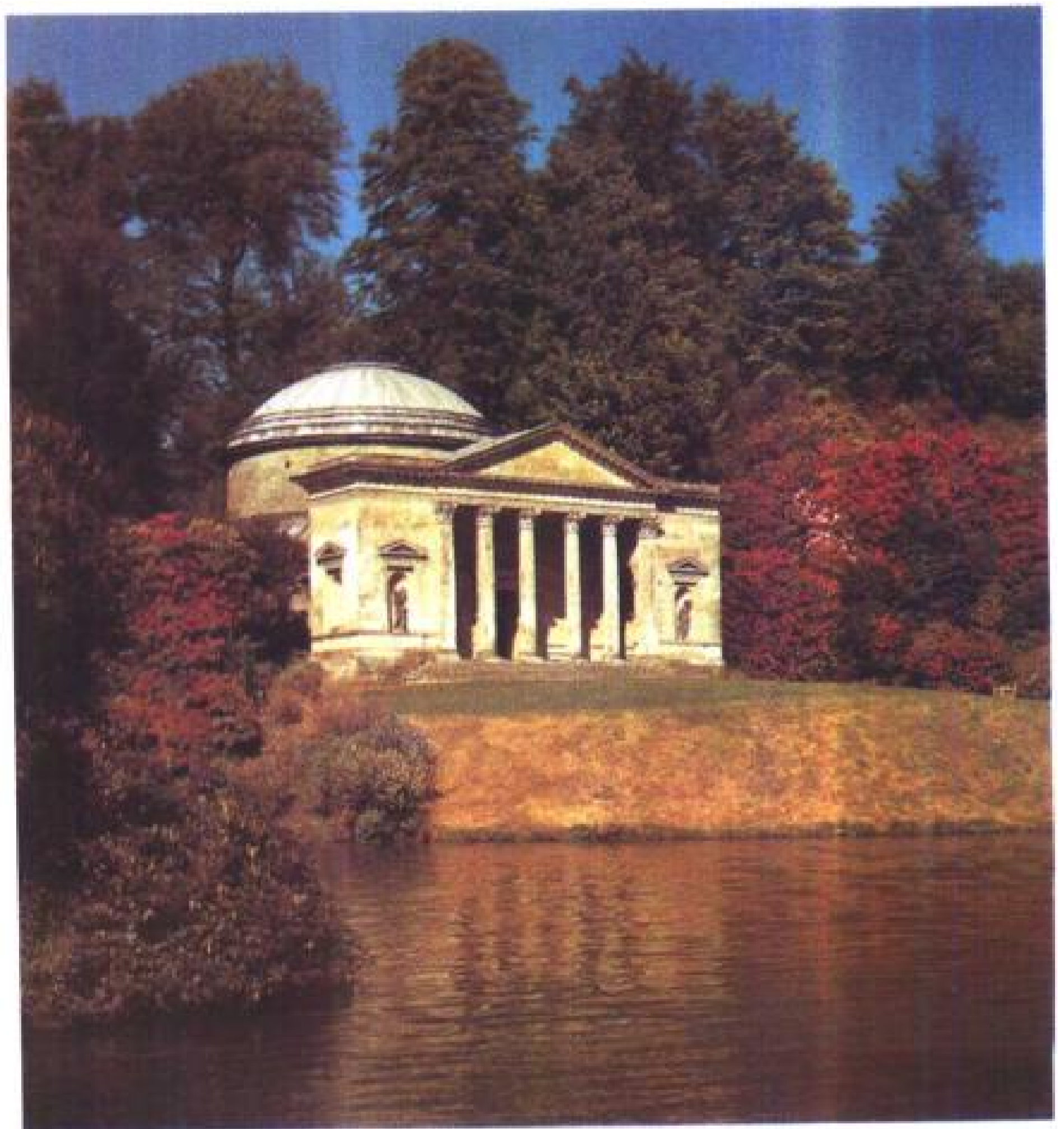
IX 伦勃朗在 17 世纪画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自画像。此幅画于 17 世纪 50 年代后期





X 弗拉戈纳尔画的狄德罗肖像。狄德罗(1713—1784)当时以《百科全书》主编著称于世,许多现代批评家似乎认为他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有独创见解的,是法国知识界泰斗,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对戏剧和美学理论,对文学批评和小说(他的《拉摩的笊子》使歌德和弗洛伊德深感佩服),对科学推测和政治,都作出了贡献

XI 花园的设计和布置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又一种人文主义艺术。在20世纪,这为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提供了一个范例:当初为社会上层的享受,后来可以成功地适用于各阶层广大群众的薰陶和享受。斯托尔海德也许是英国18世纪最优美的花园,是18世纪40年代初期由银行家亨利·霍尔设计的,他集中了维吉尔所描述的古典景致的一切成分,以“建筑上的陪衬”作为烘托,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亨利·弗利特克洛夫特的新古典主义先贤祠





XII 雅克·德·拉约 1734 年为一收藏室的门上饰板画的一柜科学仪器，这一收藏室中藏有贝壳和其他标本，建筑和工程模型，以及约瑟夫·波尼埃·德·拉·莫松制作的科学仪器，设在巴黎的卢德大夏里。这种收藏在 18 世纪甚为流行，拉约的构图吸收了其中最著名之一的许多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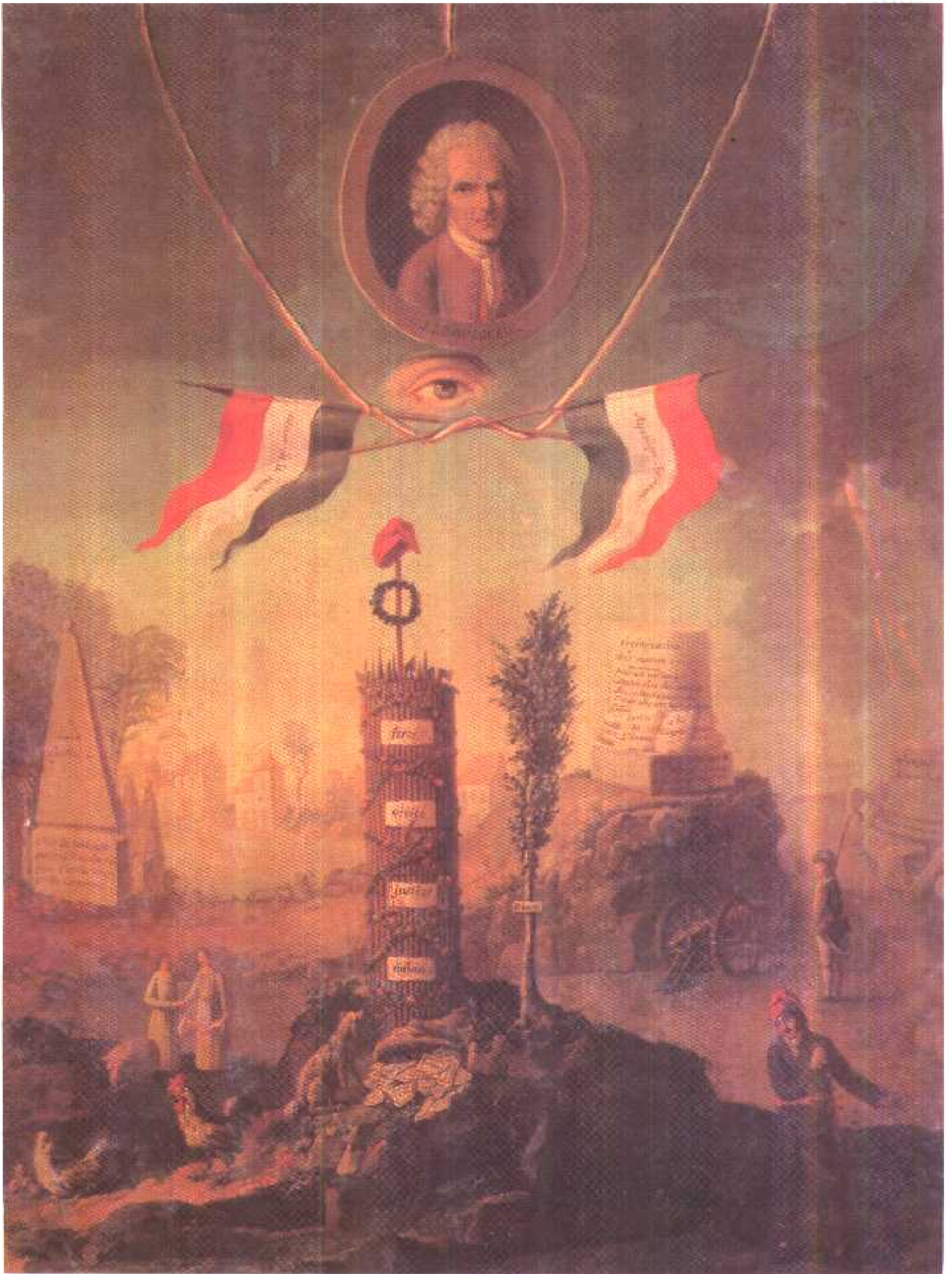


XIII 贺加斯 18 世纪 50 年代画的家中佣仆群像。贺加斯反对所谓庄重的风格以及“吹捧者在各种书中称为‘历史绘画的伟大风格’的东西”，他很乐意从自己生活时代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中汲取对象，让他们的人性自己说话而不加任何虚饰



XIV 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是第一次由一代议制机构正式宣布人民对自己选出的政府享有的权利的文告。约翰·特朗布尔画的是杰斐逊领导的起草委员会(站在他左边的是富兰克林)把这文件递给合众国大陆会议的一刻

XV 德·佐特里画的一幅关于法国革命的寓意画。图中卢梭是革命的精神之父,凌驾于真理之眼和三色旗之上,下面是一个崇尚平等的尖塔,一个颂扬革命美德的纪念碑(捆绑的棍棒和斧子模仿共和制的罗马,顶上插着一顶红帽),一棵自由之树,还有两座只完成了一半的“复兴”圆柱





XVI 歌德 1786—1788 年游历意大利时在坎帕尼亚的肖像，蒂希拜因绘。这次游历是歌德天才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年近 40

XVII 柯勒律治 32 岁时的肖像，诺思科特于 1804 年绘。穆勒称他是当时两个有独创思想的人之一，这一观点在 20 世纪得到证实，不仅他的诗作重新引起人们的欣赏，而且他的批评和哲学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再发现

XVIII 湖区“科尼斯顿瀑布之晨”，特纳于 1798 年所展出的早期风景画之一，该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同时出版了他们的《抒情诗集》。罗斯金认为特纳是所有风景画家中最伟大的，他表现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热衷于人类对自然的反应









XIX 希腊为了从土耳其的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斗争,由于其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独特结合,在西欧激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拜伦 1824 年在米索朗吉致力于组织一支军队时不幸去世,该镇终于陷落,德拉克洛瓦遂作此“在米索朗吉废墟上断气的希腊”寓意画

XX 1848 年以革命之年著称于世。在西西里开始的革命酝酿,把社会不满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散布到欧洲各地。在巴黎,路易·菲利普于 2 月间逊位,但取而代之的共和政府遇到了被称为“六月事件”的工人起义。加贝此画描绘了巴黎革命者 6 月 21 日攻打先贤祠的情况,最后起义被武力镇压





XXI “家庭团聚”，巴齐尔于 1867 年绘。此画所示系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这种家庭是 19 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了每一先锋派作家和革命者的攻击目标。巴齐尔(1841—1870)是雷诺阿、莫奈和马奈的朋友，一个很有前途的画家，在普法战争中阵亡，年尚未满 30

这里是对“现代艺术在人文主义传统中 有无地位”这一问题的四个答复：

XXII 保罗·克利笔下的幻想和智慧的神奇世界：“一位年轻女士的奇遇”(1922)

XXIII 马蒂斯的颜色驾驭：“国王的悲哀”。1952年作此画时，马蒂斯年已过八旬，卧病在床，不能提起画笔；但他仍旧把彩色纸片剪出形状，拼凑成画。他称这是“用剪刀作的画”。这是他在年老体弱之年创造力的最后一次爆发





XXIV 毕加索《门尼那》(1957)系列之一,该系列以不同方式表达传统的主题,此幅是仿贝拉斯克斯 1656 年的同名画。毕加索极为崇拜贝拉斯克斯的这幅画,以此出发,画了它对他引起的整整一系列的超现实主义形象和联想,探索和扩大原作的内涵而一点也没有失去它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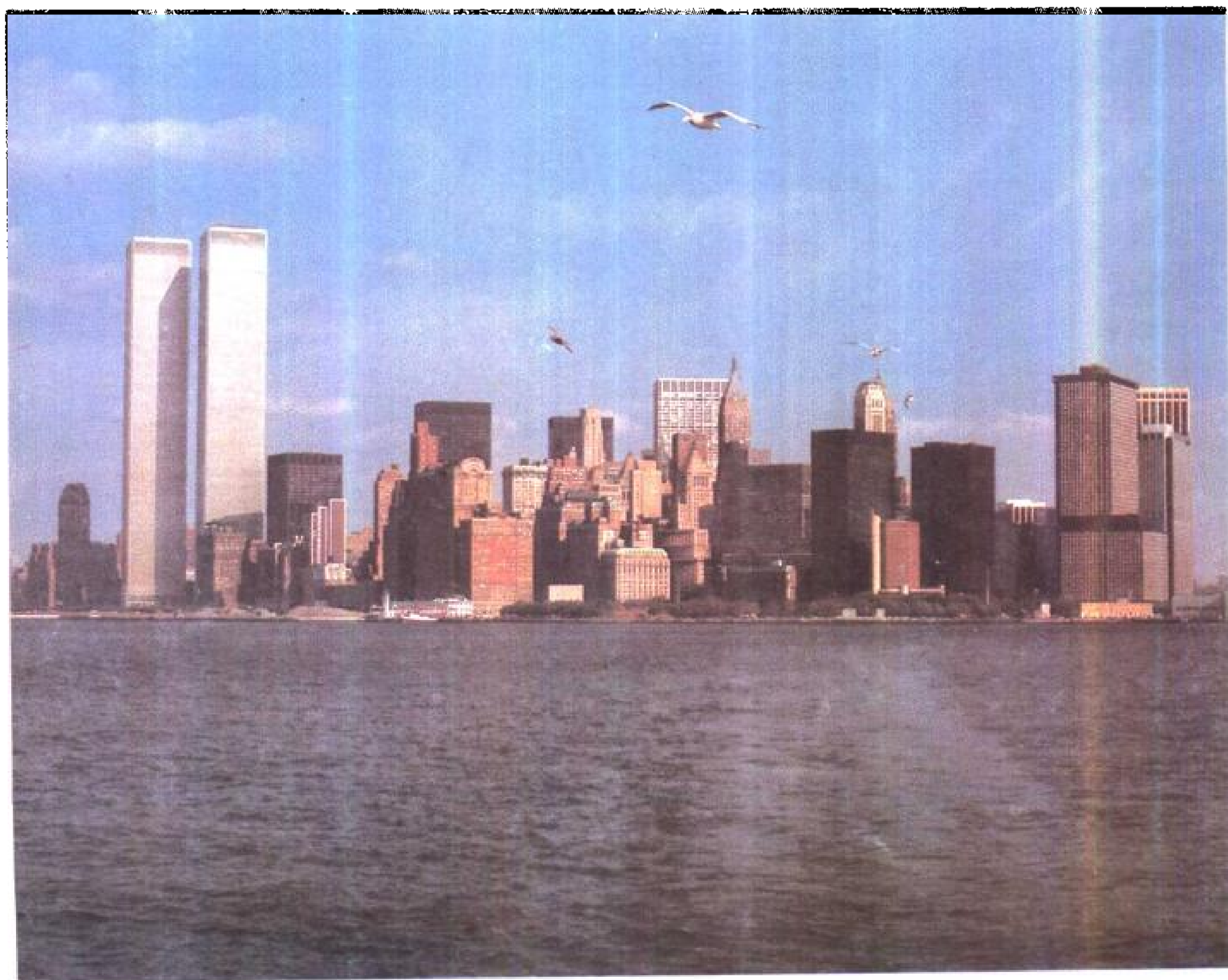
XXV “两个外型(一分为二的圆周)”,芭芭拉·赫普华思作的铜塑。她的雕塑深受她在自然界发现的形状的影响,为强调这种联系,她把这一铜塑与其他 20 多件作品并置于她在圣伊夫所辟的花园中





XXVI 雅克布森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作的设计,于 1964 年落成,其特点为现代形式与牛津一所学院的规模和传统特色的结合

XXVII 纽约——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从海上所见。没有任何别的城市的天际线像纽约那样如此有力地体现了 20 世纪的伟大成就和人的苦难



垄断以后,自己也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同样不允许对它的假定进行检查,也同样不容异见。就是这种偏狭不容的态度,促使穆勒转而反对它,认为它是一种暴政体系。<sup>④</sup>

我和穆勒同样不赞成十九世纪实证主义代表人文主义传统的说法。但是我认为,任何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记载必须把它包括在内,原因有二。一是它所引起的对未来的信心。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观察家如果说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话,那就是,这是区别战前和战后世界的最重要的特点。如果能够在1900年开始的十年里在各工业化国家举行一次民意测验的话,很有理由可以推测,大多数人会表示,他们相信人类在物质上和社会上会继续取得进步。由于经济的异乎寻常的发展,农业社会转变为越来越城市化的社会,白人优越性扩展到全世界,科学应用于对自然的掌握打开了无穷的前景等种种原因,人们的心目中仍旧像着了谜一样坚信这一点。<sup>131</sup>

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那就是进步信念的脆弱性和人文主义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因素的联合冲击下的崩溃所产生的后果。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不仅进步的信念全都丧失了,而且有许多人会出于幻灭的怨懑而把自由主义及其人文主义根源统统抛弃掉,因为它先是鼓舞了他们,后来又叫他们大失所望,因而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

因此我的问题要用另外一种提法。既然我们知道1914年以后的情况,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那日期之前就觉察出有什么迹象说明,人文主义传统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会使它在经历了自由主义的衰落以后仍旧不倒?





## 二十世纪： 走向新的人文主义

### 一

西方文明从十九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并不是像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的那样从 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开始的,而是在这以前,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的。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发现这一点时思想上感到的兴奋。<sup>①</sup>

作为开始的出发点,1883 年很合适,这是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 出版一本题为《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的论文

上(自左至右):易卜生、弗洛伊德、荣格

中(自左至右):斯特拉文斯基、托马斯·曼、马克斯·韦伯

下(自左至右):爱因斯坦、毕加索、罗素

---

\* Georg Brandeis (1842 - 1927), 丹麦文学批评家。31 岁时即出版《十九世纪文学主潮》(1872, 后共出 6 卷), 一鸣惊人, 成为欧洲重要文学批评家。此书对北欧及整个欧洲的作家影响很大。

集的一年。勃兰兑斯用的“现代”一词马上流行起来。它成为在德国、北欧和中欧正在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现代”的含义是什么？赞成还是反对？——的富有号召力的口号。这场辩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延续到二十世纪头十年。在巴黎、伦敦、纽约，“现代”时期开始得晚一些。弗吉尼亚·伍尔夫\* 曾经用夸张笔法很精辟地写道：

在 1910 年 12 月或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人的所有反应都变换了——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母子女之间都变换了。人际关系一变，宗教、行为、政治和文学也发生了变化。<sup>②</sup>

这里的日期是可以讨论的（我的看法是，1910 年未免太晚了一些，而 1900 年开始的十年是激进的年代），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事实问题上是正确的。

勃兰兑斯的书没有被遗忘还有一个原因。其中所收关于易卜生\*\* 的论文是第一篇让这位挪威剧作家为更广大读者所知的文章。没有别的人物更加适宜于开始我的这篇“现代时期”的介绍了。这个时期同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相交叠，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易卜生在今天已被公认是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 1906 年去世，他却是一场争议的风暴中心。使得

---

\*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以富有诗意的象征风格和意识流写作技巧著称，作品有《雅可布的房间》(1922)和《到灯塔去》(1927)等。

\*\* Henrik Ibsen(1828—1906), 挪威剧作家。所创作的写实主义剧本接触到当时社会问题，性格刻画入微，心理冲突深刻。剧本有《玩偶之家》(1879)、《人民公敌》(1882)等。

批评家不高兴但却使年轻人风靡的是,他大胆地把戏剧变成了一个严肃地讨论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并没有包在历史的伪装里,而是取自当代生活,不加评论和解释,通过前所未有的精彩的对白,直接提出来的。易卜生是个道学家,他对世间男男女女自欺欺人的虚伪和幻想,感到义愤填膺。像欧里庇德斯<sup>134</sup>\* 一样,他对时代流行的道德和社会观念提出疑问,揭露言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观众面前展现了他们可以认出——或者愤怒地不肯认出——自己的情景。

但易卜生是一个艺术家,他拒绝做一个先知。他始终拒绝别人把他同任何事业、政党、改革联系起来——包括易卜生主义。他对这种活动没有信仰。“我的天职,”他宣称,“是提出问题,不是作出答复。”

易卜生的艺术在于为了追求真实性而细致入微地观察人物性格和人际关系。没有别的作家曾经创造出比他所创造的更加令人难忘的一系列女性角色,但是在挪威妇女权利协会设宴招待他时,他致答词说:

我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一个社会哲学家,而更多的是一个诗人。我必须婉拒自己曾经作出努力争取女权这一殊荣。我甚至连女权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权问题……当然,要解决妇女问题是件好事;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任务是写人。<sup>③</sup>

---

\* Euripides(公元前 480 或 485—406),希腊剧作家。所作 92 部剧作仅有 17 部悲剧传世。作品特点是,心理剖析深刻,对宗教抱怀疑态度,舞台机关布景从他开始。

正是由于易卜生坚持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独立性,才使他的剧本在一百年后仍有力量对我们说话,但当时许多人需要的是一个给他们带来启示的先知。

有的人认为,他们在弗里德里克·尼采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先知。尼采在1888年之前几乎不为人所知,他也是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一次讲课中引起欧洲读者的注意的。他所以造成轰动是靠他横扫十九世纪文明及其价值观的那种劲头,而不仅仅是质询和怀疑而已。虽然从整体来看,易卜生对人的评价不高,但是他属于人文主义传统,因为他相信个人的人格,个人从苦难中学习和摆脱环境的力量,还因为他对自由所怀抱的热情——不是拥有而是追求自由的热情。而尼采却鄙视人文主义,不管是它的歌德派平衡和克制的古典形式,还是它的功利理性主义版本。

他在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中表现出了他独到的见解,让读者看到希腊文化除了有极受重视的理性的太阳神脸孔以外,在多大的程度上也有人生中阴暗的、非理性的酒神成分。十年以后(在《欢快的科学》中),尼采用他派给自己的角色狂人的话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仍旧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我们,一切凶手中最大的凶手?”<sup>④</sup>除了谴责理性和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以外,他接着谴责基督教的“奴隶道德”。他宣扬用权力意志的主子道德来代替这一切。

135 尼采所以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是由于他能够把十九世纪末期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心中要与那个过分有组织和过分理性化的文明决裂的冲动,要让本能和感情超越理智的冲动,用言词表达出来。他本人尽管后来不久就发狂,余生就此虚度(1889—



尼 采

1900),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弱他这一见解的力量:人类已达到了一切价值观都必须重新确定的极限了。

尼采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所激起的对非理性的着迷,在多种不同形式中得到了表现: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索莱尔的暴力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梦境的探索引起的反应,以波德莱尔开始,魏尔伦、斯蒂芬·格奥尔格、

---

\* Henri Bergson (1859 - 1941), 法国哲学家。认为存在是生命力量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一场斗争,人通过智力认识物质,而通过直觉认识生命力量。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时间和自由意志》(1889)、《创造性进化》(1907)。

里尔克\*以继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崇拜,热衷于进行各种试验——没有任何限度,被兰波\*\*称为是“一种感官的混乱”。

这样一种方向的变化对人文主义传统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因为人文主义传统在反对过分依赖理性而提出要发挥想象力的要求的时候,曾经认识到需要用精神的客观性来制约主观性。

如果我选择 1849 年出生的斯特林堡\*\*\*作为这一变化的代表,这是因为,他虽然死于 1912 年,但似乎异乎寻常地倾向于——并且预示着——战后世界的感情。他曾经热烈地欢迎尼采的打破偶像。尼采于 1888 年 12 月写信给他说,他(尼采)如今感到有力量“把人类历史一劈为二”,斯特林堡对于自己站在分水岭的哪一边是没有疑问的。他受到强烈的要分裂一切的冲动的刺激,要分裂事件,分裂意识,分裂性格。他在同年(1888)出版的剧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写到他所创造的角色:

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里,无论如何比以前时代更加强烈地歇斯底里,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

---

\* Paul Verlaine (1844 - 1896), 法国诗人。象征派创始人之一,诗作独具一格,富有音乐性。Stefan George (1868 - 1933), 德国诗人。受法国象征派影响。Rainer Rilke (1875 - 1926), 奥地利 - 德国抒情诗人。诗作有神秘色彩,以死亡为主题。

\*\* Arthur Rimbaud (1854 - 1891), 法国诗人。诗作风格独创,富有想象力和梦境感觉。散文诗开超现实主义先河。

\*\*\* August Strindberg (1849 - 1912), 瑞典小说家、剧作家。开始写剧本按易卜生传统,偏重社会评论,后转为两性关系的冲突。剧作有《父亲》(1887)、《裘莉小姐》(1888)和《债主》(1888)等。



克罗格画斯特林堡像。易卜生购来挂在他书房墙上

灵魂中一样。<sup>⑤</sup>

斯特林堡思想广博，很少有什么人类意识或活动没有被他探索过：他的瑞典文全集共达五十五卷，他的气质“按阶段分是激进的、反偶像的、怀疑的、神秘的和虔诚的。”他的一生曲折离奇，三次婚姻，无一圆满。他本人的“地狱”危机其实是一场精神崩溃，但是他自身因此熟悉了地狱的深广，在后来像《鬼魂奏鸣曲》(1907)那样的剧本中加以利用。

斯特林堡对易卜生和他的成功越来越不以为然。年纪大的

那一位却承认这个瑞典人有“很大的才华”。他对一位来访者<sup>137</sup>说,他读《地狱》时“极受震动”。但是,易卜生虽然像任何一个曾经写作过的人一样了解在人的内心中活动的非理性力量(他成为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作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却同弗洛伊德一样不主张让这种力量在自己的生活中为所欲为。他不信任斯特林堡的不稳定行为和见解,买了一幅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绘的斯特林堡肖像(他称之为“疯狂的露头”)挂在他的书房里。“让那疯子瞪着我。”他说,这能帮助他工作,“他是我的死敌,应该挂在那里,看着我写作。”<sup>⑥</sup>

斯特林堡到了1914年才确定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当时他找到了战后传统价值观的混乱和破产所造就的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他的读者和观众。接着他以“一望而知完全是现代的一种病症的一个先知般的亲密化身”出现。<sup>⑦</sup>在我的主题中,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因此可以当作二十世纪人文主义危机的报信者。这危机同十六世纪宗教战争的危机一样严重,当时那个不知有理性和人道的世界冷然拒绝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 二

你们想必已经注意到,我用了“现代时期”这一词,而不是“现代运动”。我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切要总结它的特点,或者用一个公式来限定它的尝试都是不成功的。对于这个时期异乎寻常地多样化的艺术、思想和文学,你能说的唯一一点是,它们都是“现代的”,就此而已,没有更多的了。不过作为标记,这很



有意思,因为它指出了普遍都有的当代感觉,那就是当时活着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他们的经验是独特的,与过去相连的连续性被打断了,他们得自己来找出新的价值观和表现形式。总而言之,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新的意识,是看待人类和世界的新方式,是一种以前没有先例的人类精神的状态。如今它是否依然使人感到如此,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有疑问,这是当时许多最有创造性的人们怀着热烈的信念所持有的看法,而且,它在科学、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发起了一阵令人瞩目的创新大爆炸。

要说清楚这个时期,更不用说总结它的特点,困难在于要摆好不同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马尔康姆·布雷德莱和詹姆斯·麦克法兰总结他们自己的尝试说:

总而言之,现代主义在大多数国家是未来主义和虚无主义、革命和保守、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 138 异乎寻常的混合。它庆贺技术时代,同时又谴责技术时代,它兴奋地接受旧文化体系已经死亡的看法,同时又在那种恐惧面前深感绝望……<sup>⑧</sup>

他们又补充说:“这一异乎寻常的混合〔他们在文章别的地方称为“两面的”〕一直持续到战后,而且肯定一直到1930年。”

我在本章开始时就曾经强调这一混合中那些表现出异化和无连续性,以非理性、分裂化和经常绝望的世界观来代替理性、秩序和乐观情绪的因素。

这些因素是“现代”意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我们对之印象特别深刻,原

因有二。一是“现代派的震撼”，这个令人不安的对创新的热烈追求曾经使得许多人——至今仍使有些人——一古脑儿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现代思想、现代艺术和建筑、现代文学和音乐，认为这些东西标志西方文明在混乱中的崩溃。二是，把现代时期看成是虚无主义开始的观点，似乎已被接着而来的那个时代的欧洲经验所证实了。那个时代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时代。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完全从这个观点，或者甚至只是主要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时期，是容易令人误解的，原因又有二。一是，这种观点压缩了历史，忽视了这个事实：晚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住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人，或者并不怀有，或者拒绝怀有那些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前途的人所怀有的危机感和绝望感。二是，头晕眼花的感觉，你脚下的大地在崩裂的感觉，尽管在这个时期始终可以找到，但是却被另外一种看到新的前景的开辟而感到的兴奋情绪所抵销了。不少原来是肯定无疑而今受到怀疑的事情本身就是空洞的，属于马修·阿诺德所说的“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而阿诺德的另外一个世界不再是“无力诞生”而是正在诞生的新世界。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可以适用“新的前景”一词的话，那就是物理学的革命。在伦琴\* 发现 X 光以及居里夫妇\*\* 发现镭以后，这场革命以普朗克\*\*\* 1900 年提出的量子理论开始。到

---

\* Wilhelm Roentgen(1845—1923)，德国物理学家。X 光的发现者，曾得 190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Pierre Curie(1859—1906)和 Marie Curie(1867—1934)，法国物理学家。镭的发现者，1903 年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Max Planck(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提出量子理论，开始现代物理学，得 19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15年,这场革命已经产生了鲁瑟福和玻尔\*的原子结构新模式和爱因斯坦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相对论理论。

随着波尔提出“互补性”概念和海森堡\*\* 1927年阐述“测不准原理”,对发现和思想本身的特殊兴趣仍继续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事情可以同这场革命相比,它持续不断地表明,当理性与想像力在它们达到顶峰的时候相互结合,可以做出什么奇迹来。这种结果是大大超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老套的。 139

但是,一场在规模上可以与以牛顿为最高峰的科学革命相比的科学革命的含意又是什么呢?当科学家们听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则被贬为相对主义的同义词和否认一切客观真理,或者海森堡的测不准原则被庸俗化为反对决定论的自由意志,他们因此感到不快是完全有理由的。同样,外行人要知道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其重要性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这种本能要求也没有错。前一代凯尔文和克勒克-马克斯威尔\*\*\*的工作似乎已使人可以看到实际宇宙的一个全面统一的图像。如果说这如今也成了问题的话,那么实证主义的唯物

---

\* 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发现阿尔法、培他、伽玛放射,首先实现人为核反应。得19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Niles Bohr (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提出“互补性原理”,后曾参加美原子弹工程。得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发现“测不准原理”,把偶然因素带到现代物理学领域,从而削弱了因果关系的观点。得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William Kelvin (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曾发明凯尔文温度计以及其他不少实际发明。

James Clerk - Maxwell (1831—1879),苏格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在数学基础上发展了电磁理论。磁通量单位以其名命名。

宇宙观又会怎样呢？这种宇宙观不是建筑在大家都认为是最可靠的科学思想成就上的吗？

西方文明虽然通过技术把科学应用到自己的问题上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处，但是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科学的威望以及西方社会对科学的依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比较有哲学头脑的人来说，包括那些科学家，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仍旧是，古典物理学提出的宇宙统一图像是否会被一个新的统一模式所取代？就像爱因斯坦本人所相信而没有实现的。或者，奥地利科学家恩斯特·马赫\*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说，科学是一种实际活动，科学规律和概念的作用不是代表现实，而是为科学家工作需要提供一个必要的然而假设的框架，他这么说是否证明是对的？科学规律和概念不应当被树立为绝对的东西，那是形而上学犯的 error，要将之当作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对的或错的东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打开了科学与人类其他形式的了解经验的探索之间的对话，后者有诸如艺术和人文学等，而其在马赫自己的时代里是受到教条式的实证主义所排斥的。

我以后再来说明，我为什么认为这样的对话对于二十世纪版本的人文主义的发展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在目前先让我来继续考察一下另外一种不同的新出发点，以政治和社会研究开始。

---

\* Ernst Mach (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专门研究气流，空气中音速单位以其名命名。

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以主张自由放任的名义,对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增长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上进行的干预,提出了反对。就在这 1890 到 1914 年之间的同一时期里,新一代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携起手来,与这种反对意见作出了最后的决裂。到 1914 年,俾斯麦的德国早先在实行国民保险方面的创举已推广到了西方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例如 1906—1916 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立法,包括其中的医疗保险、工伤抚恤以及养老金等条款,反映了——虽然远远没有满足——格拉姆·瓦拉斯、哈蒙德夫妇、霍布豪斯、霍勃逊和费边派\* 所宣传的新激进主义。<sup>⑨</sup> 尽管他们各有不同。这反过来又导致唐尼\*\* 在他的《贪得无厌的社会》(1921)中提出的主张实行社会

---

\* Graham Wallas(1858—1932),英国政治学家。费边社成员,以对政治进行心理分析著称,著有《伟大的社会》(1914)。

The Hammonds,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

L. T. Hobhouse,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

John A. Hobson (1870—1937),英国经济学家。曾批评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理论应指导社会改革。著有《帝国主义》(1902)等。

The Fabians,费边派。英国著名“费边社”社员的统称。1884 年英国一些社会主义者如萧伯纳、韦伯夫妇等组织费边社,主张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因此以罗马帝国执政官费边命名,因后者在与汉尼拔作战时以采取缓进战术著称。

\*\* R. H. Tawney(1880—1962),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贪得无厌的社会》(1921)和《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

主义的道德论据——这本书对英国工党思想比马克思更有影响——和三十年代经济政策中的凯恩斯\* 革命,以及1942年贝佛里奇\*\* 战时报告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的福利国家制度。

由此而开始的二十世纪政治新议程,给予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优先的地位,而这个新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学的发展才产生的。对社会作有系统的研究,当初是由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奠定基础,又由马克思给它添上了自己的新维度。这种社会研究由于它所提出的那种问题和建议,引起了许许多多偏见和歧视。对社会学为什么有这样挑剔的态度(正如后来对它又不加批判地接受一样),是有许多原因的,足可为思想史和社会史写上颇能吸引人的一章。但是,不应该为了这些偏见而忽视这个事实:任何以调查和了解人是如何适应现代工业化社会不断改变的新情况为其目标的研究,都有充分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可能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愿意这么说,有的社会学家甚至可能予以驳斥。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有方法和目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毫不怀疑,社会学与人文学的相互分家,特别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分家,只有造成相互贫乏化的结果。

我认为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是天生相辅相成的。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不妨举一下我目前所讨论的这一创造性时期(即本世纪早期)社会学家所形成的而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老

---

\*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原来是信奉自由经济的古典派,经历大萧条后终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促进就业。著有《就业、利息和货币总论》(1935)等。

\*\* 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 英国经济学家。1942年为政府草拟报告,主张全面实行社会保险,该报告后成为英国实行福利国家措施的基础。

生常谈的一些见解和概念。其中有非理性成分(意外、偏见、习俗)<sup>141</sup>,已由格拉姆·瓦拉斯在《政治中的人的本性》(1908)中予以指出;还有意大利人巴莱托和莫斯卡\* 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发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精英——不论其权力是正当的还是隐藏的——与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的区别,而精英的循环这个补充性概念又导致巴莱托把历史称为“贵族政体的坟场”。德国社会学家费尔迪南德·土尼斯\*\* 对 Gemeinschaft(由民间风俗和宗教治理的自然群体)与 Gesellschaft(由法律和契约所体现的理性安排治理的社会)所作的比较,已像精英一词一样,成为知识界流行的名词,同样流行的还有美国人陶尔斯廷·费伯伦\*\*\* 在其《有关阶级理论》(1899)中所创造的“摆阔性消费”概念。

现代社会学形成时期的两个领袖人物对社会学方法和目标采取了十分不同的观点。爱弥尔·杜克海姆\*\*\*\* 按照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对历史表现出不信任,而偏向于以定义和分析来

---

\* 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数学应用于经济理论,企图区分社会行动中理性与非理性成分以及统治精英集团的循环兴衰。著有《思想与社会》(1916)。

Gaetano Mosca (1858-1941), 意大利法学家、政治学家。所著《政治学基础》(1896)提出任何社会皆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看法,曾被认为为法西斯主义提供理论依据。

\*\* Ferdinand Toennies (1855-1936), 德国社会理论家。从事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和国家兴起的研究,著有《群体和社会》(1887)。

\*\*\* 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批评家。所著《有闲阶级理论》(1899)无情声讨大企业文明及其价值观,后又著有《大企业理论》(1904)。

\*\*\*\*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法国社会学家。与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两人虽属同一时代,各自主办理论刊物,但因思想体系不同,从未有过学术交往。他的主要观点为人类社会研究可以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围遍及原始宗教、人口密度、社会分工、道德教育和自杀等。著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社会学方法规则》(1895)等。

进行研究。而马克斯·韦伯则按照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对定义表现出不信任,偏向于根据历史情况来进行理论探讨。

两位社会学家都对宗教研究有兴趣。杜克海姆对宗教的内容,对超自然或个人经验的信仰,不如对宗教的社会作用那样有兴趣。他认为后者起源于图腾崇拜。他认为社会是一种道德秩序,它的核心是一整套价值观,一种“集体意识”,宗教不过是其象征性的表现,它的作用是保持神圣与亵渎之间的界线。

杜克海姆脱离社会发展的历史观点,提出有两种方式的社会休戚一致性。第一种是“机械的”(此词的这种用法与我们在十九世纪早期遇到的极其不同),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没有什么分工,人们接受共同的行为准则。第二种是“有机的”(这又是一种极其不同于寻常的用法),人的职能开始专门化,工作场所,而不再是家庭,成了依附的中心,“良心集体”有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产生了混乱状态。杜克海姆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病症,表现在劳资阶级冲突这样的征候之中。如果宗教不能再起它的维持共同道德准则的传统作用,那么就需要创造一种代替的东西,杜克海姆指望道德教育和公民精神能够以一整套有关共同人性的价值观形式产生这个代替的东西。他反对英国社会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种种假设,认为社会先于个人存在,社会的因素不能降为心理的因素。这一论点他已在有关自杀的研究(1897)中予以说明。由此可见他的上述观点的重要性。

韦伯的截然不同的兴趣,使他去从事历史上著名宗教的比较研究,例如印度和中国的宗教,古代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想由此在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得到发展而不是在亚洲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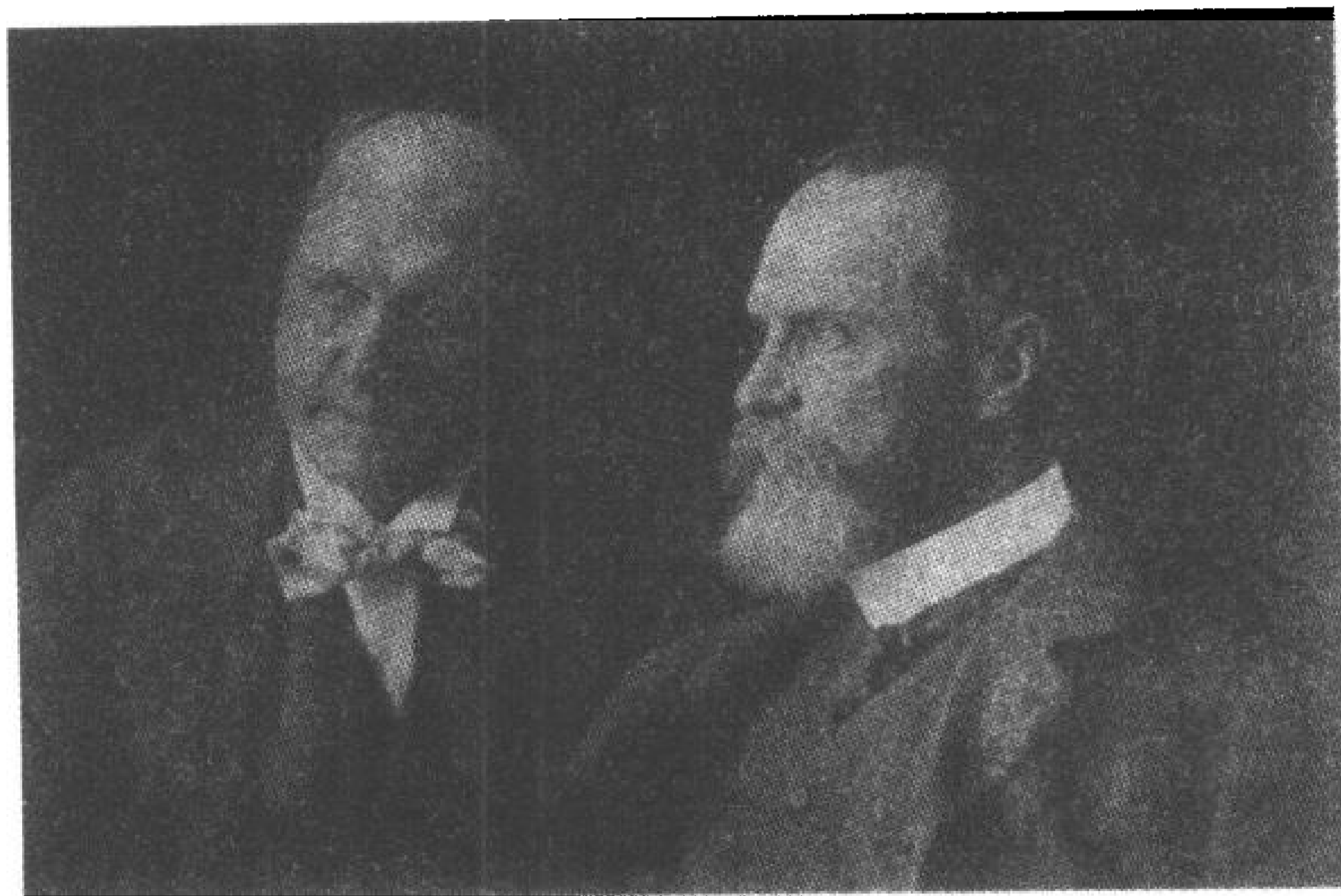
的其他地方得到发展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得到一些启示。他的答案是“新教伦理”，就此他写了他那本最有名的著作，<sup>⑩</sup>认为在社会发展中，作为强有力的影响，宗教因素也许可以同经济因素互争短长。这是个具体例子，足以证明他总的论点：人类行为太丰富和复杂了，不能用任何单个因素来解释，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从唯物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人类行为需要一种比较多元化的观点来看待多种思想——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与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互渗透。

韦伯认为理性化日益加强的趋向是现代社会的具有毁灭性的特点，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有现象，具体来说，他认为就是“官僚主义的铁的规律”和（借用席勒的话）*Entzauberung*，即从宇宙和人类生活中驱除掉魔术。

作为杜克海姆实证主义观点的对立面，韦伯坚持认为，个人赋予自己的活动的意义是了解这些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进一步超越了他所受的狄尔泰和里克特\*的历史主义的教育，认为应用比较的方法和“理想型式”的概念，也可以树立偶然—实用的或一般的解释。关于“理想型式”的一个例子是，他把传统的、理性—法律的、个人魅力的三种权威作了区分。这种要想把相反的观点拉在一起的愿望（使人想起了后期的穆勒）反映在韦伯的下面一个论点：在研究社会和澄清必须作出的选择时，把科学的客观态度同人在这方面的抉择反映了他们的主观价值倾向这个认识结合起来，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

\* 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创始人之一。反对狄尔泰的思想科学一说，另创文化科学，强调历史调查的客观性。



亨利(左)和威廉·詹姆斯兄弟,1905年摄

事实上,杜克海姆和韦伯代表了我在关于十九世纪一讲中所指出的那两个都自称代表人文主义传统的观点:一个是实证理性科学的观点,竭力要维持它超脱于历史学和人文学的主观混乱之外的独立性,另一个则想方设法要把它们结合起来。

## 四

如今不仅人类社会,就是个人的人性,也是用新的眼光来

加以审视了。十九世纪心理学,在达尔文之后,同生理学和精神活动过程的身体基础的试验性调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T. 143 H. 赫胥黎,那个伟大的普及者在1872年说的一句话,总结了作为这一切基础的假设前提:“我们都是自觉的自动机器人”,他又继续说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化的解释。“即使野兽的意识也会显得与他们身体的机制有关系,成为这种机制的运行的一个附带产物……而适用于野兽的论证对人类也适用。”<sup>①</sup>

不论后起之秀——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荣格、艾德勒\*——可能有什么分歧,但是他们都一致反对这一观点,坚持认为意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实际运作,或者用这来“解释”。

威廉·詹姆斯是亨利·詹姆斯\*\*的哥哥,他在哈佛大学从事试验性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长达二十年之久,1890年在获得医生资格后,出版了《心理学原理》一书,至今犹被视为之典工作。他的目标是“按实际经历的情况”调查和记述思想和感情。当然,发生这些思想和感情的实际环境所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是它们与之共处的空间和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知道”的。但是詹姆斯不愿意说明是在什么意义上,他只是<sup>144</sup>对柏拉图以来的关于精神的理论作了一番精彩的检查,以此来说明,解释这些理论与实际世界关系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联想主义的,还是进化主义的——所产生的

---

\* Alfred Adler (1870—1937),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创个人心理学派,认为自卑感是一切个人困难的原因,需要表现自己或权力来得到补偿。

\*\* Henry James (1843—1916), 美国小说家。后移居英国入籍。美国文学史上主要作家之一,作品主题一般皆以美国式的单纯与欧洲的老于世故作对比。著有《美国人》(1877)、《女士画像》(1881)、《大使们》(1903)等。

意义如何模糊了心理观察,并且为了要符合预定模式而加以歪曲。詹姆斯摆脱了形而上学的考虑,从“我们实际感受到的意识”出发,着手说明在智力、感情、习惯、记忆的被人疏忽的方面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东西,他称之为“意识流”的潜流是极其丰富和细腻的。这是一种过程,不是实质,是不能用它自己以外的语言来“解释”的一种功能。詹姆斯把观察和论证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对自从洛克以来左右英国经验主义思想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观点和自从笛卡儿以来已成为心理学金科玉律的“知者与被知者”二元论——即思想复制外界事物——提出了挑战。

在我看来,威廉·詹姆斯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机智泼辣的文风,他的朋友皮尔士\* 认为不宜于讨论严肃的哲学问题。实用主义一词就是詹姆斯从皮尔士那里借用过来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名词当初本是他用来作为他死前四年出版的演讲集书名的,后来却成了他作为讲究实际的人的哲学家的标签,而且被开玩笑地仿效,把他对真理的测验归结为没有耐心的美国人的一句常问的话“这灵不灵?”<sup>⑩</sup>

詹姆斯有一部作品从来没有丧失过吸引力,那就是《各类宗教经验》,这是1901—1902年他在爱丁堡讲学时的讲稿。这些讲稿不仅表现了他在探索弗洛伊德斥之为有害幻觉而不屑一顾的现象时所具有的心理洞察力,而且极其令人注目地说明了他的“在任何思想——不论是宗教的思想,还是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所造成的后果中寻求那个思想的意义和价值要采取实际的态度”这话是什么意思。伯特朗·罗素曾经说,如果

---

\* C.S. Peirce (1839 - 1914), 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在数学和逻辑方面甚有研究。著有《皮尔士选集》共8卷(1931 - 1958)。

詹姆斯是对的话，“理论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解谜的答案，”这句尖酸的话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这正是詹姆斯所信奉的新物理学中一种科学理论的作用，而且照 A. N. 怀特海德\* 的看法，是一种非常值得辩护的观点。

詹姆斯拒绝接受有一种现成的“现实”的想法，这种“现实”完全脱离永恒，独立于人的思想。詹姆斯把这种想法斥为哲学偶像。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永远在形成的过程，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弗洛伊德则不存在受到低估的问题。他的工作以 1900 年的《圆梦》开始，此书使他有理由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创见、肯定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不论在创见或者影响方面，他显然与达尔文有类似之处。这两位都提出了当时并不成熟的看法——一个是进化，另一个是无意识——并把这些看法变成一种革命性<sup>145</sup>新观念的核心思想，在达尔文是生物学，在弗洛伊德是心理学。他们的异乎寻常的影响也同样深远。达尔文提出他的理论以后，开始时曾经受到强烈的怀疑，但是最后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他不仅证明了人是猿的后代，而且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存斗争是普遍的进化规律。在弗洛伊德方面，开始时他也遭到了人们有力的抵制，但是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信念，认为他科学地证实，不快活是神经官能症，而这则是性抑压所引起的；因此，男人或女人若要快活，他们的性本能必须不加压制地任其发挥。

---

\* A. N. Whitehead (1861 - 1947),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对数理逻辑、形而上学贡献甚大，后期形成有机体哲学，把物质、空间、时间相联。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1910—1913)，其他著作有《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等。

弗洛伊德对我们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所以有这样独一无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被庸俗化了,但是这一事实并无损于他所取得的成就。人们普遍认为,他对无意识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的本性的看法。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他的这一成就,由于他为了要向所有禁忌中最根深蒂固的禁忌——即不许公开讨论两性问题——提出挑战,必须克服种种反对和侮蔑,而显得更加了不起了。

但是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有他的地位吗?如果他拒绝接受精神状态的生理解释,他当然可以称之为一个决定论者,他的无意识的模型及其与有意识精神的关系是机械的,并且是基于对性本能(后来他又加上了一个原始的侵略本能)首要性的信念,对此他以教条似的坚韧不拔的态度作了辩护。弗洛伊德对人类并无好感,他认为人类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动物,却用理性来欺骗自己对本性的认识,办法是用巧妙的说理,或者浸沉于宗教信仰这种幻觉中。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弗洛伊德并没有为非理性辩护,也没有像尼采那样歌颂非理性。相反,他并不满足于说明无意识并不遵循一般的逻辑规则,而是应用他自己的理性力量企图界定无意识自己的特殊逻辑在活动时所依据的奇怪规则。弗洛伊德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据他自己说,他并不欢迎他在分析自己和分析他的父母时得出的结论,比如婴儿性冲动和恋母情结,相反,他是竭力抵制的,只是逼着自己才接受这些结论的。他把自己看成是在一个潜藏的令人吃惊的世界中进行探索的孤独探险家,只有抱着人文主义的信念才有勇气继续下去,这个信念就是,只有增加了知识,特别是认识自己的知识(“自知”),才能使人得到自由。如果

说他坚持用实证理性态度只相信事实，而对一切哲学上的先入之见和解释敬而远之，那是因为，他像威廉·詹姆斯一样相信，只有坚持“实际经历的无意识”（用詹姆斯的话），他才能保持脚下“现实”的地面坚实，而不致于迷失在例如宗教和艺术这样的“幻觉”的迷雾中。他相信，人类只有丢掉这种幻觉，认识到理性手段难免的局限性，那脆弱然而不可缺少的理性手段才能发挥作用。

在1915年夏天写给美国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的信中，弗洛伊德自称是一个极其讲道德的人，接受现代文明的伦理准则，不加任何怀疑，除了有关现代性行为部分的伦理准则以外。“社会以其最极端的方式加以界定的性道德，在我看来是非常可鄙的。我主张自由得多的无法相比的性生活，虽然我本人很少利用这种自由：只是在我认为可以允许的程度之内。”<sup>⑬</sup>根据海因斯·哈特曼的说法，弗洛伊德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重新估价者——也就是说，他不是要向世人鼓吹新的道德价值观标准。”<sup>⑭</sup>弗洛伊德是个道德家，他要让人们卸掉性罪感和伪善的负担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使得他们的价值观更加有效。他写道，“经验教导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极限，超过这一极限，他们的天性就无法适应文化的要求。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到比他们的天性所能允许的更加高尚，就会患上神经官能症。”<sup>⑮</sup>

在某些人看来，弗洛伊德所倡导的性革命也许走得太远了，几乎到了放纵的地步。但是对于那些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性生活的黑暗、窒息、不快的世界有深入了解的人来说，这个变化尽管有过分的地方，仍毫无疑问是一种解放，尤其是对妇女。弗洛伊德本人对人类前途并不乐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形成了死亡本能（即死神与爱神进行生死搏斗）这个概念

之后。他在《文明及其不满者》(1930)中写道,他充分了解那些认为“整个[文明的]努力不值得费神”的批评家。但是他看不到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文明加在人类本能生活上的牺牲和加在人类侵略本能上的限制。人类如果要生存的话,就会有这种侵略本能。彼得·盖伊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

弗洛伊德没有任何胃口颂扬非理性力量,对于完全抛弃文明而逃避文明的辩证法的原始主义也是如此……他还没有堕落到人性的阴沟里去,浸沉于在那里找到的东西里面。他不是“本能冲动”的信奉者;他对那个盲目、自大的意志力量并不给予特殊地位,而重视“自我”的有组织能力的理性,或者超自我的抑制,把它们看成是同样自然的。<sup>⑩</sup>

我已经说过,弗洛伊德认为有必要相信,他是一个只同事实打交道的科学家,但是,正是科学家们对他的理论表示了极大的保留。他们的看法可以用牛津大学一位心理学家 B. A. 法莱尔的话来概括。法莱尔承认,弗洛伊德的工作“彻底改变了西方对人性的一般看法(正如马克思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但是他又说,“弗洛伊德的理论贡献还不能算得上是科学”,而且,“他是否真的是人类精神方面的达尔文,还是只不过像托勒密或梅斯麦\* 那样的一个人,只是把我们引到一个令人感兴趣和重要的死胡同”,则还是个未决的问题。<sup>⑪</sup>但是相对地来说,他的思想,即使是在最没有根据地进行猜测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作家和

---

\* Franz Mesmer (1734—1815), 德国医生。现代暗示疗法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在1784年已告破产,但开了催眠术的先河。



艺术家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里昂纳尔·特里林\* 在四十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弗洛伊德和文学”<sup>⑧</sup>中就指出，“心理分析是十九世纪浪漫文学的高峰之一”，他并提到弗洛伊德在他七十岁生日庆祝会上被称为“无意识发现者”时的反应。弗洛伊德拒绝了这一称呼，他说：“在我之前已有诗人和哲学家发现了无意识。我所发现的只不过是研究无意识的科学方法。”

特里林继续说，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按照“不合逻辑的逻辑”方式运行的，如果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不合逻辑的逻辑”，例如，它对显然互不相容的思想和意象的联想，它偏爱具体胜过一般，偏爱可以触摸到的琐细事物胜过笼统的抽象，偏爱暧昧的东西胜过精确的东西——这就说明了诗人和艺术家所能马上认出来的东西。许多诗歌和绘画，特别是非表象性艺术，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他最后说，在所有的精神体系中，弗洛伊德的体系是“使得诗歌与精神的天性浑为一体”的体系，而且它不但没有为艺术家缩小和简化人性的天地而限制创造能力，反而打开了这个天地，并且使它更加复杂化。总而言之，不论弗洛伊德最后在科学史上会据有什么地位，他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则由于他的思想与文学和艺术的亲近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而有保证的。

后来的历史加强了我的信念：对弗洛伊德的工作，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论弗洛伊德自己是怎样想的。因为早在弗洛伊德和艾德勒分道扬镳的时候（1911年）和后来同荣格发生那场著名的争吵的时候（1913年），就已经很清楚，完全有可能把

---

\* Lionel Trilling (1905—1975), 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自由的想像》(1950)、《逃犯的聚会》(1956)等。

弗洛伊德在表现无意识的重要性和指明通过梦境来探索无意识这一捷径(荣格是这么叫的)方面的伟大成就,与用病人的婴儿时性冲动来解释一切梦境或幻想,或者假定精神的创造精力完全是属于性本能的这种需要区别开来。

阿尔弗雷德·艾德勒认为人的侵略本能的关键是为了要补偿自卑感,而且他把性看作是表现支配能力的机会。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则走另外一条道路。他一方面同意,歇斯底里型  
148 神经官能症一般都同性紊乱有关,但是他在更加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经验使他相信,这种失调起因于一种更加一般的与外界现实的不适应,而不是具体在性方面的与外界现实的不适应。由于他从事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他开始探索人人都有精神下层的这个想法,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潜伏在个人心底,是自发产生神话、幻象、某些种类的梦境和宗教思想的基础,荣格证明这都是可以在一些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找到的。

这种原始形象或典范的一个例子就是每一种神话中以不同面目出现的“英雄”。<sup>⑨</sup>荣格对神话功能的调查结果使得他能够指出,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以外,在任何时代中,人们都在某种形式的宗教和神话中找到了他们生命的意义。他的调查结果也使他能够争辩说,今天所以有许多人都有一事无成感,是因为他们虽然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信念,他们仍需要一个宗教或神话作为他们生活的依据,但是却不能再找到。因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类,作为代替品,就具有了吸引力,像拉斯塔法里安派\* 那样的教派就到处林立。

---

\* 拉斯塔法里安是当时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原名,后成为西印度群岛黑人民族主义派别的名称,特别是在牙买加,他们把塞拉西奉为神明。

弗洛伊德集中精力要回过头来在一些早期历史中寻找心理症状的根源,而荣格却终于在一些病人提出的许多心理材料中,看到了一种向前看的企图,要无意识方面为有意识精神方面的片面、不平衡态度作出补偿。由此,荣格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内心世界和它的意象,弗洛伊德认为是产生自婴儿时期的经验,而且妨碍接受现实的,实际上却可能是人们从中取得适应外部世界的手段的来源,不论这是采取宗教、文化、艺术、还是科学的形式。

荣格特别有兴趣于那些少年得志但到了中年却为一事无成感和缺乏人生意义而丧气的人的问题。他相信,只有承认和接受某个高过自我的权威和目的,找到自己的“神话”,人们才能克服他们的内心冲突,达到他所说的“个别化”,即实现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自我。

荣格在自己家的门上刻了一句拉丁文的神谕,意为“不论是否祈求,上帝总会在场”。宗教的心理功能,不论其内容如何,对荣格来说,其重要性不下于杜克海姆心目中它的社会功能。他花了不少时间搜集各种不同的神秘材料,从诺斯底派和炼金术士到中国的沉思默想的修道经典《太乙金华宗旨》。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进行的同一精神追求,也就是寻找某种超过自己的东西,荣格认为这是人类一旦达到成熟以后的主要特点和需要。

149

荣格从来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吸引过大众的兴趣,他文章的凝重晦涩的文风,同弗洛伊德的明快相比,也使人不容易读懂。批评他的人指责他有神秘主义、含糊不清、伪科学倾向。为他辩护的人则声称,他对无意识提出了一个更加没有偏见的解释,不受弗洛伊德的教条的约束,又以自己关于集体无意识的探索作了宝贵的补充。我认为这两位的人文主义传统中都

有自己的地位,主要是我们个人的气质和经验决定我们受到其中哪一位更大的吸引。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无意识的发现当然是弗洛伊德的功劳,但是,承认无意识的重要性,同应该着重强调无意识中哪一个成分这个问题上存在不止一个观点,并不相矛盾——这个结论在讨论一个其最明显的特点是暧昧模糊的内心世界时,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 五

当弗洛伊德和荣格在探索无意识的时候,又有新的一代艺术家崛起,造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视觉艺术方面最蔚为奇观的创新浪潮,那就是巴黎的野兽派和立体派,德国的桥派和蓝骑士派。在那些年代里,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有着同样杰出的才能和对试验的专注。画家,只提其中最伟大的,有后期的塞尚(他于1906年去世)、毕加索、布拉克、马蒂斯、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克利、门奇、莱格\*。建筑师有阿道夫·鲁斯、弗兰克·洛埃德·赖特、勒科布齐埃、格鲁庇护斯、密斯·

---

\* Georges Braque (1882—1963), 法国立体派画家\*。

Henri - Emile - Benoît Matisse (1869—1954), 法国野兽派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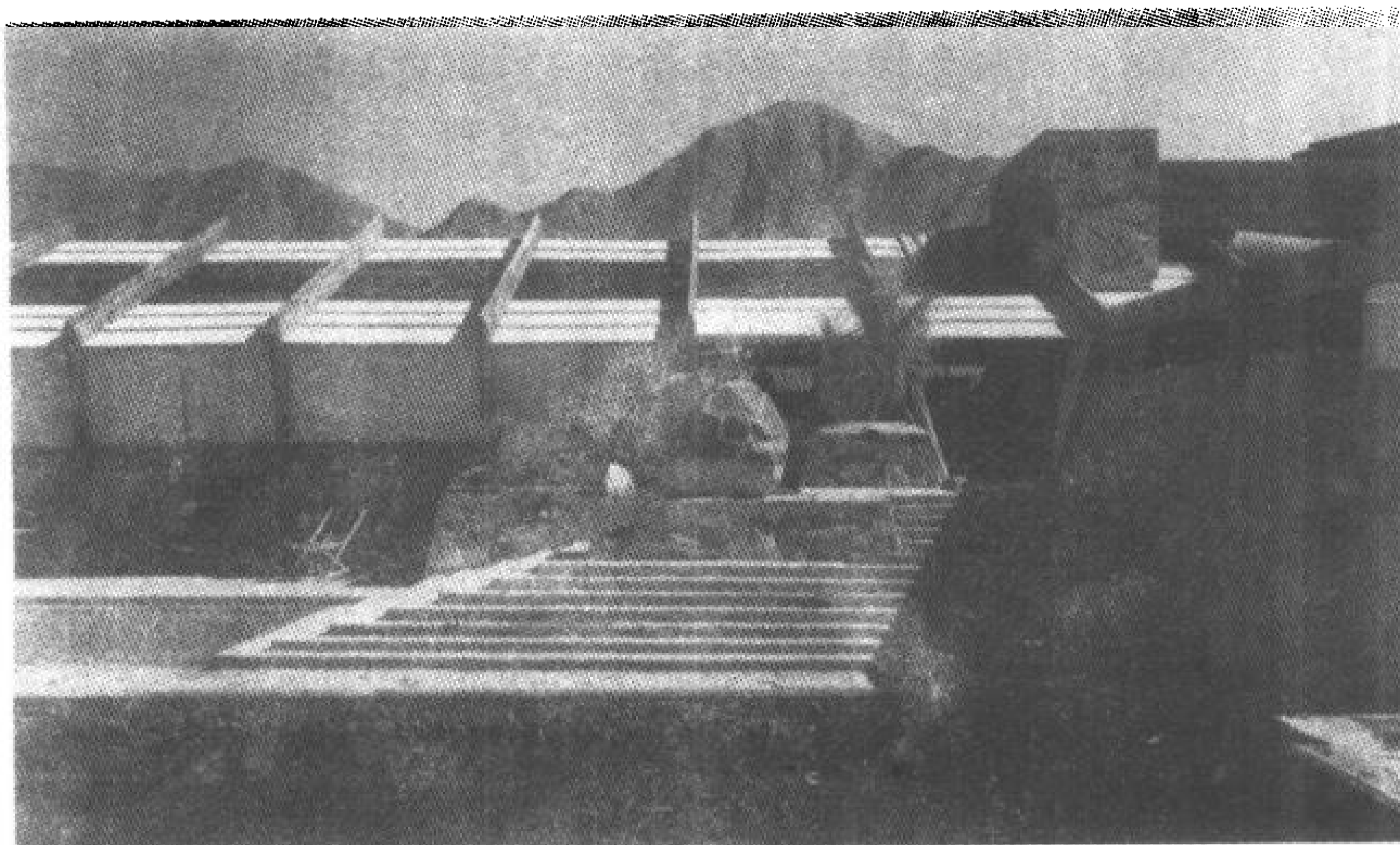
Vasily Kandinsky (1866—1944), 俄国抽象派画家。在德国寄居, 创蓝骑士派。

Piet Mondrian (1872—1944), 荷兰抽象派画家。

Paul Klee (1879—1940), 瑞士超现实派画家。

Edvard Munch (1863—1944), 挪威印象派画家。

Fernand Léger (1881—1955), 法国立体派画家。



塔利辛·威斯特,以威尔士6世纪民歌诗人名字命名的一所别墅,系建筑家赖特为自己和他的学生筑于亚利桑那州,1938年动工,不断改建和增补,一直到他1959年去世

凡·德·罗厄,以及对现代设计有独特影响的包豪斯派。\*

这种早期的新鲜感和冲击力后来是不可能再重演了,但是

---

\* Adolf Loos (1870—1933),奥地利功能派建筑师。

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美国建筑师。创有机建筑理论,是美国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

Le Corbusier (1887—1965),瑞士建筑师。现代功能派建筑学创始人,有名言曰:“房子是供人居住的机器。”

Walter Gropius (1883—1969),德国建筑师。创包豪斯设计学校。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德国建筑师。实用功能派大师之一。

the Bauhaus School of Design,1919年由格魯庇護斯创办于德国魏玛,着重实用功能,1933年遭纳粹封闭,后迁美国芝加哥重整旗鼓。

现代运动继续扩大和发展新的思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后,它仍有能力长出新的旁支来,例如后来在英国发生的现代派艺术的繁荣(亨利·莫尔、巴巴拉·赫普沃思、本·尼科尔逊以及格拉姆·苏瑟兰\*等)。也许更加令人钦佩的是,老一辈艺术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能继续拿出惊人的新作品来——马蒂斯到了八十高龄,而且卧床不起,仍能制作拼嵌的树胶水彩画,至今还有在凡斯的小教堂;勒科布齐埃设计的朗香朝圣小教堂和旁遮普邦新省会昌迪加尔;或者,在音乐方面,斯特拉文斯基\*\*在经过他的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以后,晚期转入十二音阶体系创作方法,这本身是从他在1914年以前为佳吉列夫\*\*\*的露斯芭蕾舞团所写的伟大的创新的乐谱——《火鸟》和《春之礼拜》——的一个突变。

150 这些极其个人主义化的艺术家、建筑家和音乐家能够同意他们所共有的唯一特点,就是他们都有着要打破十九世纪常规的强烈愿望。这些常规本来是以前叛逆的产物,即使如此,它们如今都有了限制性,死死规定什么可以视为艺术,什么可以视为建筑或音乐。而当有人问毕加索“什么是艺术”时,他的回

---

\* Henry Moore (1898—?), 英国抽象派雕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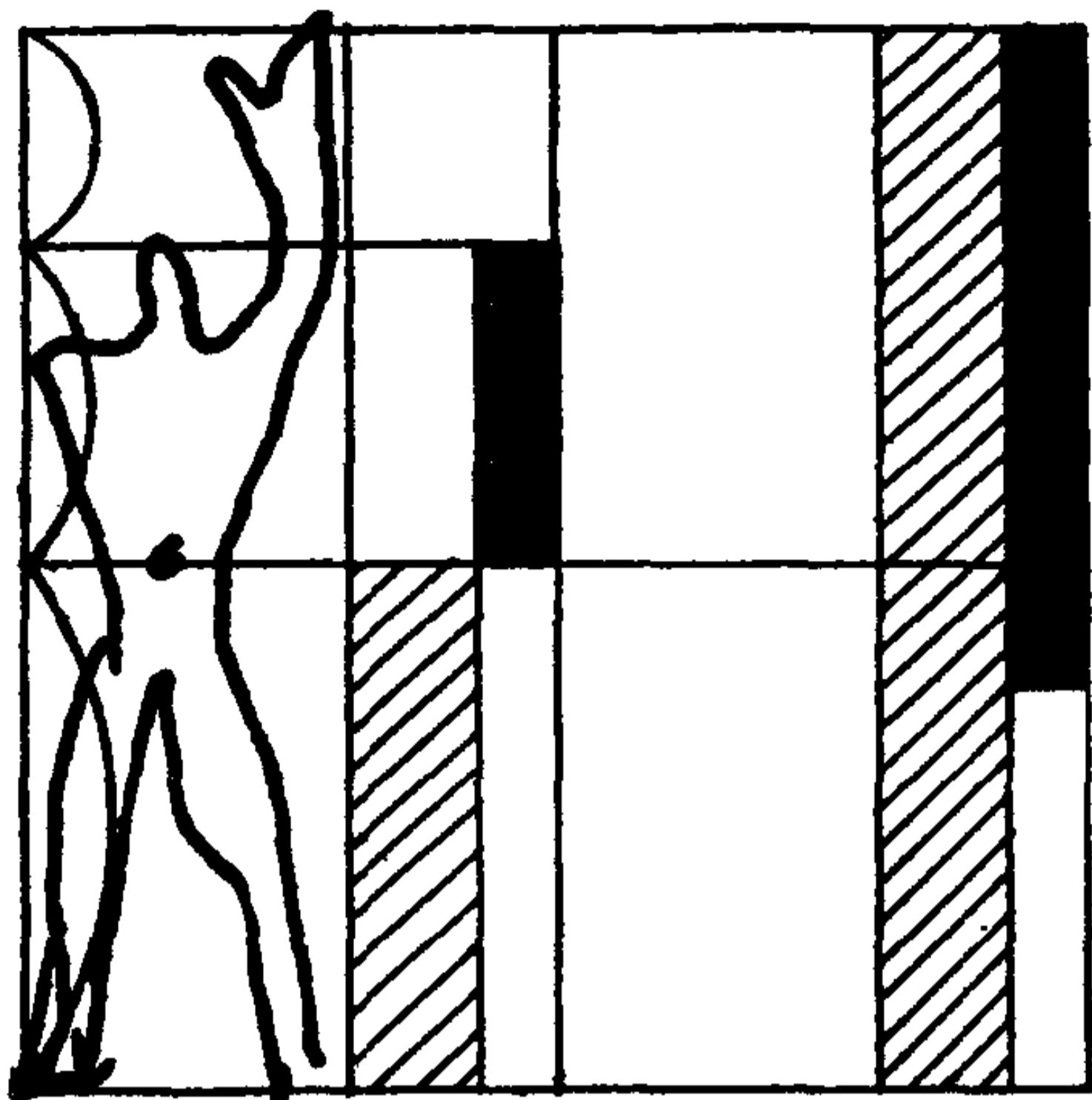
Barbara Hepworth (1903—1975), 英国抽象派雕塑家。

Ben Nicholson (1894—?), 英国画家。曾与赫普沃思结婚,受立体派影响,创几何抽象风格。

Graham Sutherland (1903—?), 英国超现实派画家。后期作品多以宗教为题材。曾为小说家毛姆(1949)和报业巨头皮佛布鲁克(1951)绘肖像。

\*\* Igor Stravinsky (1882—1971), 俄国作曲家。早期起就移居美国,以写作芭蕾舞剧音乐著称,亦创作不少室内乐和交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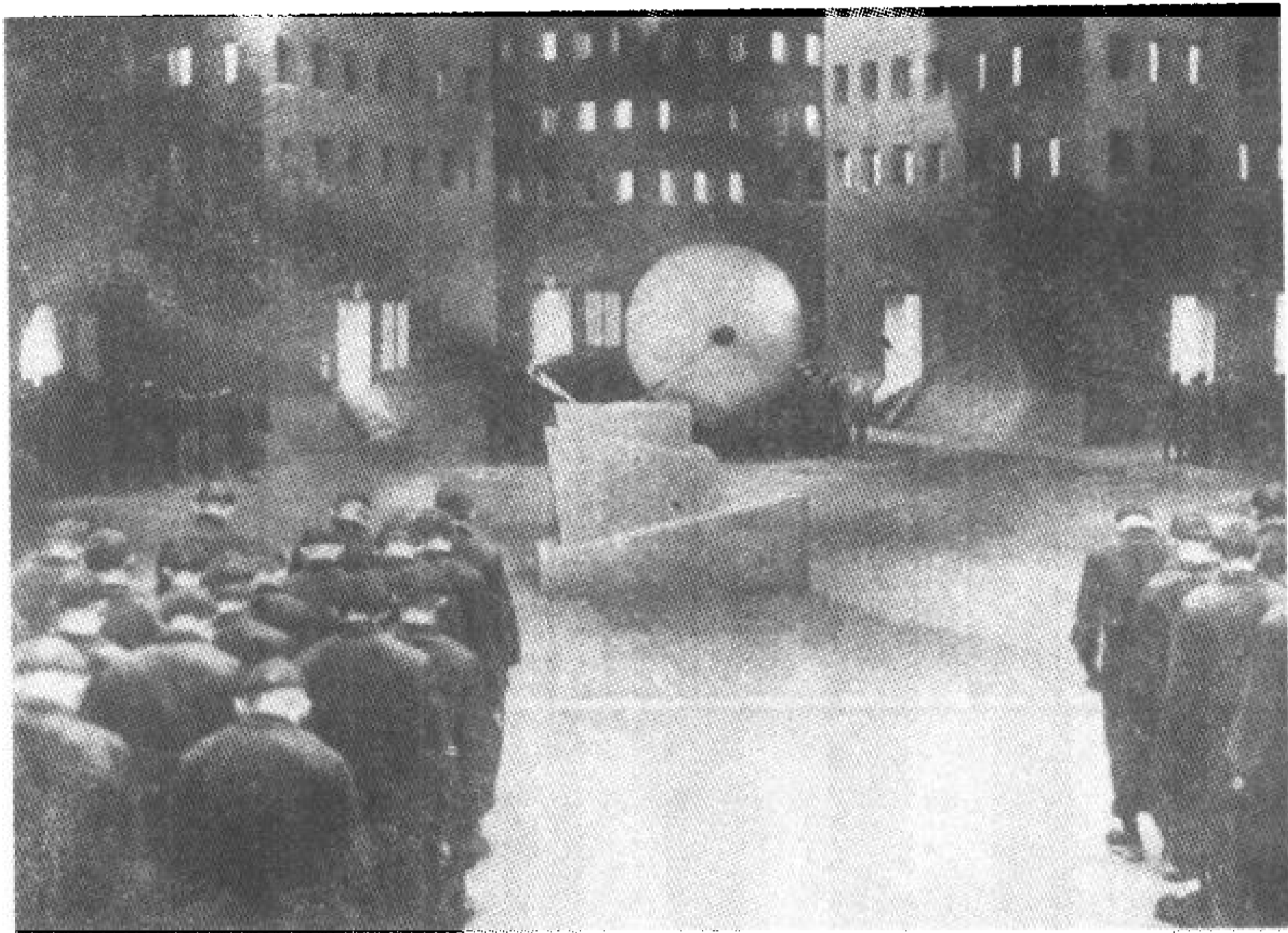
\*\*\* 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 (1872—1929), 俄国芭蕾舞家。后率露斯芭蕾舞团去法国,长期在西欧演出,振兴了西欧芭蕾舞艺术。



勒·科布齐埃为说  
明他的组合理论所  
作的画

答却是“什么不是？”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奥特加·加塞特在现代派运动的创新中看到了“艺术的非人性化”。这是我不敢苟同的一个观点。如果我花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古根汉姆博物馆弗兰克·洛埃德·赖特所创造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画廊，一边欣赏着康定斯基的油画，一边不知不觉地慢慢绕着圈子往下走，如果我在参观了毕加索回顾展后给惊得口呆目瞪地走了出来，或者站在巴巴拉·赫普沃思为了她的雕塑作品专门在圣伊夫斯花园中创造的环境里，我在当时所感到的精神升华和兴奋，同我回到佛罗伦斯或罗马去看到那里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艺术时所感到的精神升华和兴奋，是一模一样的。现代派艺术常常是非表象性的，我认为这是艺术的一种扩充，不是收缩。保尔·克利的幻想使我心迷神醉。在蒙得里安和尼科尔逊的抽象派绘画的严厉线条中，我找到了在每一部其他艺术作品（除了绘画和雕塑也有音乐和芭蕾）中得到的同样深刻的满，那是在它显露



早期最著名影片之一、弗里茨·朗于 1925—26 年拍摄的《大都会》中一景，抗议工业对人类造成的非人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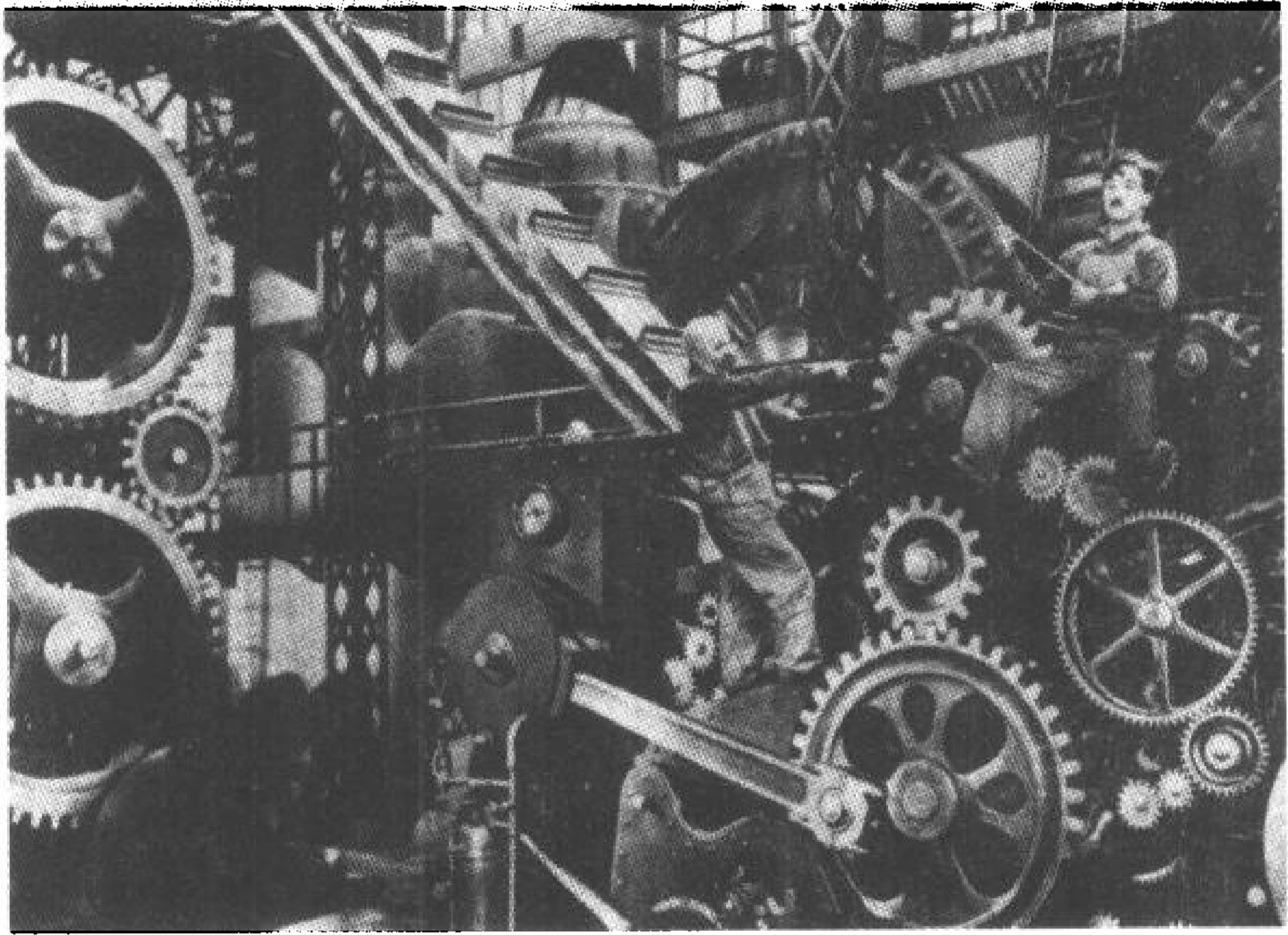
了永远流动状态下的潜在秩序的时候，而在这次则是用最简单方式表现的。

像弗兰克·洛埃德·赖特、<sup>⑩</sup>密斯·凡·德·罗厄、阿尔瓦·阿尔托\* 这样的大师，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是十分注意的，这正是伟大的现代派建筑师的作品与那些丑化我们城市的千篇一律板块式高楼的区别。瓦尔特·格鲁庇护斯在担任包豪斯学校校长职务时曾经宣布，他的雄心是要融艺术和技艺于一炉，“消除机器的一切缺点而不牺牲它一点真正的优点。”在十

---

\* Alvar Aalto (1898 - 1976), 芬兰建筑家。二十世纪北欧风格设计大师之一。





对同一威胁提出的另一种很不同的抗议：卓别林对工厂生活的讽刺：《摩登时代》，摄于 1936 年

九世纪建筑的富丽花哨的折衷主义风格之后，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现代建筑物的大小比例和粗犷线条，在我看来是以当代形式恢复到建筑学的古典原则。<sup>②</sup>

现在我们既然能够开始从正确的角度来看现代派的成就，那么就清楚地可以看出，现代派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与过去的决裂，并不像当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彻底。这正是学者们对文艺复兴所下的同样结论，这个结论重新建立了把十四、十五世纪的艺术家和作家同中世纪联结起来的连续性，而这些艺术家和作家自以为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影响。现代派时期固然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一样，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它不但

没有毁掉或者全部放弃西方艺术传统,而且在我看来还给它添加了一个光辉的新篇章。

许多艺术家都意识到而且在探索他们与前辈的关系。例如,在1957年,毕加索已达七十多岁高龄,还根据维拉斯克斯\*的杰作《侍从女官》的主题,制作了二十多幅不同的绘画,令人瞠目,那幅画是他西班牙前辈在三百年前的1656年画的,毕加索对之思索和研究已有二十年。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深入研究了并且以同样完全创新的方式吸收了亨德尔(1927年的《俄底浦斯王》)、巴赫(1931年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莫扎特(1951年的《浪子游》)的音乐。勒科布齐埃在他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学圣经《建筑学》中提出了“机器美学”原则,但是却回到希腊古人那里去寻找根据黄金分割的模数设计体系,并且追随亚尔培蒂和辽那多·达芬奇把人体比例当作他自己的模数基础。

二十世纪增加了两种新的视觉艺术:摄影和电影。这两者从一开始就都具备极有利条件,可以利用大众传播的技术,从而能够很自然地反映大众社会并且适应大众社会。我在三十年代还是一个学生在牛津大学攻读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时候,我当时看到的电影经典之作似乎像阅读修昔底德和亚里斯多德一样自然是我在人文主义传统方面的入门功课。<sup>②</sup>像电影导演一样,斯提格里兹和卡蒂埃-勃莱松\*\*这样的摄影家抓住了人们生活中的具体细节,然后把个人肖像的人文主义传统扩大到没有个性的

---

\* Diego Velazquez (1599—1660), 西班牙画家。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西班牙画家。

\*\* Alfred Stieglitz (1864 - 1946), 美国摄影家。有现代摄影艺术之父之称。

Henri Cartier - Bresson (1908 - ?), 法国摄影家。以捕捉镜头,擅摄人像和时事场面著称,曾摄有上海市民在外滩中国银行门外排队挤兑的历史性照片。

大众社会中去。爱德华·斯特青\* 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著名的展览“人类家庭”，后来曾在全世界各地展出。没有比这展览更加使我清楚地看到上述这一点了。我儿子的一代人将会在电影和摄影之外再加上第三门艺术，那就是爵士音乐的通俗艺术。这门艺术同其他两门艺术一样，都能不费什么力气就越过种族、语言和阶级的障碍，向所有的男男女女直接说话。 153

## 六

我所谈到的这一代艺术家中，绝不是个个都同人文主义有亲缘关系的。如果把文学考虑在内，情况就更其如此了。例如，W. B. 叶芝虽然是个伟大的诗人，但是他所瞩目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秘复古英雄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信任理性，对于产自启蒙运动的现代世界，像 T. S. 艾略特、伊兹拉·庞德和保尔·克劳台尔\*\* 一样厌恶。所有这些十九世纪后期的反叛主题，如疏离那个受到憎恶的资产阶级社会、非理性被视为是一种对人生经验更加深入的态度而具有的吸引力、尼采的影响等等，常常同风格上的大胆尝试结合起来，这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仍可以看到。

一方面，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像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

---

\* Edward Steichen (1879 - 1973), 美国摄影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航空队摄影部主任。

\*\* Paul Claudel (1868—1955), 法国诗人、戏剧家。在剧本中应用宗教象征、异国情调、哑剧、芭蕾、音乐和电影技巧。

那样绝望的杰作。<sup>③</sup>卡夫卡的“气质迹近疯狂，相隔只有一张写字桌”(埃里克·海勒语)。<sup>④</sup>后来像乌云一样笼罩住中欧的那种噩梦般现实，他都事先在他的想像中经历过了，而且用无与伦比的细腻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还有皮蓝德娄\* 的剧本，收在名为《赤裸的面具》的集子里，叫这个集名是因为，人只有戴上面具让他感到可以自由地丢弃虚伪做作时，才能保持真正的自我。在这些剧本里，个人身份的不连续性(《如果你们以为自己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中做妻子的说，“人们把我看成是怎样的人，我就是怎样的人”)，真理的不确定性，真实与幻觉之间的摇摆，神志清楚与疯狂之间的摇摆——主题上的每一个变奏，都是用无情的逻辑来演出的。<sup>⑤</sup>

另一方面，在D.H.劳伦斯的小说和诗篇里，现代派时期产生了对人的本能力量的颂扬，这力量表现在被文明压制和窒息的性冲动上。或者，后来(像在超现实主义中)表现在不仅对理性，而且对人性的蔑视。在萨特的《恶心》(1938)中，则是对人们要想从污泥中自拔出来的努力的荒诞性加以嘲笑的厌恶感。

不过，这样的看法不免太狭隘和片面。

现代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必须寻找合适的形式来表达他们想要实现的双重革命。第一个革命是公开承认，或者说重新承认(因为很难称它是发现)人的分裂的本性和非理性因素  
154 在个人生活和构成社会的那些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个相应的变革是承认意识的破碎性，经验的暧昧性和真理的相对

---

\* 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 意大利剧作家。现代戏剧革新者，其著名剧本《六个找寻剧作家的角色》(1921)，创“剧场中的剧场”(或“戏中戏”)。1934年得诺贝尔文学奖。

性。我认为我们不必到太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像我在上面提到的作家一样有才华的作家(托马斯·曼和威廉·福克纳\*就是两个对比十分强烈的例子)，他们也采用这些令人不安的新主题，但是并没有转过身去，无视现代的世界，或者陷于绝望，或者为了要走出迷宫而抛弃理性这一条脆弱然而不可缺少的线索，就像弗洛伊德没有抛弃这一条线索一样。

至于另外一个主题，即意识流，以及它是怎样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丰富而复杂地表现出来的，除了马赛尔·普鲁斯特以外，我们就不需要再找别人了。他以极细腻的笔法呈现了不同的时间，例如，提出了为什么某件事的记忆比事件本身提供更集中的现实印象这样一个问题。可以与《寻找失去的时间》并列的作品显然是另一部致力于恢复过去时光的杰作，这次是写1904年夏季都柏林生活中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那就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两人都是像毕加索和布拉克一样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只是在他们方面，这个问题同意识的内心世界有关，而在毕加索和布拉克方面，这个问题同外部世界有关，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改变艺术表现的传统方式的时候，也就是像毕加索所说“我画我想像中的形态，不是我看到的形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不过，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身上，就像在毕加索和布拉克身上一样，结果不是减退了意识，而是扩大了意识，就像扩大了艺术表现一样。他们所追忆的事件就像立体派绘画的对象一样普通平常，但是

---

\*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作品有《喧嚣和愤怒》(1929)、《弥留之际》(1930)、《避难所》(1931)、《押沙龙、押沙龙》(1936)，都是反映南方生活的力作。1949年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却把这些事件变成了魔幻。

彼得·盖伊说的关于现代时期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想到了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他说,现代时期固然发现了许多否定生活的方式,但是它发现的肯定生活的方式也一样多:“它的突破界限并不意味着对纪律的敌视;它的强烈的美学和社会批评并不牵涉到对颓丧的让步:它对非理性的深刻探索并不是颂扬非理性。”<sup>⑥</sup>

我并不是说,我们刚才匆匆一瞥的从1900年到1940年之间的情况,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或文学方面,都可以构成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阶段,与文艺复兴时期或启蒙运动时期相提并论。要做到这一点,时间是太短了。但是,遭到二十世纪中叶危机威胁的人文主义,已无复当初自由主义的乐观和理性,后者到了二十世纪头十年已过了鼎盛期。人文主义已经从这脱身出来,使得自己能够适应意识方面的突变,用新的方式看待人和社会,同时保持了与理性的联系,保持了思想和艺术的修养和训练,而这乃是过去人文主义传统的特  
155 点。构成人文主义一种新版本的因素开始出现。这种新版本人文主义的遭遇如何,我们暂且要放在一边,现在先让我们来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在三十年代末期突然袭来把它压垮的危机的性质。

## 七

在谈这一点之前,我最好回顾一下我们从文艺复兴以来,

经过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涉及各个方面,总结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在三十年代所继承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主要特点。

我再重复一下我在第一讲开始时所说的话,人文主义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或者信条,而是一场曾经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而且现在仍在提出非常不同的看法的持续的辩论。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具有不同的看法,同样也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当然,什么可以算是人文主义,或者什么可以自称是人文主义,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例如,我本人就不会把那种在人生和意识的问题上具有决定论或简化论观点的看法视为人文主义,或者把权威主义的和偏狭不容异见的看法视为人文主义。但是在这种限度之内,辩论是自由的和连续的:它并不产生可以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

为了同样的原因,没有人有权利可以说他对人文主义传统的看法是最后的定论,它只能是个人的看法。这一点明确以后,那么我认为人文主义传统的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特点,似乎有以下几点:

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了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这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的。

人文主义信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

156 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我强调可能性,不是比这更多的东西,不是肯定性。

为了要解放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识。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意识,他们的潜力就自然得到发挥。但是大多数人需要唤醒他们这种意识。因此人文主义者不仅对教育寄予中心地位的重视,而且他们也在总体上主张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础,目的在全面发展个性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要解放人的能力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十八世纪的哲家用理性这武器除去了由世俗的和宗教的习俗、过时的法律、权威主义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驱散了教会和整个天启宗教的机器所利用的恐惧和迷信。他们想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国家来代替。这个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则由代议制来治理,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创业,尽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



到底少到什么程度,是十九世纪早期和二十世纪各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这说明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文主义传统,把它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辩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可以指望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某个发展阶段赞同自由放任政策,我们也能指望这个传统在后来某个阶段反对这种政策,而且用提倡社会改革,限制经济权力,为不能自谋生计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来扩大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辩解。在国家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产生反效果——的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仍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特点。这远远不是弱点,相反,这种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变的正统思想相比,在我看来倒是一个优点。

人文主义传统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马克斯·韦伯关于思想、环境、利益的相互渗透的概念,是最接近于总结人文主义关于思想看法的,即它们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完全派生的。<sup>157</sup>

从十四世纪彼特拉克大声疾呼反对经院哲学开始,人文主义就表现出它不信任哲学体系——不论是神学体系,形而上学体系,还是唯物主义体系——中关于抽象思想的缜密推敲。它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为了同样的原因,人文主义偏向于历史的解释方法,而不是哲学

分析的解释方法，或者，至少，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两者的结合，把普遍的人生经验同这些经验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联系起来。它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和象征强加于人，像天主教的或者卡尔文派的、伊斯兰教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象征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国的、罗马的、法国的、印度的文明，它们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认真对待，需要作出努力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来了解它们。即使当我们不能接受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时，或者由于它们不容异见的偏狭性而使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做。

人文主义当初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时，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要想深入和恢复遥远的希腊和罗马的古人世界。四个世纪以后，歌德重复了这个经验，从中得出灵感，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 and 艺术。古代希腊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活力远远没有耗绝，这可以从俄底浦斯神话对弗洛伊德和斯特拉文斯基仍旧有着魅力看出来。我们可能感到遗憾，因为古典文明已不再是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或所能接触到了。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人民的语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信仰，把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人民思想和感情中去，不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我们自己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去，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让它消失。这种移情的艺术，狄尔泰叫做 *Verstehen*（理解），对人文主义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种除了自己这一时代和文化以外对其他时代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极大的

价值。语言和通过谈话，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幽默也是，从希腊的瓶瓮画家到查利·卓别林，这是最有特点的交往形式之一，是只有人才掌握的笑自己和笑别人的能力，也是除了看到人生所处的困境的悲剧一面以外也看到它的喜剧一面的能力。

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越过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sup>158</sup>的力量。在十七世纪，维柯曾经指出，象征和神话表达了一个社会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可以从有关诞生、婚姻、死亡的普遍经验的风俗和习惯中看出，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有关财产和家庭的法律和制度中看出。这里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泉源，人文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途径，人文主义传统也可由此吸收营养。

人文主义讨论中有一个最古老的题目在古人中间已经很熟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重新恢复了讨论，那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在逆境的时候，比如在一党专政之下生活，很少机会可以进行公开活动，那么，当然我们会认为，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一个避难所和静止点是人文主义传统的自然表现。这是蒙田在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中的态度，又是生活在独裁专政下许多异见分子经历中一再重复的态度，不论这种独裁专政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但是人文主义者的意见还是偏向于积极活跃的生活，争取掌握命运，在邪恶面前进行抵抗，而不是听天由命。

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托马斯·曼的生涯中得到了生动的说

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曼拒绝了西方盟国所唱的他认为是关于自由和民主的高调,而赞成德国的 Bildung 的传统,即内心自我修养的传统。他在 1918 年出版的《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自白》中写道:“玩弄政治使人粗鄙、庸俗、愚蠢。它所教的东西就是妒忌、侮慢、贪婪。只有修身养性才能使人自由。制度无关重要,信仰才是最要紧的。”<sup>②</sup>

到了 1923 年,托马斯·曼的态度转变了。在慕尼黑为悼念被民族主义暴徒杀害的魏玛共和国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脑的大会上,他又谈到了一种不问政治的自我完善:“塑造、加深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在精神的事物中的主观主义,一种文化生活……在这种文化生活中,客观世界,政治世界被认为是肮脏的而抛在一边……”<sup>③</sup>不过这一次托马斯·曼是在驳斥这样一种态度,称它是歪曲歌德和洪堡所说的 Bildung 和 Humanität。十年之后,在 1933 年 2 月,发生了右翼猛烈攻击魏玛共和国,最后导致希特勒夺取政权的事。托马斯·曼在对这一攻击作出反应时宣称,像下面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159 瞧不起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认为与内心世界相比,这只具有次等的重要性……政治和社会是人道的一个目标。对人类的兴趣和热情,对人类问题的自我奉献……同两方面都有关系,一方面是个人和内心的,另一方面也是外界的,对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的安排。<sup>④</sup>

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时成了德国流亡者的思想领袖,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都是其不可分割部分的人文主义的发言人。他在 1937 年宣称,“德国的许多灾祸都产自于这样一种想法,

以为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不问政治的人是可能的。”

## 八

自从希腊人认识到批判理性的力量、系统思想的力量以来，理性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就既具有中心重要性又引起众多争议。的确，人文主义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场常年的辩论，辩论的不是关于该词的含义，而是关于理性的范围和它的成就。

对启蒙运动的先知者们来说，理性是伟大的解放力量，他们用它来攻击人类发展自己天赋能力的道路上承袭自过去的一切障碍和禁忌。不过，我在第二讲里引用了休谟的一句话（“理性不但是，而且应该只是感情的奴隶”）来支持我如下的观点：把十八世纪简单地称为理性的时代是令人误解的，像伏尔泰、狄德罗<sup>⑩</sup>、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以及休谟这样精明和有经验的人，从来没有用后来的理性主义者要想表述的那种绝对的提法，来想过理性。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卢梭本人就是个有力的提醒，说明男人和女人都是感情的动物，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直觉的官能，而不是思维的官能，更经常地受到情绪或习惯的支配，而不是受逻辑或计算的支配。如果有人告诉蒙田，需要对谁提醒这一点，他会大笑的。哪一个“文艺复兴人”不会呢？

对十八世纪哲学家来说，理性原来有一种当作工具的用途，用它来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揭露正统观念和世俗观念的

空虚。只是到了后来,它才失去了批判的、怀疑的性质,而僵化为教条式的理性主义。

歌德和柯勒律治提出警告的,就是这种片面的发展。对歌德这个把许多时间花在研究大自然的诗人来说,使得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达到发展最高峰的,正是人的所有官能的融洽一致,也就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同等掌握。而对柯勒律治来说,形成理性真正形象的,是想像力和方法的结合。

160 这种一致性经常受到一方面是过分依赖理性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对非理性力量的让步而产生的后果的威胁。在二十世纪早期,我们看到了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斗争,终于与非理性的要求和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索作了妥协。下一代的人要到世纪中叶从自身经验中体会到放弃理性、信奉非理性会有什么结果,这是现代任何其他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他们痛苦地重新发现了为什么希腊人——他们的戏剧家早已表明他们是多么了解非理性力量的——这么重视被弗洛伊德称为是微弱的然而不可缺少的理性之光的解放作用。

这场辩论永远不会结束。也许我们比以前几代人更加了解需要折衷一下,但是柯勒律治自己的乱糟糟的生活,他的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足以提醒我们,甚至对于一个对人类状况了若指掌的人,要把他看到的東西化为实践,仍是多么困难。

## 九

我在结束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介绍之前,要添上两个与这

场关于理性的辩论有密切关系的有争议的问题：一是人文主义与宗教；二是人文主义与科学。

伏尔泰和十八世纪其他知识分子对理性的批判力量作了特殊的运用，攻击地位已经确立不倒的教会。到十九世纪，谁控制教育，是教会还是国家，成了一个引起激烈情绪的问题。由于达尔文进化观点的流行和实证主义者声称科学的绝对正确，宗教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双方的情绪就更加激烈了。在二十世纪后期几乎完全世俗化的西方文明中，仍可听到以前这些争论的回声。而且如果原教旨主义者的咄咄逼人有所抬头的話，那么这些争论可能卷土重来。

尽管如此，我们一方面同意这样的观点：人文主义传统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承袭了一股反基督教情绪，成了它的一个历史特点；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不论是世俗派还是原教旨派有时提出的世俗主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说法，实在牵强附会，就像把原教旨主义说成是代表宗教一样。事实上，人文主义对宗教有各种不同的态度，远远不止是理性主义对一切略有超自然或神秘的东西都抱敌意而已。

在这些不同态度的一个极端，我认为可以划界限的地方，是人类堕落的理论和人文主义对人类潜在创造能力的信任这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性。前者认为人类从蒙受神恩堕落到罪孽状态，只有靠神的干预才能赎救，而后者则认为人类潜在创造力的发挥掌握在自己手中。 161

这就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派、路德和卡尔文谴责人文主义的理由，而伊拉斯谟要想创立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打算，在争论中就被扫在一边无人置理了。现代时期宗教信仰的衰退又引起了对人文主义及受其影响的自由基督教教义的攻击，其

中的领导人物是瑞士新教神学家卡尔·巴尔特。他在1919年《致罗马人的信札》中要想逆转路德教会中可以追溯到施莱马赫的自由倾向。他把上帝说成是“完全另一个”，坚持认为人类没有途径可通上帝，人类关于上帝“人格化”的想法与现实之间是完全断绝的，只有上帝通过基督的天启，作为神恩，才能填补这鸿沟；人类无法靠自己的努力通上帝。<sup>①</sup>巴尔特后来修改了自己的观点，承认“完全另一个”这种说法太夸张了，还承认上帝有人性的成分，使他能够接近人类。但是他不肯修改他反对任何要想把基督教信仰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企图的态度。他认为这只会造成“对人类的权利和尊严作根本性的让步”。巴尔特写道，对自由派新教来说，“真正的信仰对象，不是上帝的启示中的上帝，而是信仰神的人。”<sup>②</sup>

巴耳特的不妥协态度，加上他作为一位神学家的不可轻视的能力，使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又由于他在警告德国新教徒切勿姑息希特勒这件事上所采取的强硬立场而更为加强了。他的观点并不是没有受到当时其他新教神学家的质疑，不过他的观点具有这样一个极大的优点，可以供我用来划定人文主义各种不同态度另一个极端的界限。

在这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可以以伯特朗·罗素的一篇早期论文为例，他在这篇常常重印的论文《一个自由的人的崇拜》中宣称：

人类是那些对自己要实现的目的并无预见的原因的产物；人类的起源、发展、希望和恐惧、爱和信仰，不过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的结果；没有什么烈火、英雄主义、炽烈的思想感情能够把一个人的生命维持到进了坟墓之后；历代的



一切劳动、一切奉献、一切灵感，人类才能的一切如日中天的光辉，都注定要在太阳系大死亡中灭绝——所有这一切道理，如果不是毫无疑义的话，至少也是相当肯定，任何一种哲学要拒绝承认它们，就没有希望能站得住脚。<sup>③</sup>

罗素的结论是，只有人类自己的理想才值得人类尊敬，在为这些理想斗争时，人类必须认识到，他在一个充其量也是对这些理想抱着冷漠而且常常是敌意的宇宙中，完全要依靠自己。

这同卡尔·巴爾特的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经验信仰或神的中介，认为这是幻觉的看法，有着同样明确的性质。但是在这两个教条式的极端之间，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使人文主义可以自然地同宗教信仰——基督教、自然神论、犹太教——以及同不可知论相结合。不仅可以结合，而且在历史上已经结合了：从伊拉斯谟用人文主义治学方法企图恢复耶稣教导的原来面目，经过与天启宗教相对的自然宗教，十八世纪自然神论者对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的信仰，也为牛顿、洛克、伏尔泰、康德和歌德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所共有，到施莱马赫提出摆脱教条的感情宗教。十五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多种不同的信仰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殊途同归于一个简单的真理，这个认识也为十八世纪的莱辛和伏尔泰所共有。威廉·詹姆士对不同宗教经验的调查是与他不可知论者乔治·爱略特都用的一种认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认识就是宗教信仰在改造人的生活方面有其实用的价值，即使这一认识是否准确还没有什么把握。基督教新旧两教中的现代派都想用那些与圣经考证学和科学调查结果相容的方式重申基督教信仰。

对此,我想再加上我们自己这一时代的三个例子:

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担任了三十多年教授之职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最初是以他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1932)中所表示的政治见解引起我的注意的。他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对“现代派自由文化”深感恼火。他对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乌托邦假设提出尖锐的质疑,表现出对权力问题有着一种作为政治历史学家的掌握,特别使我心折。对于启蒙运动产生的对人的乐观看法,他提出了基督教的有罪论,他认为在人的骄傲中找到了有罪论的根据:

人的自我通过权力的骄傲实现自给自足和自我主宰,这种骄傲并不承认人的生命的附带和依赖性质,以为自己是自己存在的设计者,自己价值的判断者,自己命运的主人。<sup>④</sup>

尼布尔认为犯罪倾向是人类生活中普遍的倾向,但是他反对巴爾特的新正统思想,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不是有罪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是在自由中犯的罪。这同人文主义有一线相通,但为巴尔特所否认。尼布尔对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所抱的希望是有节制的:“圣徒们要想看到到处都是神恩,而罪人们却流血流汗要使得人际关系稍许可以容忍一些,稍许公正一些。”<sup>⑤</sup>为了这一切,尼布尔一度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积极投

---

\* Reinhold Niebuhr (1892 - 1971), 美国神学家。对神学上的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提出基督教现实主义,承认邪恶的存在和民族及其他社会集团的自我主义和自尊态度。著有《大自然和人类的命运》(1941)等。被《时代》周刊誉为“美国新教的第一号神学家”。



1955年施维策尔在非洲生活的两个方面：练习巴赫的钢琴作品和他在兰巴雷内修建的医院中查房

身政治，成了工业资本主义（他曾在底特律担任过十三年教区牧师）的非人性化影响的激进批评者和美国人拥护民主行动协会创建人（一度担任过主席）。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著作是1939年作吉福德讲座后出版的《大自然和人类的命运》一书，他在其中企图把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观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他对人类在历史中的“未定可能性”的信仰，只要人类不自欺欺人地认为历史问题的绝对解决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

我无论如何是要把亚尔培·施维策尔包括进来的；他的观点正好与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形成醒目的对比。施维策尔于1875年生于亚尔萨斯，他的早年证明他有多方面的杰出

才能：在哲学方面，在神学方面（1906年他写了一部著名的观点激进的圣经考证《探索历史上的耶稣》，还有《保罗和他的解释者》，以及一部关于耶稣的精神病研究），最后在音乐方面，他是个音乐会上管风琴演奏家，巴赫的管风琴作品联合编辑人和一部关于巴赫的经典研究的作者。这一切都是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完成的，但是在他三十岁（1905）生日那一天，施维策尔已经决定，他要作为一个教会医生为赤道非洲的土著奉献一生。

1906年到1913年，他在斯特拉斯堡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学业后，放弃了他的学术生涯，出发到法属赤道非洲去。他在非洲一个最贫穷的地方兰伯勒尼建造了一所医院，主持院务五十多年。他来往于非洲和欧洲之间，目的是为了去欧洲讲学和演奏管风琴以筹募医院的经费。

164 施维策尔认为，耶稣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是被他们的时代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个末日论的信仰所支配的。而在今天仍旧普遍有效的，不是神学家们死扣的教条，而是耶稣“爱的伦理”的教导。施维策尔据此确立了他自己的“尊重生命”的哲学，不仅仅是尊重人的生命，还要尊重一切活的东西的生命，他相信只有依靠重新发现这一点，西方文明才能治好自己的病。

施维策尔没有放弃他的学术兴趣。他又写了一本关于圣保罗的书，这一次是关于圣保罗的神秘主义。他发现自己与歌德特别相近，就从基督教中走了出来，开始研究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开通态度，表现在他的三卷《文明的哲学》中，但是使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样一桩事实：有着他那样才华的人，居然把一生中这么多时光，用于实践他自己的教导，在他的医院需要重建的时候亲自去做小工，在第

三世界最偏僻的一个角落里,用自己的手医治老人、病人和穷人,1965年到了九十高龄死在那里。

马丁·布伯尔\* 的生卒年月几乎与施维策尔一致,他在施维策尔出世后三年生于维也纳,于施维策尔死去的同年死于耶路撒冷。布伯尔比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对本世纪西方宗教思想都有更大的影响。在他最有名的著作《我和你》(1923)中,他提出人有两个主要关系,一是“我一它”,一是“我一你”。前者他称为“经验”,讲的是人在生活中的客观和功能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有某个“东西”作为目标:要保持、要做、要思想、要想像某种东西。这些活动和目标对人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人只在这个水平上生活,那么他就够不上是人。“我一你”态度,他称之为“关系”,或者“相逢”,这不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对主体的关系。不像“我一它”,“我一你”既是整个人的关系,又是牵涉到相互对应的关系,而这种相互对应经验的超然客观态度中却是付诸阙如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两个人的关系,但布伯尔认为同大自然也可能保有“我一你”关系。

科学采取了“我一它”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许多客体的世界;而宗教却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我一你”关系,我们进入了这种关系,并通过它们建立了永恒的“你”即上帝的观点。“每一个具体的你都是看到永恒的你的一瞥”,也就是说,通上帝的路不是抽象的思维或教条,而是通过人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与上帝关系的一个反映。

---

\* Martin Buber (1878—1965),以色列宗教哲学家。著有《我和你》(1923)、《上帝的失色》(1952)等。

现代世界的弊病都来自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我一你”关系,把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我一你”关系降为一种非个人的主体与客体的“我一它”经验,而不是把这种对待自然的“我一它”  
165 态度提高到“我一你”关系。

在我看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施维策尔的“尊重生命”和布伯尔的“我和你”这三种非常不同的宗教哲学是完全相容的,而且是它们的必要成分。我认为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若与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它给我们帮助这一信仰相结合,我们的处境就会比——用伯特朗·罗素的话来说——听任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冷漠或敌意的宇宙中保持这些价值观这样的处境要强得多。

## 十

我从伯特朗·罗素的著作《神秘主义和逻辑》中已经援引过他反对宗教的话。在同一本书中,他把希望寄托在科学上,认为这是唯一可靠的知识形式,而且甚至在道德行为这一领域中也最可靠的指导。这种对科学的看法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卢克莱修以及某些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伏尔泰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成功地恢复了这种观点,把科学奉为新的启示,为最后了解人和社会提供了方法,就像它为了了解自然世界提供了方法一样。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专门化的

程度,使得受过教育的人无法跟上最新的发现和理论。科学与人文学的分家还没有发生。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都一出版就得到受过教育的一般公众的普遍阅读和讨论。

分家是在科学不仅趋于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并且开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明确科学观点后才发生的。在达尔文揭示了人种和其余动物王国之间的连续性以后,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怎么同关于人的传统观点相协调呢?不论那些传统观点是宗教的还是人文主义的。

T. H. 赫胥黎所提出的,后来为许多科学家所重复的正统答复是:关于人的科学观点,就像关于宇宙的科学观点一样,已经取代了以前的非科学观点,后者像以前的科学假设被知识的进步证明是有缺陷的一样给抛弃了。拿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说为例,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以后是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宗教和哲学就成了多余,科学成了人文主义的后继者,人类理性的最高成就。

按照这些道理,可以提出一个有力的论点。启蒙运动认为,把科学的方法从大自然的领域扩大到人的领域,可以把男男女女都解放出来。后来的科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希望,不仅是提高了人类生活和物质舒适的水平,而且缓解了人类的饥饿、疾病和恐惧的痛苦。这些巨大的利益,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我们的前人看来,可能如同奇迹。同时,

---

\* Charles Lyell (1797—1875), 苏格兰地质学家。证实地质学上的均变说,与灾变说相反,此说认为目前在慢慢地改变地球壳表面的力量一直在以同样方式起作用。

科学是人类思想最为壮观的成就，它不仅依靠个人天才的力量和科学方法的智力训练，而且依靠合作的努力，克服国界、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得人类其他一切事业相形之下大为失色。这当然是人文主义在发挥作用。

我不知道有多少科学家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列举它的涵义是值得试一试的。当然，有不少的科学家同那些只受到过纯粹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一样，对于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是同样重视的，对于艺术和人文学是同样欣赏的。但问题是，他们如何看待艺术和人文学所提供的见解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差别。他们是否像罗素那样，认为只有后者不仅为了解宇宙而且也为了了解人的本性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供一个严肃认真的可靠范例。因为科学的了不起的成功所依靠的方法，只能应用于那种可以毫不含糊地观察和精确地测量的现象。而艺术和人文学的传统对象——信仰、价值观、感情、对艺术的各种反应、人类经验的暧昧模糊性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却不是容易地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除非是在我认为基本上是简化论和决定论的基础上。

我并不认为许多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共同抱有的希望改变了这一点，这个希望就是，有了本世纪科学方面了不起的进展，整个人类生活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最后受到科学的控制和纠正，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无异是说，到那时候就可以完全地把精神和感情现象简单地归于生理原因。

我发现这样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有漏洞，或者甚至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有一件事情，我是直接了解的，那就是蒙田早就提出过的“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不可否认，这是决定于我自己身体中和我生活所依的环



境中的物质秩序,而且与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也不怀疑,生命科学将继续使人越来越清楚这种关系,通过遗传工程和对大脑进行的研究,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发挥作用。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使我相信,人的意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它同自己的生理载体的关系,还有别的东西,不管你叫它是灵魂也好,精神也好, 167 精灵也好,思想也好,意识流也好,仍要把人的意识看成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物体,不是简单地可以归结为它所依据的物质或社会环境的东西。

这就把我引导到最初由维柯提出的,后来由狄尔泰和卡西尔\* 这样的德国思想家,由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发展的另一种观点,那就是自然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人类参与的第二维度,用人类学的笼统术语来说,叫人类文化世界,也就是思想的、价值观的、信仰的、艺术的、语言的、象征的、神话的、制度的、历史的(包括科学史)世界。这一维度的特点是人人可以用 Geist - eswissenschaften(可译为人文学,在用人文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时又可译为社会科学)为手段,从内部——进入内部——来掌握和了解它们,因为它们是人所创造的。

我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一场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公开音乐会。如果你请不同的专家,比如建筑师、音响师、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作试验工作的心理学家、空气和温度控制专家、再加上分析演奏家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听众,来对这次演奏作一番完全的描述,直至最后一个可以衡量的细节,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描述却把最重要的使他们相聚在一

---

\*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德国哲学家、思想史家。原籍瑞典,后流亡美国。著有《象征形式的哲学》(1953—57)、《人论》(1944)、《国家的神话》(1946)等。

起的事给漏了：演奏和聆听莫扎特音乐的经验。这是一个个人的经验，因人而异，不论怎么描述或衡量都不可能十分准确，但是我认为也不能简单地只看到它所依据的物质条件。因为这些物质条件一有改变，例如，我在音乐会中途暴卒，就结束这一个人经验，正如莫扎特的去世结束了他的生产更多协奏曲的能力一样。但是这并不改变我活着的时候聆听演奏的经验这个现实和乐谱上的黑色符号对人意味着什么，而用科学的解释来介绍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论怎么全面，都是不足以表达其中的三昧的。

当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事件和参与事件的人属于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可以用自然科学来研究，一个是关于目的和意义的内心世界，只有通过 *Geisteswissenschaften* 才能达到。歌德对这两者，即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同样重视，坚持它们的统一。而我相信，在达到这种统一之前，人文主义传统由于缺此一点，仍不能算是人类成就中最杰出的成就。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有多少科学家会对我所表示的或者我所攻击的看法抱有同感。也许，我假想为辩论对象的科学家只是个稻草人而已，也许，八十年代的科学家不会像我那样  
168 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会像一百年前恩斯特·马赫那样提出问题。二十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或者遗传学的革命，或者大脑的探索，究竟带来多少的变化？也许是因为科学知识爆炸发生得太快，使得从事科学的人顾不上为这种问题操心。

虽然许多科学家对那些坚持要讨论科学对哲学和对人的含义的人有所猜忌，但是正是这些人，从 A. N. 怀特海德到亚瑟·库斯特勒\*，使我相信，我刚才讨论的问题将会得到认真的

对待。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和语言提出来。但是我所关心的只是希望看到这些问题被提出来,因为我确信,决不止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这是所有思想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把应该视为统一体的两半调和一致而不致把任何一半降为其他一半。

如果西方文化大分家出现即将结束的迹象,那就没有别的东西比这更令人兴奋了。这将是一种把科学家看到的世界和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学术家看到的世界,结合在明白易懂的关系之中,而不牺牲各自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的运动。如果能实现这一点,那末就会为人文主义传统打开一个崭新的人类经验的前景。

---

\* Arthur Koestler (1905 - 1983), 英国匈裔小说家、散文家。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西班牙内战,后对共产国际活动感到幻灭,退出共产党,移居英国。《正午的黑暗》(1941)以莫斯科大清洗为素材,并著有《梦游者》等其他哲学著作。

## 人文主义有前途吗？

## —

我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回顾人文主义传统的历史发展，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在不妨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在我最后一讲里，转过来谈一谈人文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这反过来又引导我们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事实上，这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传统的结束？或者，人文主义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里，或者在将来，是否仍有作用可起？

对我这一代的人来说——不过不一定对比较年轻的一代人——挑战的主要内容仍是纳粹德国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冷战的尖锐阶段，可以说是从希特勒在 1933 年年初的上台到 1953 年斯大林的去世。但是根据我们到了八十年代才具有的看待本世纪历史的比较长期的观点，即使这一系列危机也不过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所遇到的一整套比较长期的挑战的一部分而已。

我现在要考察的就是这些比较长期的挑战。我把它们分

为四类,从 1933 年到 1953 年发生的事件则放在最后一类里。

它们是:

- 1) 人口的增长和历史规模的改变。
- 2) 技术和历史步伐的改变。
- 3) 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
- 4) 战争和暴力的蔓延。

世界总人口在基督的时代估计为二亿五千万,到 1750 年左右工业革命开始时增至七亿五千万,到 1925 年增至二十亿,在后来的五十年内又翻了一番。预计到公元 2000 年要增加到六十亿。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城市的发展。晚至 1800 年,据信那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那就是伦敦和广州。到 1980 年,共有一百零九个城市的人口在一百万以上,其中十六个超过五百万,预计墨西哥城的人口到本世纪末将达三千万。

因此有人认为,这些数字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这些大大地增加了的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生活在极其悲惨的贫困状况中,例如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而在孟买、墨西哥城、雅加达等城市,大部分人生活在极其屈辱的拥挤状况中,因此谈什么个人自由和人文主义传统所珍视的其他价值,谈什么无关他 170 们和他们子女的勉强生存的任何东西,都无异是开他们玩笑。二是,为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人民提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规模十分庞大;为应付大城市的问题,甚至像伦敦和纽约这样富庶的城市的问题——不仅是贫困和疾病问题,而且还有犯罪、剥削、种族紧张关系、贩毒吸毒等问题——需要做的社会组织工作,规模也十分庞大。面对这些庞大的问题,只有采取凡事以总数和平均数计算的集体主义措施,才有可能应付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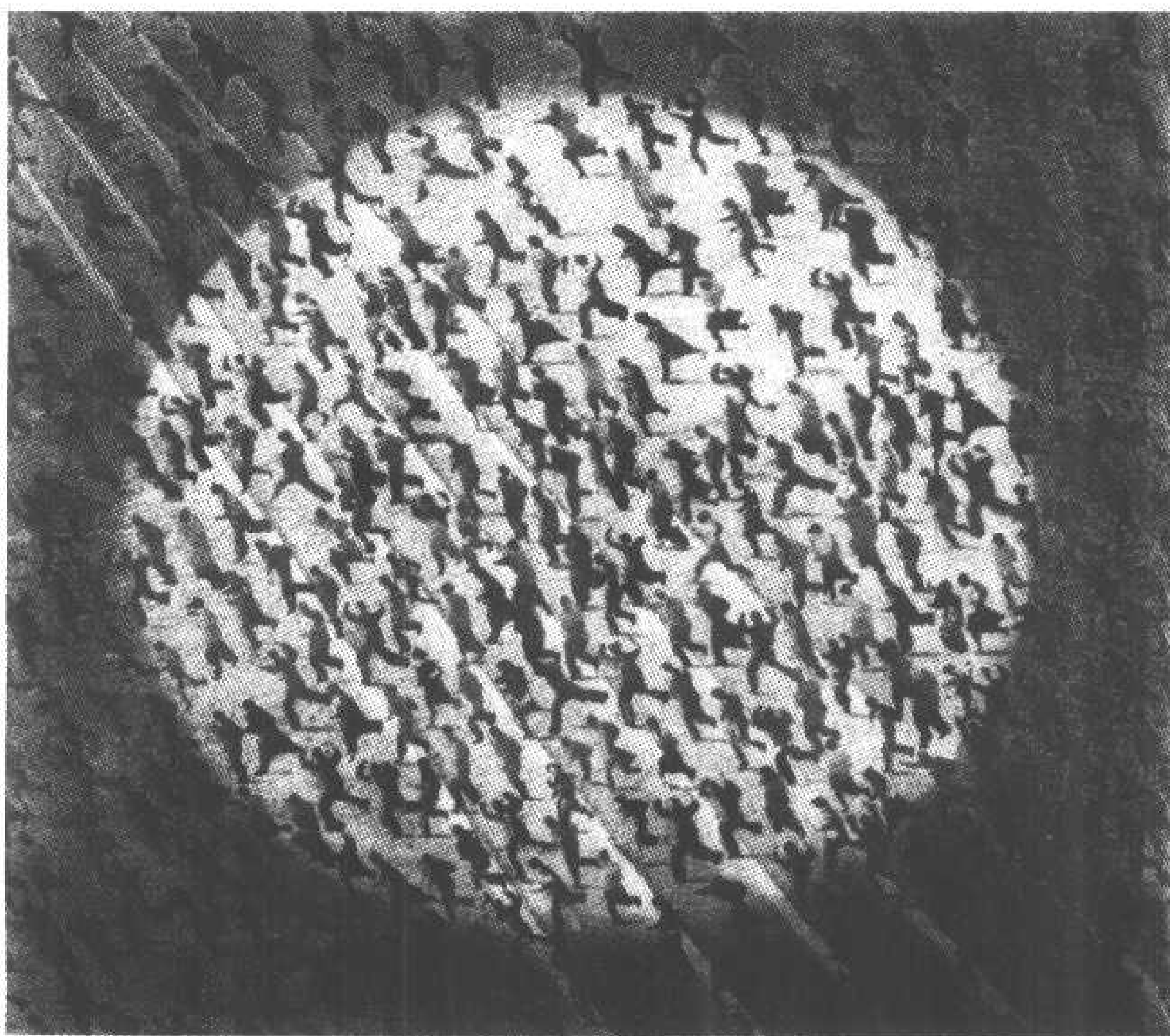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去操心，又有谁能够操心个人的遭遇呢？

科学(例如医学)和技术(例如改善卫生、改良供水、改进交通)提供了寻求答案的最好办法，或者是至少提供了防止这种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最好办法，这个事实是抱怨技术的人需要牢记的。但是至少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在应用时，人们常常不充分注意它们对环境或者对人产生的后果是否合适，而像 E.F. 舒马赫\* 这样主张另外发展小规模或中等规模技术的人，长期以来就碰到一堵偏见的墙。在工业化国家里，绝不能让任何什么东西，特别是对保护资源的怀疑，或者是对千百万人失业或流离失所这种长期后果的怀疑，来妨碍技术发展。这种必要性已经成为政府的口头禅，古典经济学“铁的规律”的新翻版。甚至仅仅问一下费用或收益的比较，或者是否可能还有别的办法，特别是在太空或军事技术方面，都会被认为是进一步证明，教育若仍保有人文主义成分，对明天的技术世界并不相宜。

在那些从事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人看来，发展的速度之快，是令人兴奋得透不过气来的。通过对大自然的掌握而改造世界，这个实证主义的美梦仍有很大吸引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们所抱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好处的信念。但是从那些并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被动参与这个改变过程的人那里来的反应，从我们常用的“人类”这个抽象概念的组成成分的个人那里来的反应，却要暧昧得多。即使他们认识到改进卫

---

\* Ernst Schumacher (1911—1977)，德国经济学家、环境保护家。著有《小的是美丽的》(1973)一书，提倡创办中小型企业来减少公害。



“焦点”，西班牙画家胡安·日诺维斯作(1966)，画中所示人类是显微镜下或探照灯下的一群惊惶奔跑的人

生状况和提高生活水准的好处,但是不断响在他们耳边的信息却是,技术进步无法阻挡,甚至无法放慢,它所带来的后果你非承受不可,这使他们认可了可能深刻影响他们生活的东西,他们无力控制,作为人,他们在技术的价值天秤上已无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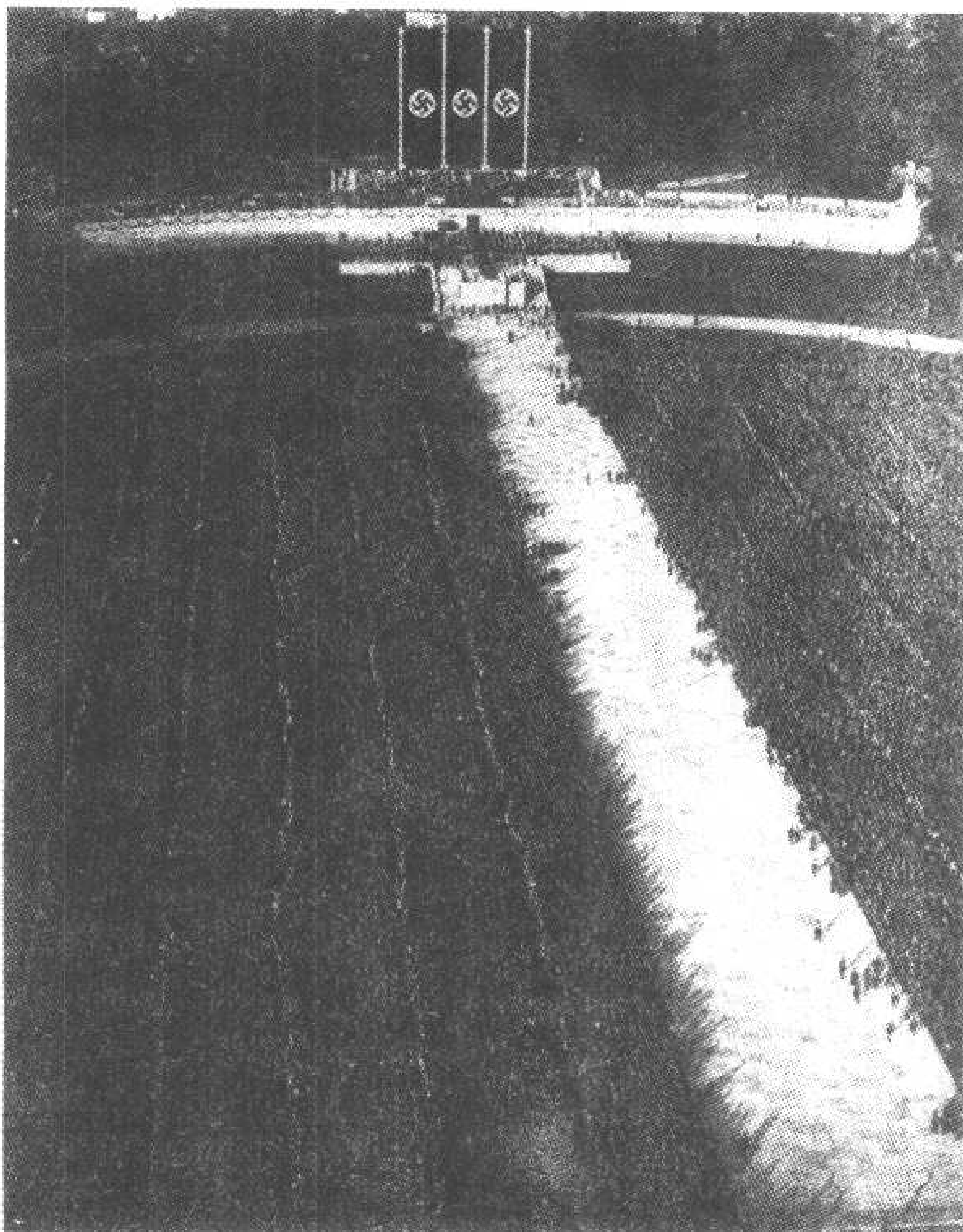
171 集体主义者很容易从中得出结论:个人有什么权利或价值的想法,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是一种极其令人误会的错觉,因为它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只有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例如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的成员,才能有价值 and 权利。

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例如教会、政党、专业团体或社会团体的成员,一直是民主社会中任何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之一。这种团体的数目和种类多少,一直被认为是衡量一个民主国家的力量的标准。再进一步,集体主义思想在工会运动——“团结就是力量”,工人单独是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利益的——中和规定由国家或市政当局进行干预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得到了表现。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为不能以自己的力量满足生活需要(例如教育、住房、保健等方面)者提供条件。这一切最后都被认为是人权在工业化社会中的自然延伸。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与二十世纪表现在如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形式,都有天壤的区别。在所有这些主义中,个人都要把他的整个生命从属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的要求,这国家不容有任何独立的表示,它集中所有权力于一身,不论这权力是属于民族的、人民的、工人阶级的、主要部族的、还是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权力。

172 事实是,今日世界大多数人所生活于其下的政权,不论它们的运作是多么的没有效率,都是集体主义性质的政权,它们把自己统治下的人民视为可以供其任意处置的对象,人民没有





个人被集体吞没：希特勒的纳粹党 1934 年在纽伦堡的集会

任何权利可以对它们的滥用权力,包括监禁、拷打、处死那些哪怕只是有反对该政权嫌疑的人以及经常有系统地灭绝种族或宗教少数集团的行为,提出异议。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一度很有信心地认为,代议制政府和民主权利的模式最终将会推广到西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余地方去,如今这一信念已被粉碎了。凡是作了试验的地方,最后莫不在腐化和无政府状态中以垮台告终,以致人民看到某个强人或政党攫取政权,反而感到如释重负一样加以欢迎。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缺少欧洲各国人民的经验和传统的缘故,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下面这两个事实,这种自满的想法就可以打消了:头一个法西斯政权是在意大利上台的,是在人文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很久的西塞罗和共和罗马时代的欧洲最文明的一个国家上台的;还有,所有集体主义政权中最为强大的两个政权都是欧洲的政权,一个是德国的纳粹政权,它在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的人民中所赢得的拥护,也许比任何其他政权都要大,另一个是俄国的政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创立的,不论其果实是多么畸形,它的根子却是欧洲的启蒙运动。

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至少有一点是坦率的,那就是它们公开反对人文主义价值观。而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却要难对付得多,因为它在西方制造了比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更大的内部挑战。

共产党人声称,他们在苏联已经建立了一个在集体的基础上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有效地表达了人文主义传统的许多价值观——自由、废除特权、合理组织社会——的国家。

他们不仅这么说,而且比法西斯分子及其第五纵队花了更

多的力量——也得到了更大的成功——在国外组织愿意听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后来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指示而工作的共产党。这意味着长达五十年之久,大致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sup>173</sup>运动和知识界,有很大一部分在革命而不是改良的诺言的吸引下,把他们自己的判断力从属于俄国人所制订的策略,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例如在德国。他们这么做,心里还相信苏联是个比他们自己的社会更加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因此更有理由赢得他们的忠诚。但是共产党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消灭他们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人。结果却是摧毁了统一战线在争取社会和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破坏了它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抵抗,为右翼独裁政权,不是为左翼革命,打开了道路,例如在德国和西班牙。它对西方许多即使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和人文主义传统的信仰和忠诚,产生了一种微妙而具有腐蚀性的<sup>174</sup>影响,他们很少错过一个抹黑自己国家的制度和人文主义传统的机会。三十年代末出现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但是这个短暂的插曲来得太迟了,例如要拯救西班牙就太迟了,后来又被斯大林于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的纳粹苏联条约所中断。

由于俄国人在保卫祖国抵抗德国人时所表现的勇气,神话和幻想又复活了,而且尽管面对斯大林统治和苏联强加在东欧、必要时用武力维持的压迫性政权的真正性质的种种证据,这种神话和幻想仍旧存在。只有到了七十年代,西方各国共产党才跟随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榜样,对苏联的幻想才充分破灭,开始要根据自己国家的传统,拟订马克思主义纲领。



胜利：德军在人文主义传统诞生地雅典的卫城升纳粹党旗，庆祝 1941 年希腊的被征服，背景为巴台农神庙遗迹

就是在欧洲的左派不顾他们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根源，仍旧盲目信奉左翼革命的乌托邦梦想的时候，二十世纪真正革命性的创新之举——操纵人民的手法和从此以后极其广泛地照搬的警察国家体制——就开始在苏俄和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里、监狱里、集中营里发展起来。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比斯大林为了要摧毁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所采取的措施、三十年代的清洗、创建古拉格群岛更加无情地应用这些手法了。只有纳粹党卫军在东欧采取的措施和最最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的“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方案”，即有系统地消灭五、六百万欧洲犹太人的措施，可以与之相比。



战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城市汉诺威被炸毁的空中鸟瞰

175 中欧和东欧各国人民在二十世纪的经历(也不要忘记西班牙内战或德国对希腊的占领)在这个曾是人文主义传统策源地的大陆的历史上是从从来没有先例的。在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中,曾经有更大比例的人口,估计约为三分之一,被消灭掉了;在宗教战争期间,中欧的许多地方成了不毛之地,其中少数幸存者变成了吃人肉的生番。但是,使你无法想像的却是二十世纪消灭人的规模和有系统的蓄意性质。如果我们把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数、纳粹和苏联集中营中所消灭的人数加起来,那么从1914年大战爆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间的四十年中所死去的人的总数一定超过了五千万,也许六千万,这还不算,还有好几百万人即使幸存下来也只剩下断肢残腿或者饱受精神创伤,永远难以痊愈。

176 从1924年到1928年这个短暂的时间中,一度仿佛有可能发生从1914年到1923年年底的暴力和压迫的循环中断这样的事。但是结果没有发生。这个循环随着大萧条而又开始了:斯大林的第二次俄国革命(农业集体化和清洗)、希特勒的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的爆发。到战争结束时,仍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欧洲的分裂、冷战、第三次核战争的威胁接踵而至。这一次暴力蔓延到了全世界,遍及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在许多地方成了常年痼疾。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成就,常常美中不足地带来了内战。种族和教族的屠杀、蓄意采取的恐怖手段和暗杀,甚至种族绝灭的尝试,已成了家常便饭。

我不需要一一列举这些非人道行为的令人心寒的清单。到现在为止,这张清单已经够长的了,足以使我可以正视这个问题:不管是我还是任何别人怎么可能侈谈什么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就好像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仍是有效的或者有关的似



波兰被取缔的团结工会 1980 年 8 月在格丹斯克造船厂门外的示威

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对人文主义传统的价值观表现出十分凶残和冷漠，今天一想到这种价值观曾经代表的希望，只会引起怨愤的感觉。

## 二

在我尝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之前，我需要指出，我对二十世纪历史所作的记述是不完全的。需要提一下其他比较积极的方面来加以平衡。例如，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不仅击败了来自轴心国家和苏联集团的外部挑战，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后者不论是多么不够完美，都是最接近于表现人文主义传统的。不仅如此，西德、意大利、西班牙都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恢复过来，而没有丢给共产主义。

同样也是事实的是，对西方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也就是苏联模式所体现的、同时为其他各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这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证明：经过近四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之后，仍未赢得东欧各国人民的支持；苏维埃制度的僵滞和不能适应变化；南斯拉夫、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放弃苏联模式等等。

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人民，包括战败的和分裂的德国，实现了一场了不起的经济和政治复苏，从实行马歇尔计划开始到1973年的二十五年之内，这场复苏使他们登上了高水平的经济繁荣，比他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均地为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一战士面对德军行刑队而毫无惧色

家所享受。在所有战争的受害者中没有人比希特勒大屠杀中 177 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更有理由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沮丧了,但是也没有人比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中表现出更加精神饱满和信心十足了。在这同一时期里,还发生了殖民帝国的结束,其中最大的是英帝国,它的结束被英国人民欣然接受,他们把过去的附属国变成了平等的英联邦成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像第一次那样突然从欧洲撤出,而是承担起复兴欧洲经济的初步责任,它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盟关系,保证了西欧的独立将近四十年之久。

在同一时期内,黑色美国人的地位也发生了一场和平革命。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于仍旧没有得到纠正的犯罪和弊端感到愤慨,但是我们在感到愤慨的时候最好不要忘记已经取得的成就,哪怕只是为了鼓励我们自己继续奋斗,扩大这些成就。

此外,我们的历史常常是用非人格化的力量、抽象化和概括化的概念来表述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绕到这一切的背后,深入到有关的个人,我们常常会遇到在勇气、自我牺牲、悲天悯人、领袖才能和承受苦难方面达到非常崇高的境界的男男女女的榜样,例如,在抵抗运动中,甚至在集中营中,而且不仅是在战争期间,在战后的年代里也是如此。这些例子令人注目的地方是,它们所表现的行为往往是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凌驾环境的力量的男男女女的行为。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这些男男女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顾死亡的危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肯定要死的,或者肯定会遇到更悲惨的结局,但是他们仍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这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忠于事业或理想?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钦佩赞美他们?是因为我们感到他们的行为恢复了我们对人性的信任?这一直是西方大多数国家人民在整个历史中的反应,这显然仍是我们自己的反应,尽管由于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和组织的规模十分庞大和非人格化,个人常常显得无足轻重,这在别人看来是这样,自己看来也是这样。

这就把我又带回到这样的问题:在人对同类做了这么邪恶的伤人之事以后,我,或者任何一个别人,怎么仍能够“相信人”,或者侈谈什么人文主义传统呢?如果说,我充分理解这种行动所引起的反感,那么,反过来我也要问,这种反感的根据是

什么？这种对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每天提出抗议的根据是什么？除了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不应该这么待人以外，除了对个人天赋的价值——那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的信念以外，这种抗议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感到愤慨的根据是什么？

有一种反驳的论点是，由于纳粹主义和集中营是德国的现象，而德国人是所有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而且也是受到人文主义的教育<sup>179</sup>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否定人文主义传统的作用了。这是乔治·斯坦纳\* 在他的讲座稿《在蓝胡子的城堡中》所提出的论点，他在其中表示了他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反感，而他本人也是这一传统的产物：

有很大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欧洲文明机构以不同程度的欢迎态度来对待这种不人道的行为。附近达豪(集中营)发生的事情丝毫也不影响慕尼黑冬季音乐节演奏贝多芬的室内乐。屠夫们手中拿着导游书崇敬地走过去时，博物馆墙上的油画仍挂在那里。<sup>①</sup>

这里，我想我们又得听一听托马斯·曼是怎么说的，他早在1923年就说过，他看到了在歌德和洪堡时代以后发展形成的德国版人文主义与英、法、美版不同的地方是，德国版的人文主义专心致志于内心的修养，即 Bildung，以及它拒绝“客观的、政治的世界，因为路德说，‘这个外界的秩序是无关紧要的！’”<sup>②</sup>托马斯·曼像歌德一样，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这种片面专心致志于

---

\* George Steiner(1929— ),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托尔斯泰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1958)、《悲剧的死亡》(1960)、《语言和沉默》(1967)等。

Innerlichkeit(内心)的倾向,但是,就是在这个倾向上,托马斯·曼看到了德国历史上为什么“恶”常常产生于“善”的原因,比如在宗教改革里,在浪漫主义运动里,在德国受过教育的阶级未能抵抗纳粹主义这个事例里。

我并不是说,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希特勒的兴起或者甚至德国受过教育的阶级坐视他上台的满不在乎态度。纳粹主义不是一个可以用单一原因来解释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托马斯·曼接触到了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不论受的是人文教育,还是理工教育,对于用今天民主国家的大众化方式进行的政治活动,常常抱着嫌恶和蔑视;还有一点是由于他们放弃公民人文主义的理想而会产生后果。

人文主义传统中,使得二十世纪过来人念念不忘的,就是人性本善而且可以益臻完善的信念,就是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特色的乐观主义,就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版本的人文主义对科学、进步以及前途所感到的信心。但是这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把人文主义历史发展某一阶段当作整体的代表,这一点我已多次指出。启蒙运动只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某一个阶段,而这个传统本身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世界和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个世界的发现。

180 忽视人文主义的这段早期历史,例如古代世界的斯多噶主义,或者蒙田在宗教战争的残酷和不容异见期间的重新阐明它,使得它的许多批评者都忽略了,比较现实的人文主义观点承认人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人的潜在创造性上,寄托在那潜在的力量一旦觉醒可能完成什么样的成就上,而不是寄托在人的天性善良上,也不寄托在人的天性邪恶上。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正是对十八世纪乐观主义观点的人文主义提出的另外这一种观点，一直由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相继保持着。他们，从歌德到马修·阿诺德、拉斯金和莫里斯，都极为不同意那些相信进步的不可避性的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一种新版本的人文主义开始出现，它打破了较早时期的乐观假定，认为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人性的双重性质，承认个人和社会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是由易卜生、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先驱者所早就阐明了的。

任何关于人的哲学，在经过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没有一种能保持完整无损的。同人文主义的观点一样，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它们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经历所揭示的人类苦难的深沉和人性邪恶的不可测。但是，要接受这一挑战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它在十九世纪留下的形象，即自由乐观实证主义那个版本，却极为不同。人文主义传统这个新版本有多大希望能够熬过这一次经历而面对我们说过的持续的挑战，是我们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当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的惨无人道，激起了世人无与伦比的愤慨，而在战后恢复自由的人们，不论在西欧或在以色列，他们表现出来的恢复力量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双重事实向我们表明，这个问题不是随便可以打发掉的。

### 三

另外有一个论点是，人文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阶

段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在一个已从个人主义转到集体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它的地位。

我到如今为止采取的历史观点的价值是,它表明:把人文主义视为就是等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适用于人文主义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大致可以说是从亚当·斯密的《原富》(1776)到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总论》和罗斯福新政之间的一个半世纪。以它来解释古代世界原来的人文主义或者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再生复活的人文主义,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它也忽略了另外181 一种版本的人文主义正是对那些最明显地表明是经济个人主义的成分抱批判态度的。这种经济个人主义在十九世纪不乏表现,后来终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产生了结果,那就是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采纳了主张政府干预的纲领。

除了这些历史的局限性以外,我认为没有理由同意随便把经济个人主义与更加具有根本意义的人的个体性等同起来。我认为后者对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性。但是个体性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抱原子式的看法,认为社会是由把自己封闭在猜疑和敌意的孤立状态中的个人组成的。相反,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要求,个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

与别人结合在一起采取行动是人类最大的潜在资产之一,也许也是其中最大的资产。一个团体的成员身份,不论是否是自愿参加的,还是像在民族或文化问题上一样,是生来具有的,都是人的个体性的必要的、也是深为满意的表现。人不仅是各

有不同特性的个体,而且是社会的存在。

我们时代的聪明人曾经说过,上帝的死亡后面跟着人类的死亡;自我的身份和个人的意识不过是融化在一系列没有相互关联的兴奋感觉之中。这是大卫·休谟在两个世纪以前讨论过的观点,也是后来由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又谈过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都没有被他们两人所接受。别的人认为,既然个人是由他的阶级或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那么像自由、责任、公正、人道这样的概念,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在应用到像阶级、民族或种族这样的集体身上才有意义。

在二十世纪里,人们如果要确保和依靠他们的自由或权利的话,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不论是由工会、政党、压力集团,还是由国家采取的。这一必要性是没有人能忽视的。而且我也已经说过,我看不出这个必要性与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个别性的强调有什么矛盾。相反,我认为这种行动是它的延伸和保护。但是,我的信念是,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国家,不论他属于什么党派,应继续把自己当作个人,并相信他们有权利受到尊重而且应该受到尊重。我同样认为,这种个人意识既没有被消除也没有得到满足,而这种个人意识,正是那些过去曾经或者现在仍旧在中欧和东欧的集体主义政权下遭过罪的人最牢牢抱住不肯放弃的。在斯大林囚犯营中丧生的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 曾写道,衡量社会的尺度是人,但是在有些时<sup>182</sup>代里,“人们说,他们没有时间考虑人,他们只是把人当作砖头

---

\* Osip Mandelstam (1891—1938), 俄国诗人。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同为阿克美派代表人物,一生经历坎坷,最后瘐死狱中。著有《忧伤》(1922)等诗集。

或水泥使用,是用来建筑的,而不是为之建筑的,”这样就忽视了人的存在。曼德尔斯塔姆把他生活于其下的斯大林比喻为古代亚述和埃及的国王。他的妻子娜德兹达对苏联生活曾作了无与伦比的记述,她在其中补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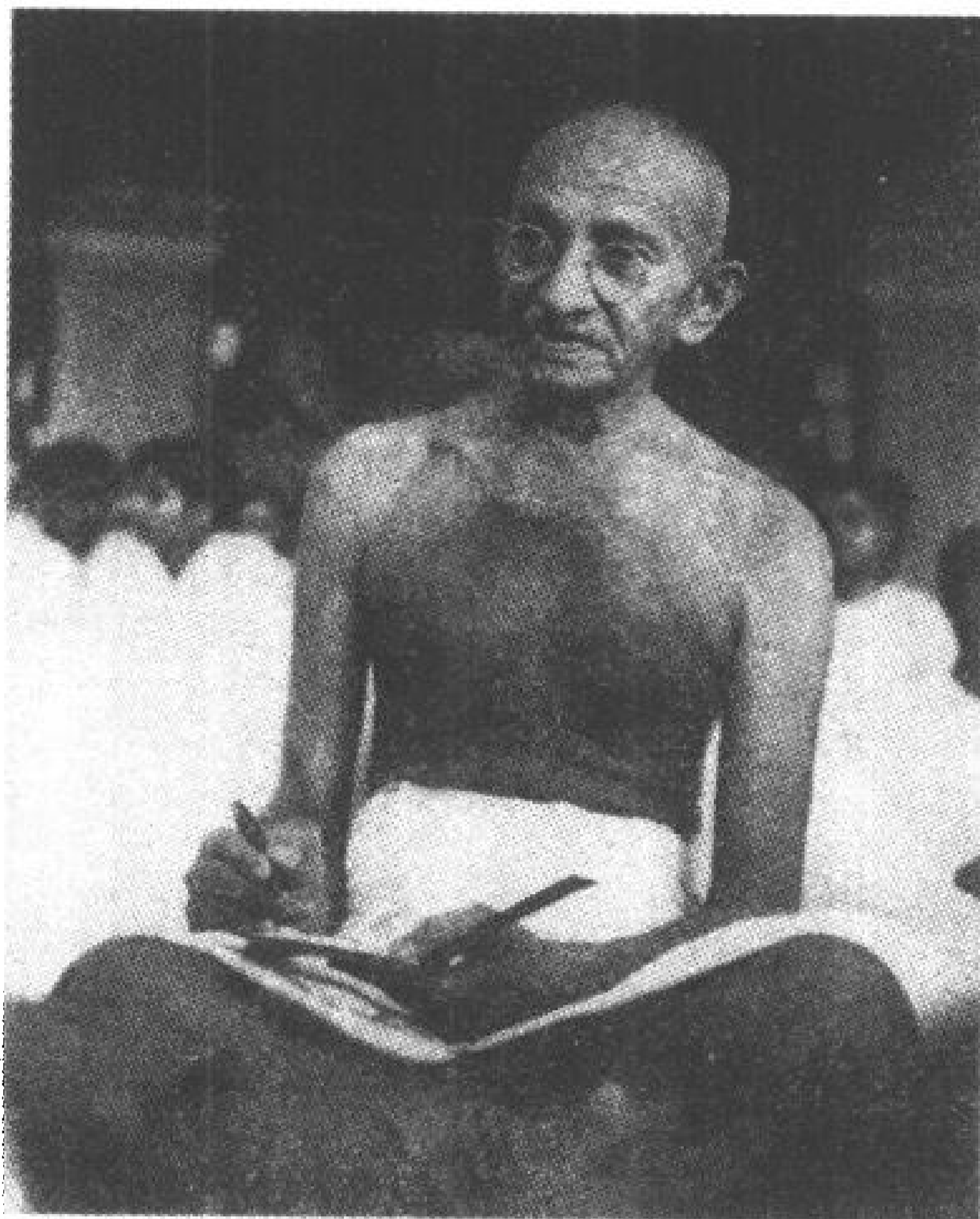
根据亚述国王的命令而消灭的这些囚犯,同凡是在建立了“铁的”社会秩序以后总会出现的、如今令我们如此畏惧的“群众”,又有什么区别?然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忠实于个人自我的。我常常注意到,在一家医院、工厂或剧院的小天地里,人们都过着他们自己的完全合乎人性的生活,并没有变成机械化,或者变成“群众”。<sup>③</sup>

娜德兹达关于“群众”的话,使我们立刻想到了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世界,想到了非洲、亚洲、南美洲和中美洲的人口众多的贫困世界问题。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同他们有什么相干呢?

印度和其他亚洲朋友们对我的讲稿所提的意见中,有一条是:我先入为主,认为人文主义传统是西方特有的,在(举例来说)印度和中国文化里,没有与它相应的东西。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即使由于我经历的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叙述西方传统时把这两个不同的传统考虑在内的话,我至少也应该承认,别的地方也有人文主义传统的存在。有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西方需要向它们学习的地方有多么多。

在二十世纪里成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采取行动的领袖中间,没有一个说的话比甘地更应该容易为西方所理解了。他





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领袖圣雄甘地④

熟读托尔斯泰和梭罗\*，这使他能够制订民间不服从和消极抵抗的策略，最终打败了英国人。

在赢得独立后，甘地前往教族暴乱最剧的加尔各答去，甘冒丢掉性命和威信的危险，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呼吁中止杀戮。他的这一行动是人文主义的公民勇气的杰出榜样。同样令

---

\*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国散文家、诗人。名著《瓦尔腾湖》(1854), 记述他在该湖湖畔的隐居生活。哲学上为十九世纪中叶超验派代表人物。其他著作有不少社会批评, 论文《民间不服从》(1849)对甘地有影响。



1983年8月一些阿根廷妇女为她们因军事独裁政权下未经审判而“失踪”的丈夫所举行的示威,该政权后来即被推翻

人感动的是,同他最接近的人问他,一旦他们需要在没有他指导的情况下担当治理印度的重任时,他有什么法宝传授给他们。甘地回答道,他们每逢需要作出一项决定的时候,就要想到他们所碰到过的最穷苦的人,然后问一下自己,这个决定会对那个穷人带来什么好处。

二十世纪的历史,若从亚洲和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是极其不同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殖民主义的结束、独立、以及如果不发生革命的话,至少也是打破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我与我认识的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交往使我相信,随着这个

过程的继续,至少在非西方世界的比较幸运的部分的继续,一旦当地居民能够把眼光放到比仅仅维持生存的更高的地方,如人权思想——不论这是否本来就是他们传统的一部分,限于某一特殊阶层或阶级——它就会是他们第一个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东西。

对于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来说,目前人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要使人权对他们来说成为现实的东西,恐怕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问题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了。即使这一点是确实的,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不应该在原则上排除人权思想,认为它不可能应用于生活在第三世界里的人,即使它可能应用于某个具体情况,作个开端。二是我们自己与世界这一部分打交道时,必须忠于那个产生了我们自己的制度的哲学思想,必须坚持,我们本人不接受 Apartheid(种族隔离),也就是不接受把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排斥在外,认为他们不能被当作可以享受我们享受的一样的权利的人。

我不相信,那些在拉丁美洲或者非洲的独裁统治下受苦的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自己不了解为了人权而代表他们提出的呼吁或者抗议。联合国宪章和欧洲人权公约,还有大赦国际的活动,在一个暴力充斥的世界里,可能仍是脆弱的工具,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权利扩大到所有国家。它们甚至在生活于独裁专政下的,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独裁专政下的国家,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没有人能够使我相信,这种人文主义的权利概念已经过时,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它是资产阶级的、白人优越主义的、或者是新殖民主义的东西。

## 四

不过,关于有没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首先必须联系西方世界来予以回答。因为,我们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和牢固确立的制度,诸如代议制议会、向选民负责的政府、自由的选举、法治、国内和平、公共教育、言论自由、福利国家,这一切都来自人文主义传统。如果我们受益于这个传统这么多的人,都对它有没有现实意义这一点丧失信心,那么就不可能说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了。

185 这些制度除非受到威胁或者丧失,否则,一旦确立以后,我们很容易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它们在实践中<sup>185</sup>的缺点上,而不是它们所代表的成就上。但是人文主义传统有它现实主义的理<sup>185</sup>由,不是由于它确保了我们的社会价值的继续存在,虽然我认为必须承认这一点,而是在于它对那些困扰着我们社会的新问题有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

这些问题是什么呢?任何人只要读一期《纽约时报》或《卫报》这样的报纸,就能开出一份清单——城市内部设施日趋破败、吸毒贩毒、退学、抢劫、犯罪、暴力、失业、贫困、恐怖活动、老年人的孤寂、污染、军备竞赛、害怕核战爆发……等等。我就不想一一列举细述人类的苦难了。但我只想指出两点。

一,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的并不完美的生物。即使在最繁荣和先进的社会里,也没有人能够一劳永逸地除掉他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每个社会所能容忍的人类的苦难

和愤怒,都是有限度的。超过这限度,就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甚至导致发生革命和内战的危险。但是在西欧和北美有组织的工业化国家中,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除非是由于战争和战败的结果,虽然我相信,对这种情况的恐惧和为了防止它的出现而采取的措施,可能加剧实际的危险。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威胁不是革命或街头巷战,而是已经露头的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以及人们互相对待的方式,这才是社会这个抽象名词背后的实质。我指的是家庭这个私人世界、男男女女之间的个人关系、对待儿童和老人的态度,以及政治这个公开世界、本地的全国的以至国际的关系、学校和地方、包括工作场所的关系。如果说,我必须想出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所担忧的东西,那个词就是独处的社会,男男女女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私人小天地里,害怕与人来往,最终丧失了交往的习惯。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对这种恶化受害最重的虽然是穷人和条件差的人,但其他的人也无一能够幸免。正如富裕阶级在十九世纪所发现的,没有人能免于霍乱瘟疫。这一发现导致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任何社会的实力不仅在于那些可以用经济和社会指数衡量的因素上,而且也在于它的凝聚力、它的道德精神、它的成员中存在充分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信任感来应付挑战,而不致像德国社会在1918年一样四分五裂成互相争吵不休的派别,从而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或者像在1940年打败了法国人的 *sauve qui pent*(大溃败)一样。

如果我们不打算接受霍布斯式的认为人类社会前途受到<sup>186</sup>权利和恐惧支配的观点——也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观点,那么我认为,在我们希望至少能够减轻我们问题的方法中,人文主义的处理办法还是可以作出不可缺少的贡献的。其中许多

方法,是无法靠政府的干预来采取的,即使可以采取,也往往不奏效,例如对外援助,除非是建立在由下而上的主动性上,或者至少是建立在来自基层的响应上。

从人文主义传统于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之日起,就有许多信念被认为与它有关,其中一个就是,在命运面前,人不是束手无策的,他们有着创造性的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可以掌握局面。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学生动乱时,我正好是大学校长,我必须努力免得我自己也染上被围心态,从而与年轻人疏远。首先给我信心,使我相信人文主义信念仍有现实意义的事就是,同我的妻子杰西·埃麦特(这次的讲座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起参加了一项阿斯本计划,我们称它为“生命的头二十年”。我们打算探索一下年轻人所造成的和所遇到的问题,从离婚而致的家庭破裂对儿童的影响,到少年怀孕和青年失业。就是从这项研究计划中,我知道了有多少年轻人和致力于帮助他们的男男女女,已经开始转而争取自助——一个人的自助和团体的自助——来对付他们所生活和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令人不安的世界。

我在自己的国家里与年轻人也有同样的经验。结果是,我由此知道了,在一个老年人不断抱怨世风日下、价值沦亡的世界里,年轻人是在尽力为自己找到有所依循的新价值观,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自己的良心概念和他们所珍视的品质概念。这些东西都不再是他们的祖父辈所有。但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也从来不是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相同的价值观,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价值观也从来不是十八世纪的价值观。

我认为,这是现代世界重新创造价值观的唯一办法。这不

再是直接传授,而是鼓励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在与长辈的讨论中,不盲从权威,而是在老一辈的同情尤其是榜样(身教不是言教)的感召下,自己去发现或者重新发现。

当人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受到怀疑的时候,年轻人想寻找他们要遵循的价值观,在我看来,正好说明了人文学可以起的作用。这需要史学、文学和在艺术的表现方法上来一场革命,不是从过去的成就出发,而是从今天年轻人的人性需要出发。但是,这也是重新发现古代世界为文艺复兴起的作用,为当时的年轻人揭示了一个陌生的激动人心的世界,供他们探索,供他们汲取营养,帮助他们对他们的经验所提出的问题和冲突,自己来作出答复。今天,可以汲取营养的材料已不再限于古代世界,还包括整个人类经验,其中有历史的经验,也有当代的经验,有我们自己西方传统的经验,也有其他文化的经验。电影、电视和录像等材料已经唾手可得,这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

这样就有一个大好机会,让上中学和大学的年轻人有可能藉这些新媒介之助,直接接触使他们困惑和感兴趣的人生经验问题,而不是接受传统的人文学课程。这反过来又可以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于诸如良心、忠心、反叛、权威、感情、自我的寻找、艺术和神话的力量、情感和同情这些问题,就像它们反映在文学、戏剧、艺术、历史和哲学辩论中一样,目的只有一个:推动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犹如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发现推动文艺复兴时期的青年人一样。

这样与人文学的接触之有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且也因为这一活动本身,它在深入其他各国人民的天地和思想时也牵动了想像力和感情。一般的教育往往倾向于向学生灌输知识,仅限于向他们传授技术和方法,而这

里使用的方法却是着重人的本性之中感情和主观的一面，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让年轻人具备自信和与别人建立满意的关系的话，这也像智力一样需要进一步加以发展。

## 五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年轻人的需要上，因为他们既是最脆弱的，也是最有希望的。不过我们大家都面临着变化，有时也都感到迷惑不解。我还注意到许多妇女要为自己寻找新的地位，转而求助于过去其他妇女的经验，阅读她们的著作、日记、信件、家史和争取妇女权利斗争史，利用人文学给她们力量，来恢复和复活其他妇女所创造的东西。

188 正是因为人文学和艺术直接地、独一无二地致力于改进人的状况，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满足个人自我发现的渴望，满足个人生活意义的渴望——与过去的时代一样，这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我才相信，它们应该仍旧是我们的教育和生活的一个必要部分。

这个看法在未来的世界中不再有效了吗？我的信念是，它甚至可能更增强了力量，不管你对未来作出什么假定：乐观的假定是未来世界将会给我们更多的闲暇和自由，多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悲观的假定是，现代生活的状况将会把更多的限制加在我们身上，就像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一个拥挤的机场里似





妇女争取投票权。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1910 年 6 月在伦敦举行的示威

的。我认为不论哪一个假定更接近真实,不论是从新的可能性的感觉出发,还是从保护他们感到已受到威胁的人道出发,人们肯定比以前更加需要机会,更加坚决地要求得到机会,来发展他们的个体性,确立他们的自我意识,根据他们本身的权利,来把他们当作人看待,而不是作为社会政策的对象,或者政

治策略的工具。

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今日已成为西方社会的特点,我可以从其中找到许多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普通公民,我同别人一样,对于这些运动常见的过份夸大、咄咄逼人和好表现自己的倾向,感到恼火。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这种同样喧闹和捣乱的抗议运动曾经取得过什么成就,根据我这了解,我可以看出,它们也是对人文主义传统和民主制度有着关键重要性的某种东西的表现。这<sup>189</sup>就是托马斯·曼认为是德国的 *humanität* 所致命缺乏的那个因素。我指的是拒绝不加怀疑地接受政府的智慧,拒绝对滥用职权和不公正现象视而不见,尤其是拒绝默认宿命论的观点,即认为要改变现状是没有办法可想的,认为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做到使自己的呼声得到理会的。

我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也就是妇女改变对自己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已经说明了我的论点。在我进行历史探索的时候,没有比这样一些妇女受到的挫折更使我感到愤慨了:这些妇女认为自己常常比男人更有理由是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但是却被偏见剥夺了人们对这一点的承认,甚至被剥夺了对人文主义传统公开作出贡献的权利。夏绿蒂·勃朗特和爱弥莉·勃朗特今天已被视为名列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林,可是在当初,他们像乔治·爱略特一样,只能用寇勒和埃利斯·贝尔这两个男子假名才能出版她们的小说。爱弥莉·狄金森\* 囿于她的时代的习俗,生前只发表了七首诗,其余一千七

---

\* Emily Dickinson (1830 - 1886), 美国诗人。三十岁后隐居不出,所作抒情诗风格独特,含意隐晦,从后方出集子。

百五十多首都积压在抽屉里,但后来这些诗确立了她在作为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的地位。

如今来承认妇女所作的贡献为时不免已晚,但是把这方面的努力作一番介绍,是谈不上什么“女权主义”的。易卜生说的对,这不是女权问题,这是人权问题。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近年来一直受到攻击,说它吵吵闹闹,偏颇失衡,自我中心,破坏家庭,还有许多本世纪初骂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其他难听的话。但是在我看来,没有疑问,不论变化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和旷日持久,如果两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平等的话,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场笑话。

没有比马丁·路德·金\* 在他发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监狱的信中把抗议的理由说得更透彻了。这信是他在1963年民权运动高潮中写给该市其他牧师的:

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采取直接行动?为什么要静坐、游等等?难道谈判不是更好的途径吗?”你们要求谈判,这完全是对的。说实话,这正是直接行动的目的。非暴力直接行动要造成这样一种危机,要造成这样创造性的紧张气氛,使得经常拒绝谈判的地方社会被迫面对争论中的问题。它要把这问题闹得人人注目,使它不致再被忽视不顾……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向你们说,我们在民权方面得到的进展,没有一个是在未经施加坚定的、合法的、非

---

\*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 - 1968)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牧师出身,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投身黑人民权运动,主张非暴力,1968年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遇刺被害。1964年曾得诺贝尔和平奖。



马丁·路德·金在争取公民权利和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中

暴力的压力的情况下得到的。历史就是一部记述特权集团很少主动放弃特权的说不尽的悲惨故事……

马丁·路德·金援引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来作为他的根据，认为公正的法律和不公正的法律是有区别的：

190

我很同意圣奥古斯丁的看法：“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它给了隔离主义者一种没有根据的优越感，给了被隔离者一种没有根据的自卑感。用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尔的话来说，隔离用一种“我一它”关系来代替“我一你”关系，结果是把人降到物的地位。<sup>⑤</sup>

要是让我来编二十世纪人文主义文集，伯明翰狱中来书将

名列我开列的必须收入之文件的榜首。

## 六

我认为不能把人文主义视为可以与抗议等同,正如我们不能把宗教视为可以与解放神学等同一样。这样做无异是给那场关于人类本性和命运的长期而范围广泛的辩论一个过于狭隘的基础。你们当还记得,我在上次讲课中,极其重视意识的变化和人们对自己看法的变化,把这看成是勃兰兑斯早在1882年称之为“现代突破”的变化的关键,那是当时的欧洲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崩溃之前三十年。在人文主义传统的那个历史关头,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传统必须认识到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其他构成从十九世纪<sup>191</sup>到二十世纪的意识变化的因素。

结束这个讲座的一个办法是,谈一谈本世纪上半叶“现代派时期”的作家和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所创造的新版本人文主义的前途,看一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由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者和比较语法学家完成了,这些人,乔治·斯坦纳曾称之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当然继承者”。<sup>⑥</sup>如果我不采取这个办法,而选择着重谈一谈新版本的人文主义像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启蒙运动那一版本的人文主义一

---

\* Lévi Strauss(1908 - ),法国文化人类学家。著有《图腾崇拜》(1962)、《野蛮人的心灵》(1966)等。

样如何化为行动的前途，那是因为我相信，人文主义前途现在更多地取决于这一点，而不是取决于作家和艺术家、哲学家和批评家在他们私人的天地里写下的、说出的、创造的东西的独创性和真实性。在这样一个前途能实现之前，这些私人天地由于隔绝于我们大家都生活于其中的二十世纪后期日常生活天地而造成的完全孤立感和挫折感，将会仍旧像今天一样。

我在上面提到过一个办法可以打破这局面，那就是明白表示，人文主义的永恒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适用于那些到现在为止被排斥在外而致极为不满的人身上，而且应该扩大到他们身上。

但是提出抗议仅仅是这种表示的一种方式，尽管这是要在今日世界中实现人文主义原则的必要行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定义上来说，这是被排斥在决策权力之外的人们的行动，也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动。但是那些拥有决策权力的人又怎样呢？难道对于政治、政府、企业这些圈子里的人，除了抗议以外，人文主义就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了？

几年以前，阿斯本学会会长 J. E. 斯拉特曾经建议该学会设置一项研究政府管理工作的计划，他规定要研究的就是由于我们的制度——特别是公共制度，但也包括公司制度，国际的和全国性的——在应付日趋难以管理的社会时官能不全而引起的问题。

没过很久就发现，无法管理程度增长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那些在圈子外面的人对于是否能够使得任何大组织正视他们的需要或批评，普遍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除非发动大规模抗议，否则是做不到的。但是在圈子内部的人，也包括那些不

仅对他们与公众之间出现的信任差距,而且也对权威差距,深感不安的人,他们对大组织的无动于衷、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和专业化传统的根深蒂固,都感到失望。

卡夫卡和马克斯·韦伯以不同的方式都预料到了这个官僚主义问题的发展,而这个问题正是西方社会、共产党社会和第三世界社会所共有的。毕竟还是由1968年布拉格的叛逆分子<sup>192</sup>提出了“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想找到一个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吸引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中以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最令人感兴趣。但是要把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此词如今已很流行)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强求一致协调起来,则又是一个障碍,却是西方所没有的。在西方,至少在原则上,对于一种积极形式的公民人文主义来说,改革应该比较容易进行一些。

请允许我在我的人文主义人物肖像画廊里再添上最后一幅肖像来说明我的论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以来对公共事务发生影响最大的一位经济学家。但是在三十几岁以前,一点也没有有什么迹象说明他会起这样的作用。他在剑

---

\* Jürgen Habermas (1929—),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该学派因早期代表人物1931年前后曾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所工作而得名,后来六十年代又在美国恢复活动,认为由于工业和技术发展,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已过时,工人阶级已不是革命力量,革命也不再是社会革命,而是心理革命,创立自由的文化。美国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

\*\*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在法西斯狱中所作笔记,死后出版,其政治思想颇有独创的见解。

桥大学学的是数学,成了 G. E. 莫尔 \* 哲学影响下的一个小集团成员。莫尔的教导提倡一种道德的自我陶醉,认为道德是精神状态的问题,不是行动问题;亲密的个人关系和对美的期待是唯一高尚的精神状态。这种看法同佛罗伦萨时代洛伦佐·德·梅迪齐圈子里的人们的看法没有很大的不同,它鼓励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的生活是与你的朋友关系亲昵地生活(凯恩斯是个活跃的同性爱者),追求真理和美,没有任何外界义务,不受一般人的抱负和价值观的影响,后者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都是丑恶的令人厌嫌的。

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当研究生时期和在布鲁姆斯伯里集团\*\* 成员所生活的极度封闭的社会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他很可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但他被征到财政部去服务,对于战后同德国谈判的方式感到愤慨,就在三十七岁上发表了《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sup>⑦</sup>,对和约的经济后果作了杰出的论战性的攻击。从此他义无反顾地一跃而入社会公共生活,不仅革新了经济理论,而且采取了积极步骤把他的思想付诸实践:为劳合·乔治\*\*\* 的1929年竞选活动提出了经济纲领(《我们能够战胜失业》是我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购买的政治小册子),以《怎样为

---

\* George E. Moore (1873—1958), 英国哲学家。与罗素在剑桥同学,互有影响。认为哲学若与常识有矛盾就肯定是错误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对英国哲学界很有影响。著有《伦理学原理》(1903)。

\*\* Bloomsbury group, 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知识分子集团,因多数成员中艺术家、作家所居地区而得名,著名人物有维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林顿·斯特拉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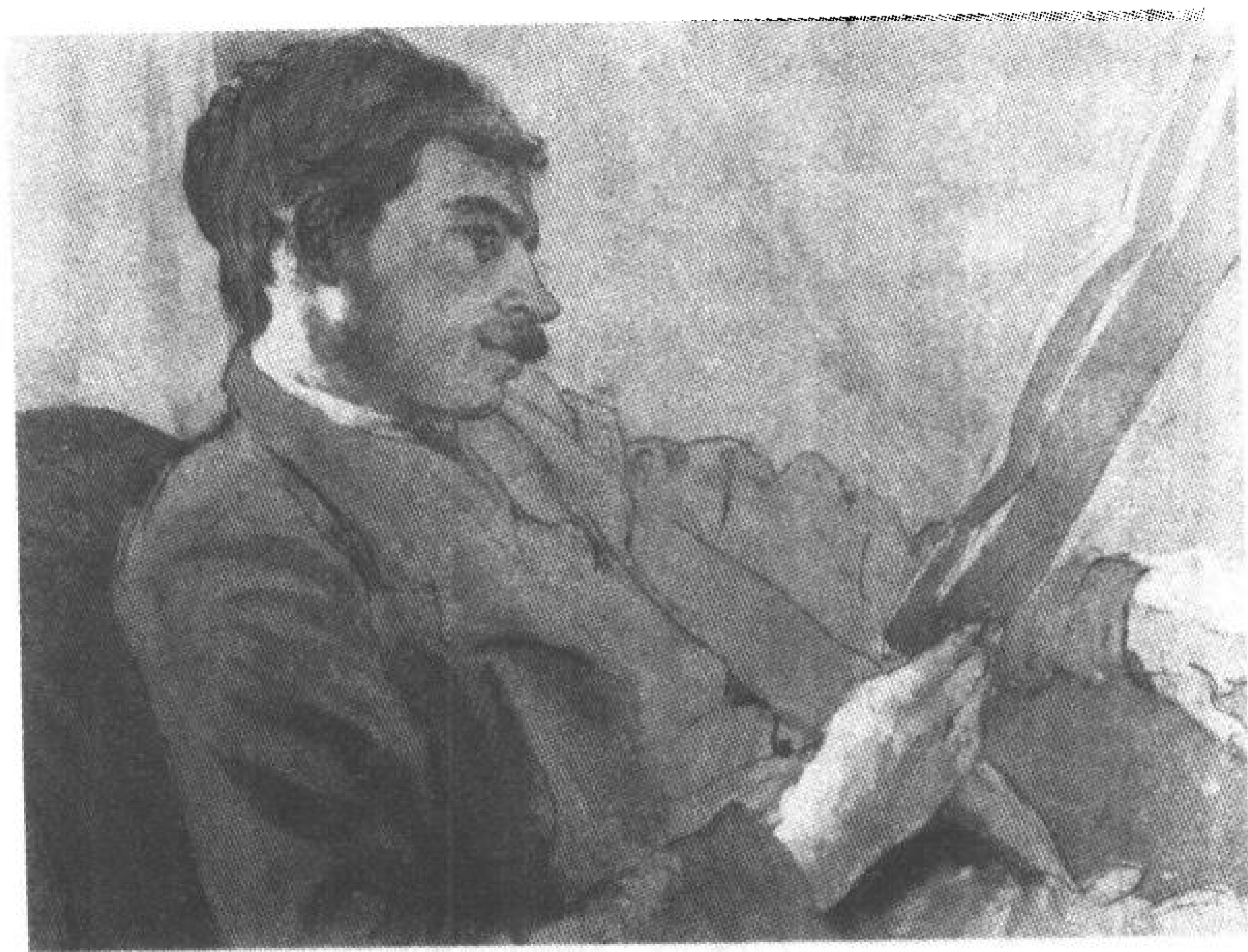
\*\*\* 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 英国政治家。自由党执政期间任首相(1916—22),为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在英国奠定基础。



战争偿债》小册子改组了财政部，在布列顿森林倡议成立战后国际货币制度，与美国谈判贷款给英国。与此同时，他还附带写了一些本世纪最优秀的政治新闻报导，为自己在股票交易所发了一笔财，为他的母校国王学院又另外发了一笔，同时他又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赞助人。凯恩斯是文艺复兴时<sup>193</sup>期意大利人所钦佩的 *l' uomo universale*（全才）的现代翻版。他最终献身于积极的公民人文主义这一点表明，他的思想和精力最后不仅造福于他自己的国家，而且也造福于整个西方世界。

凯恩斯成功的教训是，不论有多少发源于制度之外的改革思想，只有争取到制度内部的人与你对话并且被说服有改革的必要，这些思想才能起作用。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就是阿斯本学会所倡导的，它把政府和企业首脑、政治家、法官、学者、普通公民都以个人身份集合在一起，共同讨论我们社会的问题，因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再能受到他或她的职业性质的保护，不能再限于重弹老调，说一些无人反驳的断言。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我这里只举一个，那是阿斯本学会的“公司和社会”研讨会，它把六位大公司首脑和一些为消费者利益集团和其他公共利益集团工作的年轻律师请来坐在一起，从正式对抗转化为非正式面对面讨论，对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另一个关键是专业教育。我对“专业”一词所隐含的假设有疑问：那就是该词常常包含的随便缩小责任的涵义（“手术很成功，可惜病人死了”）。在专业态度形成的关键时刻，需要作出努力，说明专业能力与了解人的问题和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仅仅规定专业人员对损害的责任是不够的。



20 几岁时的凯恩斯，拉弗拉特 1908 年绘

194 图书馆里不乏这样的建议可供查阅。其中有一项建议占着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那就是区区的“布洛克工业民主报告”（1977）。<sup>⑧</sup>这个报告的产生过程使我认识到了抗拒改革的力量有多么大，即使我们能够指出，在德国、奥地利、瑞典这样的国家里，已经成功地实施了我们提出的让工人参加私有和公有大企业董事会的建议。但是产生这个报告的经验也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人文主义对这些管理问题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这里有几点看法，我相信常常被忽略，而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它们突出出来的。

一是，俄国和中国同西方一样，它们的全部二十世纪历史

都在警告我们,仅仅为技术问题寻找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不论多么具有吸引力,到头来都是幻想。人的维度是不能弃置不顾的。怎样克服对创新的抗拒,怎样争取到合作,这是最困难的,到头来也是决定性的问题。

二是,虽然电脑和现代通讯系统对人的决策工作和发挥领袖作用是极好的帮助,但它们不是代替品,不是那些有责任做出决策进行领导的人逃避作出判断(这必然包括价值判断)的责任的手段。我们没有办法躲进对标准问题自动作答的非人格化的天地。

三是,任何组织所能得到的最大资源就是人的才智、经验和忠诚。但是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些资源更加被普遍地低估了。通过教育,通过争取企业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和致力于企业的成功,可以有利地开发这些资源。在这方面的任何投资,都会比在场地、建筑、设备上积压资金,产生更大的效果。

四是,边沁和哲学上的激进派曾经对旧制度提出如下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也应用到二十世纪的机构臃肿的组织和计划,就会产生没有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发人深思的效果。这些问题是:

这有什么用处?

它要完成什么目的?

它是必要的吗?它能像所说的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人民是不是要些别的东西?

他们的要求能够更加简单地得到满足吗?

## 七

现在如果你问我,我是否认为在一个结构像我们的那样僵化的世界里,用纯洁的理性之光把显而易见的道理说出来就能产生效果呢?我只能回答“否”。我愿意努力促使这样的人文主义批判能够成为管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内容,但是仅仅靠它本身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说到头,甚至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个剧烈得多的方法,也只能吓一吓中国的官僚主义,而不能根除它。要不是我相信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猾”,我很可能感到绝望的。这是一句听起来煞有介事的大话,说的只是变革是必然的,甚至官僚机构也不可避免地必须适应它。

哪怕只是二十年之前,有谁会相信,技术的进步会在这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对重型制造业的重视?当时这就代表了工业。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作为今天特色的大规模官僚组织——包括政府和公司内部的官僚组织——会逃得过这类似的变化呢?或者,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技术的进步只会导向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呢?有没有可能,技术造成了出现小规模、非集中化的组织的条件,结果有利于个人和小型组织,在这种小型组织里,个人能感到自由自在,而不是加强无形的、到处存在的非人格化力量,就像乔治·奥威尔\*所创造的1984年噩梦?这是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如果是的,我们怎么来利用它?这个问题至少是值得问的,就像我们当作阿斯本学会一个研究项目的另一个问题一样:工作模式的改变会有什么

意义？这不仅是对生产，对经济学而言，而且也是对人而言，对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寻求满足的方式而言。

如果我问一下自己，我一生从事历史和人文学的研究，我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会用五个字来回答：前途不可测。谁能知道明天的日程会是什么？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测的，特别是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至少是，会作出一些什么发明，包括技术上的进步。但是，即使你能预测到不少关于五十年或一百年后人类生活外部环境的情况，却没有人能预测，人类对这种环境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回过头来看一看本世纪初的预测，你就会发现，人类飞向月球是被正确地预测到了，但是人类历史的走向却没有被正确地预测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情况也没有被正确地预测到。

有多少人预见到了 1914 年大战的时间之长和它的特点？预见到了德国会战败，或者战败后再一次角逐欧洲的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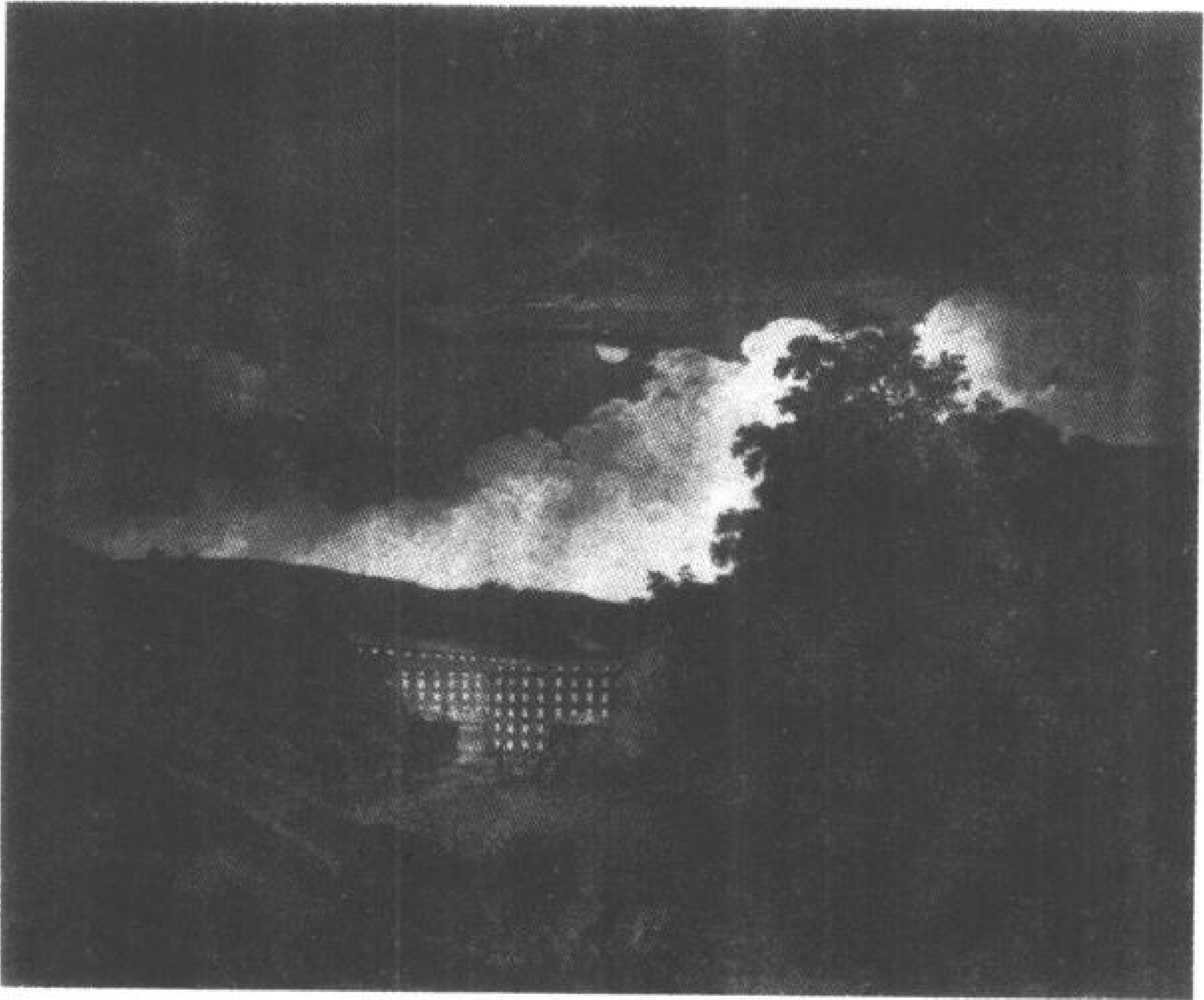
有多少人预见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会上台，千年帝国只存在了十二年，在 1940 年还显得无敌于天下的希特勒会把德国引向第二次战败，而在战败之前竟想一举灭绝欧洲的犹太人？ 196

有多少人预见到了以色列国家会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诞生，欧洲各个帝国包括英帝国会在战后消失，日本在美国援助下新生后会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和技术对手，两次战败和陷于分裂的德国最后会在英德抗衡中成为胜利者？

我还可以这样问下去。在十八世纪末有谁会预见到当时

---

\* George Orwell (1903—1950), 英国作家。本名 Eric Arthur Blair, 著有《动物农场》(1945)和《1984》政治寓言小说, 曾引起西方思想界的注意, “1984”已成了未来极权主义社会的同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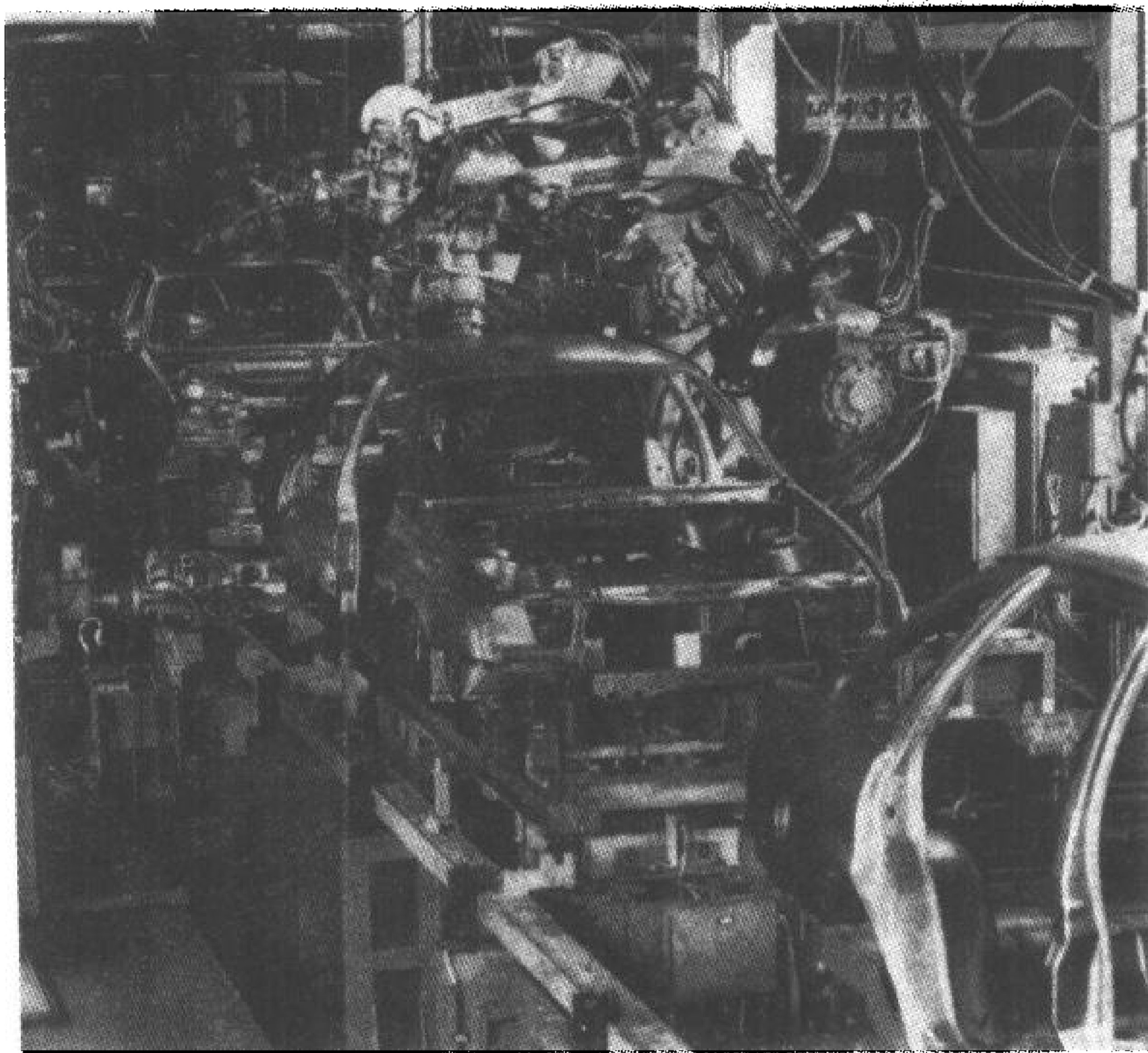


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依靠水力发电。图中为克隆福德的棉花厂，筑在德温特河岸，于 1771 年建成，由约瑟夫·赖特于夜间画成

以英国少数几家纺织厂和铸铁厂为代表的工业化会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有谁会预见到物理学的革命会改变科学家对宇宙和物质的看法？

正是历史学和人文学的研究使我们保持了未来还没有定局的意识。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少数人相当突然地感到了一种冲动，要想重新发现古人的世界，结果，由此产生了他们要创造一个自己的新世界的信心。

这就是六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所代表的东西：拒绝接受决



工业革命最后阶段。1982年设在伦敦达根哈姆的福特汽车车身厂由机器人代替装配线上的锻工

定论或简化论的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

对于那些渴望安全、渴望能得到保证,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去干,所期望的结果必然会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够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我认为这就是人文主义态度继续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些人认为,信念总是这么一回事:你必须在完全得到确证之前就下定决心;他们强烈反对压倒我们的无能为力感。但是人文主义态度并不保证大家都会作出好的选择,正确地预见到结果,或者避开灾祸,而只保证,如果我们能找到勇气和意愿来作选择,那么仍有许多选择供我们去作。



### 绪论和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

- ① 音乐家有阿瑟·鲁宾斯坦、格里戈尔·皮阿蒂戈尔斯基以及季米特里·米特罗保罗斯指挥的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一年一度的阿斯本音乐节由此产生,这是歌德纪念会的音乐方面的收获。
- ② 西塞罗,《论演讲》(公元前 55);昆的利安,《演讲术》(约公元 96)。
- ③ 埃尔温·潘诺夫斯基,《文艺复兴和西方艺术的再生》(斯德哥尔摩 1960,纽约 1969),第一、二章。
- ④ 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散文》(《意大利文学·小说》,第 7 卷,米兰 1955),拉丁原文和意大利译文,第 722—23 页。
- ⑤ 我的同事乔治·霍尔姆斯博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权威,他向我指出受过教育的非教士信徒中的公证人的重要性。在十四世纪中叶,仅在佛罗伦萨一地就有六百人。他们同律师有紧密联系,主宰着私人来往和许多政府机关官方文件的制作。几乎所有的主要人文主义者,从彼特拉克、布鲁尼和萨鲁塔蒂到马基雅维里,或者本人就是公证人或者出身于公证人家庭,对于用第一流拉丁文写作有着职业上的兴趣。对于霍尔姆斯博士的这一点指教以及他对本章内容所提的许多其他专家意见,我深表感激。
- ⑥ 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文化和社会,1420—1540》(伦

敦,1972),第九章,“社会框架”。

⑦ 伯克,上引书,附录,“有创造性的精英”。

⑧ 例子有格罗青(1446—1519)在1488—1490年;李那克莱(1460—1524)在1486—1492年;科莱特(1467—1519)在1493—1496年。

⑨ 引文摘自里多尔非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撰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文章,刊第15版,第2卷,第230页。又见罗伯托·里多尔非《马基雅维里传》两卷本(1969年第4版),西西尔·格雷逊英译本(伦敦,1963)。

⑩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2卷,第12章。莱斯利·瓦克英译本,两卷本,1950;平装本,伯纳德·克里克编,哈蒙兹沃思,1970。

⑪ 见弗朗西斯·叶芝,《炼金术士的启蒙运动》(伦敦,1972)和彼得·法兰奇的关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魔法师的研究,《约翰·第》(伦敦,1972)。弗朗西斯·叶芝在她一本较早的著作《布鲁诺和炼金传统》(伦敦,1964)中,追溯了斐契诺和米兰多拉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如何形成这一传统,并在《世界戏剧》(伦敦,1969)中继续她对该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研究。

⑫ 保尔·奥斯卡·克里斯泰勒,《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根源》,迈戈尔·穆尼编(纽约,1979),第167—168页。并见同一文集中第4篇论“异教和基督教”,第9篇论“人的尊严”。

⑬ 这种教本最早的有从1470年代开始的弗朗西斯科·巴特里兹的《王国和国王教育》,北方的例子是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王的教育》,该书于1519年完成,献给了弗朗西斯二世。它们后来得到了一部同样重要的系列的补充,其中卡斯蒂里昂尼的《朝臣》可作为样品,这是以他在乌比诺宫廷经验为根据的。英国的例子是托马斯·爱略特的《名为总督的书》(1531),西班牙的例子是格瓦拉的《君王的罗盘》,据说是十六世纪读者之多仅次于圣经的书。

199 ⑭ 安得烈·夏斯特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收在《文艺复兴:阐释论文集》(伦敦,1982),第238页。拉斐尔致里奥十世的书信引文

摘自该论文。

##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

- ① 彼得·盖伊,《启蒙运动》,第1卷,《现代异教的兴起》(伦敦,1970),第3页。
- ②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格言84。我用的译文登在埃德温·A·伯尔特编的文集《英国哲学家,从培根到穆勒》(纽约,1939),第58页。
- ③ 《新工具》序言,伯尔特,上引书,第25页。
- ④ 盖伊,上引书,第1卷,第269—279页。
- ⑤ 伏尔泰,《波林布洛克先生的重要考察》,收在《全集》,第26卷,第198页。
- ⑥ 狄德罗,(1762年9月25日),《通讯》,乔治·劳思编,第4卷,第178页。
- ⑦ 伏尔泰,《演讲五十篇》,1762年发表,但早已在十年前写于普鲁士宫廷。《全集》,第24卷,第354—355页。
- ⑧ 狄德罗,《哲学著作》,维尼埃尔编,(巴黎1956),第240—241页。
- ⑨ 同上,第191页。
- ⑩ 两个著名例子是伯明翰月球学会和美国哲学学会。詹姆斯·瓦特、马修·波尔顿、约瑟夫·普里斯特莱都是前者的会员;后者由本杰明·富兰克林1743年在费城建立。
- ⑪ 孟德斯鸠,《罗马人兴衰原因考》(1734),《全集》,纳格尔编,三卷本,第1卷(巴黎,1950),第482页。罗伯特·沙克尔顿已经证明,所引这篇文章受到了维柯的朋友无藉藉名的那波里哲学家保罗·马提阿·多里亚在《公民生活》一文中的一段话的启发。见沙克尔顿,《孟德斯鸠》(牛津,1961),第168页。
- ⑫ 《休谟论文集》,塞尔培一比格编(牛津,1888),第XX页。

- ⑬ 康迪耶克,《论人的意识的起源》,收在《哲学著作》中,乔治·勒·洛埃编,三卷本(1947—1951),第1卷第4页。
- ⑭ 《休谟论文集》,第13页。
- ⑮ 诺曼·汉普逊所引,《启蒙运动》(哈蒙兹沃思,1968),第122—123页。
- ⑯ 艾耶,《休谟》(牛津,1980),第96页。
- ⑰ 笛卡儿,《精神的情感》,1649,第50条(刘易斯编,巴黎,1955)。
- ⑱ 休谟,《人的知性探索》,见塞尔培—比格编《休谟论文集》第25页,大卫·休谟,《人的知性和道德原则探索》,第3版,尼迪契编辑修订(牛津,1975)。
- ⑲ 《休谟论文集》第415页。
- ⑳ 狄德罗,《哲学思索》,见《全集》,阿塞札特和杜尔纽编,20卷本(1875—1877),第1卷,第127页。
- ㉑ 《休谟论文集》,第487页。
- ㉒ 休谟,《探索》,第75页。
- ㉓ 《休谟论文集》,第183页。
- ㉔ 包括这个事实:卢梭有一时期曾是一个流行的作曲家,以有关音乐的文章名闻遐迩。《百科全书》有关音乐条目都是他写的。盖伊,上引书,第2卷,第534—535页。
- ㉕ 卢梭,《全集》,普雷德版,盖涅平、雷蒙德等编,4卷本(巴黎,1959),第1卷,第7页。
- ㉖ 同上,第351页。
- ㉗ 卢梭,《第三对话录》,同上,第936页。
- ㉘ 卢梭,《文集》(巴黎,1964),第3卷,第164页。
- ㉙ 卢梭论自己,见《全集》,第1卷,第934—935页。
- ㉚ 卢梭,《爱弥尔——论教育》,加尼亚兄弟公司版(巴黎1964),第76页。
- 200 ㉛ 同上,第103—104页。

- ⑳ 《第三对话录》，《全集》，第1卷，第934—935页。
- ㉑ 大卫·休谟，《论趣味标准》，《哲学著作》，格林和格罗斯编，4卷本（1882），第3卷，第271页。
- ㉒ 尼古拉斯·彼夫斯纳，《欧洲建筑概述》（伦敦，1960），第624—625页。
- ㉓ 这是在1769—1790年之间发表的。见雷诺兹，《论艺术》，罗伯特·瓦尔克编，第2版（新港，1975）。
- ㉔ 以赛亚·柏林爵士，《维柯和赫尔德》（伦敦，1976），第147页。赫尔德自己的《人类史的哲学的思考》（1784—1791）（弗兰克·曼纽埃尔节译本，芝加哥1968）没有写完。
- ㉕ 柏林所引，上引书，第165页。
- ㉖ 同上，第158页。
- ㉗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诺曼·史密斯英译本（伦敦，1933），第65页。
- ㉘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本原理》，阿博特英译文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关于伦理学理论的其他著作》，第5版（伦敦，1898），第18页。
- ㉙ 康德，《判断力批判》，伯纳德英译本（纽约，1951），第37页。
- ㉚ 伯克著名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一书直接攻击的对象，那个热心的激进派理查德·普赖斯博士宣称，作为“人类提高的进步航向上的一个步骤”，美国革命仅“次于基督教义在人类中间的传布”。汤姆·潘恩在《普通常识》中指出了美国的另外一个形象，使得下一世纪成百万的人把它看成是“欧洲各地受到迫害的公民和宗教自由热爱者的避难所”。

### 第三章 十九世纪：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 ① 托克维尔，《英格兰和爱尔兰之行》，劳伦斯和梅耶尔英译本（伦敦，

- 1958), 第 107—108 页。
- ② 托克维尔,《全集》,9 卷本,古斯塔夫·德·布蒙编(巴黎,1860—1866),第 3 卷,第 514 页。
- ③ 同上,第 519—520 页。
- ④ 同上,第 5 卷,第 425 页起。
- ⑤ 托克维尔致亨利·里夫斯信,1837 年 3 月 22 日,同上,第 4 卷,第 67—68 页。
- ⑥ 《旧制度和革命》于 1856 年出版,英译者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纽约,1955)。
- ⑦ 托克维尔,《全集》,第 8 卷,第 321—322 页。
- ⑧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英译文收在包顿莫尔编的《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哈蒙兹沃思,1970),第 51—52 页。
- ⑨ 以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第 4 版(牛津,1978),第 116 页。
- ⑩ 巴克·费尔莱,《歌德研究》(牛津,1947)中所引,第 163 页。
- ⑪ 同上。
- ⑫ 布鲁福德,《德国的自我修养传统:从洪堡到托马斯·曼》(剑桥,1973)中所引,第 69 页。
- ⑬ 同上,第 72 页。
- ⑭ 同上,第 70 页。
- 201 ⑮ 卡尔·巴尔特,《十九世纪新教神学》(苏黎世,1947),第 379 页。
- ⑯ 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最初发表在 1807 年。
- ⑰ 穆勒关于边沁的文章发表后又写了一个关于柯勒律治的姊妹篇,也发表在 1840 年的《西敏寺评论》上。剑桥大学出版社予以重印,附有 F. R. 李维斯的序言,书名为《穆勒论边沁和柯勒律治》(1980)。穆勒关于边沁的这几句话见第一篇论文,第 40 页和 73 页。
- ⑱ 穆勒关于柯勒律治的话见第二篇论文,同上,第 108,130,132 页。

- ① 托马斯·卡莱尔,《时代的迹象》(1829),见《选集》,第2卷,第233页。
- ② 柯勒律治,《俗人讲道》,怀特编(伦敦,1972),第205页。
- ③ 穆勒,《自传》,拉斯基编(牛津,1924),第56页。
- ④ 迈戈尔·圣约翰·派克从1834年4月的一封信中引用,见《穆勒生平》(伦敦,1954),第83页。
- ⑤ 穆勒,《自传》,第180页。
- ⑥ 派克,上引书,第400页。
- ⑦ 派克作了很好的总结,同上,第402页。
- ⑧ 穆勒,《论自由》,麦考伦编(牛津,1946),第104页。
- ⑨ 穆勒,《自传》,第216页。
- ⑩ 引自巴锡尔·威莱,《十九世纪研究》(伦敦,1949)中,第230页。
- ⑪ 《乔治·爱略特生平,见其书信和日记中所述》,克劳斯编,3卷本(爱丁堡1885),第3卷,第245页。
- ⑫ 日期为7月5日。克劳斯,上引书,第2卷,第118页。
- ⑬ 见《便携本马修·阿诺德》序言,这是他为海盗出版社编的(纽约1949),第3—4页。
- ⑭ 引自“沙特勒兹大修道院”,同上,第151页。
- ⑮ 同上,第473页。
- ⑯ 同上,第476—479页。
- ⑰ 罗伯特·莫兰特(后封爵士)是教育部中负责起草1902年法案的官员,该法案废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的学校委员会制度,规定由县政和区政委员会负责中小学教育。非国教徒强烈反对该法案,但该法案由巴尔福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强制通过。
- ⑱ 引于巴锡尔·威莱上引书,第261页。
- ⑲ 约翰·拉斯金,《威尼斯的石头》,第2卷,第6章,“哥特式建筑的性质”,1899年版第163—165页。
- ⑳ 威廉·莫里斯,“我是怎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重印于《无与伦

比的莫里斯》，科尔编(1948)，第 657—658 页。

⑳ “共产主义”，同上，第 663 页。

㉑ 《原富》(1778)；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 2 版(1890)。

㉒ 《科学原理》(1892)，第 24 页。

㉓ 迈戈尔·比迪斯所引，《群众的时代》(哈蒙兹沃思，1977)，第 52 页。

㉔ 同上，第 106 页。

## 第四章 二十世纪：走向新的人文主义

① 没有疑问，我们只是在重新发现在我们的父母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事情，这是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经历的。不过我于六十年代早期在伦敦发表的一次演讲“二十世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非专家的听众却引起相当的新奇感，以致《泰晤士报》对此发表了一篇社论，英国广播公司在“1900—1914 激进年代”的系列节目里把它当作开场白。它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企鹅丛书现代文学指南》中，题为“双重形象”，收在《现代主义 1890—1930》一卷中，编者为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1976 年第一版。当然，其他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里也作出了同样的发现。

② 维吉尼亚·伍尔夫，“贝纳特先生和布朗先生”(1924)，重刊于《散文选集》(伦敦，1966)，第 1 卷，第 321 页。

③ 1898 年 5 月 26 日，引于迈戈尔·麦耶尔，《亨利·易卜生》，第 3 卷。《寒冷的山顶，1883—1906》，第 297 页。

④ 尼采，《全集》三卷本(慕尼黑 1960 第 2 版)，第 2 卷，《欢快的科学》，第 127 页。

⑤ 斯特林堡为《裘莉小姐》写的序言，收在《国际现代剧本》(人人丛书版，伦敦，1950)，第 5—16 页。



- ⑥ 麦耶尔,上引书,第3卷,第253页。
- ⑦ 约翰·弗莱彻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派戏剧:起源和模式”,刊于《现代主义 1890—1930》,第504页。
- ⑧ “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刊于《现代主义 1890—1930》,第46—52页。
- ⑨ 欲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新激进主义的情况,请看彼得·克拉克,《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剑桥,1978)。
- ⑩ 写毕于1905年,发表于1922年,译成英文题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伦敦,1930)。
- ⑪ 威廉·詹姆斯引用于《心理学原理》,第1卷(纽约,1904),第131页。
- ⑫ 雅克·巴尔宗(在《与威廉·詹姆斯一起散步》,芝加哥,1983)引用柏格森致詹姆斯的一封信中的话:“人们想当然把实用主义看成一定是简单的东西……我不断地重复说,相反,[它]是哲学里所出现的最微妙、最细腻的学说之一。”(第107页)作为詹姆斯文风的一个例子,这里摘引他对相对于“心地坚强的”气质的“心地慈善的”气质(正好与当今一般用法相反)的描写:心地慈善的有“一种教条的和权威的面孔。‘必须’这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它的宇宙的腹带必须系得很紧。它不想有什么东西发生偶然的意外,而是要保持永恒不变。经验的易变必须建立在不变性上。”他对经验作的定义可以作为他在这一点上的创见的例子:“我的经验是我同意要照顾的东西。”
- ⑬ 引于欧纳斯特·琼斯,《席格蒙德·弗洛伊德生平和作品》,3卷本(伦敦,1953—1957),第2卷,第417—418页。
- ⑭ 海因斯·哈特曼,《心理分析和道德价值观》(1960),第17页,彼得·盖伊引用于《弗洛伊德、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现代派文化中的主宰者和受害者》(纽约,1978),第69页。
- ⑮ 《“文明的”性道德和现代神经病》(1908),并由盖伊引用,上引书,

第 67 页。

- ⑯ 盖伊,上引书,第 70 页。
- ⑰ 法莱尔在《丰塔那现代思想词典》中,该词典在美国改名为《哈泼现代思想词典》出版,阿伦·布洛克和奥立佛·斯泰利布拉斯编(1977),第 247 页。
- ⑱ 于 1947 年修订,重印于《自由派的想像力》中(纽约,1950)。
- ⑲ 见约瑟夫·康培尔,《千面英雄》,第 2 版(普林斯顿,1968)。
- ⑳ 约翰·门肯是巴卡研讨会(见本书序言)的参加者之一,他曾是弗兰克·洛埃德·赖特在新墨西哥州塔利辛修建著名房屋时的年轻学徒。他告诉我们说,赖特要求每个新徒工做一个木工工具箱,配备必要的工具:“这个任务几乎包含着强烈的暗示,他必须熟悉爱默生、梭罗、惠特曼。”
- ㉑ 我很高兴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我作为塔特画廊董事会主席能够起一定作用为国家购得巴巴拉·赫普沃思的房子和花园(以及全部雕塑)。另一件是同丹麦建筑师阿尼·耶可布生合作,建造牛津大学圣凯塞琳学院,这是一所古老大学里的一个现代学院,尼古拉斯·彼夫斯纳爵士曾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建筑。设计首尾一致,细节分毫不爽。自我约束是它的信息,表现在整体和局部的全部几何学中,你不论在走动或停下步来都可感觉到”(《英国的建筑》,牛津郡,1974)。见彩色版 X X V 和 X X VI。
- ㉒ 例子有《卡利加里博士的壁柜》;《大都会》;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让·雷诺阿的《乡下一日》和《游戏规则》;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
- ㉓ 卡夫卡于 1924 年死于维也纳,几乎默默无闻。《审判》是死后于 1925 年出版的;《城堡》出版于 1926 年。
- ㉔ 埃立克·海勒,《卡夫卡》(伦敦,1974),第 26 页。
- ㉕ 皮蓝德娄的两部最有名的剧本出版于 1921 年(《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和 1922 年(《恩立科四世》)。

- ⑫ 盖伊,《弗洛伊德、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第26页。
- ⑬ 引于布鲁福德,上引书,第231页。
- ⑭ 同上,第246页。
- ⑮ 引于布鲁福德,上引书,第254页。
- ⑯ 例如,见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出版于1762年。歌德读后印象极深,随即译成德文。弗洛伊德对狄德罗预见到俄底浦斯情结也很高兴。
- ⑰ 引于埃伯哈德·布施,《卡尔·巴尔特,根据书信和自传材料写的生平》(从第2版德文本译出,伦敦,1976),第119—120页。
- ⑱ 同上,第166页。
- ⑲ 重印于罗素,《神秘主义和逻辑》(铁锚平装本,纽约,1957),第47—48页。
- ⑳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大自然和人类的命运》,平装本(纽约,1964),第1卷,第188页。
- ㉑ 由约翰·贝纳特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尼布尔条目中引用,第15版,第74页。尼布尔在他吉福德讲座中发挥了他关于上帝王国和历史领域的关系的看法,上引书,第2卷,《人类的命运》。

## 第五章 人文主义有前途吗?

- ① 乔治·斯坦纳,《在蓝胡子的城堡中》,(新港,1971),第63页。
- ② 托马斯·曼,《德意志共和国的精神和实质》,1923年6月,引于布鲁福德,上引书,第vii页。
- ③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把斯大林的俄国同亚述和埃及相比可以见于纳德兹达·曼德尔斯塔姆的《万一希望》,马克斯·海华德译(纽约,1970)。这里的引文是企鹅版第308页该章的最后一段(哈蒙兹沃思,1975)。
- ④ 此幅甘地照片是印度刊物《研讨》发行人和主编罗梅什和拉贾·泰

巴尔送的,他们都是巴卡举行的阿斯本学会研讨会的参加者(见本书序言)。

- ⑤ 马丁·路德·金的信重刊于《非裔美国人史:第一手资料来源》,托马斯·弗拉齐尔编(纽约,1970),第392—405页。
- ⑥ 刊在他的《安蒂岗》中(牛津,1984),第124页。
- ⑦ 见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中凯恩斯年轻时肖像,第1卷,《被出卖的希望,1883—1920》(伦敦,1983)。
- ⑧ 《工业民主调查委员会报告》。Cmd. (1977), 6706。

# 英汉人名术语对照表

205

〈页码为原文页码,标在正文两旁〉

## A

- Aalto, Alvar 阿尔托 150
- Adam, Robert 亚当 73
- Adams, John 亚当斯 80
- Adler, Alfred 艾德勒 143, 147
-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73
- Africa 非洲 163, 169, 176, 182, 183, 184
- "Age of Reason" "理性时代" 63, 66, 159
- Agitprop 宣传鼓动 174
- Alberti, Leon Battista 亚尔培蒂 9, 23 - 24, 27 - 28, 33, 38, 39, 40, 42, 44, 54, 71  
- 72, 151
- Alcala, University of 阿尔卡拉大学 26
- Aldus, Manutius 阿尔杜斯 25
- American 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51
-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80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184
-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49, 57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112, 138, 172
- Anglican Church 圣公会 110
- anthropology 人类学 140, 158
- anti - Semitism 反犹主义 112

antiquity 古代世界, medieval view of 中世纪的看法 14; *philosphes'* admiration for 哲学家们的崇拜, 53; rediscovery of 重新发现 12, 13, 14, 15 - 6

Aquinas, St. Thomas 阿奎那 14, 28, 189

architecture 建筑, classical 古典建筑 36; Greek revival 希腊复活 75; Neoclassical 新古典主义 74;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24;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 150 - 151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 13, 14, 21, 23, 40, 152

Arnold, Matthew, 阿诺德 9, 43, 100, 109 - 11, 112, 138, 180

arts 艺术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时期 70 - 74; fusion with humanism 与人文主义的结合 23 - 25; in Germany 在德国 96; importance of to humanism 对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157 - 8; Italian Renaissance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36 - 40; Neo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 72 - 4; Netherlands 荷兰 36, 71; 19th century 十九世纪 107;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23 - 5, 149;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 149 - 53

Ascham, Roger 阿斯坎 34

Asia 亚洲 176, 182, 183

Aspen Institute 阿斯本学会 186, 191, 193, 195

Athens 雅典 11, 20, 27, 105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27 - 8, 189 - 90

Austria 奥地利 82, 194,

Ayer, A.J. 艾耶 63

## B

Bach, J. S. 巴赫 151, 163

Bacon Francis 培根 52, 60

Ballets Russes 露斯芭蕾舞团 149

Balzac, Honore de 巴尔扎克 107

Baroque 巴洛克 70, 74

Barrés Maurice 巴雷斯 112

Barth, Karl 巴尔特 101, 161, 162

Baudelaire, Charles 波德莱尔 74 - 75, 135  
Bauhaus 包霍斯 149, 150 - 151  
Baumgarten, Alexander Gottlieb 鲍姆加登 70  
Bayle, Pierre 拜尔 51 - 52  
Beccaria, Cesare, Marchese de 贝卡里亚 59  
Beethoven 贝多芬 95, 96, 179  
Bellini family 贝林尼家族 25  
Bentham, Jeremy 边沁 9, 49, 59, 65, 103 - 105, 108, 129, 194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135  
Berlin 柏林 49, 95 - 96, 101  
Berlin, University of 柏林大学 100, 102  
Berlin, Isaiah 以赛亚·柏林 76, 77, 95  
Beveridge Report 贝弗里奇报告 140  
Bible 圣经 26, 31, 33, 108  
Biblical humanism 圣经人文主义 30, 31 - 33  
*Bildung* 修养(德文) 97, 98 - 99, 158, 179  
Bismarck, Prince Otto von 俾斯麦 140  
Black Death 黑死病 19, 175  
*Blaue Reiter, Der* 蓝骑士派 149  
Bloomsburey group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 192  
Bohr, Niels 玻尔 138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172  
Bordeaux 波尔多 50  
Borgese, G. A. 波吉西 8  
Botticelli, Sandro 波的契里 25, 40  
Bradbury, Malcolm 布拉德伯里 137 - 138  
Bradford 布拉德福 85  
Bramante, Donato 布拉曼特 40  
Brandes, Georg 勃兰克斯 133, 134, 190  
Braque, Georges 布拉克 149, 154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共同生活兄弟会 31  
British Empire 英帝国 177, 196  
Brönte, Charlotte 夏绿蒂·勃朗特 107, 189  
Brönte, Emily 爱弥莉·勃朗特 189  
*Brücke, Die* 桥派 149  
Bruegel, Peter 布鲁盖尔 42  
Brunelleschi, Filippo 布鲁奈莱契 24, 36, 38  
Bruni, Leonardo 布鲁尼 23, 24, 27, 28, 31  
Buber, Martin 布伯尔 164, 165, 190  
Buddhism 佛教 155  
Bude, Guillaume 布德 26  
Buff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布封 61  
Burckhardt, Jacob 伯克哈特 12, 13, 27, 38, 39, 44  
Burke, Peter 伯克 19, 20  
Byzantium 拜占庭 33, 67

## C

Calas, Jean 卡拉斯 56  
Calvin, John 卡尔文 33, 46, 161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26, 192  
Câmoens, Luis de 卡蒙斯 36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94, 111, 112, 142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104, 109  
Carolingian revival 加洛林王朝复兴 14  
Cartesian rationalism 笛卡儿式理性主义 53  
Carthage 迦太基 55  
Cartier - Bresson, Henri 卡蒂埃·勃莱松 152  
Cassirer, Ernst 卡西尔 77, 167  
Catherine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凯塞琳女皇 49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46 - 47, 56, 57 - 58, 157



Cervantes 塞万提斯 36, 51  
 Cézanne, Paul 塞尚 149  
 Chaplin, Charlie 卓别林 157  
 Chardin, Jean Baptiste Simeon 夏尔丹 71  
 China 中国 11, 51, 142, 148, 157, 164, 174, 176, 183, 194, 195  
 Christ 基督 15, 31, 33, 162, 164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人文主义 13, 26, 30, 31 - 32, 161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55; Enlightenment criticism of 启蒙运动的批评 55 - 58, 63;  
 and German humanism 和德国人文主义 100 - 101; humanist attitudes to 人文主义对它的态度 160 - 164; Machiavelli's view of 马基雅维里的看法 29;  
 Nietzsche's view of 尼采的看法 134; in 19th century 在十九世纪 108; and the  
 Reformation 和宗教改革 32 - 33;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29 - 30  
 Christ College, Cambridge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26  
 Chrysolaras, Manuel 克莱索拉勒 23 33  
 Church 教会, Enlightenment's criticism of 启蒙运动的批评 55 - 58; humanist  
 attitudes to 人文主义的态度 160; medieval 中世纪 14  
 Cicero 西塞罗 11, 12, 18, 21, 22, 35, 53, 172  
 cinema 电影 151 - 152, 187  
 cities, growth of 城市增长 169 - 170  
 civic humanism 公民人文主义 23, 27, 28, 30 - 31, 38, 53, 93, 179, 192, 193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189 - 190  
 Clark, Kenneth 克拉克 38, 40  
 Claudel, Paul 克劳台尔 153  
 Clerk - Maxwell, James 克勒克 - 马克斯威尔 139  
 Cold War 冷战 169, 176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勒律治 9, 101, 103 - 104, 105, 108, 159, 160  
 Colet, John 科莱特 8, 12, 14  
 Colle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26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171 - 172, 180, 181

Collingwood, R. G. 科林伍德 77, 167  
communism 共产主义 89, 148, 171 - 174, 176, 191 - 192  
Comte, Auguste 孔德 16, 90, 105, 129, 165  
Condillac, Etienne de 康迪耶克 62  
Condorcet, Marquis de 康多塞 62  
contemplative life 沉思默想的生活 27, 30 - 1, 158  
Copernican astronomy 哥白尼天文学 50 - 51  
Copernicus 哥白尼 13  
Le Corbusier 勒科布西埃 149, 151  
Corpus Christ College, Oxford 牛津基督圣体节学院 26  
Counter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13, 32, 46 - 7, 83  
Croce, Benedetto 克罗齐 77, 167  
Cubism 立体主义 149, 154

## D

Dante Alighieri 但丁 14, 22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90, 129, 142, 144 - 145, 160, 165  
David, Jacques Louis 大卫 74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80  
Deism 自然神论 57, 162  
democracy 民主 88, 91 - 93, 129, 171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23  
Depression(1930s) 大萧条 131, 176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 51, 53, 63 - 64, 144  
determinism 决定论 94 - 95, 139, 197  
Diaghilev, Sergei 佳吉列夫 149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107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9, 49, 55 - 6, 58 - 9, 62 - 3, 64, 66 - 7, 70, 71, 75, 130, 159  
Dilthey, Wilhelm 狄尔泰 77, 142, 157, 167  
Donatello 多那太罗 24, 36, 38, 39

drama 戏剧 43 - 44, 98, 107, 133 - 134, 158

Dryden, John 德莱顿 54

Dürer, Albrecht 杜莱尔 25, 36, 39—40, 71—72

Durkheim, Emile 杜克海姆 141 - 142, 148

## E

Eastern Europe 东欧 174, 175, 176, 181

Edinburgh 爱丁堡 49, 50

education 教育 112, 160;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personality 与培养人的个性  
11; in England 在英国 110; in France 在法国 34, 110; Graeco - Roman influences  
希腊罗马影响 12; importance of to humanism 对人文主义的重要性 156, 157;  
professional 职业教育 193 - 194; Prussian 普鲁士教育 100, 110;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33 - 35; in Rousseau's philosophy 在卢梭哲学中 68; in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 170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112, 138 - 139

Eliot, George 乔治·爱略特 107 - 109, 112, 162, 189

Eliot, T. S. T. S. 艾略特 153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伊丽莎白一世 34

Elizabethan literature 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 31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78, 101, 144

*Encyclopedie* 百科全书派 59, 61

Engels, Friederich 恩格斯 142

English civil war 英国内战 51, 52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时期 49 - 83, 86, 88, 98, 129, 134, 153, 159, 199, 165 -  
166, 172, 179

Erasmus 伊拉斯谟 8, 9, 13, 25, 26, 31, 33, 34, 40, 45 - 46, 161, 162

Este, Niccolod' 埃斯特 33

Euripides 欧里庇德斯 133 - 134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欧洲人权公约 184

evolution 进化 90, 145, 160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63

Eyck, Jan van 爱克 36, 38

## 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31, 148, 171 - 172, 173 - 174, 176

Faulkner, William 福克纳 154

Feltre, Vittorino da 费尔特莱 33

Ferrara 斐拉拉 20, 33, 96

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费尔巴赫 108

Ficino, Marsilio 斐契诺 24, 30 - 31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88, 131, 133, 146, 158, 175, 190, 192, 195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107

Flaxman, John 弗莱克斯曼 73

Flemalle, Master of 佛莱马尔的大师 36

Florence 佛罗伦斯 18, 19, 23, 24 - 25, 27, 28, 30, 33, 38, 42, 44, 49, 53, 107, 150, 192.

Fontane, Theodor 方坦纳 107

Fragonard, Jean Honore 弗拉戈纳 70

France 法国 56;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人文主义 26, 31; Dreyfus affaire 德莱福斯案件 129; education 教育 34, 110;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49, 50; expulsion of Jesuits 驱逐耶稣会教士 57, 129; foundation of economics 经济学基础 61; invasion of Italy 入侵意大利 42; language 语言 36, 49; Revolution 革命 65, 69, 74, 80, 81 - 83, 85, 92 - 93, 110;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93; Second Republic 第二共和国 92 - 93;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185; social reforms 社会改革 140; 20th century art 二十世纪艺术 149

franchise 选举权 88, 91, 93, 109, 112, 129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弗朗西斯一世 26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49, 80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腓特烈大王 49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法国国民议会 88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9, 112, 135, 137, 143, 144 - 147, 148, 149, 154, 157, 160, 180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160

## G

Galileo 伽利略 13, 39, 51

Gandhi, Mahatma 甘地 183

Gay, Peter 盖伊 49, 54, 65, 67, 146, 154

Geneva 日内瓦 56, 69

Germany 德国,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人文主义 26, 31;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 195; humanism in 人文主义在德国 95, 101, 179; industrial democracy 工业民主 194;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03; literature 文学 96 - 98; Lutheranism 路德派改革 33; Nazism 纳粹 169, 172, 173, 174, 176, 178 - 179, 185, 195; Pietism 虔诚主义 57;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74;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 - 196; social reforms 社会改革 140; 20th century art 二十世纪艺术 149; unification of 德国的统一 120

Gibbon, Edward 吉朋 28, 49, 55

Giorgione 吉奥吉奥尼 25

Giotto 乔托 24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格拉斯东 78, 105, 110

Gnostics 诺斯替派 30, 148

Goethe 歌德 8, 9, 15, 45, 73, 74, 77, 95, 96 - 98, 99, 100, 101, 103, 104, 110, 135, 157, 158, 159, 162, 164, 167, 179, 180

Gonzaga family 贡札加家族 33

Gothic Revival 哥特式复活 75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192

Great Britain 英国 85; Biblical humanism 圣经人文主义 31; Civil War 内战 51, 52; constitution 宪法 62; deism 自然神论 57; education 教育 34, 110;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86, 103; language 语言 36; modern art 现代艺术 149;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 88, 105, 109;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101 - 104; social

reforms 社会改革 140

Greece, German occupation of 德军占领希腊 175

Greece 希腊, ancient 古代 11 - 12, 67, 157; and English humanism 与英国人文主义 101, 105, 110; and German humanism 与德国人文主义 98; and Neoclassicism 与新古典主义 72 - 73, 75; Nietzsche's view of 尼采对希腊的看法 134; philosophy 哲学 14; Renaissance attitudes to 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的态度 18

Greek language 希腊文 20, 21, 23, 26, 33

Greek Revival 希腊复兴 75

Gropius, Walter 格鲁庇护斯 149, 150 - 151

Grote, George 格罗特 105

Guarino da Verona 圭里诺·达·维罗那 33

207 Guicciardini, Francesco 圭契阿第尼 25, 28, 42

## H

Habermas, Jürgen 哈贝马斯 192

Hadrian, Emperor 哈德里安皇帝 73

Haeckel, Ernst 哈克尔 130

Hamilton, Alexander 汉弥尔登 80

Handel, George Frederic 亨德尔 151

Haydn, Joseph 海顿 96

Hebrew studies 希伯来研究 26, 110

Hegel, Georg William Friedrich 黑格尔 102, 195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尔 191

Heisenberg, Werner Karl 海森堡 138 - 139

Heller, Erich 海勒 153

Helvitiu, Claud Adrien 赫尔维修斯 62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八世 34

Hepworth, Barbara 赫普沃思 149, 150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赫尔德 76 - 77, 78, 83, 95, 98, 102, 103

Hermes Trismegistus 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30

High Renaissance 高峰期文艺复兴 40, 43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94 - 95  
history 历史 Marx's view of 马克思观点 93 - 4; Renaissance attitudes to 文艺复兴时期的态度 28, 35; 20th century attitudes to 二十世纪的态度 140 - 1  
Hitler, Adolf 希特勒 112, 138, 158, 161, 169, 172, 174, 176, 179, 180, 185, 186, 195 - 96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51  
Hobhouse, L. T. 霍布豪斯 140  
Hogarth, William 霍加斯 71  
Holbach, Barond' 霍尔巴赫 56, 62 - 63  
Holbein, Hans 贺尔拜因 39 - 40  
Holderlin, Johann Chritian Friedrich 荷尔德林 75  
Homer 荷马 22, 35, 72, 73, 112  
Horace 贺拉斯 61, 71  
Huguenots 胡格诺派 55, 56  
human nature 人的本性 Enlightenment view of 启蒙运动对人性的看法 62 - 5; in Rousseau's philosophy 卢梭哲学中的看法 67 - 70  
human rights 人权 80, 88, 155, 171, 183 - 184, 189  
Humboldt, Alexander von 亚力山大·冯·洪堡 99  
Humboldt, Wilhelm von 威廉·冯·洪堡 98, 99 - 100, 110, 158, 179  
Hume, David 休谟 49, 50, 56, 62 - 65, 66 - 67, 70, 72, 78, 79, 83, 130, 159, 181  
Huxley, T. H. 赫胥黎 90, 112, 143, 165

## I

Ibsen, Henrik 易卜生 133 - 134, 136 - 137, 180, 189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77, 85, 112, 129  
India 印度 51, 142, 149, 157, 164, 182 - 183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61, 85 - 86, 112, 140, 169, 196  
Innocent III, Pope 英诺森三世 28, 30  
Inquisition 宗教法庭 46

Ireland 爱尔兰 105

irrational, the 非理性 134 - 135, 145, 153, 160, 190 - 191

Islam 伊斯兰教 51, 155, 157, 172, 183

Israel 以色列 177, 180, 196

Italy 意大利, arts 艺术 23 - 25, 36 - 40, 149; education 教育 34;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72, 176; French invasion 法国入侵 42; High Renaissance 高峰期文艺复兴 40; printing 绘画 25;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11 - 47, 95, 96; unification of 统一 129

## J

James, Henry 亨利·詹姆斯 107, 143

James,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9, 143 - 144, 145 - 146, 154, 162, 181

Japan 日本 85, 196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49, 80

Jena 耶拿 96, 99; 84

Jesuits 耶稣会 34, 46, 57 - 58, 129

Jews 犹太人 59, 174, 177, 196

Joyce, James 乔伊斯 154

Judaism 犹太教 142, 162

Julius II, Pope 朱利乌斯二世 25, 40

Jung, Karl Gustav 荣格 143, 147 - 149; 93

## K

Kafka, Franz 卡夫卡 153, 191

Kandinsky, Vassily 康定斯基 149, 150

Kant, Immanuel 康德 49, 61, 78 - 79, 80, 83, 101, 162

Keats, John 济慈 75, 101

Kelvin, William Thomson 凯尔文 139

Kempis, Thomas 肯比斯 31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 140, 180, 192 - 193



King,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金 189 - 190

Klee, Paul 克利 149, 150

Knox, John 诺克斯 47

Koestler, Arthur 库斯特勒 168

Krohg, Christian 克罗格 137

## L

Labour Party (British) 工党 140

Lambarene 兰伯拉尼 163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de 拉米特里 63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169, 176, 182, 184

Latin language 拉丁文 14, 20, 21, 22, 33, 35 - 36

Lawrence, D. H. 劳伦斯 153

Léger, Fernand 莱格 149

Lenin 列宁 112

Leo X, Pope 利奥十世 38

Leonardo da Vinci 辽那多·达芬奇 26, 33, 38 - 39, 71 - 72, 98, 151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莱辛 49, 57, 59, 70, 71, 162

Lévi Strauss, Claude 列维·斯特劳斯 191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78, 110, 112 - 129, 131, 140, 154

literature 文学 158; German 德国文学 96 - 8; Golden Age 黄金时代 36; 19th century 十九世纪 107 - 10; Renaissance humanist influences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影响 31;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 153 - 154

Livy 李维 22, 28

Lloyd George, David 劳合·乔治 192

Locke, John 洛克 9, 52 - 4, 68, 78, 144, 162

London 伦敦 34, 49, 57, 74, 105, 169, 170

Loos, Adolf 鲁斯 149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六 82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20, 26, 31

Loyola, Ignatius 罗耀拉 34, 105

Lucretius 卢克莱修 55, 165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26, 32 - 33, 34, 45 - 46, 47, 100, 161, 179

Lyell, Sir Charles 莱伊尔 165

## M

Mach, Ernst 马赫 139, 168

Machiavelli, Niccolo 马基雅维里 25, 28 - 29, 42, 43, 44

Malthus, Thomas 马尔萨斯 93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85, 86

Mandelstam, Nadezhda 纳德兹达·曼德尔斯塔姆 182

Mandelstam, Osip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 181 - 182

Manet, Edourd 马奈 107

Manetti, Giannozzo 马奈蒂 30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9, 154, 158 - 159, 179, 189

mannerism 矫揉主义(亦译风格主义) 40 - 41

Mantua 曼图亚 20, 24, 33, 96

Marguerite of Navarre 纳瓦尔的玛格丽特 34

Marx, Karl 马克思 62, 90, 93 - 95, 102, 140, 142, 147, 192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94 - 95, 155, 157, 172 - 174, 176, 192

Masaccio 马萨契奥 24, 38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110, 139, 142

Matisse, Henri 马蒂斯 149

Mazzinni, Giuseppe 马志尼 77

Medici, Cosimo de 科西摩·梅迪齐 24, 30

Medici, Lorenzo de 洛伦佐·梅迪齐 24 - 25, 30, 192

Medici family 梅迪齐家族 20, 30, 41, 42

Melanchton, Philipp 梅兰克东 26, 32 - 33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18, 101, 139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07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169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33, 39, 40 - 41, 44

Middle Ages 中世纪 13 - 14, 15, 16, 21, 36, 75, 151

Mies van der Rohe, Ludwig 密斯·凡·德·罗厄 149, 150

Milan 米兰 19, 23, 27

Mill, James 詹姆斯·穆勒 104

Mill, John Stuart 约翰·穆勒 9, 65, 90, 93, 99, 103 - 106, 108, 109, 129, 130, 142

Millar, John 米拉 50, 60

Milton, John 弥尔顿 36

"modern period" "现代时期" 133, 137 - 138

Moliere 莫里哀 51

Mondrian, Piet 蒙德里安 149, 150

Monet, Claude 莫奈 107

monist philosophy 一元论哲学 130

Montaigne, Michel, Sieur de 蒙田 9, 13, 18, 26, 36, 44 - 45, 46, 78, 109, 155, 158, 159, 166, 179 - 180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49, 59, 61 - 62, 70, 72, 140, 159

Moore, G. E. 莫尔 192

Moore, Henry 亨利·莫尔 149

morality 道德,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时期 62 - 4; in Ibsen's drama 易卜生剧本中 133 - 134; in Kant's philosophy 康德哲学中 78 - 9; Non - conformist 非国教派 110; in Rousseau's philosophy 卢梭哲学中 69

Morant, Sit Robert Laurie 莫兰特 110

More, Sir Thomas 莫尔 8, 12, 26, 33, 34, 40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111 - 112, 180

Mounier, Jean Joseph 莫尼埃 81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莫扎特 96, 151, 167

Munch, Edward 门奇 149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现代艺术博物馆 152 - 3

music 音乐 96, 153, 157

mysticism 神秘主义 30, 31

mythology 神话 31, 148, 158

## N

Naples 那不勒斯 19, 42, 49

Napoleon I, Emperor of the French 拿破仑一世 88, 99, 110

Napoleon III, Emperor of the French 拿破仑三世 93

Napoleonic Wars 拿破仑战争 81, 99 - 100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77 - 78, 112, 171 - 172

nature 自然, and Enlightenment science 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 52; in Goethe's work 歌德作品中 97 - 98; 19th-century views of 十九世纪的观点 90; return to 回归大自然 38 - 39;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76, 102 - 3

Nazi - Soviet Pact 纳苏条约 174

Nazism 纳粹主义 9, 100, 148, 169, 171 - 172, 173, 174, 178, 179, 195

Neoclassicism 新古典主义 72 - 74, 75, 151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24 - 25, 30 - 31, 38, 40, 44, 162

Netherlands 荷兰 36, 56, 71

New Learning 新学 8, 12, 13, 32, 34

New Testament 新约(圣经) 26, 31

New World 新世界 51, 85

New York 纽约 170

Newton, Isaac 牛顿 52, 53 - 54, 56 - 57, 61, 90, 138, 162

Nicholas of Cusa 尼古拉斯(古萨枢机主教) 30, 54

Nicholson, Ben 尼科尔逊 149, 150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 162 - 163, 165

Niethammer, F. J. 尼特哈麦 12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112, 134 - 136, 145, 153

Nonconformism 非国教主义 110

northern humanism 北方人文主义 31

northern Renaissance 北方文艺复兴 25 - 26

numbers 数, proportion 比例 38 - 39; symbolism 象征 31

## O

Old Testament 旧约(圣经) 56  
Ortega y Gasset, Jose 奥特加·加塞特 8, 150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195  
Ossian 奥西安 73  
Ovid 奥维德 14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12, 26

## P

Padua 巴图阿 25, 96  
Paepcke, Walter 配普克 8  
Paestum 派伊斯图姆 73  
Paintings 绘画 24, 70 - 74, 107, 157 - 158  
Palladio, Andrea 巴拉第奥 42  
Panofsky, Erwin 潘诺夫斯基 14, 40  
Papacy 教廷 20, 25, 32  
Pareto, Vilfredo 巴列托 141  
Paris 巴黎 26, 49, 57, 59, 67, 74, 85, 149  
Pearson, Karl 皮尔逊 129  
Petrarch 彼特拉克 9, 14 - 15, 17 - 8, 22 - 23, 28, 30, 35 - 36, 52, 157  
Peirce, C. S. 皮尔士 144  
Pevsner, Nikolaus 彼夫斯纳 74  
*philosophes* 哲学家 9, 49, 53 - 56, 58 - 61, 65, 66 - 67, 69, 70, 80, 81, 83, 98, 156, 159, 165  
physics 物理学 52, 90, 138 - 139, 144, 169, 196  
Physiocrats 重农学派 61  
Picasso, Pablo 毕加索 112, 149, 150, 151, 154  
Pico della Mirandola 米兰多拉 31, 44, 54

- Pietism 虔信主义 57
- Pirandello, Luigi 皮蓝德娄 153
- Piranesi, Giambattista 皮蓝纳齐 73, 75
- Pius II, Pope 庇护士二世 25
- Plancke, Max 普朗克 138
- 208 Plato 柏拉图 9, 21, 22, 23, 24, 30, 71, 105, 144
-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 24
- Plotinus 普洛丁 30
- Plutarch 普鲁塔克 22, 23
- Poggio Bracciolini 波吉奥 28
- Pompeii 庞贝 73
- Pope, Alexander 蒲柏 52, 57
-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174
- Population 人口, growth of 增长 169 - 170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90, 91, 105, 130, 139, 160
- Pound, Ezra 庞德 153
-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44
-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172, 192
- Priestley, Joseph 普里斯特莱 61
- Proclus 普罗克尔 30
- proportion, theory of 比例理论 24, 38 - 39, 71 - 72
- Protestantism 新教主义 31, 32, 46, 95, 100 - 101, 142, 161
- Proust, Marcel 普鲁斯特 107, 154
- Prussia 普鲁士 76, 78, 82, 85, 99 - 100, 110
- Psychology 心理学 142 - 149
- Ptolemy 托勒密 14
- Puritanism 清教主义 110
- Pythagorean 毕达戈拉斯式 31, 71

## Q

Quintilian 昆的利安 11

## R

- Rabelais, Francois 拉伯雷 13, 26, 36
- Raphael 拉斐尔 38, 39, 40, 71
- Rastafarians 拉斯塔法里派 148
- Rathenau, Walther 拉特脑 158
-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13, 31, 32, 46, 161, 179
- Reeves, Henry 里夫斯 92
- Reform Act(1832) 改革法(1832) 88
- Reform Act(1867) 改革法(1867) 109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13, 31, 32, 46, 161, 179
- religion 宗教 141;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人文主义 13, 26, 30, 31 - 33, 161;  
in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时期 51 - 52, 55 - 58; and German humanism 与  
德国人文主义 100 - 1; humanism and 人文主义与宗教 160 - 165; 19th - century  
十九世纪 108; Nonconformism 非国教主义 110; psychological function of 宗  
教的心理功能 148 - 149; and the Reformation 与宗教改革 32 - 33;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29 - 30, 55; social function of 宗教  
的社会功能 142, 148;
- Religion of Humanity 人道宗教 90, 108
- Rembrabdt, Harmensz van Rijn 伦勃朗 51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8, 11 - 47, 54 - 55, 83, 95, 96, 98, 149, 179
- Renoir, Pierre Auguste 雷诺阿 107
- Resistance movements 抵抗运动 177 - 178
- Revealed Religion 天启宗教 55, 57, 60
- revolution 革命 85, 91
- Reynolds, Sir Joshua 雷诺兹 74
-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88, 192
- Rickert, Heinrich 里克特 142
- Ridolfi, Roberto 里多尔非 28 - 29
- Rilke, Rainer Maria 里尔克 135

Rimbaud, Arthur 兰波 135  
Robertson, William 罗伯逊 50  
Robespierre, Masimilien Marie Isidore de 罗伯斯庇尔 82  
Rococo 洛可可 70, 74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11 - 12, 14 - 15, 53, 55, 67, 69, 74, 110, 157  
Romanesque 罗马式 36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74, 101 - 104, 147, 179  
Rome 罗马 14, 18, 19 - 20, 25, 27, 42, 73, 150  
Ronchamp 朗香 149  
Rontgen, Wilhelm Konrad von 伦琴 138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罗斯福 180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49 - 50, 59 - 60, 65 - 70, 72, 76, 78, 79, 81, 82, 83, 159  
Ruskin, John 拉斯金 111, 112, 180  
Russell, Bertrand 罗素 144, 161 - 162, 165, 166  
Rutherford, Ernest 鲁瑟福特 138

## S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圣约翰学院 26  
St. Just, Louis Antoine de 圣茹斯特 82  
Salutati, Coluccio 萨鲁塔蒂 23, 31  
Salzburg, Archbishop of 萨尔斯堡大主教 50  
Sartre, Jean Paul 萨特 153  
Savonarola, Girolamo 萨伏那罗拉 25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谢林 101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席勒 98, 99, 100, 101, 142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施莱马赫 98, 100 - 101, 161, 162  
Scholasticism 经院主义 18, 22, 157  
Schubert, Franz 舒伯特 96  
Schumacher, E. F. 舒马赫 170  
Schweitzer, Albert 施维策尔 8, 162 - 163, 165



science 科学 in 20th century 在二十世纪 138 - 139; 18th century advances 十八世纪的进步 61;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时期 52, 165 - 166; and Goethe's development 与歌德的发展 97 - 98; humanism and 人文主义与科学 164, 165 - 168; 19th century 十九世纪 90,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38; and 20th century problems 与二十世纪的问题 170  
 scientific humanism 科学人文主义 91  
 Scotland 苏格兰 50, 61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149, 169, 175, 176, 177 - 178  
 secular humanism 世俗人文主义 91, 160  
 Select Society, The 精选会 50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36, 43 - 44, 71, 97, 107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莱 75, 101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49, 50, 60, 61, 62, 83, 88, 129, 140, 159, 180, 192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90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 140, 173  
 socialism 社会主义 93 - 95, 111, 129, 140, 142, 171  
 sociology 社会学 61 - 62, 140 - 2, 158  
 Socrates 苏格拉底 18, 45, 64, 105  
 Sorel, Georges 索莱尔 112, 135  
 Soufflot, J. G. 苏弗洛 74  
 Soviet Union 苏联 169, 172 - 4, 175, 176, 182, 194  
 Spain 西班牙,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人文主义 26; expulsion of jesuits 驱逐耶稣会教士 57;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74, 176; language 语言 36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175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90, 129  
 Spinoza, Baruch 斯宾诺莎 51  
 Stalin, Joseph 斯大林 138, 169, 174, 175, 176, 180, 182, 186  
 Steichen, Edward 斯提青 152 - 153  
 Steiner, George 斯坦纳 179, 191  
 Stieglitz, Alfred 斯提格里兹 152

Stoffels, Eugene 斯托费尔 91  
Stoicism 斯多噶主义 22, 29, 68, 179 - 180  
Stravinsky, Igor 斯特拉文斯基 149, 151, 157  
Strindberg, August 斯特林堡 135 - 137  
Stuart, James "Athenian" 斯图尔特 73  
Sturm, Johannes 斯托姆 34  
*Sturm und drang* 狂飚运动 74, 76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 153  
Sutherland, Graham 苏瑟兰 149

## T

Tacitus 塔西陀 22  
Taine, Hippolyte 泰纳 129 - 130  
Tawney, R. H. 唐尼 140  
Taylor, Harriet 泰勒 105  
technology 技术 139, 170, 195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萨克莱 107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70, 183, 191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 183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22, 28, 35, 152  
Tintoretto 丁托莱托 25  
Titian 提香 25, 39, 40, 42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85, 86, 91 - 93, 99, 105, 106  
Tolstoy, Leo 托尔斯泰 183  
Tonnies, Ferdinand 土尼斯 141  
Trilling, Leonel 特里林 109, 147  
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杜尔戈 61, 80  
Turkish Empire 土耳其帝国 129

## U

unconscious 无意识 145 - 146, 147 - 148, 149, 160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8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177, 192;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189 - 190; Constitution 宪法 62, 80 - 81;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80; democracy 民主 91 - 92; and the Enlightenment 与启蒙运动 80 - 81;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85;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 88

universities 大学 34, 105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12, 130, 140

Urbino 乌比诺 20, 95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65, 88, 108, 129

## V

Valla, Lorenzo 伐拉 32, 35

Van der Goes, Hugo 凡·德·戈斯 36

Van der Weyden, Rogier 凡·德·维顿 36

Vasari, Giorgio 伐萨里 25

Vatican 梵蒂冈 40

Veblen, Thorstein 费伯伦 141

Velasquez, Diego de Silva y 维拉斯克斯 151

Venice 威尼斯 18 - 20, 25, 27, 42, 107

Vergil 维吉尔 14, 22, 35

Verlaine, Paul 魏尔伦 135

Veronese, Paolo 维罗尼斯 25

Vico, Giovanni Battista 维柯 76, 77, 158, 167

Vienna 维也纳 85, 95, 112

Virtu 美德、力量 27, 43

Visconti, Giangaleazzo 维斯康蒂 23

Visconti family 维斯康蒂家族 27

Vitruvius 维特鲁维 24

Voltaire 伏尔泰 9, 49 - 50, 53, 55 - 7, 59 - 60, 61, 66 - 67, 70, 72, 83, 159, 160, 162, 165

Vulgate Bible 拉丁文圣经 26, 31

## W

Wallas, Graham 瓦拉斯 140, 141

Wars of Religion 宗教战争 13, 42, 44, 51, 137, 158, 175, 180

Washington 华盛顿 74

Watt, James 瓦特 61

Watteau, Jean Antoine 瓦多 70

Weber, Max 韦伯 9, 142, 157, 180, 191

Wedgwood, Josiah 威治伍德 73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158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140, 184

Wesley, John 威斯莱 57

*Westminster Review* 威斯特敏斯特评论 108

Whitehead, A. N. 怀特海德 144, 168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温克尔曼 15, 72 - 73, 75, 98

Wölfflin, Heinrich 伍尔夫林 40

women's rights 女权 187, 189

Woolf, Virginia 伍尔夫 133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 101, 102 - 103, 105

Wright, Frank Lloyd 赖特 149, 150

Wyatt, James 威阿特 73

## X

Xenophon 色诺芬 23

Ximenes, Francisco Jimenez de Cisernos, Cardinal 希门尼斯枢机主教 26

## Y

Yates, Frances 叶芝 31

Yeats, W. B. 叶芝 153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174, 176

## **Z**

Zola, Emile 左拉 107